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伊莎多拉·邓肯



## 第一章 天骄少女

五岁的小伊莎多拉便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

十一岁，她开始了自己的初恋，且激情持续了两年。

为了生存，伊莎多拉不得不满足经理的低级要求，跳“刺激性”的舞蹈。她历经苦难。

在芝加哥，伊莎多拉陷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的情网。他吻了她，并向她求婚。

但她不解风情。

伊莎多拉和经理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她不想当艺妓。

18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旧金山降临人世。

按照伊莎多拉自己的说法，她的性格在娘胎里就已经定了，她在娘胎里便开始跳舞。

母亲怀她的时候，痛苦得经常说：“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而且预料会生下一个怪物。

伊莎多拉一生下来，似乎就开始手舞足蹈。母亲此时不由得大叫：“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伊莎多拉成了全家和朋友们的笑料：他们给她穿上衣服，放在桌子上，然后演奏音乐曲子，于是她便随着舞起来。

伊莎多拉还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和母亲便离了婚。孩子们都由母亲抚养。她的母亲很穷，家里雇不起佣人，也请不起家庭教师。由于缴不起房租，他们经常被房东赶走，一次甚至连续搬了15次家。

五岁时，伊莎多拉就到公立学校读书了，因为在外工作的母亲必须给这个好动的孩子找个安置的地方。

伊莎多拉大约六岁时，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她召集了六七个街坊上的孩子——他们小得还不会走路——让他们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她在干吗，她说这是自己办的舞蹈学校。邓肯夫人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面为她弹奏乐曲。后来，这个“学校”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大受欢迎，邻居的小姑娘都来了。他们的父母给伊莎多拉一点儿钱，让她教她们。伊莎多拉成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舞蹈教师”。

伊莎多拉十岁的时候，来学跳舞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她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会挣钱了，这比上学重要得多，上学只会浪费时间。她把头发梳拢，盘在头顶上，自称十六岁。

就年龄来说，她的个子很高，谁听了都会相信。她的姐姐伊丽莎白是由姥姥抚养大的，后来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参加了教这些班的舞蹈。需要她们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都请她去教舞蹈了。

伊莎多拉从来没见过父亲。有一次她问姨妈，她是不是有过父亲。姨妈回答说：“你父亲是个恶魔，毁了你母亲的一生。”从此以后，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图画书中有角有尾巴的恶魔。在学校里，当别的孩子谈到他们父亲的时候，她则一声不吭。

伊莎多拉七岁时，全家住在三楼的两间四壁空空的房间里。有一天，她听见前门铃声响，到前厅开了门。来人是一个头戴礼帽的绅士。他说：

“请问，邓肯太太家在哪儿住？”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伊莎多拉回答。

“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吗？”那位陌生绅士说。

他突然把伊莎多拉抱在怀里，泪流满面，不断地吻她。伊莎多拉非常惊讶，问他是谁，他流着泪回答：“我就是你爸爸。”

伊莎多拉一听，高兴极了，连忙跑进去告诉全家。

“来了个人，他说他是我爸爸，”伊莎多拉说。

她的母亲一下子站了起来。她脸色苍白，神情激动，走进隔壁房间，随手锁上了门。

她的哥哥一个钻到床下，另一个躲到碗柜后面，姐姐则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

“叫他走开，叫他走开，”他们叫喊道。

伊莎多拉非常诧异，但她走到前厅，很有礼貌地对他说：“家里人不大舒服，今天不见客。”

她的父亲听了，拉着她的手，要她跟他一起去散散步。

下楼来到街上，走在他旁边，伊莎多拉茫然不解地想：这个漂亮的绅士是我的父亲，可他不像我一直想象的那样，既没有长角，也没有长尾巴呀。

父亲把她带到一家冷饮店，让她把冰激凌和点心吃了个够。伊莎多拉十分兴奋地回到家里，可是发现全家人情绪却非常沮丧。

“他真漂亮，明天还要来，给我多多的冰激凌。”她告诉他们说。

但是全家人拒绝见他。不久以后，她的父亲回到洛杉矶他的另一个家去了。

以后，伊莎多拉有几年再没见到父亲，一直到他又一次突然出现。这一次，她的母亲大发慈悲见了她。他送给他们一所漂亮的房子，里面有舞蹈室、网球场、仓房，还有一座磨坊。

邓肯夫人是一名音乐教师，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是在音乐和诗歌熏陶之中度过的。每天晚上，母亲坐在钢琴旁，一弹就是几个钟头。孩子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很有才气。她常来他们家做客，并且常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活动。她长得很漂亮，一双黑眼睛，一头乌亮的头发。她嗓子很甜，要不是她父亲把和戏剧相关的一切都看成属于魔鬼的东西，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歌唱家。

“我宁愿看见我女儿死，也不愿看见她在舞台上演出。”她的父亲当时这么讲。

搬进父亲给他们的那所大房子以后，首先是伊莎多拉的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库房里开张了。他把客厅里的皮毛垫子割了一块作胡子，扮演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瑞普·凡·温克尔。

他演得非常逼真，小伊莎多拉坐在饼干箱上看戏，感动得直流泪。

这个小小的剧院越办越好，在邻里中受到热烈的赞誉，因此，后来他们就想到海滨会巡回演出。伊莎多拉跳舞，奥古斯丁朗读诗歌，然后合演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扮演了角色。尽管伊莎多拉当时才十二岁，其余的孩子也不过十几岁，他们遍及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的巡回演出却非常成功。

伊莎多拉童年时的主导精神，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狭隘束缚，对强加于生活的种种限制不断反抗，以及对东方日益向往。在她的想象中，东方一定也是比较宽广的。当时她常常在家人和亲友面前侃侃而谈，而且总是这

样结束她的演说：“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在全家人中，小伊莎多拉是最有勇气的。当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了，她就自告奋勇到肉铺去。耍点小花招，诱使肉铺老板赊给一点羊肉片。派到面包师那儿去的也是她，去左说右说，央求面包师继续让她家赊购。出门办这类事，小伊莎多拉总是得到真正的冒险乐趣，特别是成功的时候（而她总是成功）。高高兴兴地回家，跳着舞，手里拿着战利品，心里的欢欣就跟抢掠得手的强盗一样。这是很好的一种教育，因为从哄骗凶恶的肉铺老板中，她学得了一种本领，后来能够对付凶恶的经理人。

一次，邓肯夫人因为商店不肯收购她编织的一些东西哭了。伊莎多拉便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帽子戴在头上，织好的手套戴在手上，挨家挨户兜售叫卖。东西不仅全部卖掉了，她带回家里的钱还比商店给的多上一倍。

有些家长说，他们工作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的钱。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正好是把这些孩子生活中的冒险精神一笔勾销了。因为给子女们留下的钱越多，孩子们就越软弱无能。给子女最好的遗产就是放手让他自奔前程，完全依靠他自己两条腿走自己的路。这是伊莎多拉·邓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经验。

一到晚上，邓肯夫人给孩子们弹琴，小伊莎多拉就即兴表演舞蹈。

有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是她家的朋友，常去她们家消磨晚上的时间。她从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住过，她说伊莎多拉使她想起了意大利著名芭蕾舞演员范妮·艾斯勒，常常给她们讲述艾斯勒大获成功的故事。她总是说：“伊莎多拉将成为范妮·艾斯勒第二。”

她的话激励了小伊莎多拉的雄心壮志。

老太太让邓肯夫人把伊莎多拉送到了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芭蕾舞教师那里去学习。

但是，伊莎多拉并不喜欢这位教师的课。当他让她用脚尖站立起来的时候，她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这样美。”伊莎多拉说那很丑，不自然。上完三课以后，她就不去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去。

在小伊莎多拉看来，那个芭蕾舞教师称之为舞蹈的那些僵硬而陈腐的体操动作，只是扰乱了她的理想。她追求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舞蹈。她说不清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然而她探索着，走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一旦找到钥匙，她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

离开学校以后，伊莎多拉依然喜欢读书。他们一家当时住在奥克兰，那里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尽管离家很远，她还是跑着步，或是跳着舞，跳跳蹦蹦到那里去。

图书管理员名叫艾娜。她鼓励小伊莎多拉看书，当她向她借好书的时候，她总是显得很高兴，美丽的眼睛充满着热情。艾娜曾经和伊莎多拉的父亲热恋过，她显然是他终生钟情的对象，大概是这根看不见的命运之线把伊莎多拉引向她的。

那时伊莎多拉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无数小说，有好有坏——贪婪地什么都读。往往坐在白天搜集来的蜡烛头的亮光下通宵读书，直到黎明。

那时伊莎多拉还坚持记日记，并为它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这时

候她有了一个巨大的秘密：陷入了情网。

除了儿童班以外，伊丽莎白和伊莎多拉还收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伊丽莎白教他们跳交际舞，如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等等。

这批学生中有两个青年，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英俊潇洒，名字也挺漂亮——弗农。

伊莎多拉当时才十一岁，由于云鬓高耸，衣衫垂地，所以看起来要大一些。她狂热地爱上了他。但她不知道弗农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那样的年纪，她实在不好意思去吐露自己的爱情。

他们一起去参加各种舞会，他几乎每个舞都和她一起跳。舞会以后，伊莎多拉迟迟不能入睡，直到凌晨还在写日记，叙述自己极度狂喜的心情：“我在他的怀抱中飘飘荡荡。”

弗农在一家药房里工作，小伊莎多拉常常为了经过他面前，不惜走上好几里路。有时候还鼓足勇气走进店里跟他打个招呼。她甚至找到了他租住的那所房子，经常在晚上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

这种激情一直延续了两年，伊莎多拉受尽了相思之苦。

最终，弗农宣布和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姑娘结婚，伊莎多拉只得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失望和痛苦。在他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看着弗农和一个蒙着白纱、貌不出众的姑娘一起走向圣坛，伊莎多拉仿佛落入了无底深渊。此后，两人的联系断了。

多年后，伊莎多拉在旧金山演出。一天，一位白发苍苍，但看起来很年轻、漂亮的男子走进她的化妆室。她一下子认出了他，是弗农。伊莎多拉想，过了这么些年，总可以把年轻时候的热情告诉他，他可能会感到有趣。然而，他却异常害怕，马上就和她谈到他的妻子，他对妻子的眷恋之情始终不衰。

这就是伊莎多拉的初恋。她爱得发狂。而从那以后，伊莎多拉从没有停止过疯狂的恋爱。

受所读书籍影响，伊莎多拉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国外去旅行，想随同某个大剧团出去。

于是，有一天她去拜访一家巡回剧团的经理，请求允许给他表演一下舞蹈。

试演是在一个又大又黑、空荡荡的舞台上进行的。邓肯夫人为女儿伴奏。跳完以后，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对邓肯夫人说：

“这种玩意儿不适合在剧场演出，它更适合于教堂。您还是把小姑娘领回家去吧。”

伊莎多拉大失所望，但她并不死心，又开始想别的主意出国。她邀集了全家人来商量，侃侃而谈，说了一个多钟头，向他们讲清楚了为什么在旧金山再也不能待下去的种种理由。邓肯夫人有点困惑不解，但她乐意跟伊莎多拉到任何地方去。于是她们两人决定先期出发去芝加哥。伊莎多拉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留在旧金山，等有朝一日伊莎多拉给全家挣得财富后再来接他们。

她们到达芝加哥时，正是大热的6月。她们随身只带了一只小提箱和伊莎多拉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外加二十五美元。伊莎多拉盼望能立刻得到聘用，这样一切事情便会十分顺利和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伊莎多拉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但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说：“好

倒很好，只是不适宜舞台演出。”

过了几星期，她们的钱渐渐花光了，典押首饰也没有弄到多少钱。后来，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们付不出房租，行李全被扣留；再后来，她们被拒于门外，身无分文，只得踟蹰街头。

伊莎多拉的外衣衣领上有一个小小的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总算在傍晚的时候把它脱了手，卖了十美元，足够再租一间房子了。至于剩下的钱，伊莎多拉想了个办法，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接连一个星期，她们就吃这些西红柿度日。吃不着面包，也没有盐吃，可怜的邓肯夫人衰弱得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伊莎多拉就出门，想尽办法去见经理。最后她只好决定，只要有工作，干什么都行。于是她便去找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介绍所的人问她。

“什么都会。”伊莎多拉回答。

“哼，依我看，你什么也不会！”

绝望之中，有一天伊莎多拉去找共济会教堂屋顶花园的经理。他嘴里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傲慢地看完了她的舞。

“嗯，你长得不错，”他说，“风度也挺优美。如果你肯改变一下，不跳这些，跳点有刺激性的玩意儿，那么我可以雇用你。”

想到家里饿得发晕的妈妈，伊莎多拉便问他：“你所说的‘刺激性’是指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跳的这些。得穿短裙，加点花边，还得甩大腿。你可以先跳点希腊舞蹈，然后再转动花边裙子，甩开大腿，那就引人注目了。”

但是她上哪儿去找带花边的裙子呢？伊莎多拉知道，开口借支或预支是没有好处的。

她只说了一句明天我带刺激性的东西再来，就走了出来。

那天正是芝加哥通常特别热的天气。她徘徊在大街上，又饿又累，差点晕倒。她忽然看见旁边有一家百货公司的一个分店，便走了进去，要求见经理。

她被引进办公室，一位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面，瞧上去很和气。于是她向他解释，明天上午她需要有一件带花边的裙子，如果他能赊给她，她一定订了合同就付款。

这位年轻人应允了她的请求。若干年以后，伊莎多拉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伊莎多拉买了做裙子的白色和红色布料，还有荷叶花边。挟着这一大包衣料回到家，她的母亲已经气息奄奄了。

但邓肯夫人坚持从床上坐起来，为女儿赶制服装。她干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才缝完最后一个褶子。

伊莎多拉带着这套服装再去拜访那个经理，乐队已经做好了试演的准备。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伊莎多拉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随口说了一句：“《华盛顿邮车》吧！”这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

音乐奏了起来，伊莎多拉尽最大努力给经理跳了一段“刺激性”的舞蹈，边跳边编。

经理简直高兴极了，从嘴里取出雪茄，说道：“跳得不赖！你明天晚上就可以上台，我要替你宣布一个特别节目。”

他给了伊莎多拉周薪五十美元，并且预付了她一个星期的钱。

伊莎多拉用了一个艺名在屋顶花园登台表演，获得很大成功。但她心里腻味透了。

到了周末，经理提出要续约，甚至进行一次巡回演出。

伊莎多拉拒绝了。虽然幸免饿死，但这种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取悦于观众的事，伊莎多拉真不想再干了。她这样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夏天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以后再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每次看见大街，她就会感觉到饥饿、恶心。

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邓肯夫人从来没有提出要回家去。

一天，有人给了伊莎多拉一张名片，介绍她去见芝加哥一家大报的女助理编辑安勃。

伊莎多拉去见了她。她个子很高，瘦精精的，约摸五十多岁，红头发。伊莎多拉跟她谈了关于舞蹈的见解。

安勃非常热情地倾听着，并邀请伊莎多拉和母亲到“波希米亚人”俱乐部去，说在那里可以见到文学家和艺术家。

当天晚上，她们去了俱乐部。俱乐部只是一幢高大楼房顶部的几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有几张桌椅。尽是些与众不同的人物，是伊莎多拉从未见过的。安勃站在他们当中，用男人般的嗓子大声喊道：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一起来吧！”

她每喊一声，他们就举起啤酒杯，用欢呼和歌唱来回答。

在这欢呼声中，伊莎多拉跳起了那种充满宗教色彩的舞蹈。那些“波希米亚人”有点迷惑不解，不知如何是好。不过他们还是认为伊莎多拉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邀请她每天晚上都去参加。

那些“波希米亚人”是一群奇特的人，其中的诗人、艺术家和演员，什么民族的人都有。他们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全都一文不名。有不少“波希米亚人”，如果不是来俱乐部吃由安勃供给的三明治和啤酒的话，根本没有东西吃。

那些人中间，有个叫米罗斯基的波兰人。他四十多岁，一头蓬松的红鬃发、红胡子、蓝眼睛，通常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面带一丝冷笑，观赏“波希米亚人”的余兴节目。

在所有看伊莎多拉表演的人中间，只有他懂得她的理想和作品。

他也非常穷，不过常邀请伊莎多拉和母亲到小饭馆去用餐，或者带着她们乘电车到乡下树林里去野餐。他很喜欢野菊花，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伊莎多拉，总是抱一大堆野菊花。因此，以后一见金红色的野菊花，伊莎多拉就会联想起米罗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诗人兼画家，非常古怪，曾在芝加哥经商谋生，但根本不会做买卖，在那儿几乎饿死。

那时伊莎多拉还只是一个小姑娘，还太年轻，对他的不幸或爱情丝毫不解。她当时对人生的看法也纯粹是抒情的、罗曼蒂克的，还不解风情。很久以后，她才明白自己激起了米罗斯基的狂热感情。

这个四十多岁的人疯狂而愚蠢地堕入了情网，爱上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

邓肯夫人显然缺乏预感，仍允许他们长时间单独在一起。

面对面地单独相处，在林子里长时间地散步，产生了心理效果。最后他忍不住吻了她，并向她求婚。伊莎多拉当时相信，这是自己一生中一次伟大的恋爱。

夏天快过完了，她们手上的钱也花光了。在芝加哥已经没有什么指望，她们必须迁居到纽约去。

但怎么去呢？

一天，伊莎多拉在报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和他那个由艾达·里恩担任明星的剧团正在芝加哥。她决定去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享有美国最喜好艺术、最有审美能力的剧团经理的蜚誉。

接连好几个下午和傍晚，伊莎多拉站在剧场通往后台的门口，一次又一次将她的姓名通报给戴利，求他接见。但是人们告诉她，他太忙，只能让她见他的助理。伊莎多拉坚决不肯，说一定要见戴利本人，有十分重要的事情相告。

最后，在一天的薄暮时分，她终于被允许谒见这位大人物。他长得漂亮，但是对于陌生人总是显出一副挺凶的样子。伊莎多拉被他吓住了，不过终于鼓足勇气，发表了不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戴利先生，我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向您讲，在全国恐怕只有您能理解它。我发现了舞蹈，发现了已经失传两千年的这种艺术。您是卓越的舞台艺术家。但您的舞台上缺少一样东西，然而正是它曾使得古希腊戏剧那样伟大，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队。

没有它，等于头和躯干失去了运载它们的双腿。现在我把这种舞蹈贡献于您的面前。我给您带来了足以使我们整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想法。我在什么地方发现它的呢？是从太平洋，从内华达山脉波涛起伏的松树林。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在洛基山顶峰翩翩起舞的理想丰姿。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给您的剧院带来它所缺少的那个生命所系的灵魂——舞蹈演员的灵魂。因为您知道……”

这位大牌经理不耐烦地插话：“得啦，别说了！别说啦！”

伊莎多拉竭力不去理睬他，一个劲儿讲下去：“因为您知道，”她提高了嗓门，继续讲道：“戏剧是从舞蹈中诞生的，第一个演员就是舞蹈演员。他载歌载舞，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舞蹈演员原来那种伟大的艺术一天不返回剧院，您的剧院就一天不可能有真正的表演！”

戴利看到这个瘦小、古怪的孩子竟敢如此放肆地用这种口气教训他，真不知该如何对待，他只是回答了一句：

“好吧，我在纽约排演的一部哑剧里，有一个小角色。你10月1日可以来参加排练，如果合适，就雇用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莎多拉。”她回答。

“伊莎多拉，挺好听的，”他说。“好了，伊莎多拉，10月1日我们在纽约再见吧。”

伊莎多拉喜出望外，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

“妈妈，到底有人赏识我了，”她说。“鼎鼎大名的戴利先生雇用我啦。10月1日以前咱们必须赶到纽约。”

“好的，”邓肯夫人说，“可是，用什么去买火车票呢？”

这确实是个难题。伊莎多拉急中生智，给旧金山的一位朋友发了个电报：

荣获戴利先生之聘，10月1日须抵纽约，火速电汇旅费一百元。

奇迹居然发生了，钱寄来了。同时来的还有她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见了那份电报，他们都来投奔她。一家人都乘上火车，满怀憧憬、高高兴兴地前往纽约。

伊莎多拉心想，社会怎么说也一定会承认我的！如果她当时能够稍稍想到以后将熬过多么令人精疲力尽的漫长岁月，才得到这种承认的话，恐怕她就会勇气顿消。

米罗斯基想到即将与伊莎多拉离别，伤心之至。不过，他们发誓永远相爱。伊莎多拉还向他解释，如果她在纽约发迹，他们结婚就不成问题了。其实，她并非当真对结婚抱什么信心，只是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她的母亲心里高兴。

纽约给伊莎多拉的第一个印象，是它比芝加哥更美丽、更艺术化。另一方面，能够重新来到海滨，伊莎多拉非常高兴。住在内地城市，她总觉得气闷。

他们在一家供应膳食的客栈里住了下来。那里寄宿的旅客光怪陆离，也像“波希米亚人”一样有个通病：谁若付不起账单，随时都有被撵出店门的危险。

一天早晨，伊莎多拉去戴利剧场后台的大门口报到，又一次被领去见这位大人物。

她想再次向他解释那套主张，但他忙得很，而且满腹心思。

“我们已从巴黎聘请了哑剧明星简·梅。”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可以给你分配一个角色。”

虽不情愿，但伊莎多拉除了接受这个角色外，别无他法。于是她把剧本带回家去研究。整个作品在她看来非常愚蠢，同她的理想志趣很不相称。

第一次排练就令伊莎多拉大失所望。

梅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女子，脾气极坏，动辄大发雷霆。伊莎多拉被告诉说，指指对方，是表示“你”，使劲地按着胸口是“爱”的意思，还有用力捶胸，则是表示“我”的意思。这一切对她来讲简直滑稽可笑。伊莎多拉没精打彩地做着，做得糟透了。

梅大为不悦，去向戴利告状，说伊莎多拉根本没有才华，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伊莎多拉听到这番话，马上想到全家都将流落在一个可怕的客栈里，听凭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店主摆布。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个瘦小的合唱队歌女被扣押了行李，撵到大街上的情景，同时又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苦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簌簌地沿着两颊滚落下来。

看到她那副凄惨可怜的模样，戴利先生脸色变得温和了。他拍拍伊莎多拉的肩膀，对梅说：“您看，她哭起来倒还是挺有表情的，她能学会的。”

但是这些排练对伊莎多拉来说简直是活受罪。然而，年轻人适应能力强，她总算进入了这个角色的情绪。

梅扮演皮埃罗一角。有一场戏，是伊莎多拉向皮埃罗表露爱情。在三段不同的音乐里，她必须走过去，在皮埃罗面颊上吻三次。在彩排时，她这

一段表演得非常卖劲，竟把嘴上的红唇膏印在梅的白脸蛋上了。这一下，梅立刻火冒三丈，给了伊莎多拉一记耳光。

然而排练越往下进行，伊莎多拉越钦佩这位哑剧女演员异乎寻常、充满活力的表情。

首演之夜来临。邓肯夫人坐在第一排，看着女儿的表演，简直不堪目睹。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提出要回旧金山。但是伊莎多拉看出母亲大失望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得到的结果却是如此可怜！

在这出哑剧排练期间，是没有工资的。他们被撵出了那家客栈，搬进两间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

由于没钱坐车，伊莎多拉经常步行到戴利的剧场去。为了抄近路，她常常在泥地上奔跑。没有钱，她就不吃午饭，躲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精疲力竭地打个盹儿，然后饿着肚子继续参加下午的排练。这样过了六个星期，直到哑剧上演了一个星期以后，伊莎多拉才拿到工资。

在纽约演了三个星期以后，剧团接着走码头演出，一个地方演一场。

伊莎多拉每周挣十五美元，除了一半作一切开支外，另一半寄给母亲维持生活。当剧团在小站下车后，伊莎多拉不去住旅馆，而是提着旅行袋，步行去寻找便宜的客栈。

一切费用在内，每天至多只能花五十美分，所以有时她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几英里路，才能找到合适的住所。有时她到的客栈，住着非常奇怪的邻居。一次，她住的房间门锁不住，那里的男客人喝醉了酒，一个劲儿地想闯进她的房间来。伊莎多拉怕极了，把沉重的大衣柜拽过来堵住了门。即使那样，她也不敢上床睡觉，警戒地坐了一夜。

梅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天都召集排练，但总是不合她的心意。

伊莎多拉随身带了几本书，不时翻阅。她每天都给米罗斯基写一封长信，算是给自己的一点安慰。

这样巡回演出了两个月，最后，全班人马回到纽约。戴利不幸蚀了本，梅也就回巴黎去了。

伊莎多拉又去见戴利先生，试图吸引他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但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对伊莎多拉提出的任何主意都毫无兴趣。

“我打算派一个剧团出去表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那个仙女场面里跳舞。”

伊莎多拉主张舞蹈表现凡人的感觉和情绪，对仙境之类她一点不感兴趣。不过，生活所迫，她还是答应了。

《仲夏夜之梦》开演的时候，伊莎多拉穿的是一条白色和金黄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还插有一对金丝编成的翅膀。伊莎多拉对这副翅膀十分反感，觉得真是滑稽可笑。

于是她对戴利先生说，不用假物她同样能够表现出翅膀来。但戴利固执得很。那天晚上是伊莎多拉第一次单独登台表演舞蹈，她觉得非常高兴。

她终于一个人站在一个大舞台上，在大批观众面前跳舞了。她跳得很好，观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她“打响”了。当伊莎多拉走进台侧，满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过来向她祝贺，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冲她大发雷霆：“这里不是舞厅！”可是观众好像不理睬他的叫嚷，依然为这个舞蹈鼓掌。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上路”了，伊莎多拉又得恢

复那种沉闷的旅行和寻找客栈的生活了。只是她的薪水已加到每周二十五美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伊莎多拉非常难过。她的美梦、她的理想、她的抱负，全成了泡影。在剧团中她也没交上几个朋友，他们都把她当作怪人。伊莎多拉常常捧着一本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在布景后面走来走去，她试着采取斯多噶学派的哲学来减轻自己常常感觉到的痛苦。不过她在那次旅行中交上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是扮演泰坦尼亚王后的。她长得很甜，讨人喜欢，但是有个怪癖：靠吃柑子过活，从来不吃别的食物。几年以后，伊莎多拉听说她死于恶性贫血症。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瑞痕是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尽管地位比她低的演员非常不喜欢她，但伊莎多拉在剧团中唯一的乐趣就是观摩她的表演。艾达很少同伊莎多拉参加的那个巡回剧团在一起，伊莎多拉返回纽约，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表演。她是世界著名的超级明星之一。这位大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屑于博得剧团里人的好感。她非常骄傲，连向大家问声好也觉得十分勉强。

在戴利剧团整整两年里，伊莎多拉未有机会同瑞痕小姐说话。

在巡回演出《仲夏夜之梦》的过程中，剧团到了芝加哥。伊莎多拉又能与心上人会面，真是高兴极了。正好又是夏天，只要没有排练，他们就到森林里去做长时间的散步。

伊莎多拉越来越佩服米罗斯基的聪明。几星期后，当她动身回纽约的时候，他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就去纽约和伊莎多拉结婚。

伊莎多拉的哥哥听到了这个消息，经过一番打听，发现米罗斯基在伦敦早有家室。

邓肯夫人惊愕万分，坚持要女儿跟他分手。

全家都搬到纽约后，他们设法搞到了一间带洗澡间的工作室。由于伊莎多拉想不放置任何家具，留出空间来跳舞，所以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他们给工作室四周的墙壁统统挂上帷幕。白天把这些弹簧垫子竖起来，晚上就睡在垫子上，没有床铺，大家合盖一床被子。

就在这个房间里，伊丽莎白开始办舞蹈学校，像在旧金山一样。奥古斯丁加入了一个剧团，经常去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尝试从事新闻工作。为了弥补支出，他们白天把工作室接钟点转租给教念白、音乐、唱歌的教师们。但是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样一来，全家就不得不外出散步。他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跑来跑去，以便使身体暖和一些，然后再走回来，站在门外谛听。

此时，在剧团里，戴利先生出了个高招，想把日本艺妓这种形式搬过来。他要伊莎多拉加入四重唱，而她生来连一个音符也不会唱！其他三个人都说伊莎多拉老是使她们走调，因此她时常张着嘴巴，美滋滋地站在那里，其实一声也不吭。

为了充当艺妓这事，伊莎多拉和戴利先生原已很僵的关系最终破裂了。

一天，他穿过熄了灯的剧场走过来，发现伊莎多拉躺在一间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便弯下腰问她出了什么事。伊莎多拉说，对他那个剧团接二连三的蠢事，再也不能忍受了。但是，他说他对“艺妓”一点也不比伊莎多拉更喜欢，只是不能不从经济利益着眼。

然后为了安慰她，顺手在她的后背上抚摩。这个动作把伊莎多拉给惹火了。

“我有我的天才，你们既然用不着我，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她说。

戴利先生惊讶地瞪了她一眼，“哼”了一声走开了。

这是伊莎多拉最后一次见到戴利。几天之后，她鼓足勇气申请辞职。在这个剧团里，同样的台词、同样的手势，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个夜晚接着一个夜晚，都使伊莎多拉感到厌恶。

离开了戴利，伊莎多拉回到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身边的钱已寥寥无几，但她再一次穿上了那件白色的练功衣，邓肯夫人为她伴奏。由于白天她们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个工作室，可怜的邓肯夫人只得为女儿通宵达旦的弹琴伴奏。

这时的伊莎多拉已被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奈温的音乐深深地吸引住，并为他的音乐《那吉苏斯》、《奥菲莉亚》、《水仙女》等创作了舞蹈。

一天，伊莎多拉正在工作室练功的时候，门忽地开了，冲进一个年轻人。他两眼冒火，怒发冲冠。他向她冲过来，大声嚷道：

“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拉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

“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瞧瞧，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他的《那吉苏斯》跳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于年轻的那吉苏斯的想象：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女。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没有消逝，埃斯尔伯特已经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来一把把她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接着她又为他跳了《奥菲莉亚》和《水仙女》。他越看越入神，最后主动地坐到钢琴边来，为伊莎多拉即兴创作了一首称之为《春天》的美妙舞曲。

埃斯尔伯特完全陶醉了，立即建议跟伊莎多拉在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里举行几次演出，并将亲自为她伴奏。

埃斯尔伯特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并且每天晚上都来跟伊莎多拉一起排演。

埃斯尔伯特·奈温拥有一个伟大作曲家应有的一切才能。他本来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惜他终生坎坷，不得不以整个身心顽强奋斗，导致了严重的疾病，终至不幸夭折。

第一次演出非常成功，接着举行的几次，在纽约轰动一时。如果她们讲究实际，物色到一位出色的经理人的话，那他们很可能就此发迹，可是当时他们简直对此一窍不通。

在观众中有许多社交界名媛。演出既然成功，在她们纷纷邀请之下，伊莎多拉得以出入纽约各式各样的客厅。这时，伊莎多拉根据奥马尔·卡扬的一首诗编了个舞蹈，跳的时候，有时由奥古斯丁，有时则是伊丽莎白为她朗诵。

夏日渐近。伊莎多拉接受阿斯特夫人的邀请，和母亲、伊丽莎白一起到她的新港的别墅去。

新港是一个时髦的游乐胜地。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就像女王在英国那样，前来拜谒她的人比觐见英国女王陛下还要诚惶诚恐。可是伊莎多拉倒觉得她和蔼可亲。

她安排伊莎多拉在她的草坪上演出。新港最有身价的人物就在草坪上看伊莎多拉跳舞。伊莎多拉一直保存着这次演出的一幅相片。在这张相片上，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身边，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和菲什等几个家族坐成几排，围绕着她。

伊莎多拉还在新港其他别墅里跳过舞。可是那些贵妇人极为吝啬，给的“赏钱”连盘缠和膳食都不够。同时，尽管她们欣赏伊莎多拉的舞蹈，并且认为挺优美，但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舞蹈稍微有一点点的理解。

整个来说，新港之行给他们留下的只是不愉快的印象。在伊莎多拉的心目中，那些人是那么趋炎附势、铜臭熏天，对艺术一窍不通。

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艺术家低人一等，只是高等杂役罢了。

伊莎多拉渴望找个比纽约更合适的环境。于是她向往着伦敦，向往着在那边可能遇到的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些名字多么富有魅力。实际上，在纽约的全部经历中，

伊莎多拉没有发现任何人对她的理想表示同情和赞助。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学校越办越兴旺，他们从卡内基会堂的工作室搬进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星期的租金是九十美元。但是，不久他们就发觉学生所交的学费还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表面上看来很成功，其实银行帐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阴沉，他们还得想方设法应付较大的开支。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盘算着怎样弄到足够的钱来偿付那些帐单。

突然她大声喊道：“解救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旅馆失火烧光。”

三层楼上住着一位很有钱的老太太，房间里布满了古董家具和名画，她习惯于每天上午八点整下楼到餐厅进早餐。她们决定由伊莎多拉出面向她借钱。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向她告借，不料那天正巧老太太心情非常不好，拒绝借钱给她，还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已经住了多年了，”她说道，“要是他们不给我好一点的咖啡，我可要离开这儿了。”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了，整个旅馆突然失火，旅馆的一切都化为灰烬，老太太也被烧成了焦炭！

伊丽莎白镇定自若，英勇地把她那舞蹈学校里的学生抢救了出来，领着她们挨个儿手牵手逃出那座楼。但她们丧失了全部家当，其中包括十分珍惜的家庭照片。她们在同一条街上白金汉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暂栖一时。几天后，和初来纽约时一样，不名一文了。

“这是命运，”伊莎多拉说，“我们必须到伦敦去。”

此时全家只剩下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跟一个小剧团去巡回演出，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姑娘。

一天，他回家来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这件事被家人看作背叛行为。邓肯夫人大为恼火，跟伊莎多拉第一次看到父亲时一样，走进另一个房间，“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伊丽莎白用沉默来回答，而雷蒙德简直是歇斯底里发作。对奥古斯丁稍稍有点同情的只有伊莎多拉一人。她愿意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

他把她领到小街上一座阴暗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了“朱丽叶”。她容貌秀丽，身体虚弱，好像有病似的。他们悄悄告诉伊莎多拉，她已经怀孕了。

这样一来，去伦敦的计划势必要把奥古斯丁排除在外了。全家把他看作旅途中掉队的人，不配跟他们一道去追求远大前程。

他们再次像初夏时一样待在空荡荡的工作室里，一钱不名。伊莎多拉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她曾经在她们大厅里跳过舞的有钱太太们，央求她们给一笔钱去伦敦。

她首先访问了住在五十九道街的一位太太。她住的那幢大厦下面就是中央公园。伊莎多拉对她诉说温莎旅馆失火，他们丧失了所有行李，并告诉她自己在纽约得不到知音，而确信在伦敦能够找到赏识自己的人。

最后，那位太太走到书桌旁，拿起笔来签了一张支票，折好交给伊莎多拉。

伊莎多拉两眼噙着热泪向她告别，跳跳蹦蹦地走出来。可是走到五道街，她才发现这张支票只有五十美元，这实在不够全家去伦敦的费用。

接着，她想再到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那里去试试。她走过五十个街区才到达那家的公馆。

在那里，伊莎多拉受到一个老年妇女更加冷淡的招待。她认为伊莎多拉的请求是非分的，把她教训了一顿。说要是当初伊莎多拉学的是芭蕾舞，她对这个请求的看法也许会两样，而且她曾听说有个芭蕾舞演员发了财呢！

那时已是下午四点，伊莎多拉还没吃过午饭。那位太太一看，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了，便叫来男管家，送来一杯咖啡和几片烤面包。

伊莎多拉的眼泪滴进咖啡里，洒到面包上，但还是竭力想使那位太太相信他们非去伦敦不可。

“总有一天我会名扬四海，而您将因为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声誉大振。”伊莎多拉对她说。

最后，这个拥有六千万财产的贵妇人也给了她一张支票。又是五十美元！她还加上一句：“你挣到了钱，得还给我。”

就这样，伊莎多拉对纽约一个又一个百万富翁的妻子游说了一番，终于凑足了三百元这个可观的数目，做为去伦敦的旅费。

但是，要是指望到达伦敦之后多少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连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票还不够。

幸亏雷蒙德出了个好主意。他在各个码头附近兜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艘运牲口到赫尔的小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诉说感动，答应把他们当作旅客带走，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船上规章制度的。

一天早晨，他们只带几个旅行包上了船，因为箱子都在温莎旅馆烧光了。

正是这次旅行的影响，使雷蒙德成为素食者。眼见二三百头可怜的牲畜从美国中西部平原运到伦敦，在货舱里挣扎着，日夜相互用角抵触，用最

令人哀怜的声音嚎叫。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入他们的脑海。

后来，当伊莎多拉坐着大型定期班轮豪华舱室的时候，经常想起这次乘坐牲口船的航程。当时，他们吃的只有咸牛肉和淡而无味的茶，床铺硬梆梆的，船舱很小，食物又不足。可是在前往赫尔的两星期旅程中，他们都十分快乐。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乘坐这样的船，毕竟有点不好意思，于是他们就签上了伊莎多拉外祖母的姓氏——奥戈尔曼。伊莎多拉改名为玛吉·奥戈尔曼。

船上的大副是个爱尔兰人，他跟伊莎多拉一起在了望塔上消磨了几个月色皎洁的夜晚。他不断对她说：“真的，玛吉·奥戈尔曼，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做你的好丈夫。”

好心的船长有时晚上拿出一瓶威士忌来，给他们加上柠檬做热饮料喝。

不管怎么艰苦，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愉快，只是货舱里那些可怜的牛羊的哀鸣声使他们心中难受。

## 第二章 从伦敦到巴黎

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每到这时，这个青年诗人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颊。

她绝望地想：“他不爱我。”

“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革命性变革。”

一个5月的早晨，奥戈尔曼全家到达赫尔。但是坐上火车，几小时后到达伦敦的却是邓肯全家了。

通过《泰晤士报》上的一个广告，他们找到了一家小旅店。

乍到伦敦的头几天，他们乘坐公共马车到处游逛，心里说不出的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悦目，忘记了剩下的钱已为数无几。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等地玩了好久，又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然后兴奋而又疲惫地回到小旅店。活像是有阔绰的父亲从美国汇大宗款子来的观光者。几星期后，女房东怒气冲冲来索帐，才把他们从游览梦中惊醒过来。

一天，他们从国立美术展览馆聆听了一场非常有趣的讲演之后回来，房门迎面“砰”地关上了。仅有的几件小行李也都被锁在里面，他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翻遍各人的衣兜，总共只剩下大约六个先令了。他们只得走到肯辛顿公园，在一只长椅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后来，伊莎多拉·邓肯回想过去的日子，她说：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过去生活的电影，难免要惊异地说：“我决不是这样的！”当然我还记得那时四个人在伦敦浪迹街头，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一模一样，而现在我就很难相信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了。年轻人经历这样一系列的灾难，反而兴致勃勃，是不足为奇的。可我那可怜的母亲一生历尽艰辛和苦恼，人也衰老了，遭到这么大的困难却能安然处之，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觉得难于相信的。

他们踟躅于伦敦街头，身无分文，没有朋友、也没法找到过夜的栖身之所。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店主看到他们没有行李，坚持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试了两三家供宿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都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跟格林公园里的长凳打交道，然而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让他们滚蛋。

就这样，整整过了三天三夜，一家人靠着廉价的小面包维持生活。不过他们的生命力确实惊人，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日子。一次，当伊莎多拉读温克尔曼《雅典旅行记》时，根本忘却了自己的处境而哭了起来。她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温克尔曼从他所热衷的探险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失声痛哭。

到了第四天的黎明，伊莎多拉下了决心，一定要想个办法。她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莫吭地跟着她走，大模大样地跨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旅馆。叫醒了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说他们刚乘夜班火车来到这儿，行李即将从利物浦运来，快给他们开几个房间，并且把早点送上楼来。

那天，他们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厉声指责行李怎么还没运到。

晚上他们就在房间里吃饭。

第二天拂晓，他们断定这个把戏已经玩到了头，就像来时那样，大模大样地走出了旅馆。当然这次没叫醒那位夜班侍者。

走到街上，伊莎多拉感到神清气爽，完全可以再次应付后面的日子了。

他们散步到切尔西，坐在老教堂的墓地上。伊莎多拉看到地上有一张报纸，就把它拾起来，她的眼光落在在一帧照片上。报道说某夫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将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候，伊莎多拉曾在她家里跳过舞，于是她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她对他们说。

午饭以前，伊莎多拉独自找到格罗夫纳广场。那位太太正好在家，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伊莎多拉说她到伦敦来了，目前在好些人家的客厅里表演舞蹈。

“那正好，星期五晚上我要开一个宴会，”她说。“你能在进餐后来几段吗？”

伊莎多拉立刻答应了，同时转弯抹角地暗示，要能如约前来，稍许预支一笔钱是不可少的。那位夫人立即签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伊莎多拉拿着这张支票，迳直奔回切尔西墓地。到了那儿，她对大家说：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一位夫人家去表演舞蹈，威尔斯亲王可能莅临。

我们肯定要交好运了！”说着，她把支票拿出来给他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得拿这笔钱去找一间工作室，预付一个月房租，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下的房东太太的凌辱了。”

于是他们去找工作室，并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那天晚上他们就睡在那里，虽然没有床铺，睡在地板上，可是大家觉得又像艺术家那样地生活了。一家人赞同雷蒙德的意见，以后再也不能去住那种小市民的客栈了。

他们付了工作室的房租，又用多余下来的钱买了些罐头食品做为储备。伊莎多拉在商店里买了几码薄纱，披着它出现在星期五晚上的宴会上。她跳

了埃塞尔伯格·奈温的《那吉苏斯》，又跳了他的《奥菲莉亚》。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孩子从哪儿学来这样悲哀的表情？”晚会结束的时候，伊莎多拉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邓肯夫人为伊莎多拉伴奏，伊丽莎白朗诵了几首希腊诗人戴奥克里图斯的诗，雷蒙德也简短地做了个讲演，女主人大为高兴。

那是个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聚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时赤脚穿着便鞋，身上披着透明的轻纱。这种朴素的装束几年后在德国风靡一时。然而英国人是特别讲究礼貌的民族，没有一个人想要评论她那独出心裁的舞服。另外，大家只是说些“多美啊”、“好极了”、“多谢您啦”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次晚会之后，伊莎多拉收到了许多请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里去表演舞蹈。

经常地，头天她可能在王亲国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却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们有时付钱给她，而更多的时候却一分钱也不给。女主人们总是随口对伊莎多拉说：“您将要在公爵夫人或伯爵夫人面前跳舞。这么多的显贵看您跳舞，您的名字在伦敦将会红得发紫！”

有一次，伊莎多拉在一个慈善募捐演出会上连续跳了四个钟头。所得的报酬只是一位有爵位的夫人亲自给她倒茶，并且给她草莓吃，可是伊莎多拉好几天没有填满肚子，草莓加上奶油吃下去真是难受得要死。就在这当儿，一位夫人举起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对她说：“瞧，您替我们盲女院募到了这么多的钱！”

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俩实在太腼腆了，没有勇气告诉这些人，她们的残忍简直前所未闻。恰恰相反，为了省下钱来穿得体面，装出发迹的样子，她们连应该吃的东西都舍不得吃。

他们在工作室里添置了几张吊床，还租了一架钢琴，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大英博物馆里。在那里，雷蒙德给所有的希腊花瓶和浮雕统统画了素描，而伊莎多拉则捉摸着如何用舞蹈来表达。他们每天还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消磨几个小时，在休息室里吃些廉价的小面包和牛奶咖啡做为午饭。

伦敦的美丽使他们着了迷。伊莎多拉在美国从没机会见识的各种文化美和建筑美，在这儿她可以尽情地欣赏。

在离开纽约以前，伊莎多拉已经有一年没见到米罗斯基了。后来，她接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说他志愿参加对西班牙作战，随军运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患伤寒病死去了。这封信对伊莎多拉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她到库柏学院翻遍了旧报纸的合订本，在用很小的铅字印着的几百个死者的姓名中间，查到了米罗斯基的名字。

那封信中还告诉了她米罗斯基在伦敦的妻子的名字和地址。到伦敦后，有一天她雇了一辆双轮小马车去找米罗斯基太太。当时，伊莎多拉多少还怪米罗斯基在伦敦还留下了一个妻子，而他从来也没有向她说过。因此她去的打算跟谁也没有提过。她把地址交给马车夫，上车就走。

不知跑了多少路，几乎到了伦敦城边。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小房子，样子彼此完全一样，都有十分灰暗的前门，伊莎多拉最后才找到了那所房子。她按了下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异常阴郁的伦敦女仆人。

伊莎多拉问起米罗斯基太太，女仆于是把她引进一间闷热的客厅。那

天伊莎多拉穿的是白色的细棉布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条蓝色的带子，头上戴着一顶阔边大草帽，鬈曲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

伊莎多拉听到楼上响着脚步声，一个尖锐而清脆的声音说道：“姑娘们，守秩序，守秩序！”原来房子是一所女子学校。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矮矮的顶多四英尺。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既骇异又嫉妒，尽管米罗斯基已经不幸亡故。

米罗斯基夫人不仅矮小，而且消瘦不堪。可灰色的双眼却炯炯有神，灰色的头发稀稀拉拉，一张小白脸上两片薄嘴唇紧闭，显得格外苍白。

她的欢迎是不大热情的。伊莎多拉试图说明自己是什么人。

“知道，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多拉。伊凡在他的信上多次提到过你。”

“我很抱歉，”伊莎多拉结结巴巴地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你。”

“那就对了，”她说。“他不会的。不过我当时真该到他那边去，可惜现在他死了。”

米罗斯基太太说这些话时带着一种悲凉声调，惹得伊莎多拉哭了起来。接着，米罗斯基太太也哭了。这样一来，她们仿佛成了老朋友。

她带伊莎多拉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墙上挂满了伊凡·米罗斯基的相片。这里有他年轻时的相片——一张非常漂亮而又刚健有力的脸，还有一张他当兵穿军装的相片——四周围上了黑纱。她对伊莎多拉谈起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到美国去找出路，只因为没有足够的旅费，他俩没能够一块去。

“我真该跟他在一起啊！”米罗斯基太太说。“他时常来信说，不久就要有钱了，那你就可以来了。”

可是若干年过去了，她还是女子学校的教员，头发也熬白了，而伊凡始终没有把去美国的钱汇给她。

伊莎多拉拿这位有耐心的瘦小妇人的命运跟自己的闯荡生涯相比，实在不能理解：既然她是米罗斯基的妻子，她又想去，怎么不到他那儿去呢？即使坐底舱去也行啊！伊莎多拉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想做什么，却不可以去做！因为她自己是决不延宕自己想做的事的。这虽然常给她带来灾祸，不过至少她的自行其事同样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伊莎多拉想，这位可怜的、极有耐心的瘦小女子，怎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还是她的丈夫——来叫她去呢？

伊莎多拉坐在房里，四周尽是伊凡的相片。米罗斯基太太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谈着伊凡以前的事情，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米罗斯基太太要伊莎多拉以后还去看她，而伊莎多拉则请她一定来看她们。米罗斯基太太说她一点空闲也没有，因为必须从早到晚教书，批改姑娘们的作业本。

伊莎多拉已经把马车打发走了，所以只得坐在公共马车的顶篷上回家。一路上她都在为伊凡·米罗斯基和他那瘦小可怜的女子的命运而哭泣，但同时她有一种认为自己坚强有力的奇特优越感，有一种对失败者和终身等待着的人们的蔑视。

以前她一直与米罗斯基的相片和信件一起睡觉，但从那天起，她就把它放到箱子里一个密封着的封套里去了。

当他们在切尔西的工作室第一个月租期满后，天气已经很热了。他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有家具的工作室。在那里，伊莎多拉有了一架钢

琴和较大的工作空间。可是一下子到了7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而他们在旺季里却没有攒下几个钱。他们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度过了整个8月份，时常在图书馆关门之后，徒步走向肯辛顿的工作室。

一天傍晚，米罗斯基太太来了，请伊莎多拉去吃晚饭。伊莎多拉十分惊异，而米罗斯基太太也非常激动。上一次伊莎多拉去她家作客，对米罗斯基太太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吃饭时，她还开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米罗斯基太太老是要伊莎多拉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是怎么个样子，说过些什么话。伊莎多拉当时告诉她伊凡多么喜爱在树林里采集野菊花，说有一天她看到阳光照在他的红头发上，他怀里挟着一大抱野菊花，还说她时常把他跟这种花联想在一起。听了这些，米罗斯基太太哭了，伊莎多拉也流下了眼泪。她们接着又喝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两个人完全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最后米罗斯基太太告辞回去了。

转眼就是9月。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去挣些钱。因为她同从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的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以支付她回去的船费。

“如果我挣了钱，就可以寄些给你们。不久伊莎多拉一定能够又有名又有钱，那我马上就可以回来跟你们团聚了，”她对大家说。

伊莎多拉上街，在百货店里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家人送她上了邮船。

剩下的三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几天都跟掉了魂似的。

快乐温雅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10月逼近了。他们初次尝到了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许已使他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也失去了它的魅力，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裹着毛毯，坐在工作室里，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跳棋。

实际上，有时候早上他们都失去了起床的勇气，整天躺在床上。

最后，他们收到了伊丽莎白寄来的信和汇款单。她已经到达纽约，寓居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日子过得不坏。

这个消息使他们振作起来。这时恰巧工作室的租期满了，于是他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所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她们去广场的花园就方便了。

一个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雷蒙德正在花园里跳舞，一个头戴大黑帽、艳丽迷人的妇人走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钻出来的，还是掉下来的，你们非常惹人喜爱。你们愿意到我家里去玩玩吗？”

她的家就在附近，他们跟她到了那里。房间里悬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十分逼真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她坐在钢琴旁为他们兄妹演奏，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背诵诗歌给他们听。最后，伊莎多拉跳起舞给她看。坎贝尔夫人美丽非凡，一头浓厚的黑发，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肤色娇嫩，还有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兄妹两人完全被她迷住了。这次跟她相会，终于把他们从忧郁和沮丧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他们否极泰来的转折。

坎贝尔夫人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十分欣赏，写了封信把她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

温德姆夫人极其热诚地接待了伊莎多拉，而伊莎多拉生平第一次在炉

火前品尝英国式的午茶。

坐在炉火前确实不错，有面包和黄油三明治吃，有沏得很酽的茶喝。外边是一片黄澄澄的大雾，屋里是悠闲的清淡，这一切使伦敦变得十分诱人。如果说伊莎多拉过去已被伦敦吸引，那此刻她已热切地爱上了它。屋子里有一种迷人的气氛：宁静、舒适、高雅和安闲。伊莎多拉感到如鱼得水，那美妙的藏书室也引起她极大的兴趣。

就在这间房子里，伊莎多拉初次注意到那些文雅得体的英国仆人不同凡响的举止：行走的姿态稳重而高贵，一点也不像美国仆人那样因为当了仆人而感到委屈，或者只想往上爬。他们为自己能在“最高尚家庭”里服务而感到骄傲。他们的父辈从前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后代将来也将这样做。这是促使生活安定的因素之一。

温德姆夫人安排伊莎多拉在一天的晚上在她客厅里表演舞蹈。那个晚上，伦敦所有的文艺界人士几乎都在场。在这里，伊莎多拉碰到了一个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她一生的男人。

他大约五十岁，是她所见过的男人中最英俊的一个。他突出的前额下嵌着一双深邃的眼睛，希腊式的鼻梁，优美的嘴唇，修长的身材，背稍稍有些弓，中间分开的灰白头发卷曲到耳根，脸上的表情特别和蔼可亲。此人就是查尔斯·哈莱，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

那时，尽管伊莎多拉见到的很多年轻人都乐意向她献殷勤，可是一个也没有引起她的好感。她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她却一下子对这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产生了热烈的感情。

查尔斯·哈莱原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年轻时的挚友。他请伊莎多拉到他的工作室去喝茶，并且把玛丽在《科里兰纳斯》里扮演维吉利亚时穿过的舞衣拿出来给她看。这件舞衣，他当作神圣的纪念品珍藏着。这次初访之后，他们的友情越来越深，伊莎多拉几乎没有一个下午不想方设法到他的工作室里去。他给她谈了许多有关文艺界的事情。在他的工作室里，伊莎多拉度过了许多非常有趣的时光。她多少懂得了一些老大师们的艺术，部分原因是通过这位逗人喜欢的艺术家的友谊。

查尔斯·哈莱当时是新美术馆的馆长，那里展出当代所有画家的名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着迷的小型美术馆，中央有庭院和喷泉，喷泉四周有珍贵的花木和一行行棕榈树。

查尔斯·哈莱提议让伊莎多拉在那边演出，介绍她跟他的朋友们结识。其中包括画家威廉·里奇蒙爵士、安德鲁·兰先生和作曲家赫伯特。他们答应做一次讲演——里奇蒙爵士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而伊莎多拉在中央庭院里绕着喷泉跳舞。那些节目都获得很大的成功，报纸热情地赞扬她，查尔斯·哈莱也为伊莎多拉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从此，伦敦的知名人士纷纷邀请她去喝茶或吃饭。

一天下午，罗纳德夫人举行酒会，小厅里挤满了人，伊莎多拉被介绍给威尔斯亲王，接着又被引见给爱德华国王。他称赞她是个画中美女，这个赞词更提高了伊莎多拉在伦敦社交界中的声誉。

伊莎多拉的运气越来越好。她在沃里克广场上租了一大间工作室。每天探索在国家美术馆看见的意大利艺术品影响下产生和新发现的灵感。

接着，一个年轻的诗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有一副柔和的嗓子和一双梦幻似的眼睛。他出身英国皇族的一个旁系，名字叫道

格拉斯·安斯利。

每当黄昏时刻，他就出现在伊莎多拉的工作室里，腋下挟着三四本书，把斯温伯恩、济慈、勃朗宁、罗塞蒂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篇念给她听。他喜欢大声地朗诵，她也很爱听。邓肯夫人认为在这种场合下跟女儿作伴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她也懂得并且爱好这些诗，却不能理解诗歌朗诵的牛津风格。约摸一小时后，特别是在读威廉·莫里斯的诗篇时，她就打瞌睡了。每到这时，这个青年诗人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伊莎多拉的面颊。

伊莎多拉为有这样的友谊而感到非常高兴。除了安斯利和查尔斯·哈莱之外，她再也不想交别的朋友。一般的小伙子她都觉得很讨厌，尽管有许多人看了她在伦敦客厅里的舞蹈之后，总是兴冲冲地来拜访她，或者想带她出去。伊莎多拉的态度很高傲，他们也就完全灰心了。

查尔斯·哈莱和待在闺中的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古老的小房子里。哈莱小姐待伊莎多拉也很和善，时常请她吃便饭，于是他们三个人待在一起了。伊莎多拉初次去看亨利·欧文爵士和女演员戴姆·艾琳·泰瑞，也是和他们一起去的。

亨利·欧文是舞台世家的头面人物，19世纪末英语舞台上的主角。他生于1838年，因其戏剧表演独具一格，深受观众欢迎，使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得爵士封号的演员。戴姆·艾琳·泰瑞1847年生于一个戏剧家庭，由父母训练成为非常有名的儿童演员。她是有才智的女演员的典型，既能演自然主义戏剧，又能演内涵深刻的戏剧。两人从1872年开始合作，一直到1902年。他们的合作珠联璧合，成为英国戏剧史上的美谈。伊莎多拉第一次看欧文爵士的演出是他演的《钟》，那伟大的艺术激起她内心的热情和敬佩，使她陶醉在它的影响下，整整几个星期不能安睡。至于戴姆·艾琳·泰瑞，她始终是伊莎多拉一生的偶像。

在那个夏季里，有一天查尔斯·哈莱带伊莎多拉去探望大画家瓦茨，她就在他的花园里跳舞给他看。在他房间里，伊莎多拉看见泰瑞那奇妙的脸庞多次出现在他的画板上。

瓦茨和伊莎多拉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给她讲了许多关于他的艺术和生活的美妙的事情。

戴姆·艾琳·泰瑞这时正在女性完全成熟的时期，已不再是瓦茨以绝妙想象所倾心的那个修长而苗条的姑娘，胸部高耸。她臀部丰满，具有一种与现代理想迥然不同的庄严健美的丰姿。

就这样，伊莎多拉在伦敦跟现代最出色的文学界和艺术界知名人士有了交往。

随着冬天的消逝，沙龙举行得少了。伊莎多拉一度参加了本森剧团，但除了在《仲夏夜之梦》中扮演过仙女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进展。剧场的经理们似乎总是不能理解她的艺术，或者说，不懂得她的主张对他们的营业会有什么好处。这确实奇怪，因为以后莱因哈特、吉迈尔和先锋派其他名人的演出中，出现了那么多模仿伊莎多拉·邓肯的流派的东西。

一天，伊莎多拉被介绍给泰瑞夫人。在一次排练中伊莎多拉上楼进了她的化妆室，她非常热情。可是等到伊莎多拉听从她的指示，穿上舞蹈服装，由她带领上舞台去为比尔博姆·泰瑞跳舞——给他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的时候，他却心不在焉地仰起头，凝视着苍蝇打圈圈，几乎不瞧伊莎多拉一眼。后来，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为伊莎多拉·邓肯成为世界上

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而祝酒的时候，她向他谈起了这件旧事。

“什么？”他惊叫着说。“我以前曾看过您的舞蹈、您的美貌和您的青春竟会不知赞赏？唉，我多傻呀！”他接着又说：“现在是太迟了，太迟了！”

“永远不会太迟的，”伊莎多拉回答。从那以后，他对伊莎多拉做了极高的评价。

确实，那时伊莎多拉很难理解，既然自己已经激起了像安德鲁·兰、瓦茨、埃德温·安诺德爵士、奥斯丁·杜布森、查尔斯·哈莱这些她在伦敦所遇到的所有的画家和诗人的狂热赞赏，为什么那些剧场经理们却仍然对她无动于衷。好像她的艺术使命是他们那种剧场里艺术粗劣的实用主义所无法领略的。

伊莎多拉整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练功。到了黄昏时分，不是诗人安斯利来给她朗诵，就是画家查尔斯带她外出，或者看她跳舞。他们两人总是设法不一起到来，因为相互之间已经有了醋意。诗人说他真不懂她怎么会跟那个老头消磨这么多的时间；画家则说他真不能理解一个聪明的姑娘怎么能跟那么个顽童相处。然而伊莎多拉在他们的友谊中都感到非常快乐，实在说不出更喜爱跟哪一个在一起。不过，星期天她总是给哈莱留着，两人一同在他的工作室里吃午饭，尝尝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鹅肝，喝点雪利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一天，他允许伊莎多拉穿上玛丽·安德森的舞服，摆出各种姿势，给她画了许多张素描。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虽然经常入不敷出，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生活还比较安定。然而雷蒙德不满足于这种宁静的气氛，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了，伦敦只剩下了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母女二人。到了春天，他接二连三拍电报，催促她们去巴黎。于是，伊莎多拉和母亲收拾了行装，登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渡轮。

离开大雾迷蒙的伦敦，到达瑟堡，正是明媚春天的早晨。在她们看来，法国就像一座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的路上，她们一直把头探出三等车厢的窗口，向外眺望。

雷蒙德在车站上迎接她们。他留着披到耳边的长发，穿着一件翻领上衣，系着飘垂的领带。她们对他改变的装束有些看不惯，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里的时髦服装。

他领她们到他的住所，碰到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拿出一瓶据他说价值三十生丁的红葡萄酒来款待母亲和妹妹。

喝完了酒，他们出去找工作室。雷蒙德会说几句法国话，他们便一路喊着：“寻求工作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用的“工作间”一词在法语里还可以指“任何一种工场”。

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了一间工作室，租金特别便宜，每个月才五十法郎，还备有家具。他们喜出望外，立即预付了一个月的房租。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房租会这样低廉，然而到了晚上就明白了。正当他们安静下来想要休息时，一阵可怕的震动摇撼着整个工作室，一切东西似乎一会儿跃向半空，一会儿又掉到地上。这样的震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雷蒙德下楼去察看，才发现楼下原来是一家夜间印刷厂，奥妙就在这里。

一家人感到相当扫兴，但对他们来说，五十法郎可是个大数目，因而伊莎多拉提议把这种噪音当作大海的波涛声，就算是置身于海滨吧。这里的

看门人供应伙食，午饭每人二十五生丁，晚饭连酒在内每人一个法郎。

雷蒙德同那个女店员断绝了关系，专心照料母亲和妹妹。刚到巴黎，伊莎多拉什么都觉得新奇。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到卢森堡花园里去练舞，然后在巴黎到处逛，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路，并且在卢浮宫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以致管理员对他们起了疑心。伊莎多拉用手势告诉他，自己到巴黎来只是为了跳舞。管理员断定他们是无害的怪人，也就随他们便了。他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打蜡地板上，滑行着去瞧底层的架子，或者踮着脚尖喊道：“瞧，这里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到这儿来吧，这儿有美狄亚杀子的场面！”

他们天天到卢浮宫去，直到关门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虽然没有钱，在巴黎又没有朋友，好在他们一无所求，卢浮宫就是他们的乐园。伊莎多拉穿着白色外衣，戴着一顶自由帽；雷蒙德戴着大黑帽，穿着翻领上衣，飘垂着领带，看到过他们的人后来告诉伊莎多拉说，他们这样年轻，却又这样沉迷在希腊花瓶中，活像两个大傻瓜。当他们吃完云豆和色拉，喝过红葡萄酒后，又快乐得像神仙一般了。

雷蒙德擅长铅笔画，不多几个月就把卢浮宫里的希腊花瓶都临摹完了。但后来人们把雷蒙德所画的伊莎多拉的裸体跳舞像误认为是希腊花瓶上的图案。

除了卢浮宫以外，他们还到过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此外，伊莎多拉对歌剧院前面的群像和凯旋门上的浮雕也特别入迷。

每经过一处历史文物，她无不伫主观赏。得见这些曾经梦寐以求的灿烂文化，使这位年轻的美国人的心灵无比兴奋，欢欣不已。

春去夏来，1900年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开幕了。

一天早晨，查尔斯·哈莱忽然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室。伊莎多拉非常高兴，而雷蒙德却深感不悦。哈莱是特地来参观博览会的，此后他就经常跟伊莎多拉作伴，他是个聪明而有魅力的向导。他们整天穿越各种建筑物漫游，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那里进餐。他非常和蔼可亲，当伊莎多拉累了的时候，就让她坐上轮椅，他推着她走。伊莎多拉时常感到懈怠，因为博览会里的艺术品根本不能跟卢浮宫里的艺术品相比。不过她还是很快活，因为她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莱。

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坐火车到乡下去，在凡尔赛花园或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她在森林里跳舞给他看，他为她画速写。

1900年的博览会给伊莎多拉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伟大的日本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舞蹈。接连好几夜，她和哈莱为这位伟大悲剧演员高超的舞蹈艺术所倾倒。

另一个甚至比这更深刻的终生难忘的印象，就是罗丹馆。在那里，伟大的雕塑家罗丹的全部雕塑作品首次公开展出。伊莎多拉初次踏进这个展览馆，站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杰作面前，崇敬之情不觉油然而生。那时她对罗丹还没有什么认识，但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每次去参观，听到有些庸俗的观众说：“这个塑像的脑袋到哪里去了？”或者“他的胳膊呢？”她便愤然回头大声呵斥：“这也不懂？！这不是人体，这是艺术，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于人生理想的一种设想。”

秋天来了，博览会也将闭幕。查尔斯·哈莱不得不回到伦敦去，临行

前把伊莎多拉介绍给他的侄子夏尔·努夫拉。“我把伊莎多拉托给你照顾，”他说。

努夫拉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对生活多少有些厌倦。但托他照顾的天真烂漫的美国姑娘颇使他入迷。他开始帮伊莎多拉在法国艺术教育方面补课，给她讲述了许多关于哥特式建筑的知识，还使她懂得了鉴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室，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

在这间工作室里，邓肯夫人重振旗鼓，像孩子们童年时代一样，接连几小时地演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工作室不带卧室，也没有浴室。他们也没有床，晚上把床垫放在竹木箱上，在上面睡觉。

努夫拉成了邓肯家的常客。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好朋友来到工作室：一个是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尼；另一个是青年文人，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特别以有伊莎多拉这样的朋友为荣，欣然把她当作美国的一个稀世之宝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伊莎多拉为他们跳了舞。当时她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圆舞曲和玛祖卡舞曲。邓肯夫人那天弹得好极了，就像男人那样坚定有力，并且富有感情，对作品理解深刻。她为伊莎多拉伴奏了好几个小时。

就在那时，雅克·博尼想出个主意，要他的母亲德·圣马索夫人请伊莎多拉在某个晚上去跳舞，以款待她的朋友。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她在她的雕塑家丈夫的工作室里安排了一次预演。弹钢琴的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他的手指仿佛有鬼神之功，伊莎多拉立刻被他吸引住了。

一见到伊莎多拉，他就大声喊道：“何等美妙！多美！多么标致的孩子啊！”接着按照法国的习惯，把伊莎多拉搂在怀里，吻了她的双颊。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萨杰。

首演的夜晚来到了。整个过程中，观众的亲切热情使伊莎多拉受宠若惊。往往不等一场舞跳完，他们就喊了起来：“妙，妙！她跳得多妙！了不起的孩子！”

第一个舞刚跳完，一个目光锐利、身材高大的男人便站起来把她抱住。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伊莎多拉，”她回答。

“小名呢？”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喔，多丽塔，你真可爱！”他嚷着，吻了伊莎多拉的双眼、双颊和嘴唇。接着，圣马索夫人拉着她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萨杜。”

萨杜是法国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18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实际上，在座的都是巴黎数一数二的人物。

临走时，伊莎多拉被包围在鲜花和赞美声中。她的三位“骑士”——努夫拉、博尼和博尼埃一同送她回家。一路上他们志得意满，喜气洋洋，因为他们邀来的神童竟然大获成功。

这三位青年中间，后来跟伊莎多拉最要好的不是快活的高个子努夫拉，也不是一表人材的博尼，而是那位可以说是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的博尼埃。

虽然他脸色苍白，圆圆脸庞上还戴着一副眼镜，但他的心智却非常出众。

伊莎多拉始终是一个富于理智的人，她的恋爱事件也多半是诉诸理智的。

安德烈·博皮埃正在创作他最早的两本书：《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天天来看伊莎多拉。通过跟他交往，伊莎多拉对所有法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了些理解。

这时伊莎多拉已能相当流利地阅读法文和讲法语。博尼埃常常一连几个下午在工作室里为他们高声朗读，声调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把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高地叶和莫泊桑的作品读给伊莎多拉听。从他那里，她首次听到梅特林克的《佩利亚和梅利桑德》，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法国现代名著。

下午，每当工作室响起叩门声，便是博尼埃来了。他总是挟着一本新书或杂志。

邓肯夫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女儿对这个人那么热情。做为女儿的情人，他并不符合她的理想，因为他是个小胖子，眼睛很小。

通常他给伊莎多拉朗读两三个钟头，接着他们就坐在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城岛去，凝视月光下的巴黎圣母院。他了解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每个塑像，能够给她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然后，他们就步行回家。她不时地感觉到安德烈胆怯地用手指按着她的胳膊。

每个星期天，他们便乘火车到马尔利去。后来在博尼埃所写的一本书里，就描写过他们在森林里散步的情景——伊莎多拉怎样经常在他前面沿着小径边走边舞，像一个山林女神或者一个树精那样，格格地笑着向他招手。

他向伊莎多拉倾诉了想要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类型和全部构思。一天早晨，他脸色惨白来到伊莎多拉那里，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两眼直瞪瞪。临走前在她额上吻了一下，神色意味深长。

伊莎多拉预感到他要去死了，一直为他担惊受怕。三天之后，他神采飞扬地又来了，向伊莎多拉承认自己进行了一次决斗，刺伤了他的对手。她始终不知道这次决斗的起因，事实上，对他的私生活她丝毫也不了解。通常他每天下午五、六点钟到来，然后根据天气和他们的兴致，决定给她朗读或者带她去散步。

有一次，他们坐在墨登树林中一块空地上，那里有四条道路交叉。他管右边那条道叫做“成功”，左边那条道叫做“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做“不朽”。

“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道呢？”伊莎多拉问他。

“爱情，”他低声回答。

“好，我宁愿留在这儿，”伊莎多拉兴冲冲地喊了一声。

他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儿。”说完便站起身来，沿着笔直向前的那条道飞奔而去。

伊莎多拉非常失望，又觉得迷惑不解，急急忙忙跟在他后边喊道：“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开我？”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说什么，把伊莎多拉送到工作室门口，突然扔下她就走了。

这种古怪而又热烈的友情延续了一年多。出于天真无邪的心愿，伊莎多拉渴望着把他们的友谊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设法叫母亲和雷蒙德去看歌剧，只留下自己一个人，下午还偷偷买了一瓶香槟酒。晚上，小桌子上放着鲜花、香槟酒和两只玻璃杯。她穿上一件透明的舞衣，头上戴着玫瑰花环，像个小情人一样期待着安德烈的到来。

他来了，似乎十分惊异，而且局促不安，那香槟酒几乎碰也不敢碰一下。她跳舞给他看，但他好像心不在焉。最后，他突然走了，说那天晚上有好些东西要赶着写完。伊莎多拉孤零零一个人待着，玫瑰花环和香槟酒还在面前，她伤心地哭了。

她绝望地想：“他不爱我。”

由于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挫伤，她开始和那三个密友中的博尼调情。他身材高大，金色的头发，一表人材。在拥抱、接吻这些方面跟安德烈那种畏畏缩缩的表现恰恰相反，非常大胆。但伊莎多拉这次尝试的结果也不大妙。

一天晚上，在饭馆吃了晚餐之后，他把她带到一家旅馆里，开了一个房间。

伊莎多拉浑身战栗，但内心实在高兴：我终将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在博尼的怀抱里，沉浸在暴风雨式的爱抚之中，她的心怦怦乱跳，每一根神经都沐浴在欢乐中，整个身体淹没在醉人的欢悦里。最后她终于苏醒过来，欣喜若狂。

突然间，他惊跳起来，跪在床边，用难以描摹的激情对她嚷道：“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我几乎犯下多大的罪啊！不行、不行！你应当保持纯洁无暇。把衣服穿上，赶快把衣服穿上！”

他对她的悲叹充耳不闻，把外衣给她披在身上，急忙送她上了马车。在回家的路上，他狂乱地痛骂自己，把伊莎多拉吓得不知所措。

伊莎多拉问自己：什么罪？他几乎犯了什么罪呢？她感到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惶惑不安。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她又一次被扔在工作室的门口。此后，那个年轻的、金头发的朋友再也没有来找过她。不久以后，他就到殖民地去了。

这就是伊莎多拉青年时代在爱情这个奇妙境地的边缘上的最初几次探险。多年来，她总渴望着进入，却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她给追求者们造成的印象过于严肃，甚至令人敬畏。不过最后这次震动对伊莎多拉的感情气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使她以这种气质的全部力量投入舞蹈艺术。

伊莎多拉日日夜夜在工作室里潜心探索着一种舞蹈，它能够通过身体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她常接连几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口，遮住太阳神经。邓肯夫人见女儿呆若木鸡、精神恍惚地持续那么久，经常惊惶失措。不过伊莎多拉还是在思索着。在她进行的研究中，最初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学习格鲁克的音乐。邓肯夫人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菲乌斯》，直到窗户上曙光闪耀。

窗户很高，而且没有窗帘，因此邓肯夫人一抬头总是能看到天空、月亮、星星。有时大雨倾盆而下，雨水的细流就淌到地板上，因为工作室顶棚的窗户很少是能防雨的。

到了冬天，工作室里朔风凛冽、冷得可怕，而夏天则热得像蒸笼一样。他们只有这么一个房间，大家各行其事是不方便的。不过年轻人能屈能伸，对这些满不在乎。邓肯夫人又是个刻苦耐劳、自我牺牲的模范，一心只想给孩子们的工作助一臂之力。一次，伊莎多拉接受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邀请，

去她家客厅表演。

格雷夫尔伯爵夫人是当时社交界的皇后。因此那天晚上，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济济一堂，到处都是服装华丽、珠围翠绕的妇女，千百朵红玫瑰香气袭人。伊莎多拉跳舞时，第一排的几个漂亮的小伙子总是盯着她，他们的鼻尖几乎可以触到她那跳舞的脚尖。伊莎多拉快快不乐，觉得这次演出完全失败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伯爵夫人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字条，除了表示感谢，并叫她到她的门房去领“封包”。伊莎多拉不喜欢到人家的门房里去，因为她对钱实在太敏感了。然而不管怎么样，这笔钱够付工作室的房租了。

使她愉快的是，有一天晚上，在著名的玛德兰·勒玛尔夫人的工作室里跳舞，她第一次看见了在观众席上的诺瓦伊伯爵夫人，让·洛兰也在座。

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她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歌剧院的图书馆。那里的管理员对她的研究工作非常关心，不管什么样的书籍，只要是关于舞蹈的、关于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的，都搬出来让她随意选用。伊莎多拉便聚精会神地阅读上自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随读随记，专门抄录在笔记本上。但是，在她完成了这个工程浩大的实验之后，她才知道能够求教的大师只有三人：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个天色晦暗的下午，有人叩伊莎多拉工作室的门。伊莎多拉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一位仪态大方、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士。伊莎多拉觉得她的到来似乎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

“我是波利尼雅克王妃，是格雷夫尔伯爵夫人的朋友，”她自我介绍道。“我看了你的舞蹈。你的艺术使我，特别是使我的作曲家丈夫发生了兴趣。”王妃容颜秀丽，美中不足的是下颚太大，如果不是冷若冰霜的矜持神态，她的眼神和容貌还是给人以娇艳的感觉的。她说话时带鼻音，生硬刺耳，人们听到这样的噪音会感到迷惘，因为原以为她的噪音会圆润和深沉得多。后来伊莎多拉才捉摸出，尽管她贵为王妃，那冷漠的表情和生硬的声调，却是用来掩饰内心极度敏感和羞怯的。

伊莎多拉对她讲述了自己的艺术和希望，王妃立刻提出在她的工作室里为伊莎多拉举行一次演出。

王妃会作画，同时又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和管风琴。

这位王妃似乎从这个空荡冰凉的工作室察觉到邓肯一家的贫困，看出了他们面有饥色。当她告辞离去的时候，羞怯地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那里面装着两千法郎。

第二天下午，伊莎多拉到王妃家里去，见了波利尼雅克亲王。他是一位颇有才能的优秀音乐家，是一位高雅清瘦的绅士。他时常戴一顶小黑丝绒圆帽，这种帽子跟他那张表情细腻的漂亮脸庞十分相称。

伊莎多拉穿上舞服，在他的音乐室里为他跳舞。他看得出了神，赞美她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幻象。伊莎多拉那关于动作和音响之间关系的理论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她对舞蹈做为一种艺术而复兴的种种期望和理想也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很高兴地为她弹奏钢琴，那纤巧的手指弹上去，宛如恋爱着它、抚摩着它。他的赞赏像一股暖流涌上伊莎多拉的心头。最后他叫了起来：“多可爱的小姑娘，伊莎多拉，你真可爱！”

伊莎多拉用法语羞涩地答道：“真的，我也很喜欢您。我愿意总是为您

跳舞，在您那动人的乐曲启发下创作舞蹈。”

接着他们就设想今后合作的前景。不幸的是，后来因为他的早逝，希望化作了泡影。

在波利尼雅克王妃工作室里举行的晚会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慷慨地把工作室对外开放。观众不仅限于她的好友，这样一来，伊莎多拉的舞蹈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兴趣。

从此，邓肯一家也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连举行收费的晚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波利尼雅克亲王每次都到场。有一次，他眉飞色舞地摘下他的小帽在空中挥舞，并且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欧仁·卡里埃尔和他的一家人也来观看，还为伊莎多拉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简短演讲，在他的演讲中有一段话说：

“伊莎多拉为了要表现人的情操，从希腊艺术中找到了最好的典范。她对那些美丽的浮雕形象赞叹不已，从中取得了灵感。但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她却返回自然，从而产生了她的一切舞姿。在相信能够模仿和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时，她还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她所想的是希腊的艺术，而表现的是她自己的东西。她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忘却时间，追求幸福。这种愿望表现得这样真挚，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在复活的希腊艺术珍品面前，我们也像她一样年轻了。一个崭新的希望在我们心中高奏凯歌。当她表现她顺从命运之必不可免的时候，我们也和她一起屈从了。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兴节目，而是一种个性的表现，也许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它无比丰富，激励着我们努力实现自己命定要实现的事业。”

尽管伊莎多拉的舞蹈已经为许多知名人士所赏识，但他们的经济情况还是十分拮据。

时常为无力支付房租而心烦，或因没有煤炭生炉子而挨冻。不过，在这样贫困的处境中，她总能独自接连几小时站在冰冷凄凉的工作室里，期待着灵感的来临，用动作表现自己。

一天，伊莎多拉正这样站着，一位衣饰华丽的绅士前来拜访。他穿着一件贵重的皮领大衣，戴着一枚钻戒。他说：

“我从柏林来。我们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是从一家最大的游艺场来的，想立即跟你签订一个合同。”

他搓着双手，笑容可掬，好像给伊莎多拉带来莫大佳运似的。

可是，伊莎多拉却像一只受伤的蜗牛，急忙缩进壳里去。漠然答道：“噢，谢谢您。

不过我决不同意把我的艺术送进游艺场。”

“可您并不了解，”他惊异地说，“好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都在我们游艺场里表演。

再说还能挣大钱。我现在就答应演出一个晚上给你五百马克，以后还要增加。我们要为您大肆宣扬，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赤脚舞蹈家’。一个赤脚舞蹈家，了不起、了不起！”

您一定会答应吧？”

“决不、决不！”伊莎多拉发起脾气来。“任何条件都不行。”

“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带来了，”他说。

“不行，”伊莎多拉说，“我的艺术不是为游艺场准备的。将来总有一天

我要去柏林，希望能合着你们的爱乐交响乐队跳舞。但要在音乐堂里，而不是在玩马戏和杂耍的游艺场。老天爷，真太可怕了！不，什么条件我都不要。再见！”

这位德国剧院的经理对房间里的陈设和伊莎多拉破旧的装束瞧了一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第二天他又来了。过了一天，他第三次来了，答应每晚付她一千马克，先订一个月合同。他发火了，说她是个“傻姑娘”。

最后，伊莎多拉向他喊道：她到欧洲来跳舞，是为了通过舞蹈传播宗教信仰的伟大复兴；通过人体动作的表情来让人们认识人体和心灵的美和圣洁，根本不是给那些脑满肠肥的资产者茶余饭后做为消遣的。

“请你赶快出去！你走！”她叫喊道。

“每晚一千马克您还拒绝吗？”他简直透不过气来了。

“当然不行，”伊莎多拉厉声回答。“就是一万、十万我也不干。我所追求的目标你是不会了解的。”

他临走的时候，她还加了一句：“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到柏林去的。我要去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是要在一个配得上他俩的剧场里，也许还不止一千马克！”

后来，伊莎多拉的预言终于实现了。三年之后，在克洛尔歌剧院里，她在柏林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出。当剧院售出了二万五千多马克的戏票的时候，这位经理先生捧着鲜花到伊莎多拉的包厢里来表示祝贺。他友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对她说：“小姐，你的话没说错。”

可是他们的经济情况很不宽裕，无论是王公贵族们的赏识，或是伊莎多拉本人名声与日俱增，都不能带来温饱。

在此期间，一个身材矮小的姑娘时常到他们的工作室里来，她的长相很像一位埃及公主。她来自美国西部的一个名门望族，唱起歌来十分迷人。清晨，常有散发着紫罗兰香气的小字条塞进邓肯家的门缝里来，接着雷蒙德便偷偷摸摸地不见了。终于有一天，雷蒙德告诉大家说，他已经受聘去美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在巴黎就剩下伊莎多拉和母亲两个人了。那时邓肯夫人病了，她们不得不搬到一家小旅馆里去住。在那里，邓肯夫人总算可以睡在床上，不像在工作室里那样受地板下冷风的侵袭，同时进餐也可以正常了，因为是三餐包饭。

在这家供膳宿的公寓里，有一对夫妇非常引人注目。女的大约三十岁，美貌出众。

一双出奇的大眼睛，眼神温柔、深沉、妩媚而又富有吸引力，充满着火一样的热情。同时又流露出驯顺和谦卑。她那满头金红色的头发如火焰一般，一举一动都激起人们的爱欲。任何人只要窥视一下她那双眼睛，就会像掉进了火山的喷火口一样。那男的身材纤长，有两条秀气的眉毛，脸上时常带着年轻人少有的倦意。通常还有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总是专心地谈着话，谈得热烈，十分起劲。这三人似乎与常人不一样，从来不知疲惫，也毫不厌烦。

一天早晨，那少妇来到伊莎多拉桌前，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先生。

这是让·洛兰先生，他为你的舞蹈撰写过文章。我叫贝特·巴蒂。我

们很希望哪天晚上能造访你的工作室，如果您愿意为我们跳舞的话。”

伊莎多拉非常激动，也十分高兴。她从未听说过像贝特·巴蒂那样有魅力、那样热烈、那样洋溢着生命力和爱情的嗓音。她以前就一直注意这三个人，贝特·巴蒂时常穿着令人吃惊的紧身衣，色彩不断变化，上面还缀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

那次会晤之后，他们就经常到伊莎多拉的工作室来。有一次巴塔伊还给他们朗诵他的诗作。就这样，伊莎多拉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觅得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名流的心胸。要知道，巴黎当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如同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自从在 1900 年展览会上观赏了罗丹的作品之后，他的艺术天才总是萦绕在伊莎多拉的心头。有一天，她到大学路上他那工作室，去向罗丹参拜。

罗丹的身材矮小粗壮、健壮有力、须发丰美。他的作品寓伟大于简雅。有时他低声吟哦着他的塑像的名字，不过可以感觉到，名字对于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时常伸手去抚摸那些塑像。最后他两手摸住一小块粘土揉捏的时候，呼吸也急促了，热流从他内心奔涌而出，好似火炉在熊熊燃烧。不一会儿便捏成了一个女人的胸部，她仿佛在他的手指下悸动。

他搀着伊莎多拉的手，坐了马车去她的工作室。伊莎多拉急忙换上舞衣，把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一首牧歌跳给他看。

接着，她把自己那套创造新舞蹈的理论讲给他听。但是不久她就发觉他并没在听她讲，而是注视着她，两眼闪闪发光，接着脸上的表情就像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作品。他向她走过来，伸手抚摸她的脖子和胸部，捏了她的胳膊，又滑过臀部和赤裸着的腿和脚。

他开始按摩她的全身，就像揉捏泥巴一样。同时，他身上发出热焰。伊莎多拉烧焦了，她融化了。她当时整个的心愿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他。是的，要不是由她所受的教养使她害怕起来，她真会这样做的。她躲闪开去，急忙把外衣披在舞衣上，把他打发走，他当时莫名其妙。

两年以后，伊莎多拉从柏林回到巴黎，才又见到了他。以后若干年中，他一直是她的良师益友。

伊莎多拉·邓肯同另一位大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会晤就大不一样，但也充满乐趣。

她是由作家凯彻尔的夫人带引到他工作室去的。凯彻尔夫人怜悯邓肯一家的孤寂生活，时常请他们到她家吃饭。有一次，伊莎多拉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帧奇异、迷人而忧伤的画像，凯彻尔夫人告诉她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她带伊莎多拉到卡里埃尔家里去。她们登上最高一层的工作室。在那里，卡里埃尔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们团团围住。他拥有一股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周身流淌着对于一切的深情厚爱。他的画作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正是他那崇高心灵的直接表现。当伊莎多拉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到自己仿佛见到了基督，满怀着敬畏。

几年之后，约斯卡夫人描述这次会晤的情景，写道：

伊莎多拉站在这位谦逊的大师和他的朋友麦基尼科大之间。她比他们俩还要文静得多。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美国女孩子会像她那天一样显得那么害臊。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欧仁·卡里埃尔就拉着我的手，好像领着一个孩子去见识应该赞赏的什么东西似的，对我说：“这就是伊莎多

拉·邓肯。”接着一片寂静，更加烘托出这个响亮的名字。

平时一向低声说话的卡里埃尔突然用深沉而高昂的声调宣布说：“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革命性变革。”

伊莎多拉很快成了卡里埃尔工作室的常客，他们很快就推心置腹地待她，把她看作他们的挚友。这是伊莎多拉青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从那时起，每当她怀疑自己的时候，只要想起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恢复了自信心。在她整个生活道路上，欧仁·卡里埃尔一直激励她坚持自己的最高理想，召唤她永远奔向深入探索艺术的圣洁殿堂。

甚至当忧伤几乎要把伊莎多拉带到病人院里去的时候，是卡里埃尔的作品给了她活下去的信心。

### 第三章 布达佩斯的春潮

从第一次相对注视的时候起，俩人所拥有的吸引力都迸发出来，把他们投入疯狂的拥抱之中。

……于是，她仿佛听到了爱情丧钟的声音。

成百上千的大学生爬上了舞台，对伊莎多拉·邓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差点没把她挤死。

一天晚上，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洛伊·富勒来到伊莎多拉工作室。伊莎多拉跳舞给她看，并且照例把她所有的理论讲给她听。事实上，即使来了一个水管工人，伊莎多拉也会这样做的。

洛伊·富勒满腔热情，告诉伊莎多拉她第二天就要去柏林，建议伊莎多拉到柏林去找她。洛伊·富勒不仅自己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且经理着贞八重子的演出，而伊莎多拉素来极为钦佩贞八重子的艺术。她建议伊莎多拉和贞八重子一起到德国各地去演出。

伊莎多拉高兴地同意了。

临行那天，安德烈·博尼埃前来话别。他们最后一次瞻仰了巴黎圣母院，然后他送伊莎多拉到火车站去。他一如往常，以克制的态度吻了她，表示道别，不过那副眼镜后面似有苦恼的目光一闪。

到了柏林，伊莎多拉去布里斯托尔旅馆，在一套豪华的房间里找到了洛伊·富勒。

十几个漂亮女郎簇拥在洛伊·富勒的身边，依次摸摸她的手，吻她的脸。

尽管邓肯夫人热爱自己的孩子们，但很少抚爱他们，因此当伊莎多拉看到这表示感情的姿态，感到非常新奇，简直不知所措。这里有一种热情洋溢的气氛，是她过去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富勒按了一下电铃，给伊莎多拉叫来一份非常丰盛的晚餐。晚上，她要在冬季公园跳舞。

伊莎多拉注视着她，真不知道她怎样才能赴约去跳舞，因为她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侍女不时送来冰袋，放在椅子上，垫着她的背脊。“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富勒说，“好像就不痛了。”

那天晚上，坐在包厢里看富勒跳舞时，看到富勒光彩夺目的形象，伊莎多拉简直无法把她与几分钟以前那个忍受着剧痛的病人联系起来。她变成了绚丽多彩的兰花，变成了袅娜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螺旋形的百合花，真是五光十色，变化无穷，犹如魔术一般。多么非凡的天才啊！伊莎多拉沉醉了。演出结束后，伊莎多拉神思恍惚地回到旅馆，这位奇异的艺术家使她魂不守舍。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初次出去观赏柏林市容。做为一个对希腊和希腊艺术向往已久的人，柏林的建筑物顷刻给了她深刻的印象。

在柏林逗留几天之后，伊莎多拉跟着富勒的舞剧团到莱比锡去。他们没有携带大衣箱，甚至连伊莎多拉从巴黎带来的简单的衣箱也跟别的衣箱一起被扣留了。起初伊莎多拉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昨天还是香槟酒宴和皇宫似的旅馆的奢侈生活，现在却不得不扔下衣箱离开柏林。后来她才发觉，这是因为富勒经理贞八重子演出遭到失败，她的收入因偿付欠款而花得精光。

在莱比锡，伊莎多拉仍然每天晚上坐在包厢里看富勒跳舞。她越来越热衷于富勒那奇妙无比、不可捉摸的表演艺术。

但是，有一天半夜，她被一阵谈话声惊醒。声音是模糊的，但她辨得出那是她们称为“保姆”的红发姑娘在说话。从她们那兴奋的低语中，伊莎多拉依稀听出“保姆”在说，她打算回到柏林去和某人商量，弄钱来让大家到慕尼黑去。接着，就在这天夜里，这个红发姑娘跟伊莎多拉激动地说：“我要上柏林去了。”

去柏林不过几小时的旅程，伊莎多拉不能想象为什么她这样激动，为离开他们而心烦意乱。不久，她带着去慕尼黑的旅费回来了。

到了慕尼黑，艺术团又希望能去维也纳，可还是缺少足够的钱，而且这次看来已完全不可能借到任何一笔款子。

伊莎多拉自告奋勇到美国领事馆去请求援助。她要求他们无论如何给艺术团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

经过伊莎多拉的一番努力，艺术团终于到达了维也纳。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她很崇拜洛伊·富勒的艺术，但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把母亲独自一人留在巴黎，而自己在这个由美丽而颠狂的女人组成的剧团里。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旅途中一切戏剧性事件的一个爱莫能助的旁观者。

于是，她决定打电报把母亲从巴黎叫来。邓肯夫人果然来了。伊莎多拉把对目前处境的一切想法都告诉了她，最后俩人决定离开维也纳。

与富勒的剧团一起在维也纳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伊莎多拉在“艺术家俱乐部”里给一些艺术家跳舞。当她跳完酒神舞之后，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格罗斯的来自匈牙利的剧场经理走过来对她说：“要是你希望有美好的前途，请到布达佩斯来找我。”

此时此刻，急于要跟母亲一起逃出维也纳的伊莎多拉，想起了格罗斯先生的建议——带着对光明前途的憧憬转往布达佩斯。

亚历山大·格罗斯提出一个合同，要伊莎多拉独自在尤拉尼亚剧场里演出三十个晚上。

这是伊莎多拉·邓肯破天荒第一次签订在剧场里为观众献舞的合同，因而有些犹豫。

她说：“我的舞蹈是跳给名流看的，要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音乐家看，而不是给一般观众看。”

亚历山大·格罗斯反驳说，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如果他们喜欢你的舞蹈，那么普通观众一定会百倍地喜欢它。

伊莎多拉听信了，签了合同。

格罗斯的预言果然灵验。在尤拉尼亚剧场的首演之夜大奏凯歌。接着，在布达佩斯的三十个晚上，场场满座。

美丽的布达佩斯城，一片姹紫嫣红。在河边、在山上、紫丁香怒放，在每座花园里。

每天晚上，如痴如狂的匈牙利观众发出暴风雨似的喝彩，把他们的帽子扔到舞台上。

1902年4月的一天早晨，伊莎多拉·邓肯看见多瑙河河水在阳光照耀下闪烁荡漾，获得深刻的印象。当晚，她传话给乐队指挥，让他在演出结束时，临时加演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

演出的效果如同触电一样，全体观众一跃而起，热情奔放，像疯了似的。伊莎多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跳这支圆舞曲，他们的颠狂才稍稍平息。

那天晚上，在观众中，有一个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匈牙利青年跟别人一起大声叫喊。以后，他使伊莎多拉·邓肯从一个纯洁的仙女变成一个狂野的、无所忌惮的放荡不羁的女人。

布达佩斯的春天，柔情如水的月明之夜，离开剧场时空气的芬芳，浓郁沁人的紫丁香气息，观众狂热的情绪，以及晚餐上她从未经历过的一些完全放荡不羁、耽于声色的人，还有吉卜赛音乐；那用辣椒粉调味的匈牙利式的洋葱焖牛肉和浓郁的匈牙利酒——一切带来了伊莎多拉·邓肯肉体的初次觉醒，知道了她的肉体除了做为神圣音乐和声的表达工具之外，还有别的作用。

她的两个乳房这时开始轻柔地膨胀起来，一种使人局促不安的感觉震撼着她的芳心。

她的臀部原来像男孩子的一样，这时却开始有了另一种起伏。她的整个身躯发生一阵强烈的冲动，一种渴求，清清楚楚的迫切要求。晚上她再也难以入睡，而是辗转反侧，陷入兴奋而又痛苦的惊忧不安之中。

一天下午，在一次聚会上，伊莎多拉遇到了一双大眼睛，它用那样炽热的崇拜和匈牙利式的激情烧灼着她的心，每一流盼，对她就是布达佩斯的整个春天。他身材高大匀称，满头浓重漆黑的鬃发。在她的眼中，他完全可以为米开朗琪罗雕塑大卫充作模特儿。

他微笑的时候，在两片鲜红的、肉感的嘴唇之间，雪白坚固的牙齿闪闪发光。从第一次相对注视的时候起，俩人所拥有的吸引力都迸发出来，把他们投入疯狂的拥抱之中。也就从这第一次对视的时候起，他们已经投入彼此的怀抱，而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把他们分开。

他是一位演员。他的名字叫贝列吉。

“你的面容花儿似的，你是我的花儿。”贝列吉一遍又一遍地对伊莎多拉说。

他给了伊莎多拉一小方纸片，上面写着：“国立皇家剧场的包厢”。那天晚上，伊莎多拉·邓肯和母亲一起去看他扮演罗密欧。贝列吉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后来成为匈牙利最伟大的演员。他刻画罗密欧那青春爱情的火焰，

最终征服了伊莎多拉的心。

演出结束后，伊莎多拉到化妆室里去看望他，所有的剧团人员都带着古怪的笑容望着她，似乎人人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感到高兴，只有一个女演员看来很不愉快。

贝列吉伴送邓肯夫人和伊莎多拉回旅馆，他们一起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邓肯夫人以为伊莎多拉睡了，但伊莎多拉又回到客厅里去看她的“罗密欧”。那个客厅同她们的卧室之间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这时他告诉她，那天晚上他改变了罗密欧这个角色的表演。

“从我遇见你之后，懂得了陷入情网的罗密欧的声音该是怎么个样子。只有此刻我才懂得，因为，伊莎多拉。你使我生平第一次懂得了罗密欧的爱情是怎么样的。现在我要从头至尾用迥然不贩方式来扮演了。”

他站起身来，一场接一场给她背诵这个角色的全部台词，不时地停下来说道：“是的，此刻我懂得了要是罗密欧真的在恋爱着，他无疑会这样那样地说话——跟我先前扮演这个角色时所想象的完全两样。现在我懂得了。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给了我灵感。由于这种爱情，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伊莎多拉狂喜地注视着，倾听着，时而大胆地给他一个“回声”或者做一个手势。

最后他俩跪了下来，山盟海誓，终生相爱。

一天晚上，两人都下了戏，一同走进客厅。起初，贝列吉高高兴兴地背诵他的台词，又畅谈他的艺术和剧场里的事。伊莎多拉则津津有味地听着。逐渐地，他似乎心绪不宁，不时显得十分慌乱，忽然不出声了。他攥紧拳头，似乎身体十分不舒服，他那英俊的面庞涨得通红，两眼冒火，鼓着嘴，几乎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

伊莎多拉也感到晕眩不安，一种把他紧紧搂过来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在她的心中涌起。

忽然，他完全失去自制，陷入狂乱之中，一把把她抱进屋去。

伊莎多拉又惊又喜，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们开始慌乱地亲吻，相互抚摩，渐渐进入意乱情迷的状态。当他最终进入她的身体，她感到了一种告别处女时代的痛楚……

那天早晨天刚亮，他俩一块儿离开旅馆，在街上雇了一辆马车，驱车走了很远很远，到了乡下。

他们停在一家农舍门前，在那里租借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老式的四柱床。他们一整天逗留在乡下，不停地做爱，享受鱼水之欢的快乐。

贝列吉有一副好嗓子，他教给了伊莎多拉许多匈牙利和吉卜赛歌曲，并把歌词的意义和发音教给她。这丰富了她的舞蹈的内容。

布达佩斯演出季节结束后的第二天，伊莎多拉和贝列吉到乡下的农舍里过了几天。

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整夜互相厮搂着的欢乐。

清晨醒来的时候，发现她的头发和他的黑鬃发缠绕在一起，感觉到他的手臂搂着自己，伊莎多拉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然而，得知女儿风流艳事的邓肯夫人极度苦恼，从纽约回来的伊丽莎白更把她看作犯罪的人。她们的忧虑使伊莎多拉难以忍受，但她不想屈服。

后来，亚历山大·格罗斯给伊莎多拉·邓肯安排了一次穿越匈牙利的

巡回演出，在许多城市做表演。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在所有那些匈牙利小城市里，伊莎多拉到处受到观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在每一个城市里，伊莎多拉·邓肯浑身上下穿着白色的衣服，在一片欢呼声中，像从另一个世界来观光的年轻女神那样穿城而过。

但是，不管群众怎样起劲地逢迎，不管她的艺术怎样使自己欣喜若狂，伊莎多拉依然迫不及待渴望与贝列吉欢聚。她痛苦不绝，尤其在晚上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此时此刻，她愿以自己的一切成功，甚至以她的艺术，来换取再度陶醉在他怀抱里的一时片刻。她渴望回到布达佩斯去。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贝列吉欢欣异常地到车站接她，但她感到他心里有了某种奇异的变化。他告诉伊莎多拉，他将要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并举行首次演出。

“难道一个角色的变换对艺术家的热情的性格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影响？”伊莎多拉想。不过她确实意识到他的初恋热情已经起了变化。

他谈起他们的婚事，在他看来好像早已完全确定了，他甚至带着她去看好几处公寓。

伊莎多拉·邓肯看了那几套没有浴室的房间和走不完的楼梯上的厨房，感到说不出的扫兴，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布达佩斯住下来干什么？”她问道。

“怎么，”他口答道，“每天晚上你不是可以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

他给她背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但是，她感觉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自己已经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一天，在乡下漫步了好久以后，他们在一个干草堆旁坐下来。他问她有没有想过，她继续搞自己的，而他去干他那行，这样是否会好些。

伊莎多拉感到内心一阵寒战。当天下午，她跟格斯签订了去维也纳、柏林以及其他德国城市的合同。

伊莎多拉看了贝列吉首演马克·安东尼的演出。在剧场里，欢众疯狂的热情与坐在包厢里吞咽着眼泪的伊莎多拉·邓肯形成极大的反差。她感觉如万箭穿心。

第二天，她动身去维也纳，既然贝列吉已经消失，她便向“马克·安东尼”告别。

他绷着个脸，心里别有所思似的。

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这次旅行，是伊莎多拉·邓肯所经历过的旅行中最痛苦和忧伤的一次。一切欢乐似乎都一下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在维也纳，她病倒了。格斯把她送进了一家病院。

接连几个星期，伊莎多拉完全处于虚脱和极度痛苦之中。

贝列吉从布达佩斯到来，甚至在她房里放下一张帆布床。但是一天清早醒来后，伊莎多拉看见一位护士隔在她和睡在帆布床上的贝列吉的身体之间。于是，她仿佛听到了爱情丧钟的声音。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伊莎多拉才恢复健康。格斯带她到弗朗曾斯巴德去疗养。她心情忧郁，无精打彩，不论是美丽的乡村或者和蔼的友人，都无法引起她的兴趣。

格斯夫人来了，她彻夜不眠，亲切友好地照料伊莎多拉。在医生和护士的昂贵费用耗尽了伊莎多拉的银行存款之后，格斯为她安排了在弗朗

曾斯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

伊莎多拉·邓肯打开衣箱，拿出舞衣，一边热泪潸潸地吻着她的红色舞衣，一边发誓决不再背弃艺术去追求爱情。

此时，她的名字在这个国家简直有了魔力。一天，当她与她的经理和他夫人一起进餐的时候，餐厅玻璃窗外的人群拥挤不堪，竟把窗上的大玻璃挤破了，搞得旅馆经理毫无办法。

她把烦恼、痛苦和爱情的幻灭都转化为她的艺术。最后，格罗斯为她安排下在慕尼黑的演出。在那里，伊莎多拉跟母亲和伊丽莎白重新团聚。她们看到她又只剩下一个人，感到很高兴，尽管发现她变了，而且很忧伤。

在到慕尼黑以前，伊莎多拉和伊丽莎白到阿巴沙去，驱车在街上到处寻觅供膳宿的旅馆。旅馆没有找到，她们自己却引起这个宁静的小城相当大的注意。她们被路过的费迪南德大公看到了。他很感兴趣，向她们打招呼，邀她们到斯蒂芬尼旅馆花园中他的别墅里去住。于是，贵妇人争先恐后地去拜访她们。但那些贵妇人根本不是如伊莎多拉天真想象的那样，是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而是想要弄清伊莎多拉在大公别墅里的真实地位。

就在那时，伊莎多拉·邓肯创制了一种浴衣。那是一种用最好的中国纱制成的淡蓝色的舞服，大开胸，肩上有小吊带，裙子恰好齐膝盖上面，裸着腿，赤着脚。

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妇女们下水游泳时还习惯穿一身从头包到脚的黑衣服。从膝盖到脚踝是裙子、黑色长统袜子、黑色游泳鞋子，所以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她的创造引起了怎样的轰动。

费迪南德大公时常去跳水桥上散步，用观剧用的小望远镜瞄着她，用完全听得见的声音咕哝着说：“瞧，邓肯多么漂亮！真是好看极了！就是春天也没有这样美！”

后来，这种浴衣变得特别流行。

当伊莎多拉·邓肯在维也纳的卡尔剧院里跳舞的时候，大公会带着一批年轻漂亮的副官和侍从，每天晚上到特别包厢来。这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可是大公对她的兴趣却纯然是唯美的和艺术的。他似乎有意回避与女性的社交活动，只是满足于与英俊的青年随从交往。

伊莎多拉和伊丽莎白从阿巴沙到了慕尼黑。

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集中于“艺术家之家”。一群著名的大师，诸如画家卡尔巴赫、伦巴赫、版画家斯塔克等人，每天晚上都在此聚会，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谈论哲学和艺术。

格罗斯想安排伊莎多拉首次在那儿演出，伦巴赫和卡尔巴赫也这么想。但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对于像“艺术家之家”这样一个艺术殿堂来说，颇不合适。

于是，一天上午，伊莎多拉·邓肯到斯塔克家去拜访，想说服他相信她的艺术的价值。她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舞衣跳舞给他看，接着给他讲她的神圣使命，讲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连讲了四个小时。后来斯塔克常对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好像林中仙女突然从奥林匹亚山上下来，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他的眼前。

伊莎多拉·邓肯在“艺术家之家”的首次演出，成为这个城市多年以来的艺坛盛事。

接着，伊莎多拉在凯姆学院表演。学生们简直发了狂，一夜接着一夜，

他们把她马车上的马解下来，由他们拉着车游街，并在她的敞篷马车两边唱着歌曲，擎着火炬欢呼跳跃。他们经常一连数小时聚集在伊莎多拉住的旅馆窗户下面唱歌。她把花朵和手帕扔给他们，人们便抢着，每人分一点掖在帽子里。

一天晚上，他们把伊莎多拉簇拥到学生的咖啡馆，把她抬起来，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桌子跳舞。他们通宵唱歌，不断重复着唱道：“伊莎多拉，伊莎多拉。人生是多么美！”

他们在黎明时送她回家的路上，把她的衣服和披肩都撕成了碎片，戴在帽子里面。

这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全城的规矩人为之骇然。

慕尼黑是欧洲艺术和学术的中心之一。大街上尽是大学生，经常可以看到姑娘们的腋下夹着书或乐谱。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稀有的古书古画和最新出版的各种图书。

与那些大师们的交往，使得伊莎多拉·邓肯重新回到中断了的理智和精神生活中来。

她开始学习德语，并且学会了喝慕尼黑的啤酒。这样，与贝列吉分手后感情上受到的打击，渐渐缓和了。

在慕尼黑的博物馆里，来自意大利的光辉灿烂的作品，同样地对伊莎多拉有新的启发。此时此地，意大利边境近在咫尺，伊丽莎白、伊莎多拉和邓肯夫人顺应着不可压抑的欲望，乘火车前往佛罗伦萨。

火车穿越蒂罗尔山，然后顺着阳坡下山，驶向翁布里亚平原。

在佛罗伦萨，她们接连几个星期到处漫游，看遍了美术馆、公园和橄榄园。在那段时间里，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吸引了这个年轻美人。

一连好几天，她坐在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天》前面。

一位好心的老管理员给她搬来一张凳子，并怀着好奇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伊莎多拉崇敬的表情。她一直坐在那里，晃然之间，她看到鲜花成长，画中赤露的腿跳起舞，身体扭动起来，而欢乐的使者来到她面前。于是她想：“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编成舞蹈，把爱的信息，曾经使我那样痛苦的爱的信息——春天，孕育万物的春天，带给他人。我一定要通过舞蹈把这种狂喜的感情带给他们。”

闭馆时间到了。伊莎多拉·邓肯仍然在画前滞留，希望通过这个美丽瞬间的神秘色彩，去发现春天的真谛。

由于她们仍然一如往常地不务实际，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伊莎多拉不得不给亚历山大·格罗斯拍电报，请他寄一笔款子来，好去柏林找他。当时他正在柏林准备伊莎多拉·邓肯的首次演出。

到达柏林的时候，她们简直莫名其妙：在驱车穿过城市的路上，发现满城都是写着伊莎多拉名字的灯光广告，以及她将于克罗尔歌剧院同爱乐交响乐队一起演出的预告。

格罗斯安排她们在布里斯托耳旅馆里的一套漂亮的套间住下，整个德国新闻界都在那里等待伊莎多拉·邓肯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了在慕尼黑的研究和佛罗伦萨的经验，于是伊莎多拉用美国武德语大发宏论，率直天真地解释她对舞蹈艺术的想法——她说它是一种“伟大的原始艺术，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艺术的艺术”。这使当地的新闻界大吃一惊。

亚历山大·格罗斯是一位勇敢的先行者。他不怕承担风险，全部资本

都投入了筹备伊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演出。他不计工本大做广告，包下了第一流的歌剧院，聘用了最好的指挥。

万一大幕升起，这个瘦小轻巧的美人站在庞大的舞台上，不能激起困惑迷惘的德国观众的迎头彩声，那就意味着他的彻底破产。

但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先知。他所预见的，伊莎多拉·邓肯都为他一一实现了。

他们简直是一举攻克了柏林！

柏林的观众大为倾倒，演出了两个多小时以后，观众根本不愿意离开歌剧院，一再大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最后还激动地冲到脚灯前面不肯离散。成百上千的青年大学生真的爬上了舞台，对伊莎多拉·邓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差点儿没把她挤死。

一连好几个晚上，他们老是重复着德国当时流行的可爱的仪式——把她马车上的马解下来，他们自己拉着车游行，走过几条大街，一直走到她住的旅馆。

从首演的那个晚上起，伊莎多拉·邓肯在德国观众中间声名雀起，被他们叫做“伟大的、圣洁的伊莎多拉”。

## 第四章 柏拉图式的恋情

伊莎多拉·邓肯觉得以往的自己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从来没有生活过，似乎她现在刚刚降生于人间。

她的情欲自从那次猛然觉醒以后，又沉睡了，根本没有了这方面的要求……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么爱我吗？”伊莎多拉问。

一天晚上，雷蒙德突然从美国来了。他太想念她们，再也受不了分离的痛苦。于是，一家人重新提出了孕育已久的计划——去朝觐最神圣的艺术圣地，到他们景仰的雅典去。

伊莎多拉·邓肯觉得自己只是停留在艺术的大门口，所以经过一个短暂的演出季节后，不顾格罗斯的恳求和惋惜，坚持要离开德国。

他们兴高采烈地又一次登上了去意大利的火车，经过威尼斯，一起去做延迟已久的雅典之行。

他们在威尼斯待了几个星期，虔诚地参观了一些教堂和美术馆。

当时，威尼斯对于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对佛罗伦萨更钦佩百倍。直到若干年后，同一位橄榄色皮肤的、黑眼睛的情人一起重游该地，伊莎多拉才第一次感到威尼斯的美丽迷人。但是这头一次访问只给她留下了急着乘船的感觉。

雷蒙德决定，到希腊去尽可能一切从简。所以，他们没乘巨大舒适的客轮，而是乘了一条航行于布林迪西和圣毛拉之间的小邮船。

他们在圣毛拉上了岸，去拜访古老的伊沙卡的遗址。

清晨，他重新坐一条小帆船，从圣毛拉出发，顶着如火的7月骄阳，穿过蔚蓝色的爱奥尼亚海，驶进安布鲁斯海湾，在一个叫做卡法萨拉斯的小

镇登了陆。

当地居民都到海边来欢迎他们。哥伦布第一次在美洲登陆的时候，大概也没有在土著中引起这样的惊动。当雷蒙德和伊莎多拉跪下亲吻泥土时，他们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的确，他们高兴得快要发疯了。经过一番漂泊流浪，他们终于到达希腊的神圣土地上。

卡法萨拉斯没有大旅馆，也不通火车。那天晚上他们在小客店能向他们提供的唯一的一个房间里睡觉。实际上他们也没怎么睡，一是因为雷蒙德通宵大谈特谈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柏拉图式爱情在天堂的补偿；其次，因为房间里的床是由单块木板做成，硬梆梆的；再加上小动物多得数不清，要把他们饱餐一顿。

天一亮，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村子。邓肯夫人坐在一辆双套马车里，车上还装着他们的四个旅行包，她的几个孩子则手拿从月桂树上折下来的树枝护送着。全村的人陪着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程。

路蜿蜒在荒凉、崎岖而又雄伟的群山之中。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天空清澈如水。

他们迈开青春健步，行走如飞，常常在马车前面蹦蹦跳跳，还不时发出高兴的喊叫和欢乐的歌声。穿越阿斯普罗波塔莫斯河时，伊莎多拉和雷蒙德不顾伊丽莎白的苦苦哀求，坚持要在清澈的河水里浸一浸，或者说来个洗礼。他们不知道河水是那样湍急，差点儿叫水冲走。

途经斯特拉图斯、阿格里尼昂、梅索朗吉昂，他们又乘小轮船到了帕特雷。

在帕特雷，他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去奥林匹亚，还是去雅典。最后急于看到巴台农神庙的强烈渴望占了上风，于是一家人乘上了去雅典的火车。

火车奔驰在阳光普照的希腊大地上。一会儿瞥见白雪盖顶的奥林匹亚山，一会儿又处身于婆娑起舞的山林中间，他们感到无限的喜悦，常常用互相拥抱、流出高兴的眼泪来表达情绪。小车站上的农民们惊奇地望着他们，以为他们不是喝醉了酒，就是发了疯。

那天晚上，他们到达了戴上紫罗兰花冠的雅典城。

拂晓，他们满怀崇敬之情，两腿颤抖、战战兢兢地沿着雅典娜神庙的台阶攀登。登上高处，伊莎多拉·邓肯觉得以往的自己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从来没有生活过，似乎现在她刚刚降生于人间。

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那边升起，山显得出奇地洁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壮丽巍峨。

他们登上了神庙入口处最后一级台阶，凝望着在晨曦中闪耀的神庙，不约而同地屏息无语，彼此稍稍保持着距离。

他们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惶恐。现在不能再喊叫，也不能再拥抱了，每个人都找到了顶礼膜拜的最好的位置，一连几个钟头处于狂热的沉思之中，人人战栗，身体发软。

一看到巴台农神庙，他们仿佛觉得自己已经到达了尽善尽美的顶峰。于是自问：既然在雅典找到了可以满足美感的一切，为什么要离开希腊呢？所以他们决定，邓肯家族应该永远留在雅典，在这里建造起一座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圣殿。

在柏林的演出给伊莎多拉·邓肯带来了用之不竭的大笔银行存款，所以他们立即出发去寻找建造这座圣殿的合适地方。只有奥古斯丁一个人不大高兴。他闷闷不乐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吐露了真情：他妻子和孩子不在，他觉得非常寂寞。于是大家同意把她们接来。

他妻子带着小姑娘来了。她穿着入时，还穿了一双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对她的高跟鞋，一家人都侧目而视，因为他们为了不弄脏神庙的白色大理石地面，都已经改穿平底便鞋了。而她却强烈反对穿便鞋。

他们勘察了科罗诺斯、法列尤以及阿提卡的所有谷地，但找不到一个地方堪当建址。

最后，有一天在往希梅图斯散步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山岗，雷蒙德突然把拐棍往地上一放，对大家喊道：“瞧，我们现在同卫城在同一水平面上！”

大家往西看去，确实如此，雅典娜神庙犹如近在咫尺，尽管事实上有四公里之遥。

花了不少时间，他们才查清这块土地属于五家农民所有，拥有所有权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又找了很久，他们才找到了各家的家长，问他们是否肯卖。

那些人惊讶不止，因为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对它发生过兴趣。它远离雅典城，又是块岩石地，只生长一些蓟草，小山附近哪儿也没有水。但是一听有人要买，这几家农民就聚集到一起商量，认定这块土地是无价之宝，漫天要价。

然而邓肯一家决心要买这块地，就抱着必买决心同他们谈判。他们邀请这五家农民吃饭，端上了烤羊羔和其他美味，还请他们喝了不少当地出产的一种白兰地酒。

宴会上，在一位小个子的雅典律师帮助下，他们起草了一份地契。那些农民不会写字，就在上面画了押。

尽管为这块地付的价格并不便宜，但是邓肯一家还是认为这次宴会是一大成功。

这块与卫城一样高的、自古以来被称为科帕诺斯的贫瘠山地，现在属于邓肯家了。

下一步是要弄到图纸和建筑绘图仪器，为房子画出草图来。雷蒙德觉得阿伽门农宫殿的平面图正是所需的范本。他瞧不起建筑师，不要他们帮忙，自己雇来了工匠和搬运石块的工人。他们认定只有从彭提里库斯山运来的石头才配用来盖他们的圣殿，巴台农神庙的雄伟圆柱用材，就是从这座山开采来的。后来他们退了一步，满足于山脚下发现的红石头。打这以后，每天都可以看到运送这些红石头的长列车队，蜿蜒于从彭提里库斯到科帕诺斯的盘山道上。

最后，安放圣殿奠基石的重大日子终于来到了。邓肯一家觉得这件大事必须用隆重的仪式好好庆祝一番。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希腊仪式，请一位希腊祭司安放这块奠基石。

他们把方圆几英里以内的农民全部都请来参加这个仪式。

那位老祭司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帽、黑纱从他宽大的法冠上飘垂下来。祭司要求他们找一只大黑公鸡做为祭品，从阿波罗神庙时代起，以后经由拜占庭祭司传下的仪式都是如此的。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只黑公鸡，连同圣刀一起呈给了祭司。与此同时，由农民组成的几支乐队从附近各地来到

这里。雅典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士也来凑热闹，太阳落山的时候，科帕诺斯山上挤满了人。

仪式完毕，几大桶葡萄酒和当地产的白兰地打开了，小山上燃起了熊熊篝火。邓肯一家同邻近的农民们一起跳舞、喝酒，欢闹了个通宵。

他们决定永远定居希腊。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起誓，以后谁都不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就结了吧”。

对于奥古斯丁的妻子，邓肯一家实在勉强接受她，而且经常形之于色。

他们订出了今后在科帕诺斯的生活准则，当然把所有不是邓肯家族的人排除在外了。

这些准则有点仿照柏拉图的《理想国》，规定太阳一出马上起床，用欢乐的歌舞迎接初升的太阳；然后，一人喝一小碗山羊奶振作精神。上午用来教老百姓跳舞唱歌，必须让他们学习祀奉希腊诸神，并一定要放弃他们的可怕的现代服装。然后，他们稍稍吃点新鲜蔬菜聊作午餐。他们已决定放弃肉食，奉行素食。下午用来沉思默想，晚上则用来进行有适当音乐伴奏的异教徒仪式。

接着开始了科帕诺斯房子的建设工程。由于阿伽门农宫殿的墙大约有两英尺厚，所以科帕诺斯的墙壁也同样必须两英尺厚。砌墙工程大有进展之后，伊莎多拉·邓肯才发现需要从彭提里库斯运来的红石头数量大得惊人，而每一车石头的价钱又是多么昂贵。

几天以后，他们决定就地露营过夜，这时才突然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方圆几里以内连一滴水都弄不到！科帕诺斯是完全干旱的不毛之地，最近的泉水也在四公里开外！

但是雷蒙德什么也不怕。他雇了更多的工人，叫他们动手挖掘一口深井。在挖井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好多种古文物，便断定古时候这里有过一个村庄。而伊莎多拉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片坟场，因为深井越往下挖，土地越来越干旱。

最后，在科帕诺斯毫无收获地寻找了几个星期水源之后，他们返回了雅典，去向预言吉凶的神灵问卜——他们深信，在雅典卫城住着这样的神灵。

他们从城里弄到一张特别许可证，可以在月夜到那里去。他们养成了在狄俄尼索斯神庙的圆形剧场里静坐的习惯，奥古斯丁在那里朗诵希腊悲剧的片断，其他人则跳舞。

邓肯一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根本不同雅典居民来往。有一天他们听农民说，希腊国王曾悄悄地来偷看他们的圣殿，连这他们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另一些国王统治之下的，这些国王就是阿伽门农、墨涅拉俄斯和普里阿摩斯。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正坐在狄俄尼索斯神庙的剧场里。

忽然，一个男孩的高昂歌声刺破了夜晚的寂静。那种哀婉动人、超脱尘寰的音色，只有男童声才能具有。突然间，又有一个声音加入，随后又是一个，唱的是几首古老的希腊乡村民歌。

邓肯们席地倾听，神往不已。雷蒙德说：“这一定是古希腊合唱队的童声合唱。”

第二天夜里，这样的音乐会又出现了一次。

这时候，他们对希腊教堂的拜占庭音乐很感兴趣。他们参观了希腊大教堂，听了唱诗班大师美妙而哀怨的赞美诗歌唱，还参观了雅典城外培养青

年祭司的神学院。

听了孩子们唱的歌，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这些希腊儿童组织起来，重新恢复原来的希腊合唱队。紧接着，他们便开始实施。他们每天夜里都在酒神剧场里举行比赛，凡是能演唱最古老的希腊歌曲的人都可以得奖，另外还聘请了一位拜占庭音乐老师。

最后，他们选拔出十个全雅典声音最美的男孩组成了一个合唱队。

就这样，研究雅典卫城，进行科帕诺斯的建筑，以及随埃斯库罗斯的合唱曲跳舞——邓肯一家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之中。除了偶尔到远处村庄远足以外，他们别的什么也不想了。

就在邓肯一家在雅典沉缅于他们的享受时，那里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情。王室和大学生之间就演戏应该采用哪一种希腊语：古希腊语或是现代希腊语——出现了争歧。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地走上大街，打着旗帜，主张采用古希腊语。

邓肯一家从科帕诺斯返回雅典那一天，大学生们围住了他们的马车，对他们穿的古希腊图尼克衣衫喝采欢呼，并要求他们参加他们的游行。

邓肯一家欣然同意了。

学生们在这次大会上决定去市剧场举行演出。那十个希腊男孩都穿上花花绿绿的飘动的图尼克，唱着埃斯库罗斯用古希腊习用语编成的合唱曲，伊莎多拉·邓肯表演舞蹈，这使大学生们欣喜若狂。

国王乔治听到这次游行之后，表示希望再在王家剧院演出一次。但是，在王室和驻雅典的各国大使面前举行的演出，比起在大众剧场给大学生的演出来，缺少那种火焰和热情。

当乔治国王到后台化妆室来，邀请伊莎多拉去谒见御用包厢里的王后的时候，尽管他们显得很高兴，伊莎多拉却看得出他们对她的艺术并没有真正出自心灵的热爱，也不真正懂。

此事发生的时候，恰好伊莎多拉发现银行存款告罄。在为王室演出的那天晚上，她久久不能入睡，天一亮就独自跑到卫城，走进狄俄尼索斯神庙剧场跳起舞来。伊莎多拉·邓肯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在这里跳舞了。然后，她又爬到卫城城门上，站在巴台农神庙前面，突然觉得自己全部美梦已经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她只是现代人，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不可能拥有古希腊人的感情。她现在前面的这个雅典娜神庙，在以往不同的时代有过它不同的色彩，而她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的美丽幻想一下子破灭了。

三天之后，一大群热心者，还有那流着眼泪的十名希腊男童的父母，簇拥着邓肯一家搭上从雅典去维也纳的火车。在车站上，伊莎多拉·邓肯用白蓝两色的希腊国旗裹住全身，十个希腊男童和所有老百姓一起唱起了希腊国歌。

跟随邓肯一家离开希腊、前往维也纳的还有他们的那个男童合唱队的十个男孩。

维也纳离布达佩斯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在巴台农神庙前度过的这一年，使伊莎多拉·邓肯对布达佩斯相当陌生了。所以，贝列吉从未花四个小时乘车看过她，她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一点没有认为他应该来。她迷恋希腊的大合唱，把全部精力和情绪完全奉献给了它。另外，她获得了一个充满理性的男人的友谊，他的名字叫赫曼·巴尔。

两年前，伊莎多拉·邓肯在维也纳的“艺术家之家”为艺术家们表演的时候，巴尔便看过她的舞蹈。她带领希腊男童合唱队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更加感到兴趣，在维也纳的《新报》上写了精彩动人的评论文章。

巴尔大约三十岁，一头浓密的褐色头发，一嘴褐色的胡子。尽管他经常在散戏以后到勃里斯托夫旅馆来，和伊莎多拉一直谈到天亮，但是，在两人之间并没有丝毫男女私情。也许有人会怀疑这难以置信，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自从布达佩斯那次情欲放纵以后，伊莎多拉确信风流的日子已告终止，将来只专门献身于她的艺术。她的情欲自从那次猛然觉醒以后，又沉睡了，根本没有了这方面的要求，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她的艺术上。

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得到了曾在维也纳卡尔剧场获得的成功。虽然观众对十个希腊男童的合唱反应相当冷淡，但当伊莎多拉最后表演《蓝色多瑙河》舞蹈的时候，观众为之兴奋激动不已。

演出结束时，伊莎多拉做了讲话，解释这不是她所期望的效果；她所希望的是表达出希腊悲剧的精神实质。她说：“我们必须复活合唱的美。”

然而观众一个劲儿叫喊：“别讲啦，跳舞吧！跳那美丽的《蓝色多瑙河》，再跳一次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使劲鼓掌。

就这样，他们满载而归地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

希腊合唱队在慕尼黑的出现，在艺术界和知识界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是柏林对伊莎多拉的希腊合唱队不怎么热情，尽管来自慕尼黑的著名教授科纳里乌斯亲自做介绍，柏林观众还是像维也纳观众一样喊道：

“啊！跳《蓝色多瑙河》吧，别管什么恢复希腊合唱啦！”

与此同时，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觉到不习惯这个陌生的环境。有好几次，旅馆主人向伊莎多拉抱怨，这些孩子不懂规矩，脾气太坏，总是要求黑面包、熟透了的黑橄榄果和生洋葱。每天的饭菜中若没有这些开胃食品，就对侍者大发脾气，一直发展到把牛排扣在他们头上，动刀子。

他们被几家上等旅馆撵出来以后，没有办法，只好在柏林伊莎多拉那套间住房的前厅里安放十只帆布床，与她住在一起。

这些希腊男孩跟伊莎多拉一起只待了六个月。他们的嗓子在逐渐变声，唱得越来越走调。而且，后来警察当局通知伊莎多拉说，这些希腊男孩夜里偷偷摸摸跳窗户出去，当她以为他们正在安稳地沉睡的时候，他们却在出入下等咖啡馆，同本城最下等的希腊妓女鬼混。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同样，当他们抵达柏林以后，完全失掉了当初在酒神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并且每个人都长高了许多。所以有一天，在经过多次苦恼的商议之后，邓肯一家终于决定让整个希腊合唱队列队齐步走进一家大百货公司，给他们买了衣裤，然后用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给每个人买了到雅典的二等车票，与他们告别。

伊莎多拉·邓肯创建希腊合唱队的试验流产了。

德国人对艺术讨论十分严肃，而且都要寻根究底地思考一番。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成了激烈的，甚至是热火朝天的争论的话题。所有报纸上经常出现整栏整栏文章，时而欢呼她是新发现一门艺术的天才，时而又痛斥她是真正古典的舞蹈（即芭蕾舞）的破坏者。

从观众为之颠倒发狂的演出归来后，伊莎多拉便煮一杯淡牛奶，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沉思默想，坐到深夜，为她所追求的纯粹美的动

作寻找灵感。

在常去邓肯家的画家和作家中，有一位青年人。他高高的前额，目光犀利，戴着眼镜。他认为向她启示尼采的天才思想是他的使命。他对伊莎多拉说，只有靠尼采的指导，她才有可能像她寻求的那样，充分显示舞蹈的表现力。

尼采哲学的魅力使伊莎多拉入了迷，就连她的经理人劝她去汉堡、汉诺威和莱比锡等地，哪怕是做短期的演出——在那里有兴奋好奇的观众和成千上万的马克正在等着她——伊莎多拉也非常不愿意。她的经理人常常向她鼓吹做可以大获成功的环球演出，但伊莎多拉同样没有兴趣。

她要学习，希望继续她的研究，创造出新舞蹈和动作。另外，童年时代一直萦绕在伊莎多拉·邓肯脑中的办学校的梦想，也越来越强烈。

伊莎多拉想要留在工作室学习的愿望，简直快把经理人急疯了。他不断央求她去旅行演出，并且三番五次上门苦苦哀求，给她看一份份报纸。上面刊登的消息说，在伦敦和一些别的地方，模仿她的服装和舞蹈正受到欢迎，颇获成功，并且被当作真正独创的货色而受到欢呼。

但这些消息也没有打动她。当夏天来到时，伊莎多拉·邓肯又宣布打算整个夏季都留在拜罗伊特，以便钻研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这样一来，经理人恼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一天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前来拜访伊莎多拉，这使她留下来的决定更是坚定不移了。

科西玛·瓦格纳亭亭玉立，仪态端庄，秀眸流盼。她精通各种深奥的哲学，熟知大师丈夫的每一乐句、每一音符。她以最大的鼓励，娓娓动听地向伊莎多拉·邓肯谈到她的艺术，然后告诉伊莎多拉说，瓦格纳不喜欢芭蕾舞和它的服装。他梦寐以求的是酒神节歌舞和鲜花一般的姑娘舞蹈。她谈到，那一年应邀来拜罗伊特演出的柏林芭蕾舞剧团的表演，根本不可能适合瓦格纳的梦幻。

接着，她问伊莎多拉是否同意在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中表演一段舞蹈。可是，产生了一个难题：根据伊莎多拉的理想，她是绝不同芭蕾舞有丝毫牵扯的。她认为芭蕾舞的每一个动作都伤害着她的美感，它的表现方式在她看来都是机械的、粗俗的。

“啊！我为什么没有一个我梦想已久的学校呢？”伊莎多拉回答道。“这样，我就可以在拜罗伊特给您送来一群瓦格纳梦寐以求的山林女神、田野之神、半人马神以及优美三女神了。”

伊莎多拉·邓肯是在5月到达拜罗伊特的，她在黑鹰旅馆租了几个房间，其中的一间宽敞得足够练功。便在里面放了一架钢琴。

她每天都收到瓦格纳夫人的一张便条，邀请她去午餐或晚餐，或者晚上到汪弗里德别墅去玩。她的款待盛情已极，每天去那里赴宴的至少有十五个人以上。客人中间包括德国的大思想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常常还有来自各国的大公和公爵夫人，或者皇亲国戚。

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墓在汪弗里德别墅的花园里，从藏书室的窗户外就可以望得见。

用完午餐，瓦格纳夫人便挽着伊莎多拉的胳膊，走进花园，用非常忧郁而又神秘的声调跟她聊天。

指挥家汉斯·里克特、音乐家卡尔·马克、指挥家和作曲家莫特儿、作曲家汉帕丁克和音乐家海因里希·索德，每一位艺术家都曾应邀到过汪弗

里德别墅，并受到殷勤的接待。

伊莎多拉·邓肯为能够跻身于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中间，感到非常自豪。她开始学习歌剧《唐豪塞》的音乐。唐豪塞是中世纪欧洲传说中的一名骑士。

《唐豪塞》、《戒指》、《帕西法尔》这些瓦格纳创作的歌剧的接连演出，使伊莎多拉·邓肯始终陶醉在音乐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她背熟了这些歌剧的台词，让这些传奇故事渗透在她的心中，整个人都随着瓦格纳旋律的波浪而起伏。

黑鹰旅馆颇为拥挤，伊莎多拉住得很不舒服。一天，她在巴伐里亚的一座隐居花园中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所建筑精美的石头房子。

这是一座古老的狩猎别墅，里面有非常宽敞、比例匀称的起居室，有古老的大理石台阶通向浪漫色彩的花园。它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有一大家子农民已在那里住了大约二十年。

伊莎多拉答应给他们相当可观的一大笔钱，让他们搬走，至少搬走一个夏天。然后，她请了一批油漆匠和木匠进行修缮，把所有的墙壁都粉刷一新，漆成柔和的淡绿色。她前往柏林，订购了一批长沙发、靠垫、柳条圈椅和书籍。伊莎多拉取得了这所叫做“菲利浦静庐”的狩猎别墅的所有权。

伊莎多拉·邓肯一个人住在拜罗伊特。邓肯夫人和伊丽莎白都在瑞士避暑。雷蒙德已经返回他心爱的雅典去继续修筑科帕诺斯圣殿，他接二连三地给伊莎多拉发来电报：“自流井工程进行顺利，下周定能出水。速汇资金。”就这样，科帕诺斯耗掉了她一笔巨款。

在离开布达佩斯的这两年里，伊莎多拉一直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就像她还是处女一样。整个人原先全都沉浸在“希腊狂热”之中，现在又沉浸在“瓦格纳狂热”之中。

她睡得很少，醒来时嘴里老是在哼哼头一天晚上学过的乐曲主题。但是，情欲还是要在她心里觉醒，尽管这一次与以往大不相同，形式完全两样。

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玛丽单独居住在“菲利浦静庐”中。因为这里没有仆人的睡房，男仆和厨师都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客栈里。

一天晚上，玛丽来找她，说：“伊莎多拉，我不是有意吓唬您。可是，您来窗前瞧瞧，那里，在对面的树下，每天半夜后老有一个男人望着您的窗户。我担心这是个贼，在打什么坏主意。”

确实有一个瘦小的男人站在树下仰望她的窗户，伊莎多拉吓得打了个冷战。

但是，突然月亮露出来了，照亮了这个人的脸。玛丽一把抓住伊莎多拉的手，两人都看清了那是音乐家海因里希·索德往上仰起的兴奋面容。

她们从窗口往后退缩，忍不住像女学生那样格格傻笑了一阵——也许这是恐惧之后产生的反应。

“他每天晚上都像这样站在那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玛丽低声说道。

伊莎多拉让玛丽等着，自己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外衣，轻轻地跑出门外，直奔索德站的那个地方。

“亲爱的，好朋友，您这么爱我吗？”伊莎多拉问。

“是的，是……”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我的理想，你就是我的救星。”

伊莎多拉拉着他的手，温柔地把他带上台阶，引入别墅。

他像一个梦游人，两眼发直地盯住她，眼睛里充满祈祷的神情。

当她回望他时，突然觉得自己精神振奋，似乎同他一起穿越太空。像这样微妙的情欲狂热，她以前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伊莎多拉·邓肯觉得浑身发软，头晕目眩，一切感觉都麻木了。在一种无法形容的狂喜极乐之中，她倒在了他的怀抱里。

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经历了飘然欲仙、虚无缥缈的超然感觉。

索德向前俯身，吻了吻她的眼睛和额角。但这绝不是人间情欲的吻。

的确，无论是这次直到天明他们分手，还是以后每天晚上来她的别墅，索德都没有对伊莎多拉有过什么尘世鄙俗的行为。

她并不期望他表达什么世俗的感情。她那沉睡了两年的官能感觉，完全变成了一种飘然世外的心醉神迷状态。

在拜罗伊特的排练开始了。伊莎多拉同索德一起坐在黑沉沉的剧场里，听着歌剧《帕西法尔》的序曲开始演奏。

一阵快感透过她的全部神经，强烈得令人难忍。哪怕他的手臂轻轻一触，也会引起她浑身哆嗦，简直到了晕倒昏迷的地步，同时又有一种甜蜜而痛苦的愉快。

这种快感像万道霞光在她的脑海千回百转，在她的咽喉里跃动，乐得她简直想大喊大叫。

伊莎多拉经常感觉到他瘦小的手正按捺着她的嘴唇，不让她忍不住发出呻吟和叹息的声音。

她好像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达到了爱情的顶峰，呻吟得这么执拗，很难分清究竟是十足的欢乐还是可怕的痛苦。似乎二者兼而有之。

每天夜里，索德都来菲利浦静庐。他从来没有像情人那样爱抚过伊莎多拉，也从来没有想要解开她的舞衣，或者以任何方式接触她的双乳和身体，尽管他知道她身体的每一下悸动都是仅属于他的。

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激情，在他的目光一瞥之下，在伊莎多拉的体内油然而生。

一阵阵的快感强烈得可怕，使她常常觉得这种快乐正在置她于死地。他简直完完全全地占有了她的灵魂，使她觉得只能凝视他的眼睛，渴望死亡的来临。因为这不像世俗的爱情，没有任何满足和停止。

伊莎多拉完全丧失了食欲，甚至都不想睡觉。只有《帕西法尔》的音乐能使她兴奋激动，似乎也只有它才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使她多少解脱陷入的这个微妙而可怕的情网。

索德的意志力十分坚强，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疯狂的心醉神迷和令人晕眩的狂喜，一下子转入纯理智的专心一致状态。

每天他都给伊莎多拉带来一部分自己创作的《圣弗朗西斯》的手稿，写一章，就给她念一章。他还把但丁的《神曲》从头到尾念给伊莎多拉听，一直念到天亮，常常是旭日东升才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离开那里。

一天早晨，他正要离开菲利浦静庐的时候，忽然惊慌地抓住伊莎多拉的手说：“我看见瓦格纳夫人走过来了！”

瓦格纳夫人迎着晨曦走来。她脸色苍白。

头一天，她和伊莎多拉争论过伊莎多拉给《唐豪塞》的酒神祭中三女神编舞时赋予意义是否适当。夜里，瓦格纳夫人无法入睡，把瓦格纳的遗物翻检了一遍，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一个小笔记本，上面写有一段文字，描述了他构思的这段酒神祭舞蹈的意图。

这位可爱的女人再也等不及了，天刚破晓立即赶来承认伊莎多拉是正确的。不仅如此，还用激动得发抖的嗓音对伊莎多拉说：“我亲爱的孩子，你的灵感确实确实得自大师本人。你瞧，他写的是什麼，同你的直觉完全不谋而合。从今以后，你可以在拜罗伊特自由处理这段舞蹈，我再也不来干涉你。”

或许当时瓦格纳夫人的心里有过一个念头：伊莎多拉会嫁给她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的，同他一起继承大师的传统。但是，尽管西格弗里德一直是伊莎多拉的朋友，可他从未想过自己要做她的爱人。至于伊莎多拉，全部身心都为索德超人的爱所吸引，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要是与西格弗里德结合对她多么有价值。

在伦敦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在大英博物馆读过德国博物学家厄恩斯特·海克尔著作的英译本。他关于宇宙各种现象明白而清楚的表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莎多拉写过一封信，向他表示感谢。大概这封信的某些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后来当她在柏林演出期间，他给伊莎多拉写了回信。

海克尔由于他的自由派言论，当时已遭德皇下诏放逐，不能去柏林。但是，他们之间书信不断。伊莎多拉到拜罗伊特以后，写信邀请他来作客，看节日演出。

一个雨天的上午，伊莎多拉·邓肯乘一辆双套敞篷马车，赶到车站去接海克尔。

这位伟人尽管已年过六旬，须发俱白，但身体很魁梧健壮。俩人从未见过面，但是一见如故。伊莎多拉马上就被他粗大的胳膊搂住，脸也埋进了他的胡须之中。

他们一起来到菲利浦静庐，伊莎多拉为他准备了一个装饰着鲜花的房间。然后，伊莎多拉跑到汪弗里德别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瓦格纳夫人，说伟大的海克尔已经莅临，成了她的上宾，并且还要来听《帕西法尔》。

出乎伊莎多拉意料，这个消息引起的反应十分冷淡。她不知道，瓦格纳夫人床头上边的十字架和吊着的念珠决非装饰品，她真的是一个常去教堂做礼拜的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一个写出《宇宙之谜》、信仰达尔文学说的人，在汪弗里德别墅里是不可能受到热情接待的。

伊莎多拉以坦率真诚的口吻向她解释了海克尔的伟大以及她对他的敬佩。瓦格纳夫人十分勉强地答应伊莎多拉在令人羡慕的瓦格纳包厢中给他一个座位，因为她是瓦格纳夫人的好友，不便拒绝她的请求。

当天下午，幕间休息时，伊莎多拉穿着希腊舞衣，光腿赤脚，手挽手地拉着海克尔在惊讶的观众面前走过。

海克尔观看《帕西法尔》时一直沉默不语。演到第三幕，伊莎多拉才明白，这种神秘激情一点也不能打动他的心。他的头脑过于科学了，不能为神话魔力所感动。

由于汪弗里德别墅没有宴请海克尔，伊莎多拉·邓肯决定自己为他举行欢迎会。她邀请了一批显贵人物，从当时正在拜罗伊特访问的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德皇的妹妹萨克斯梅宁公主，一直到亨利公主、汉帕丁克、索德等人。

伊莎多拉发表了赞颂海克尔的讲话，然后又跳了一个向他致敬的舞蹈。

海克尔对她的舞蹈发表了一番评论。接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冯·巴利唱了歌。他们一起用晚餐，海克尔高兴得像个孩子。大家又吃又喝，又唱歌，一直闹到天亮。

但是，第二天，海克尔还是太阳一出来就起了床。在菲利浦静庐逗留期间，每天早晨他都是这样。他常常到伊莎多拉的房间来，约她一起到山顶去散步。伊莎多拉对爬山并不像他那样热衷，但是她觉得这种散步倒是很有趣。因为他对路上见到的每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个地质岩层，都要发表一番见解。

一天晚上，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驾临汪弗里德别墅。当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并且小声提醒伊莎多拉也站起来。可是她仍旧悠闲自在地斜靠在长沙发上一会儿，斐迪南国王问伊莎多拉是谁，并向她走了过来。在场的显贵都觉得十分尴尬。斐迪南却平易近人地在这个长沙发上挨着伊莎多拉坐下，同她津津有味地谈论起他对希腊文物古迹的喜好来。伊莎多拉告诉他，她有一个理想，就是想建立一所学校，来复兴这个古代世界。他听罢大声地说：“这个主意妙极了，你一定要到黑海之滨我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

在进餐时，伊莎多拉问他能否在某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到静庐来同她一起进晚餐，以便向他进一步解释她的理想和抱负。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如约来到静庐，同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此后，斐迪南国王数次驾临静庐。尽管他们是极其纯真地坐在那儿讨论艺术，这件事在拜罗伊特还是搞得满城风雨。因为他是深更半夜来的。事实上，伊莎多拉·邓肯做什么事情总显得与众不同，因此免不了引起人家大惊小怪。

菲利浦静庐有许多沙发床和垫子，玫瑰色的吊灯，可就是没有一把椅子。在一些人的眼里，它是“邪恶的殿堂”，尤其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冯·巴利来了兴头，经常整夜引吭高歌，伊莎多拉又陪着舞蹈一番，所以人们都认为这是一所名符其实的魔宅，把他们的宴乐说成是“可怕的放荡”。

在汪弗里德别墅，伊莎多拉·邓肯遇到过几位青年军官，他们邀请她早晨同他们一起去骑马。伊莎多拉穿着希腊舞衣和凉鞋，头上什么也不戴，鬃发随风飘舞，活像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女妖。由于从静庐到节日剧场还有一段距离，她从一位军官那里买了一匹马，骑马去参加每次排练。这匹马原先是军官的坐骑，习惯于挨马刺踢，非常难驾驭。

当它发现背上只是一个女人，就任性胡闹撒起欢来。经常在路旁每一家小酒馆门口停步不前，四蹄钉地，不肯再走一步（因为军官们平时都在这里喝酒），直到它从前的主人的几位朋友哈哈大笑出来送她一程才算完事。当伊莎多拉以这副模样到达剧场，便会引起剧场门口聚集的全体观众的极大轰动。

在《唐豪塞》首场公演时，伊莎多拉穿的是透明的舞衣，跳舞的时候她的身体各个部分暴露无遗。这样，置身于芭蕾舞演员套着粉红色紧身衫的大腿中间，就造成了相当的骚乱。最后，连可怜的瓦格纳夫人也失去了勇气，派她的一个女儿把一件白色无袖女衫送到化妆室来，央告伊莎多拉把它穿在薄薄披纱下面。但是伊莎多拉丝毫不动摇，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穿服装和跳舞，否则干脆不跳。

“您会看到的，要不了多少年，您的酒神祭女和花似的少女们都会像我这样装束打扮的。”她对瓦格纳夫人讲。她的这一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

但是，一般人对于伊莎多拉这双漂亮的大腿议论纷纷，争论激烈：伊莎多拉裸露光滑发亮的皮肤究竟是否合乎道德，应不应该用肉色丝质紧身衫把它遮盖起来。

伊莎多拉多次大声疾呼，竭力剖白，说肉色紧身衫是多么鄙俗不雅；而赤裸的人体，当它是为美丽的思想所灌注的时候，又是多么美丽和纯洁无邪。

夏天在这个奇怪的神话世界中慢慢消逝，最后几天来到了。索德将要离开，巡回讲学。伊莎多拉也为自己安排一次德国全境巡回演出。她离开了拜罗伊特。

旅行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伊莎多拉·邓肯听了索德对学生的讲演。他用时而柔和、时而激动的声调向他们谈论着艺术，中途突然告诉学生们说，一个美国女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的形式。

他的夸奖使伊莎多拉感到幸福和自豪，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那天夜晚，她为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在街上游行。伊莎多拉和索德并肩站在旅馆的台阶上，一起分享他的胜利的喜悦。海德堡的青年们崇拜他。每家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他的照片，另外都摆着伊莎多拉的那本书——《未来的舞蹈》，他们两人的名字总是并列在一起。

索德夫人接待了伊莎多拉。她是一位和善的女人，但她过于讲究实际，不能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到了晚年，索德终于离开了她，同小提琴家皮耶德·派珀一起搬到加德西的一所别墅去居住。

索德夫人老是显出一副心神不宁的表情。但不管怎么说，她待伊莎多拉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有什么嫉妒之心，那她并没有表露出来。

尽管伊莎多拉·邓肯同索德度过了许多夜晚，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是，他对待她的态度，几乎使她整个肉体都非常敏感。他只需接触一下，有时只需看一眼，就足以使伊莎多拉感觉到极大的快感，引起她强烈的情绪波动。

这种情形太不正常，伊莎多拉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她什么也吃不下，常常有一阵阵说不出的软弱无力。她的舞蹈也越来越显得虚无缥缈，没有内容。

这次巡回演出，伊莎多拉·邓肯独自一人旅行，身边只有一名女仆侍候。最后她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夜里总是听见索德叫她的声音，那么肯定第二天能收到他的一封来信。

人们开始为她日益消瘦而担心，并且对她那莫名其妙的憔悴容颜议论纷纷。

她吃不下也睡不着，常常整夜不合眼，用柔软发烫的双手抚摩着自己的身体，仿佛有成千上万个魔鬼附在身上。她徒劳无益地企图减轻这种痛苦，寻找摆脱这种痛苦的出路。

她不断地看见索德的眼睛，听到他的声音。经过这样一夜一夜的折腾，时常在凌晨两点，伊莎多拉怀着极度绝望的心情起床，搭上火车，跨过半个德国——只是为了挨近他待一个小时，然后独自返回去巡回演出，遭受更大的内心痛苦。

他在拜罗伊特在她心中激起了那种精神狂热，逐渐被一种不可克制的性欲望所代替。

直到她的经理人带来一个去俄国演出的合同，才把上面这种危险状态

结束。

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需要两天，但从经过边境那一瞬间起，伊莎多拉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那以后，那冷冽刺骨的林海雪原似乎把她滚热的脑子冷却下来了。

那天夜里，在卧铺车厢里，伊莎多拉·邓肯梦见自己从窗子里跳了出来，赤条条地掉进雪中，掉进了雪的冰冷怀抱，打着滚，最后冻僵了。

## 第五章 俄罗斯之旅

但是，这一幕惨剧——那晨曦中绝望的愤怒，注定了要在她今后的生活中结出果实。

她把双手搭在他两肩上，勾住他健壮的脖子，把他的头往下拉，吻了他的嘴。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俄国芭蕾舞演员脱下了她们的舞鞋和舞袜。

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四点到站，而因风雪阻挡晚点十二个小时，在翌晨四点才到达。

车站上没有一个人迎接伊莎多拉·邓肯。当她从火车上下来时，气温是零下十度，这样冷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连穿得很厚的俄国马车夫都在用戴手套的拳头捶打胳膊，加快血管里的血液流通。

伊莎多拉让女仆留下看守行李，自己雇了一辆单套马车，让车夫拉到欧罗巴旅馆。

途中，她遇见了一种让她很难忘怀的景象，其恐怖不亚于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故事中的任何情景。

那是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凄凄惨惨地走过来。男人们扛着一口口棺材，压得弯腰驼背，一个接一个地走着。

马车夫让马慢步而行，低下头划着十字。在朦胧的晨曦中望着这一切，伊莎多拉心中充满着恐怖。她问马车夫这是怎么回事。尽管她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她明白了。

原来这些死者是前一天在冬宫前面被枪杀的工人：他们手无寸铁去请求沙皇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

伊莎多拉叫马车夫停住马车。当这个悲惨的不见尽头的队伍在身边走过的时候，她的眼泪不由得从脸颊上滚滚流下，在脸上冻成冰珠。他们之所以要在黎明时下葬，因为在白天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这场情景是不能在白天给全城人看见的。泪水使伊莎多拉喉头哽咽，她无比义愤地望着这些抬着死难者的可怜的悲痛欲绝的工人。

面对这种悲剧，伊莎多拉暗暗发誓，要以自己全部力量，为人民、为被踩在下层的人服务。

她猛然发觉，所有个人的爱欲和痛苦，现在看起来多么渺小无用！甚至她的艺术，如果不能有助于这些人，也将是一无所用之物。

最后几个悲哀的送葬者终于从他们身边过去。马车夫奇怪地回过头来，望着泪水盈面的伊莎多拉，他又一次划了十字，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扬鞭

策马朝旅馆去了。

伊莎多拉登楼进入豪华的房间，趴到了恬静的床铺上，独自哭泣起来，一直哭到入睡。

但是，这幕惨剧，那晨曦中绝望的愤怒，注定了要在她今后的生活中结出果实。

欧罗巴旅馆的房间宽敞无比，天花板高到极点。窗子是封死的，从不打开，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抽进来的。伊莎多拉醒得很晚。演出经理人前来拜访，送了几束鲜花。

过了两夜以后，伊莎多拉·邓肯在贵族剧场里出现在彼得堡的社会名流面前。

在那些看惯了有昂贵布景的豪华舞剧的外行们看来，看一个穿着薄如蛛网的图尼克的年轻姑娘，出现在简朴的蓝色幕布前面，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这一定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要看伊莎多拉是如何用她的舞蹈表现出她的灵魂，是怎样理解肖邦的灵魂的。

然而，伊莎多拉刚跳完第一个舞，掌声就如雷似地爆发出来。

想到晨曦中那送葬行列的牺牲者们，一听到悲壮的前奏曲，伊莎多拉的灵魂就如饥似渴，倍受熬煎；一听到雷霆万钧的波洛涅兹舞曲，她的灵魂就恨不得钻进音乐里边。

她的灵魂由于义愤而哭泣；这样的灵魂，在这些有钱的、娇纵的贵族观众中间，居然引起了掌声震动。

第二天，一位长得很迷人的娇小玲珑的女士前来拜访伊莎多拉。她身裹黑貂皮大衣，耳朵上挂着钻石耳环，脖子上绕着珍珠。她说她是著名舞蹈家克舍辛斯卡娅，是代表俄国芭蕾舞团来欢迎她的，并且邀请伊莎多拉参加当天晚上歌剧院的游艺晚会。

伊莎多拉感到非常惊讶。在拜罗伊特，伊莎多拉·邓肯受到的只是芭蕾舞剧界的冷淡和敌意，他们甚至在她的地毯上撒图打，把她的赤脚扎伤。两种态度截然不同，使伊莎多拉又惊又喜。

那天晚上，一辆烧暖了的、垫了贵重毛皮的马车把伊莎多拉送到了歌剧院。坐进第一列包厢，里面摆着鲜花、糖果，另外还有三位圣彼得堡英俊青年。伊莎多拉仍旧穿着那件小的白色图尼克和凉鞋。

伊莎多拉·邓肯一直反对芭蕾舞剧，认为它是一种虚假荒唐的艺术，甚至根本不能算在艺术之列。但是，当克舍辛斯卡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时候，她却禁不住为她天仙般的美妙身姿鼓掌。那仿佛不是人间所有，而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者蝴蝶舞影婆娑！

幕间休息时，伊莎多拉环顾四周，见到了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穿着最美丽的袒胸露肩的夜礼服，浑身珠光宝气，而穿着华贵制服的男人侍立于侧。所有这些豪华排场，与头两天清晨伊莎多拉碰到的那个送葬的行列恰成对比。所有这些笑容满面的幸运儿，同苦难者实在毫无共同之处。

演出结束后，伊莎多拉被邀请到克舍辛斯卡娅的豪华府邸去用晚餐。在那里，她遇到了米哈伊尔大公。当她讲述起为平民百姓的孩子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时，他显得有些骇异。在别人的眼里，伊莎多拉是一个完全不可理解的人物，但是他们又都极为亲切热情、异常慷慨好客地接待她。

过了一些日子，俄国著名芭蕾舞明星安娜·巴芙洛娃来访。伊莎多拉又一次应邀坐在包厢里观看她引人入胜的芭蕾舞剧《吉赛尔》中担任主角的

表演。当巴芙洛娃在舞台上飘然起舞的时候，她又一次忍不住对她精湛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芙洛娃在家里举行晚宴。她家比克舍辛斯卡娅的府邸要朴素一些，不过同样也很漂亮。伊莎多拉·邓肯坐在两位画家——列夫·巴克斯特和亚历山大·别努阿中间，并且她第一次见到了俄国戏剧活动家谢尔盖·佳吉列夫。她同他就她所设想的舞蹈艺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伊莎多拉说出了她做为反对派对芭蕾舞的看法。

那天晚上，在晚餐上，画家巴克斯特为伊莎多拉画了一张速写，表现了她非常严肃的神情，几绺鬃发感伤地垂在一边。巴克斯特还给她看了手相。“你会获得很大的荣耀，”他说，“但你会失掉你在人间最心爱的两个东西。”这句预言真叫伊莎多拉摸不着头脑。

吃罢晚餐，不知疲倦的巴芙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尽管大家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五点钟过了，但她还是邀请伊莎多拉当天上午八点再去，如果伊莎多拉想看她练功的话。伊莎多拉晚了三个小时才到，她已经相当疲乏了。

整整三个小时，伊莎多拉·邓肯茫然紧张地坐在那里欣赏巴芙洛娃令人惊羨的绝技。

巴芙洛娃似乎是钢铁和橡皮制成的，美丽的面孔呈现出殉道者那样严肃的线条，练起来从来没有停过。

十二点的午餐时间到了。可是，席间巴芙洛娃脸色苍白，坐在那里不怎么进食，也不喝酒。伊莎多拉饿了，吃了不少炸猪排。巴芙洛娃把她送回旅馆，然后再去皇家剧院参加无休止的排练。伊莎多拉困乏不堪，倒在床上睡得香极了，暗自庆幸自己福星高照，没有倒霉地去当芭蕾舞演员。

第二天，伊莎多拉·邓肯空前地在八点钟就起来了，去参观皇家舞蹈学校。

在那里，她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小学生，一个个做着重复的练习，一连好几个钟头踮着脚尖站立着。在她的眼中，这些孩子受着非人的折磨，他们是一些经受残暴的、不必要的严厉刑罚的牺牲品。在她的眼中，宽敞的、光秃秃的舞蹈教室毫无美感，也没有灵感，简直像是一间刑讯室。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所皇家舞蹈学校简直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在圣彼得堡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伊莎多拉到了莫斯科。这里的观众对她起初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样热情。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做过这样描述：

大约在 1908 年或 1909 年间，我记不清楚具体日期了，我到底见识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位当代的天才——伊莎多拉·邓肯和戈登·克莱格。

我观看邓肯的表演完全出自偶然，因为在此以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见预告她要来莫斯科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表演的数量相当少的观众之中，却有以马蒙托夫为首的那么多艺术家、雕塑家，有那么多芭蕾舞演员，有那么多剧场首演观众和不寻常事物爱好者的时候，真是惊讶之至。

邓肯首次在台上出现，并没有引起很了不起的印象。由于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几乎不能注意和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完了以后，只引起了一阵不冷不热的掌声和怯生生的试探的口哨声。但是，接连几个节日——其中有一个特别有说服力——演完之后，

我对全体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就毫不掩饰地大鼓其掌。

幕间休息时，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新收下的信徒，跑到台前去鼓掌。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我跟马蒙托夫并肩站在一起，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马蒙托夫旁边还有一位著名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作家。当一般观众清楚了在鼓掌的人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全场也就轰动起来。嘘声停止了，而当观众看见可以鼓掌了的时候，于是全场鼓起掌来，接着就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欢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时起，我从来错过一次邓肯的表演。必须看她的演出，常常是受我内心的艺术感，与她的艺术密切联系的艺术感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她的好朋友克莱格的思想都有所了解以后，我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由于我们不了解的情况的促使，不同领域的形形色色人等，都在艺术中追求同样的出自自然的创造原则。

他们相遇的时候，彼此对思想上的共同性不胜惊奇。这种情况恰恰就是我在前描述的那次会见中发生的。几乎就在我们未及发一言的时候，就达到了互相了解。

邓肯初次来莫斯科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同她结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到我们剧院演出，我就把她当成贵宾接待了。这种欢迎已经成为集体性的了，因为我们剧院全体人员都和我一起欢迎她，他们终于全都了解了她，把她做为一位艺术家来热爱。

邓肯不知道怎样有条理地、系统地谈她的艺术。她的种种思想往往猝然而发，都是我们最不注意的日常事情的结果。例如，当有人问她，是谁教她跳舞的时候，她回答说：

“是歌舞女神教我的。我幼年时刚学会站立，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整个人类、整个世界都必须舞蹈。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如果有人干扰，不想理解自然赋予我们的这种天然需要，那是徒劳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那独特的美国法语结束了谈话。

另一次，她谈到她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到她的化妆室，妨碍她准备演下一个节目的时候，她解释说：

“我不能那样无准备地去演出。我上台之前一定要把我的灵魂安上一台发动机。当这台发动机开始工作时，我的腿、手臂和整个身体将独立于我的意志之外而动作。但是，如果我没有时间在我的灵魂里安上一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

那个时期，我正在寻求一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一个演员必须学会在上台之前把它安装在他的灵魂里。显然，我这些问题一定使邓肯感到厌烦。我就在她演出和排练过程中观察她，只见她的情绪发展着，面部表情随之而变，两眼发光，充分显示出她的灵魂里产生的一切。回忆我和她随意而为的几次关于艺术的讨论，比较她做过的工作和我正在做的工作，我明白了，我们在艺术上殊途同归，寻求着不同艺术分支中的同一东西……

芭蕾舞剧令伊莎多拉·邓肯不寒而栗，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剧院又在同样程度上热情得使她激动得发抖。只要自己没有演出，每天晚上她都到那里去，并受到全院非常热情的接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常常来看她，想通过向她寻根究底提出询问，以把她所有的舞蹈变成他的戏剧中一个新的舞蹈体系。但是伊莎多拉告诉他，这只有从孩子们做起才能成功。后来他的剧院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们尝试演出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但是结果却很

糟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天都在剧院里排练，忙得不亦乐乎。他习惯于散戏以后来看伊莎多拉。他在他的书中写道：“我想，我的问题一定使邓肯感到厌烦。”其实，他并没有叫伊莎多拉感到厌烦。因为她非常急切地要传播自己的主张。

雪天的冷空气，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完全治好了伊莎多拉由于同索德搞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消耗症。

现在，她整个身心都在渴求同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接触。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她的面前时，她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天夜晚，伊莎多拉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他身材漂亮，肩膀宽阔，头发黑亮，鬓角开始灰白。当他快要告辞的时候，她把双手搭在他两肩上，勾住他健壮的脖子，把他的头往下拉，吻了他的嘴。

他温存地回吻了她，但露出一一种极为惊讶的神情，仿佛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然后，伊莎多拉试图进一步引诱他。但他往后直躲，同时惊恐地看着她，大声说道：“可是，孩子呢，我们怎么办？”

“什么孩子？”伊莎多拉问。

“当然是咱们的孩子呗！您看，咱们该拿他怎么办呢？”他慎重其事地继续说：“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我的任何孩子在我管辖之外成长，然而，放在我现在这个家庭里抚养又很难办到。”

尚未有肌肤之亲，他便已经想到了结果，想到此伊莎多拉哈哈大笑起来。

他大为苦恼，直瞪眼地望着她，最后离开了她，急急忙忙沿着旅馆的楼梯跑了下去。

伊莎多拉断断续续地整整笑了一夜。可是，笑尽管笑，毕竟很伤脑筋，继而她简直忿怒了。伊莎多拉这下子总算彻底懂得了，为什么有些十分高雅的男人，在同聪明绝顶的女人会见几次以后，就会弃之不顾，跑到不三不四的地方去。

可是，做为一个女人，她不能这样做，所以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到一个俄国澡堂去洗了个澡，滚热的蒸气和冷水交替而来，使她精神焕发，恢复了正常。

与此相反，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包厢里伊莎多拉遇到的那些青年，只要被允许向她求欢，什么都干得出来。但他们只要一开口讲话，就使她厌烦不堪，欲望未起便感觉麻木了。

的确，在跟查尔斯·哈莱和海因里希·索德这些给人灵感的、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伊莎多拉再也不可能忍受那些花花公子了。

多年以后，伊莎多拉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段趣闻告诉了他的妻子。她听了笑不可止，叫道：“啊，这倒真是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从来就是这么严肃的。”

伊莎多拉尽可能反攻，得到了一些甜蜜的吻，但有时也遭到冷淡无情、顽强的抵抗，不容她有丝毫争议。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冒险在散戏之后去她的房间。

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她接到一家乡村餐馆，在一个单间里用了午餐，并喝了伏特加和香槟。同时，俩人在一起谈论艺术。这令伊莎

多拉非常高兴。她最终相信，只有蛊惑男人的娇艳美女赛克斯本人下凡，才能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矢志不渝的堡垒。

伊莎多拉常常听人讲起，年轻姑娘一走进戏剧圈子便会有多大的危险。然而，对她来讲，事实恰恰相反。她在她的崇拜者们身上引起的那种畏惧、尊敬和崇拜，反倒使她委实难受。

在访问莫斯科之后，伊莎多拉又对基辅做了短期访问。一群群学生站在剧院门口的公共广场上，不让她过去，非要她答应举行一次表演。因为在剧院的演出票价太贵，他们买不起。当伊莎多拉离开剧场以后，他们还站在那里发泄对演出经理人的不满。伊莎多拉·邓肯站在雪橇上向他们讲话。她说，如果她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青年知识界，那她将非常自豪和高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学生，能像俄国学生那样关心理想和艺术。

伊莎多拉·邓肯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由于不得不履行原有访问柏林的约定而中断了。

临走以前，她签订了春天再来演出的合同。

尽管这次访问为时很短，但给她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在俄国围绕她的理想发生了不少争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在狂热的芭蕾舞迷和热心邓肯艺术的人之间，真像是进行了一次决斗。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俄国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脱下了她们的舞鞋和舞袜。

## 第六章 与戈登·克莱格的同居生活

“您这儿不像是学校，简直就是一所医院……。”

她那蛰伏了两年的情欲之火，现在终于迸发出来了。

不久，伊莎多拉·邓肯发现自己怀孕了。

克莱格咆哮起来：“告诉她，我不想让娘儿们打扰我的工作！”

皮姆的爱对伊莎多拉来说，就像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样：“宁要片刻的快乐，不要永久的悲伤。”

返回柏林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决意开办她梦想已久的学校——再也不拖延了，马上就开始了。

她把这些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伊丽莎白，她们也同样地热心。

她们立即着手为未来的学校寻找房子，速度之快，同她们做其他事值一样。一个星期之内，便找到了一所刚刚落成的别墅，并把它买了下来。

接着，她们到商店，订购了四十只小床。每只床上面挂着白色细布帷盖，用蓝色缎带拴着撩起来。

一家人着手把这个别墅布置成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在中央墙壁上，挂着希腊神话中亚马逊女英雄的画像，比真人还要大一倍。在宽敞的舞蹈室里，有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所做的浮雕像和意大利雕塑家多奈泰洛所做的正在跳舞的儿童塑像。在宿室里，装饰有蓝色和白色的婴孩，圣母和圣婴也是蓝色和白色的，他们被花果编织的花环环绕着——这也是罗比亚的作品。

伊莎多拉把这种种儿童理想形象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因为它们都

表现了不同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们理想中的儿童形象。

从这些小人儿天真无邪的形象和动作上看，彼此有点像是同胞手足，仿佛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儿童相遇，手拉手地穿越时代的界限。学校里有血有肉的孩子在这些形象中间活动、舞蹈，成长起来一定会像他们一样，不知不觉地在她们的动作和脸上反映出欢乐气氛和同样稚气的优雅风采。这将是第一步，也是朝着新的舞蹈艺术迈出的第一步。

伊莎多拉在学校里安置了一些跳舞、奔跑或跳跃的斯巴达姑娘的塑像。在斯巴达，姑娘们要受严格的体操训练，使她们堪为英雄战士的母亲。这些精雕细刻的泥塑人像，表现的是一年一度获奖的能跑善走、健步如飞的少女：她们纱巾飞舞，衣裳飘动，手拉手，在雅典娜节跳舞，表现了将来要达到的理想。伊莎多拉想，学校的学生将渐渐学会由衷地喜爱这些塑像，会日益成长得越来越像她们，并且日益深深浸透舞蹈和谐的秘密。

因为伊莎多拉坚信：只有唤起人追求美的愿望，她才能获得美的本身。

他们在几家大报上都刊登了招生广告，说邓肯舞蹈学校是为了招收天才儿童而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大众艺术的信徒。

伊莎多拉的经理人差不多给气疯了。他一直都在张罗着她的环球旅行演出，而伊莎多拉则一直在抵制。最初是坚持在希腊逗留一年，他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她又完全停止了演出，要招收和训练这批他称之为根本无用的儿童。

从科帕诺斯，雷蒙德寄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开凿水井花的钱与日俱增，昂贵不堪，成了填不满的窟窿。找到水的可能性一星期比一星期渺茫。

伊莎多拉决定把所有的财力都集中使用，为世界各地青年开办一所学校。她选中了德国，因为当时她相信那里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

一批批儿童前来报名。有一天，伊莎多拉演完日场口来，发现街上挤满了家长和他们的子女。德国马车夫回过头来对她说：

“那儿住着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于是一群群孩子都涌来了。”

伊莎多拉根本不懂得究竟怎样来选拔那些儿童。她急于填满那四十张床，因此不加选择，一古脑儿地收下了这些孩子，或者说仅仅看见甜美的笑脸或漂亮的眼睛就收下了。

她也没有问问自己，她们将来是不是能够成为舞蹈演员。

有一天，在汉堡，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尾服的男人，走进伊莎多拉住的旅馆会客室。他双手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卷着的包裹。他把这个包放在桌上。伊莎多拉打开一看：两只瞪得大大的眼睛正盯着她——原来是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孩子。

伊莎多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一声不吭，连哼哼的声音都听不出。

这位绅士样子很匆忙，问伊莎多拉愿不愿意收下这个孩子。

伊莎多拉把目光从婴孩脸上转到他身上，心里想：两个人长得何其相似，其中有缘故，这也许正是他这么诡秘、匆忙的原因。和平时一样，她不加考虑就收下了这个孩子。

于是他走了，但伊莎多拉从此再没有见过他。

在从汉堡开往柏林的火车上，伊莎多拉发现那孩子正在发高烧。她患

了急性扁桃腺炎。后来在学校的所在地格吕内瓦尔德，在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的帮助下，对她抢救了三个星期。霍法医生对伊莎多拉开办学的主张非常热心，免费为学校师生治病。

霍法医生常常对伊莎多拉说：“您这儿不像是学校，简直就是一所医院。这些学生都患有遗传性感染。您会发现，您将不得不耗尽心血让她们活下去，操心的程度远远超过您教她们跳舞。”

选拔学生、组织学校、开始上课以及照顾她们的日常生活，占去了伊莎多拉·邓肯所有的时间。尽管她的经理人不断警告说，有人盗窃了她的舞蹈杰作，在伦敦和别的一些地方上演，且大获成功，大赚其钱，她也全不在意，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柏林。每天从五点到七点，她都在教这些孩子学习跳舞。

孩子们有了惊人进步。伊莎多拉相信，她们良好的健康状况要归功于霍法医生规定的非常合理的素食。他主张，对于儿童教育来说，无论如何也必须让她们大量地吃新鲜蔬菜和水果，不要吃肉。

伊莎多拉在柏林大大出名，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人们把她叫做“圣洁的伊莎多拉”，甚至传说只要把病人抬进她的剧场，病就好了。每一次日场演出，都可以见到担架把病人抬进剧场的奇怪现象。伊莎多拉赤脚穿凉鞋，除了小小的白色舞衣，从来没有穿过什么别的衣服。她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宗教式的心醉神迷来看她的戏的。

一天晚上，当她演出归来的时候，一群学生从她的马车上把马卸下来，自己挽车把她拉到著名的凯旋大道上。在林荫大道中央，他们要求她发表演讲。伊莎多拉站在敞篷马车上，向学生讲了以下的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莫过于雕塑。但是，你们诸位热爱美术者，为什么允许就在你们城市中心有这样可怕的侮辱？瞧这些塑像吧！你们都是学美术的学生，如果你们当真是学艺术的学生，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拿石头去把这些塑像砸掉！美术？它们也算美术？！”

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幻影！”

学生们同意了她的意见，高呼拥护。要不是警察来了，他们一定会将柏林全城的德皇塑像砸得粉碎。

1905年年初的一天晚上，伊莎多拉·邓肯正在柏林表演舞蹈。尽管和平时一样，她演出时从不注意观众——他们总把她看成是代表全人类的伟大的神，这天晚上她却意识到在前排坐着个什么特殊人物。她并没有去看，或者看见那是谁，但她心理上感觉到这个人就在面前。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

但是，他怒气冲冲。

“您很了不起！”他大声对伊莎多拉说。“您很出色！可是，您干吗要剽窃我的思想？您从哪儿把我这些布景搞来了？”

“您说什么？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布，我发明它的时候才五岁。以后我一直都用它做为跳舞的背景！”伊莎多拉辩驳道。

“不！这是我的布景，我的构思！不过，您正是我的想象的在这样的布景中间跳舞的人儿！您是我一切梦幻的活的化身！”那人说。

“可您是谁？”伊莎多拉问。

“我是艾琳·泰瑞的儿子。”

艾琳·泰瑞，这是伊莎多拉·邓肯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女人！

“啊，请您一定赏光到我家里吃晚饭，”从不多疑的邓肯夫人说道。“既然您对伊莎多拉的艺术这么感兴趣，您一定到我家来一起吃饭吧！”

爱德华·戈登·克莱格去了。

他兴奋之极，要向伊莎多拉解释他对艺术的全部理想，他自己的雄心壮志。

伊莎多拉听得津津有味。

可是，邓肯夫人和其他人都听得昏昏欲睡，找种种借口睡觉去了，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克莱格继续讲戏剧艺术。描绘起他的艺术来，他眉飞色舞，指手划脚。

说着说着，他突然问道：

“可是，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您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唉，这太荒唐了。我是唯一发现您、创造您的人，您属于我的布景。”

克莱格身材高大，脸庞很像他那漂亮的母亲，线条甚至更为细致。他虽然个子挺高，周身却有那么点女性味儿，尤其那薄薄的嘴唇很是性感。

伊莎多拉·邓肯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允许他把她的斗篷披在她的白色舞衣上。

他拉着她的手，一阵风似地下了楼，走上大街。然后，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用德语说：“我和我的夫人要到波茨坦去。”

接连几辆出租马车都拒绝了，但他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辆。他们拂晓时分才到达目的地，在一家刚刚开门的小旅馆前面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然后，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两人又开始返回柏林。

大约九点，他们到了柏林。“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在想。他们不能回去见伊莎多拉的母亲，所以只好去找伊莎多拉的一位朋友——埃尔西·德·布鲁盖尔。

布鲁盖尔是一位波希米亚人，她态度十分体贴同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端来了早餐，又安排伊莎多拉在她的卧室里睡觉。伊莎多拉一觉睡到了晚上。

克莱格带伊莎多拉到他的工作室去。工作室设在柏林的一所高层建筑的顶部，地板漆成黑色，打了蜡，上面到处装饰着人工的玫瑰叶子。

面对着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漂亮的青年，突然产生的爱情火焰在燃烧，伊莎多拉·邓肯扑进了他的怀抱。她那蛰伏了两年的情欲之火一直在待机迸发出来，现在终于迸发出来了。

伊莎多拉·邓肯这样描绘了她与爱德华·克莱格的放纵感受：

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如何回忆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体合礼的大概总是只说到男人的头、肩膀、手等等为止，然后描绘他的衣服。但是我看见的他，至今仍然是我第一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见的那个样子：解脱衣服束缚之后，那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身躯，以其全部光彩，照耀在我眼前，使我不可仰视。

我想，牧羊人恩迪米昂的魁梧雪白的身躯初次落到黛安娜闪闪发光的眼睛中的情景，想必就是这个样子了。海辛图斯、纳西索斯和聪明勇敢的珀修斯，这些神话中的美少年一定都是这个样子。他看来不像是一个尘世青年，倒像是一个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刚刚使我神恍目眩，就立刻被他吸引过去，拥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我们两人就像火焰遇到火焰，燃烧成一团熊熊烈火。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

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一个柏拉图在《灵魂对话录》中所说的那种令人惊奇的存在物：同一灵魂的两半。

这不是一个青年人向一位姑娘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的灵魂的会合。薄薄的肉体躯壳随着陶醉沉迷而发生质的变化，全世的狂恋化作白热的熊熊火焰，绞缠交织在一起，一同登上天堂。

这欢乐是如此完满，真可不必再活下去了！啊，为什么我燃烧着的灵魂那天晚上不能找到出路，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地球的乌云飞往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情是年轻的、新鲜的、强烈的，他既没有沉溺性爱之徒的神经，也没有他们那种天性，宁愿在充分满足之前就不再缠绵于床第之间，把火热的青春活力表现为他的艺术魔力。

在他的工作室里，既没有床榻，也没有安乐椅，连饭都没有的吃。当天夜里，他们睡在地板上。

爱德华身无分文，伊莎多拉又不敢回家去取钱。她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想吃饭的时候，他就去赊购一客饭，让人给送来。伊莎多拉躲在阳台上，等到饭送来以后，再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同他一起吃。

可怜的邓肯夫人四处打听，找遍了各个警察局和大使馆，说有那么一个勾引妇女的坏蛋把女儿拐跑了。伊莎多拉的经理人也正在为她的突然失踪而急得发疯。大多数观众都转向别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几家报纸聪明地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个星期过去后，他们才一起返回邓肯夫人住的那栋房子。尽管伊莎多拉爱得发了疯，但她还是感到有点儿累，因为睡硬地板，而且只能吃他从熟食店弄到的东西，或者等天黑以后偷偷上街吃点东西。

见到克莱格，邓肯夫人便大声嚷了起来：“滚！该死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她对他的戒备提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可否认，是伊莎多拉激发了爱德华·克莱格的强烈爱情。她努力让自己的艺术生涯同与他的爱情都发展下去，两全其美。但二者不可能两全。在过了几个星期狂热的同居生活以后，克莱格和伊莎多拉的艺术灵感之间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搏斗。

他常常说：“你为什么不要手不干？为什么要上舞台去胡乱挥舞你的双臂？你为什么不能留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

尽管克莱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她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做为艺术家的嫉妒心，根本不允许他承认一个女人的确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

同时，伊莎多拉和克莱格的行为在社交界引起轩然大波。

伊丽莎白为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囊括了柏林的名流贵族妇女。当她们知道了伊莎多拉跟克莱格的风流韵事后，便给她送来一封信，以庄严的措辞表示谴责说：做为正经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员，鉴于这所学校领导人对于道德竟有如此越轨的观念，她们不便再充任该校董事。

门德尔松夫人，一位大银行家的妻子，被选派来给伊莎多拉递交这封信。她带着这张吓人的文书进来的时候，以惶惑不安的目光望着伊莎多拉，然后把信往地上一扔，泪水夺眶而出。她一把搂住伊莎多拉，哭道：“别以为我在这封倒霉信上签了名。至于其他的夫人们，那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她们不会再担任这所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赖您姐姐伊丽莎白的。”

伊丽莎白也有了自己的打算，不过没有公开说出来。所以伊莎多拉看出这些夫人们的信条是：只要不张扬，万事大吉！但这些女人大大地激怒了伊莎多拉。于是，她借了爱乐协会的大厅专门作了一次讲演，专讲舞蹈是解放了艺术；最后讲到有关妇女享有自由恋爱和自由生育的权利。

那次讲演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一半听众同情伊莎多拉，另一半则连声嘘她下台，并且抄起任何东西都往台上扔。最后，对她不满的那一半听众离开了大厅，而伊莎多拉同其他的听众留了下来，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妇女的功过问题。

伊莎多拉继续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伊丽莎白离家住在学校里，邓肯夫人则在这两个住处之间摇摆不定。

从这时起，在匮乏和灾祸的年月里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种种艰辛的邓肯夫人，开始觉得生活非常没有意义。也许是由于她的爱尔兰人性格，对于成功不能像经受灾难一样坚毅，她的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她常常心情不好，什么也不能叫她高兴。从离开美国以来，她第一次开始表露出想念美国的情绪，并且说那儿的一切都好得多：食物、还有别的，哪儿也比不上。

儿女领她到柏林最好的餐馆去，想让她高兴高兴。他们问她：“妈妈，您想吃点什么？”她总是回答：“给我来点儿虾吧！”如果这时虾还没有上市，那么，她就会一个劲儿地数落这个国家：一个国家连虾都没有，是多么糟糕！她甚至因此拒绝吃任何东西。

如果正巧碰上了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不知强多少倍。

她的这种性格上的变化，大约是由于她过惯守节生活造成的。这么多年来，她把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而现在他们忙于各自的利益，离她也就越来越远了，于是她觉得枉费了自己全部大好年华，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这种变化无常的心情有增无减，她经常表示想回美国老家。后来，她终于回去了。

不久，伊莎多拉·邓肯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她的心中充满了将为母亲的惊异和欣喜。在她的梦中，她梦见戴姆·艾琳·泰瑞穿着闪闪发光的长袍来看她——正如她在演《伊莫坚尼亚》时穿的那样，手里牵着一个长得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姑娘，用她特有的悦耳嗓音招呼：“伊莎多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时起，我知道从那个荫蔽的虚无世界，有个什么在向我降临。这就是那个孩子，她就要出世，给我带来欢乐和痛苦！欢乐和痛苦！生与死！这就是人生之舞的节奏！”

伊莎多拉·邓肯这样讲。

伊莎多拉继续在公众面前跳舞，在学校里教课，同她的情人相爱。

克莱格却坐立不安，十分烦躁，闷闷不乐。他常常大声叫嚷：“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残酷的造化之神总是跟艺术作对。但伊莎多拉却从梦见泰瑞的那个美梦中得到了安慰，这个美梦后来又出现过两次。

1906年的春天来临了。伊莎多拉·邓肯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

她不得不参加这次旅行演出，因为学校开支浩大，已经用光了她的全部积蓄，没有剩下什么钱了。

在哥本哈根，青年妇女黑色髻发上戴着大学生便帽，像男孩子一样自

由自在单独在大街上阔步行走，脸上露出不寻常的聪明智慧和喜气洋洋。这使她惊异不已。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非常热情。首演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学生们送伊莎多拉回旅馆，一路上在她的马车旁边蹦蹦跳跳，表达她们的喜悦心情。伊莎多拉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但这次参观没有为她获得任何一个热心的信徒。

她把她的观点尽力解释给学生听。但是不出所料，她们不大听得懂她的理论。

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季以后，他们经水路回德国。在船上，伊莎多拉闹了一场大病。她觉得暂时停止一切旅行演出会对自己好些，她渴望一个独处，完全脱离人们的注意。

6月，匆匆看了看舞蹈学校后，伊莎多拉·邓肯急于想到海滨会。她首先到了海牙，接着从那里到了北海海滨的一个叫诺德维克的小村。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建在沙丘之中的白色小别墅，它的名字叫“玛丽亚别墅”。

伊莎多拉对生育毫无经验，以为生孩子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搬到这间别墅去住——它离任何一个城镇都有一百英里——时，她请了一位乡村医生。

从诺德维克到最近的村子卡德维克约有三公里路程。在这里，伊莎多拉完全一人独自生活。每天从诺德维克散步到卡德维克去，再从那儿走回来。她一直渴望见到大海，现在一个人住在诺德维克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连绵数英里的沙丘，却孤寂得很。但在玛丽亚别墅，她从6月一直住到8月。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和姐姐伊丽莎白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她外出期间，一直是姐姐代她负责管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7月间，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学校教学的各种设想，还编出了一整套五百来个练习，这些练习包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正规的舞蹈动作。

伊莎多拉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吕内瓦尔德舞蹈学校学习。她后来到这里来同姑姑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常常在海边跳舞。

克莱格一刻也不肯安宁，总是来了又走。但伊莎多拉再也不感到孤独，因为有了孩子。每天来回于诺德维克和卡德维克之间的沙滩，看到一边是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另一边是沙丘起伏的荒凉海滩，她感到无限喜悦。海岸上几乎一直刮着风，时而和风煦煦，时而狂风大作，使伊莎多拉不得不与它进行搏斗。间或风暴变得非常可怕，玛丽亚别墅犹如海上的小舟，通宵达旦地颠簸摇晃。

在这期间，伊莎多拉·邓肯闭门谢客，只有一位她认为可信的好朋友例外。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她，给她带来书报杂志，并跟她谈论美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近况。他是一个办事有条理的人，总是在固定的日子前来，风雨无阻。除了他，伊莎多拉多半独自以大海、沙丘和肚子里的孩子为伴。

邓肯夫人为什么没有同她住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她抱有一个荒谬的成见：伊莎多拉本应当办好婚事的。她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女儿不结婚便生孩子的事实。

8月间，玛丽亚别墅来了一位看护玛丽·基斯特，她以后成了伊莎多拉非常好的朋友。

伊莎多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耐心、和蔼、好心肠的人。玛丽给了她

莫大的安慰。

但从这时开始，伊莎多拉受到各种各样恐惧心情的侵袭。她对自己说，每个女人都要生孩子的，可是没有用，她还是感到害怕。她当然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疼，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害怕。怕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

8月渐渐过去，9月来临。她的身子越来越重。玛丽亚别墅位于沙丘之上，要走一百级台阶才能进门。伊莎多拉常常惦记着跳舞，有时由于搞不了她的艺术而感到强烈的懊恼。而每当觉得肚子里面有东西用力地踢了她，她便笑了。

伊莎多拉漂亮的身体越来越粗壮，又小又硬的乳房变得又大又软，并且牵拉了下来，灵巧的脚变得笨拙了，踝骨也肿胀了，臀部有点酸疼。

“我那年轻漂亮的体态到哪里去了？我的雄心大志在哪里？我的名声又在哪里？”她经常不由自主地自问，而且觉得非常难受和沮丧。但是一想到快要降生的孩子，一切痛苦的念头也就烟消云散了。

夜里，伊莎多拉躺在床上，无依无靠，苦等天明。她往左边侧卧，觉得憋闷，往右边翻过身去，还是不舒服，最后只得仰面躺着。

一天，伊莎多拉碰上一件令她非常高兴的意外事。她在巴黎认识的一位女友凯瑟琳从巴黎来看她，并且打算留下来陪她。凯瑟琳精力旺盛，身体健康，胆识过人，后来嫁给了一位探险家。

一天下午，她们坐着喝茶的时候，伊莎多拉觉得仿佛有人在她背部中央猛击了一下，接着觉得疼痛难忍，好像有人把手钻伸进她的脊椎，想要把它撬开。她知道，孩子降生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果然，第三天的早晨在无比的疼痛之中，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儿。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丘庇特似的体态，蓝蓝的眼睛，长长的褐色头发时，伊莎多拉惊喜不已。尤其当那小小的嘴儿寻找她的乳房，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乱咬，吮吸着不断涌出来的奶汁时，她更有了一种做母亲的幸福感。

“女人啊，当这样的奇迹存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当律师、画家或者雕塑家呢？现在我认识到这个宏大的爱情实在胜过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吮吸奶汁，呱呱啼哭的时候，我浑身紧张，摊开四肢，好像在流血，肉体也松裂了，而又无可奈何。

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在哪里呢？我的艺术，任何艺术又在哪里？管它什么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明，超越一切艺术家之上的神明，”伊莎多拉·邓肯说。

在最初几个星期内，她常常把孩子搂在怀里，久久地躺着，瞧着她睡。

“有时看见她眼睛里露出凝视我的目光，我觉得非常接近于生命的玄妙边缘，生命的奥秘，也许是生命的知识。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身体中的灵魂，它用显然成熟的目光，永恒目光，来回答我的注视，而且充满爱恋。”

身体恢复正常后，伊莎多拉·邓肯带着婴孩和她的朋友玛丽·基斯特一起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的舞蹈学校。所有的学生看见了小宝宝都高兴得了不已。伊莎多拉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

克莱格给孩子起了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是“爱尔兰所爱”的意思。

在朱丽叶·门德尔松的介绍下，伊莎多拉·邓肯得以与她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相见，给她表演舞蹈。

伊莎多拉把克莱格介绍给了杜丝。杜丝立刻对克莱格的戏剧见解入了

迷，很感兴趣。

双方都很热情。

这样会见几次以后，杜丝邀请他们去佛罗伦萨为她演出易卜生的《罗斯梅尔庄园》设计布景。紧接着，一行人——埃莉诺拉·杜丝、克莱格、玛丽·基斯特、伊莎多拉和孩子，乘坐直达列车前往佛罗伦萨。

一路上伊莎多拉得给孩子喂奶。奶水不够，她只好用准备好的一些食品做为补充，装在瓶子里喂孩子。尽管如此，她还是极为愉快。伊莎多拉看见自己最崇拜的两个人物相逢在一起，克莱格有用武之地，杜丝将有适合于发挥她天才的舞台装置。

到达佛罗伦萨后，杜丝住在一家大饭店的豪华套间里，而伊莎多拉等人则住在附近一家小旅馆。

几位艺术家之间开始了初次讨论。伊莎多拉在克莱格和杜丝之间充当翻译，因为克莱格既不懂法语，也不懂意大利语，而杜丝一句英语也不懂。

处在这两位了不起的天才人物之间，伊莎多拉发现，这两个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好像针锋相对。她唯一的希望是使他们都愉快，让他们两人都高高兴兴。这一目的总算达到了，虽然她多少歪曲了他们的原话。因为如果她真把克莱格说的话告诉埃莉诺拉·杜丝，把杜丝的吩咐原封不动地讲给克莱格听，那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在《罗斯梅尔庄园》的第一场中，易卜生是把起居室描绘成“布置舒适、古色古香”的。但是克莱格却喜欢看到一所雄伟的埃及神庙的殿堂内景：高大的屋顶伸展入云，远远的墙壁一望无际。只有一点不像埃及神庙，那就是在远处尽头的一扇巨大方形窗户。

在易卜生的笔下，这扇窗户朝着一条通向庭院的古木参天的林荫道。可是克莱格却喜欢要窗户为十米宽、十二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景色：黄色、红色和绿色，好像摩洛哥风光似的。但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了。

杜丝似乎相当为难，她说：“我看这扇窗户应该是小的。它不可能是大的。”

克莱格用英语咆哮起来：“告诉她，我不想让娘儿们打扰我的工作！”

伊莎多拉把这句话谨慎地翻译给杜丝，就成了这样：“他说，他很钦佩您的见解，一切都要尽量做得让您高兴。”

然后，她转向克莱格，用外交手腕灵活地把杜丝的反对意见译成：“埃莉诺拉·杜丝说，您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她对您的设计不仅不会提什么意见，而且会原样采纳。”

这样的交谈有时进行几个小时。伊莎多拉常常一边喂孩子，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随时在场担任和稀泥的翻译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喂奶的时间要是过了，伊莎多拉常常感到痛苦万分，却还要向艺术家们解释他们彼此没有说过的话。

当时她的身体极易疲劳，渐渐地便支持不住了。这些令人厌烦的谈话把她的产后恢复期变得非常痛苦。不过，考虑到演出克莱格为杜丝设计布景的《罗斯梅尔庄园》是一件艺术上的大事，伊莎多拉觉得，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不过分。

克莱格全力投入剧场工作，面前放着许多颜料罐，手里拿着一支大画笔，自己动手画布景。由于他找不到能够懂得他意图的意大利画师，也找不

到合适的画布，所以搞了一些麻袋，把它们缝起来当画布使。

一连数日，一群意大利老太太坐在舞台上缝麻袋。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在台上忙着，尽力去执行克莱格的指示。这时，克莱格披着长发，对他们叫喊着，一面把画笔放进颜料盒蘸颜料，爬上梯子，站的姿势非常危险。他整天地，甚至几乎整夜地泡在剧场里，连饭也不去吃。要是伊莎多拉在吃午饭的时候不给他带一小篮子午餐去，他就干脆什么也不吃。

他下了一道命令；“不许杜丝进剧场。别让她到这儿来。要是她来，我就搭火车走。”

可是杜丝却渴望看看布景画得怎么样。伊莎多拉的任务就是将她拒于剧场大门之外，而又不得罪她。伊莎多拉常常带她到花园里去做长时间的散步，那里优美的雕像和绚丽的花卉能使她的神经镇静下来。

《罗斯梅尔庄园》的舞台布景制作工作在进展中。

每次伊莎多拉到剧场去给克莱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发现他又是愤怒、又是狂喜，一会儿相信他的杰作一定是艺术世界美的顶峰，一会儿又叫喊在这个国家什么也办不到——没有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都得他亲手去干。

接着，该是杜丝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

在此以前，伊莎多拉用尽心计使她进不了剧场。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杜丝正处在强烈的易于激动的兴奋情绪之中。伊莎多拉真担心这种情绪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天气，随时都会爆发一场狂风暴雨。

她们已经约好，杜丝在饭店的门厅见伊莎多拉，由她带着去剧场。杜丝身穿一件宽大的古铜色毛皮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古铜色的毛皮帽子。皮帽斜戴在头上，这是因为，尽管杜丝在好心肠的朋友们的建议下，一生中有时也光顾时髦的裁缝铺，但她从来穿不上一件摩登时装，也总是不能打扮得非常人时。她的衣服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一套一套的衣服多么值钱，她似乎从不是在穿戴它们，倒像是屈尊地放在自己身上，运送它们。

去剧场途中，伊莎多拉心里紧张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又一次以极其圆滑的手腕阻止杜丝，不让她奔向舞台的门，而是特意让剧场的正门大开着，把她领进了包厢。

她们在那里等候了很久。

这时间真难熬。伊莎多拉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因为杜丝不断问她；“我的窗户会完全像我说过的那样吗？布景在哪儿？”

伊莎多拉紧握住她的手，轻轻拍着，说道：“再等一会儿，您很快就会见到了。耐心一点吧！”

一想到那个已经变得其大无比的小窗户的时候，伊莎多拉心里害怕极了。

她们不时可以听到克莱格激怒的声音，一会儿用说不好的意大利语，一会儿干脆用英语：“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放在这儿？你干吗不按照我的吩咐做？”

时间过得真慢，她们好像等了几个小时。正当伊莎多拉觉得杜丝一肚子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幕布终于徐徐升起来了。

眼前看到的景色令她们又是惊讶，又是狂喜！

任何埃及神庙都没有这样美丽！没有一座哥特式大都堂，没有一所雅典宫殿有这么辉煌！伊莎多拉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人间美景。通过那一望无

际的蔚蓝色空间、和谐的天空、绵延的山脉、伟岸的高峰，人们的神魂都被这扇巨大的窗户的光辉吸引了。它展开的不是一条小小的林荫道，而是广漠无垠的宇宙。在那蔚蓝色的苍穹之中，包容着人的一切思考、一切冥想和一切忧伤。窗外，就是人的全部心迷神醉、一切欢乐、创造力的奇迹。

这就是罗斯梅尔庄园的起居室吗？伊莎多拉不知道易卜生看了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会像她们一样神魂颠倒，说不出话。

杜丝紧紧抓住伊莎多拉的手。伊莎多拉可以感觉到她两只手臂环抱着自己，把自己使劲地搂着。她看见，在杜丝美丽的脸上，欢乐的泪水滚滚而下。

她们厮搂着坐了一会儿，两人都默不作声——杜丝是由于满怀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伊莎多拉则是由于在前段时间担惊受怕之后，看到她高兴而大大松了一口气。她们就这样待了一会儿，然后杜丝拉着伊莎多拉的手，把她拖出包厢，以她那常有的步伐，两步并作一步，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舞台上。

站在舞台上，杜丝用她特有的声音喊道：“戈登·克莱格！到这儿来！”

克莱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小孩儿那样羞怯。杜丝伸出双臂把他搂住，然后从她嘴里滚滚吐出赞美备至的意大利语。她说得太快了，伊莎多拉都跟不上翻译给克莱格听。她的赞美之词就像喷泉之水，滔滔不绝地从她嘴里喷涌出来。

克莱格没有像两个女人一样激动得落泪，但是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大动感情的表现。

然后，杜丝把剧团全体人员叫拢来。他们本来一直在后台漠然等待着。杜丝给他们讲了这样一番热情洋溢的话：

“我命中注定，会发现戈登·克莱格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打算把我余生贡献出来，为的是向全世界显示他的伟大创造。”

接着，她继续以雄辩的口才，痛斥戏剧界的摩登倾向、所有的摩登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与才干的摩登概念。

她在讲话时一直握住克莱格的手，并且频频把头转向他，谈到他的天才，谈到戏剧的伟大新生。她再三强调说：“只有依靠戈登·克莱格，我们这些可怜的演员才能终有一日从今天的戏剧这个停尸所，这个丑恶地方解放出来。”

可以想象，伊莎多拉听到这些话是多么高兴。那时她还年轻，没有经验，竟然相信人们在热情冲动下真的说话算话。想象埃莉诺拉·杜丝如何用自己的辉煌才华为她的伟大克莱格的艺术效劳，将来克莱格又将如何取得不可言喻的成功，并且戏剧艺术也将取得光辉胜利。可惜的是，伊莎多拉没有估计到人的热情是多么脆弱，尤其女人的热情，更是摇摆不定。况且，尽管埃莉诺拉很有天才，也仅仅是一个女人而已。

《罗斯梅尔庄园》演出的第一个晚上，佛罗伦萨剧院座无虚席，满是期望的观众。

幕布升起，观众赞叹不已，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这样的效果是必然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在佛罗伦萨演出的唯一的那一场《罗斯梅尔庄园》，仍旧为艺术鉴赏家们所津津乐道。

杜丝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两袖十分宽大，垂在身体两侧。凭借她那万无一失的天才，杜丝巧妙地适应着笼罩她的每一道光柱、每一道光线。千姿

百态，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行动，活像一个宣示伟大信息的女先知。

可是，当另外的演员上场以后，情况就两样了。他们显得举止失措，就像舞台工作人员走错了地方。这简直糟糕透了。只有一个扮演勃伦德的男演员念以下的台词时，才与周围的奇妙环境融为一体。他说：“金光灿烂的美梦涌现，轻轻飘拂萦绕不去。在我心灵深处，浮现一个又一个令人迷醉的新奇重大念头，鼓翼而飞，把我高高载起，逍遥漫游。我把这念头变为诗歌、幻想、图画。”

演出结束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到住处。克莱格喜气洋洋，看到前途无量，将把自己伟大的创作全部献给埃莉诺拉·杜丝。他现在竭力赞扬她，就像过去对她表示愤慨一样强烈。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杜丝在克莱格的布景之中天才横溢，只有这么唯一的一次！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上演的，每晚都演出不同的戏。

高兴和激动过去之后，有一天上午伊莎多拉去银行取钱，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全花光了。生孩子，办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的各种开支，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花光了她的全部积蓄。

一定得想办法开财路，她想。正好，圣彼得堡一位演出经理向他们发出邀请。他问伊莎多拉是否准备重登舞台，并且表示要跟她签订一个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就这样，伊莎多拉·邓肯离开了佛罗伦萨。

她把孩子留给玛丽·基斯特照管，而把克莱格让埃莉诺拉关照，自己则乘坐特别快车经瑞士、柏林前往圣彼得堡。

这次旅行对伊莎多拉来说是难受的。第一次与孩子分离，还有与克莱格和杜丝分离，令她黯然魂销。她的健康状况不怎么好，婴儿又刚刚断了一半的奶，不得不用吸奶器把乳汁从乳房里吸出。这种经历对伊莎多拉来说实在可怕，为此她掉了许多眼泪。

火车越走越远，奔向北方。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到达那林海雪原的地区，它显得比过去更为寂寞荒凉。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悉心照料杜丝和克莱格，没有想到自己的艺术，对于这次寻回演出的严峻考验，没有丝毫准备。但是，俄国观众一如往常热情地接待了她，不计较演出中出现的毛病。在跳舞的时候，奶水经常顺着舞衣流下来，搞得她狼狈不堪。女人要做一番事业是多么艰难啊！

在俄罗斯巡回演出过程中，伊莎多拉一心惦记着回佛罗伦萨。因此，她尽量缩短巡回演出的期限，并且接受了到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可以离她的学校、离她渴望重逢的人们更近一些。

到达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一场病把她的身体搞垮了。演出结束时，她扑面跌倒在台上，被抬回了旅馆。在旅馆躺在屋子里，人们给她裹上冰袋。她躺了好些日子。在几个星期里，她什么也不能吃，只是喝一点儿掺鸦片的牛奶，一阵一阵昏迷不醒，最后不省人事地睡去。

克莱格从佛罗伦萨迅速赶来，一心一意侍候她。他们在一起待了三四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收到埃莉诺拉打来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佳，速来。”

那时伊莎多拉已部分恢复健康，所以克莱格便动身到尼斯去了。但是伊莎多拉看到了这封电报，立即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如果自己不在那里当翻译，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要闹出事情来。

早晨到达尼斯后，克莱格便发现人们把布景截成了两半。看见他的艺术品、他的杰作、他在佛罗伦萨花了许多心血才诞生的“孩子”，在他眼前被肢解、被宰割成这个样子，克莱格怒不可遏。更为糟糕的是，他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了埃莉诺拉的头上。当时她刚好站在台上。

“你搞的什么名堂？”他对她大发雷霆。“你糟蹋了我的心血，你毁灭了我的艺术！”

你，我本来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他一个劲儿发火。

埃莉诺拉可从来没见过有谁敢以这样的态度对她说话，于是她也火冒三丈。她后来对伊莎多拉说：“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大发雷霆，说出吓人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待过我。我当然不能忍受。”

她指着门说：“给我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杜丝曾一度打算把自己的全部艺术生涯献给戈登·克莱格，这种念头的结局就是这样。

伊莎多拉·邓肯到达尼斯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人们不得不把她从车厢里抬出来。

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通向旅馆的路上，她坐的敞篷马车遇上了一帮人的困扰——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丑角面具，做出种种怪相。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躺在离伊莎多拉不远的一家旅馆里。杜丝给伊莎多拉写了很多亲切的信，并给伊莎多拉派来了自己的医生埃米尔·博松。这位医生不仅悉心照顾伊莎多拉，而且从那时候起，他成了伊莎多拉终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伊莎多拉的健康恢复期很长，她为种种痛苦所缠绞，迟迟不能解脱。

母亲来跟她作伴。忠实的朋友玛丽·基斯特也带着伊莎多拉的小宝宝来了。

孩子很健壮，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她们搬到沙隆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眺望大海，一面仰望山巅。在寓所的阳台上，伊莎多拉逐渐回到生活里来了。但生活的担子比过去更重，经济空前地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伊莎多拉尽快回到荷兰去巡回演出，虽然她感到身体很虚弱，精神也很沮丧。

伊莎多拉崇拜克莱格——她将自己的全部艺术灵魂奉献给了他。但是她意识到，她和他的分离不可避免。

伊莎多拉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和他生活在一起不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也不行。

和他一起生活，就是放弃她的艺术、她的个性，也许还得断送她性命，丧失她的理智；而不和他住在一起，伊莎多拉又会长期地意志消沉，受嫉妒心的折磨。

伊莎多拉仿佛看见克莱格倒在别的女人怀抱里，这幻觉在夜里萦绕在她的脑际，使她再也不能入睡。她仿佛看见克莱格在向女人们讲解他的艺术，而她们又以爱恋的眼光睇视着他；她仿佛看到克莱格同别的女人嬉戏，他以他那悦人心意的微笑对她们兴致勃勃，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讨我喜欢，伊莎多拉实在太讨厌了。”

所有这一切使伊莎多拉一会儿怒，一会儿又陷于绝望。她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舞蹈。观众喜欢与否，她都不放在心上了。

伊莎多拉意识到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要不就是克莱格，要不就是自己的艺术——而放弃她的艺术，她知道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她准会憔悴悔恨而死。她必须找到灵丹妙药，想到聪明的顺势疗法。

真是想什么就有什么，灵丹妙药果然来到伊莎多拉面前。

一天下午，伊莎多拉那里来了一个人。他年纪轻轻，仪态动人，彬彬有礼。此人金发白肤，衣着典雅。他对伊莎多拉说：“我的朋友们管我叫皮姆。”

“皮姆！多么动人的名字。你是演员吗？”伊莎多拉说。

“不，我不是！”他不承认，好像伊莎多拉在指控他犯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个了不起的想法？”

“不，啊，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想法，”他说。

“那么，你有一个生活目标？”

“没有。”

“那你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干！”

“不过，你总得干点儿什么吧？”

“嗯，”他反射似地回答。“我搜集有一套顶好的十八世纪鼻烟盒。”

伊莎多拉·邓肯签了一个到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长期的、艰辛的旅行演出，不仅要经过俄国北部，而且还要经过南俄和高加索。可是，她害怕一个人长途旅行。

“皮姆，你愿意跟我去俄国演出吗？”伊莎多拉这时问他。

“啊，太愿意了，”他立即回答。“我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皮姆红着脸说。“非常爱我，恐怕她不会同意我走的。”

“我们可以秘密地走呀！”伊莎多拉说。

于是，他们计划好等伊莎多拉在阿姆斯特丹最后一场演出之后，让一辆小汽车在后台入口处等着，把他们送到乡下。他们叫女佣人带上行李乘特别快车，然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第二站取行李。

那天雾很大，夜很冷，田野上笼罩着浓雾。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马路旁边就是运河。

“这太危险了，”他警告说，且开着车往前缓缓爬行。

但是，这种危险比起接着发生的事情，简直算不了什么。突然，皮姆向后一看，惊喊道：“天哪，她追咱们来了！”

用不着解释，伊莎多拉就明白了一切。

“她大概有一支手枪，”皮姆说。

“快，快！”伊莎多拉对司机说。但是他置之不理，只是指了指雾中闪闪发光的运河。这真够浪漫的。但是，他终于机智地甩掉了追踪者的小汽车，到了火车站，在旅馆前停下来。

那时是凌晨两点。值夜班的老门房用灯照了照他们的脸。

“要一个房间，”他们齐声说。

“一个房间——不行，不行。她结过婚么？”

“是的，是的，”他们回答。

“啊，不行，不行，”他咕咕着说。“她还没有结婚，我知道的。”不顾他们极力反对，他让他们分开住到长走廊两头的两间房里，并怀着恶意的愉快，通宵达旦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把灯放在膝盖上。每当皮姆或者伊莎多拉把头

伸出来的时候，他就把灯拿起来，说道：

“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晨，在这样一次捉迷藏似的游戏以后，伊莎多拉和皮姆都感到有点疲倦，于是乘直达快车前往彼得堡。

这是一次空前愉快的旅行。

到达彼得堡以后，搬运工从行李车里取出了十八只大皮箱，上面都标有皮姆的名字。

伊莎多拉感到困惑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她惊愕地说。

“啊，这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装的是领带，这两箱是我的内衣，这些是我的成套衣服，这些是我的靴子。这一箱装的是我特制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非常适用的。”

欧罗巴饭店的楼梯非常宽阔，皮姆每小时都要跑上跑下，每次衣服颜色都不一样，领带也花样翻新。见者无不啧啧称羨，因为他的穿着总是优雅人时。

在伊莎多拉的眼中，他的整个外貌就像春天郁金香花坛那样鲜艳迷人，他的头发就像一坛金色郁金香花，嘴唇就像玫瑰色郁金香。当他拥抱她的时候，伊莎多拉感觉就像春天里在荷兰万紫千红的郁金香花坛上展翅翱翔，飘飘欲仙。

皮姆的爱对伊莎多拉来说，就像奥斯卡·王尔德说的那样：“宁要片刻的快乐，不要永久的悲伤。”

皮姆给了她一时的快乐，而在此以前，爱情只是带给她浪漫气息、空想和折磨。皮姆却给伊莎多拉带来了快乐——纯粹是愉快的享受，而且正是在她非常需要的时候。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温存体贴，她就会陷入失望，精神就会瓦解。

皮姆的出现给了伊莎多拉·邓肯新的生命、新的活力。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

他看见什么都爱笑，到处跳跳蹦蹦，手舞足蹈。在他的感染下，伊莎多拉把忧伤抛在了九霄云外，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结果，她的演出充满了新生的朝气和欢乐。

正是在这个时候，伊莎多拉·邓肯创作了《音乐瞬间》，并且在俄国演出大获成功，每天晚上都得重复五六次。在伊莎多拉的心目中，《音乐瞬间》是皮姆的舞蹈——“快乐的一瞬间”，音乐的一瞬间。

如果伊莎多拉·邓肯把舞蹈仅仅看成为一种个人的表演，那么她的道路就再简单不过了。

她已经出了名，很多国家都竞相邀请她去演出，她只需要追求飞黄腾达就行了。

可惜伊莎多拉并没有这样做，她朝夕惦念着创办一所学校——一个能用舞蹈表演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型团体。夜晚，每当闭上眼睛，这些形象就在她的脑子里列成强大的阵容，跳起舞来，让她把他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伊莎多拉·邓肯一心梦想做出普罗米修斯创造生灵那样的奇迹。似乎只要她一声令下，那些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舞蹈形象就会从地底下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这真是个雄心勃勃、迷人心窍的美梦。

伊莎多拉带着这样的梦想回到格吕内瓦尔德去教那些学生。她们已经

跳得相当美，这使伊莎多拉增强了信心。

她时而做出像庞培遗迹的爱神的舞姿；时而又扮成多娜特罗的优美三女神；或者做出泰坦尼亚飞天的舞姿，教学生们学习迂回环绕、分离组合，变化无穷地绕圈和列队。

学生们一天比一天强壮，一天比一天灵活，在她们青春的体态和面容上，闪烁着灵感和神圣音乐的光辉。这些孩子跳起舞来美极了，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赞美不已。

然而学校的开支太大，入不敷出，伊莎多拉困难重重。因此，她想出个主意：让他们跟她到各国演出，看看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赏识这种儿童教育，给她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实施自己的规划的实验机会。

每次演出结束，伊莎多拉·邓肯都呼吁观众设法替她宣传，设法把她在生活中的这一发现告诉别人。伊莎多拉认为那样就可以给千万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光明。

但伊莎多拉越来越明白；在德国，她的办学主张是找不到支持的。德国皇后的观点纯粹是清教徒式的，当她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的时候，总是派她的御前侍卫在她驾到之前把那些裸体雕像用布遮盖起来。这种普鲁士的高压统治方式使伊莎多拉不可能再存幻想，把德国当成她可以工作的场所。

于是，她想到了俄国，因为伊莎多拉发现那儿的观众对她的反应热烈，而且使她交过好运。抱着有可能在圣彼得堡办学校的想法，伊莎多拉·邓肯于1907年1月再度前往圣彼得堡。伊丽莎白陪同她前往，她们还带了二十个小学生。

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尽管观众对伊莎多拉复兴真正的舞蹈的呼吁表示热烈支持，但是，皇家芭蕾舞剧团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伊莎多拉带着学生们参观了芭蕾舞学校孩子们的训练。该校的学生观看伊莎多拉的学生时的神情，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燕子一般。但是，在俄国建立一个提倡人体自由动作的学派还不到时候。

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建立一所更为伟大、更为自由地表现人类感情的学校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支持。然而，尽管他竭尽全力帮助她，但仍然没能把他们的学校安排在他的艺术剧院里——而这正是伊莎多拉所希望的。

就这样，寻找对她的学校支持的愿望在德国和俄国宣告失败之后，伊莎多拉决定到英国去试一试。

## 第七章 百万富翁

“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他对她说。

“我一定要找个百万富翁！”这话伊莎多拉一天重复上百次。

在为孩子担忧的共同心情的压力下，他们之间的堤防崩溃了，两人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一起。

他把她带到那里，放倒在一张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吻抱爱抚，热烈得简直使她透不过气来。

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伊莎多拉生下了她的儿子。

当帕里斯·辛格知道钢琴师是何许人以后，对伊莎多拉说：“至少我是没有理由嫉妒了。”

1908年夏天，伊莎多拉带领全班人马到了伦敦。

在著名的演出经理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主持下，他们在约克公爵剧院演出了几个星期。伦敦观众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们的表演是颇为有趣的消遣。但是，对于将来办学校并没有丝毫实际帮助。

此番距伊莎多拉·邓肯首次在新画廊演出舞蹈，已经七年了。伊莎多拉为能和英国钢琴家、指挥家查尔斯·哈莱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重叙旧日友情而感到很高兴。美丽而又颇负名望的戴姆·艾琳·泰瑞常常到剧场来。她喜欢孩子们，带她们逛动物园，使她们高兴万分。亚历山德拉王后两次驾临包厢，给他们的演出增光不少。还有许多英国贵族夫人，都毫不矜持地到后台来，十分亲切地向伊莎多拉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建议说，伊莎多拉的理想也许可以在伦敦实现，她的学校大概能得到支持。为此，她邀请她们全体到泰晤士河畔她的乡间别墅去作客。在那儿，她们又一次在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面前表演了舞蹈。

在短短的一段时期中，伊莎多拉充满了希望，满以为在英国可以办一所舞蹈学校了。

可是结果呢，又是一场空！哪儿有地方，哪儿来房子，哪儿有足够的经费实现她那规模宏大的美梦呢？

和往常一样，伊莎多拉这一小队人马的开支相当浩大。她们存款再次告罄。结果，这个学校最后又不得不返回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和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个到美国去旅行演出的合同。

为此，伊莎多拉·邓肯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只好与她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莱格分手。而最使她痛惜的，则是跟血肉相连的小宝宝迪尔德丽分开——她快一周岁了，长得碧眼金发，红润的脸蛋儿，可爱得很。

就这样，1908年7月的一天，伊莎多拉·邓肯终于独自乘上巨轮，驶向纽约。

自从一家人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八年过去了。伊莎多拉已经驰名欧洲。

她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还创造了一个小宝宝，成绩不坏。然而，就经济情况，她却并不比以前富裕多少。

查尔斯·弗罗曼是一位了不起的经理人，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伊莎多拉的艺术天生不适合于叫座。邓肯的表演只能打动相当有限的一部分观众。

他让她在8月的炎炎夏日里登台表演，做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却是在一个又小又不顶用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音乐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不出所料——彻底失败了。

那几天酷热的晚上，气温高达华氏90多度，闲步逛入戏院的极少数观众看得莫名其妙，而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喜欢邓肯的舞蹈。评论文章很少，而且写得很糟。总的来说，伊莎多拉感到回到祖国来实在是一大错误。

一天晚上，她正坐在化妆室里，心情特别沮丧，这时听到一个亲切悦耳的声音向她祝贺。伊莎多拉抬头一看，一个人正站在门口，他个子不高，一头棕色鬃发，满面笑容，和蔼可亲。

他由衷地向她伸出手，说了许多赞美她表演艺术的话，说她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伊莎多拉顿时觉得到达纽约以来遭受的一切挫折和痛苦得到了报偿。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国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

此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演出，而且经常带来一些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其中有舞台演出人戴维·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乔治·贝洛斯、珀西·麦凯耶、马克斯·伊斯特曼，格林威治村青年革新派简直可以说全部都来了。另外，来人中还有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爱德温·艾灵顿·罗宾逊、里奇利·托伦斯和威廉·沃恩·穆迪。

这些诗人和画家们向伊莎多拉表示的友好祝贺和热情鼓励，大大地振奋了她的精神，抵销了纽约观众的冷淡无情。

巴纳德，这位后来创作了大型林肯塑像的雕塑家，想给伊莎多拉雕塑一个舞蹈塑像，叫做“美国在舞蹈”。

于是，10月里晴朗的一天，纽约特有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他的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他们一起站在一个小小的山岗上。

极目眺望，伊莎多拉伸开双臂，说道：“我看见美国在舞蹈。”

这构成了巴纳德对这个雕像的设想。

伊莎多拉总是早晨到他的工作室去，随身提着一只装有午餐的篮子。他们畅谈在美国复兴艺术的新规划，非常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

自然，工作室里的这些谈话，这些互相感染的、关于美的狂热入迷的谈话，产生了效果。从伊莎多拉这方面，她很想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贡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个伟大的雕像任务。但是，巴纳德的道德观念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伊莎多拉那年轻幼稚的幻想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宗教虔诚。所以，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算怎么冷酷，也不算怎么严峻。在她看来，自己是瞬息而逝的，而他则永世名存，这就无怪乎她渴望通过他的天才成为塑像而传之千古。

伊莎多拉和她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变成在他那雕塑家的手中任他摆布的柔软粘土。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是一个奇妙的开端，但可惜没有发展。没过多久，巴纳德的妻子突然病了，塑像工作被迫停止。

查尔斯·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是，这次巡回演出也安排得很不好，结果比纽约的演出失败还要惨。伊莎多拉终于失掉了耐心，去找查尔斯·弗罗曼，而他正在为赔了那么多钱而狼狈不堪。

“美国不了解你的艺术，”他对她说。“你的艺术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接受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还是回欧洲去吧。”

本来伊莎多拉·邓肯和弗罗曼订有为期六个月的巡回演出合同。合同保证，无论成功与否都要履行下去。然而，由于伊莎多拉的自尊心受到挫伤，看到他不想履行已签订的合同，对他未免轻视，于是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说道：“这样至少可以使你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

巴纳德总是说他为伊莎多拉这样的美国土壤的产物感到自豪，说如果美国不欣赏她的艺术，他简直太伤心了。按照他的建议，伊莎多拉决定在纽约留下来。于是她在美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她的蓝色窗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为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继续创作一些新作品。

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星期日增刊登有一篇文章，对伊莎多拉·邓肯在那个时期的一个夜晚做过如下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从腰部以下裹着一幅美妙的带有中国刺绣的纱罗。她那短短的、乌黑的头发鬈曲着，蓬蓬松松地编在脖子后面，自然地分开，披拂在两颊旁边，像圣母一般。她的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是灰蓝色的。许多关于她的新闻报道谈到她的身材高大优美——犹如成功的艺术品，而实际上她只有五尺六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琥珀色的灯光亮了，剧场大厅顶部中央的黄色圆盘似的灯柔和地照着，使色彩效果达到了完美的程度。邓肯小姐上台表示歉意，说用钢琴配音大不协调。

“像这样的舞蹈用不着音乐，”她说，“除非是像潘神从河边砍来的芦管吹出来的那种音乐，恐怕只要一管长笛、一管牧人风笛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已经把舞蹈远远抛在后面，舞蹈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失传的艺术。如果试图把舞蹈与另一种远远走在前面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配合，那是困难的、不协调的。我贡献出我的一生，就是为了使这种失传的舞蹈艺术得到新生。”

她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站在靠近正厅那些诗人坐的地方，而当她结束讲话的时候，已经在大厅的另一头了。简直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但是你想想她的朋友艾琳·泰瑞就明白了——后者像她一样，对于空间是毫不介意的。

她再也不是疲惫不堪、愁容满面的女主人了，而是成了一个从一片破碎的大理石中从容自在地走过来的异教精灵，似乎那就是她在世界上要做的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也许她像希腊神话中的海中女神加拉提，因为加拉提在解放出来的最初瞬间，一定是跳着舞的；她又像是披着头发的女神达英尼，在德尔斐树林中，从阿波罗的拥抱中挣脱出来。

你刚这样想，她的头发就披下来了。

无怪乎她这些年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们娱乐，而又遭到他们半信半疑的眼光，实在叫她厌倦。现在，在你眼前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塔纳格拉的塑像，是雅典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戴花冠的悲哀女神；是酒神女祭司的放浪形骸。看起来你们是在观看她，实际上你们观看的是人为技艺尚未插入之前人类天性的全部活动景象。

邓肯女士承认：她整个的一生都在努力返回到古代，发现在悠久岁月的迷宫中丢失了的淳朴自然。

“在我们偏偏称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相应的表现动作，”她说。

“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合作协调。瞧，雕塑家的妙手抓住和表现出来的那些古希腊男女的形象，简直不像是人工斧凿出来的倔强大理石，你几乎可以说出他们想跟你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即使他们不开口，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也完全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停一会儿，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的雕像，时而高擎酒杯向你敬酒；时而把玫瑰花瓣撒在雅典神庙之前；时而在爱琴海紫色的波浪顶尖上游泳。

艺术杂志编辑玛丽·罗伯茨欣喜若狂地说出了以下一段话，邓肯女士认为这是她所读过的对她全部创作的最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多拉·邓肯翩翩起舞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世界初创的时代。那时候，人们以形体之美做为自由表现伟大灵魂的手段，运动的韵律和声音的韵律融合为一，人体的动作与风和海洋的运动协调一致，女人手臂的姿势犹如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在草地上踩踏，犹如树叶飘然落地，当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牺牲的或者欲望的整个热情，合着古弦琴、竖琴或者铃鼓的节奏表现出来的时候，当男男女女在他们的家庭炉旁和神的面前，或者走出家门在森林中和在海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欢乐，以宗教式的狂热跳起舞来的时候，那就必然是：人类灵魂的每一个强烈的、巨大的或者美好的冲动，都从精神倾泻出来而化为身体，与宇宙的节奏和谐一致，完美无瑕。”

巴纳德建议她留在美国，伊莎多拉·邓肯听从了他的劝告，并为此感到庆幸。因为有一天，有个人来到她的工作室，以后由于他，伊莎多拉才获得了美国观众的热情爱戴。

这人就是沃尔特·丹罗希。

丹罗希是一位侨居美国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从1891年至1928年，他一直担任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首席指挥。他曾看过她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用舞蹈表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次的乐队又小又糟，但他却想到，如果配上他那个优秀的乐队，由他自己精心指挥，这个舞蹈的效果将会多么了不起。

丹罗希建议伊莎多拉12月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连续演出，她欣然同意了。

结果果然如他所料。首演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但是他很惊异地发现剧场的座位已经被抢订一空。这次经验证明，不管那位艺术家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即使是最伟大的艺术也会化为泡影。埃莉诺拉·杜丝第一次到美国巡回演出就是如此，由于经理工作很糟，表演的时候剧场里几乎空空如也，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欣赏她的艺术。但是，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令伊莎多拉·邓肯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有一个由杰出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八十人大乐队伴随她去巡回演出。这次巡回演出特别成功，因为整个乐队上上下下都充满着一种友好的感情，对指挥、对伊莎多拉都是如此。伊莎多拉和丹罗希非常一致，当她站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似乎她的每一根神经都跟乐队、跟这位杰出的指挥连成一体，息息相通。

她和丹罗希之间有一种密合无间的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伊莎多拉都立刻感觉到一种与之呼应的颤动。只要渐强乐句上他一增加音量，她内在的生命力马上增长、洋溢，化为一个个动作——因为每一乐句都成为音乐律动，她的整个身心也跟他一起和谐震颤。

有时候，伊莎多拉从舞台上望下去，看见丹罗希的巨额俯览总谱，就觉得自己的舞蹈的确像是雅典娜的诞生。

在美国的这次巡回演出大概是伊莎多拉·邓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自然，她还是为乡愁所苦。每当表演第七交响乐的时候，伊莎多拉眼前便出现一幅图画：她的学生们成年以后，和她一起用舞蹈来表现这部音乐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因此，这还不是完全的快乐，而是对未来的更大快乐和希望。也许，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的快乐，而只有希望。

在华盛顿，伊莎多拉·邓肯遇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几位部长以激烈

的言辞反对她的舞蹈。

后来有一天日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亲临包厢，来看她的演出。他很喜欢伊莎多拉的演出，每一节目演完之后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些部长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能找到什么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跳着舞穿过晨曦沐浴的花园采摘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报纸援引了罗斯福总统这段话，使那些说教者们大为羞愧，而大大地帮助了伊莎多拉的巡回演出。

事实上，全部巡回演出都是极为愉快的，各方面都一帆风顺。伊莎多拉觉得，再也没有比丹罗希更好心肠的经理人或者更可爱的伙伴了。

丹罗希的气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的气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吃一顿美餐，弹弹钢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从不疲倦，而且总是和蔼可亲、轻松愉快。

回到纽约以后，银行里伊莎多拉·邓肯的名下有了相当可观的存款。如果不是总在为她的小宝宝和她的学校牵肠挂肚，她一定永远不会离开美国。但是，一天早晨，伊莎多拉·邓肯终于在码头上，向朋友们告别，回到欧洲去了。

在巴黎，伊丽莎白带着学校的二十个学生和伊莎多拉的小宝宝来迎接伊莎多拉·邓肯的归来。

伊莎多拉高兴至极——六个月没有见到她的小宝贝了！当婴孩看见她的时候，用奇怪的眼色望着她，然后哭了起来。伊莎多拉也哭了。她一下子把孩子抱在怀里。还有另一个孩子——她的学校，孩子们长高了。这是一次美妙的重逢，他们一起跳舞唱歌，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尼·波负责伊莎多拉·邓肯在巴黎的演出事务，他曾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勃雷和易卜生引荐给巴黎。他认为伊莎多拉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陪衬，于是订下了欢乐剧场，请了科隆乐队，由科隆指挥，结果轰动了全巴黎。一些大诗人，如亨利·拉维丹、皮埃尔·米尔、亨利·德·莱尼埃等，都热情洋溢地写了赞美她的文章。

巴黎满面春风地迎接了伊莎多拉·邓肯一行人。她的每一次演出，都坐满了艺术界、知识界的名流。那时，伊莎多拉似乎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开办她渴望的学校看来也易如反掌。

在丹东路五号，他们租了两个大套间，伊莎多拉住在一楼，学生们和保育员住在二楼。

有一天，在日场快要开演之前，伊莎多拉饱受了一场惊吓。她的小宝宝突然噎住了，并且咳嗽不止。伊莎多拉怕孩子患了可怕的喉头炎，于是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跑遍了巴黎，终于找到了一个著名的儿科专家。他慨然应允跟她一起到她的住处，并很快就让伊莎多拉放了心，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只不过是普通的咳嗽而已。

她的演出迟了半个小时。科隆在这段时间里演奏音乐以飨观众。

整个下午，伊莎多拉跳舞的时候，总是由于忧惧而战栗。她太喜欢自己的孩子了，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伊莎多拉就活不下去了。

那个季节最盛大的事件就是布里森舞会。巴黎文学、艺术界全体名流都接到了邀请。

每个人都以各种作品主人公的身份来参加舞会。伊莎多拉扮的是欧里

庇得斯悲剧中的酒神女祭司。穆奈 - 絮利穿着希腊长袍，化妆成酒神狄俄尼索斯。伊莎多拉和他一起跳舞。

跳了整个一个晚上——或者说，至少她是围着他跳了舞，因为这个了不起的穆奈看不起现代舞。

伊莎多拉和他一起跳舞的事。后来传开了，好像他们干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其实这纯粹是冤枉，伊莎多拉不过使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理所应当当地有几个小时的消遣而已。

她那种美国人的单纯，在那天晚上竟然震动了巴黎！

伊莎多拉又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以她的收入，已不可能支付那发展中的学校的浩大开支。她挣来的钱，一方面得用来供养和教育四十个孩子——二十个在德国，二十个在巴黎——此外还得资助别人。

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对姐姐伊丽莎白说：“这样下去不行！我的银行存款已经超支了。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非得找一位百万富翁支持才行。”

她一说出这个愿望，愿望就缠住她不放。

“我一定要找个百万富翁！”这话伊莎多拉一天重复上百次。开始是玩笑，后来就真的急切希望它实现了。

在欢乐剧院特别成功的一场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清晨，伊莎多拉穿着晨衣在照镜子，刚用卷发纸把头发卷上，戴着花边小帽，准备下午的日场演出。这时侍女拿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个显赫的名字，帕里斯·辛格。伊莎多拉脑子里突然高兴得唱起歌来：“这就是我要的百万富翁。”

“请他进来！”她欣喜地说。

他进来了，身材修长，一头金色鬃发，留着胡须。伊莎多拉·邓肯一下子就猜出他是帕里斯·辛格。

“谁想当我的骑士？”他说话声音迷人，似乎有点害羞。

“他像个戴着假胡须的大孩子，”伊莎多拉心里想。

“您不认识我，可我经常为您美妙的艺术鼓掌，”他说。

伊莎多拉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好像是在梦里见过。她记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哭得很伤心，初次参加法国丧礼，还不习惯；亲王的亲属排成长队，站在教堂旁边的过道上。有人把她向前推，“得去握手！”他们小声说。于是，为了克制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的悲伤，伊莎多拉和这些王亲们一一握手。伊莎多拉记得她突然看到一个人的眼睛，那就是现在站在她面前的这位高个子。就是他！

他们是在教堂的一个棺材旁边初次相遇的，这真不是幸福的预兆！不管怎样，从那时起，伊莎多拉就认为他就是自己的百万富翁。

“我钦佩您的艺术，钦佩您办学校的勇气。我是来帮助您的。我能做什么呢？比方说，您是不是愿意跟所有这些跳舞的孩子们一起到里维埃拉海滨的一所小别墅去，在那儿编几出新的舞蹈呢？开支您不必操心，我愿意全部负担。您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您一定很累了，现在让我来替您挑这副担子！”帕里斯·辛格发出邀请。

不到一星期，伊莎多拉的这支小队伍便坐上头等车厢，向着大海，向着阳光奔驰而去。

帕里斯·辛格满面春风，一身白衣服，来车站迎接她们，把她们带到海滨一所别墅里。

从别墅的阳台上，他指着他那白色翼舱的游艇给她们看：

“这艘船名叫‘艾丽西亚夫人号’，”他说。“不过现在我们要把它改名为‘艾丽丝号’了。”

孩子们穿着轻飘飘的蓝色舞衣，双手捧着鲜花和水果，在柑子树下跳舞。

帕里斯·辛格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每个人，竭力使人人过得舒适。他对孩子们的这种热忱，使伊莎多拉不仅对他充满感激心情，还产生了新的信任感。以后天天接触到他，他的魅力对她愈来愈大，不久就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感情。不过，她只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骑士看待，远远地对他顶礼崇敬，几乎完全是一种精神关系。

孩子们跟伊莎多拉一起住在博利欧的一所别墅里，而帕里斯·辛格则住在尼斯一家豪华的大饭店里。他不时请伊莎多拉跟他一起进餐。

当她穿着朴素的舞服，在那里发现他的旁边有一位穿着华丽长袍、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时，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意识到那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使她充满着恐惧。

后来事实证明，伊莎多拉的恐惧确有根据。

一天晚上，帕里斯·辛格在夜总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狂欢舞会。他给每个来宾准备了一套用轻柔飘拂的缎子做的化妆舞衣。

穿化妆舞衣对于伊莎多拉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参加公开的假面舞会也是第一次。

这真是一次狂欢节日。但对伊莎多拉有一块阴云——那满身钻石的女人也穿着一件化妆舞衣来到舞会上。瞧见她，伊莎多拉心里很不是滋味，难受得很。但是后来又和她狂乱地跳起舞来。爱与恨就是如此近似，难以区分。直到舞会主持人碰碰她们的肩膀，说不允许这么做，她们才分开。

也就是在这场舞会之间，有人叫伊莎多拉去接电话。在电话里，伊莎多拉得知她的一个名叫埃里卡的学生突然得了喉炎，病得很严重，恐怕有生命危险。

伊莎多拉从电话间直奔帕里斯·辛格的餐桌，叫他快到电话间来，他们必须打电话请医生。

就在那个电话间附近，在为孩子担忧的共同心情的压力下，他们之间的堤防崩溃了，两人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一起。

接下来，他们一秒钟也没有浪费，帕里斯·辛格的汽车就在门口。他们仍然穿着化妆舞衣，坐上汽车，找了个医生，直驶博利欧别墅。

小埃里卡窒息着，脸憋得发紫。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吓呆了，在床边等待着诊断的结果。两小时过去了，窗户上微微出现曙光，医生宣布孩子已经脱险。他们俩籁籁流下的眼泪，把脸上的化妆油彩都溶化了。

帕里斯·辛格搂着伊莎多拉说：“勇敢些，亲爱的！咱们回去陪客人吧！”

在回去的路上，他在汽车里紧紧搂着她小声说：“最亲爱的，哪怕只是为了这一个晚上，这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爱你。”

在夜总会里，时间过得非常快，绝大部分客人都没有发现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曾经离场。

不过，有一个人却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就是那个浑身都是钻石的小女人。她是以嫉妒的目光看着他们离开，当他们返回大厅的时候，她从桌上抓起一把餐刀，扑向帕里斯·辛格。幸亏帕里斯·辛格及时发现她的意图，

紧紧抓住她的手腕，一转眼就把她高高举起抱了出去，送到女宾休息室。

整个事件好像是一场玩笑，是狂欢节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节目。他在那儿把这女人交给仆人，简简单单地说，她有点歇斯底里，需要喝点水，然后若无其事、兴高采烈地回到舞厅。

的确，从那时起，整个晚会的欢乐气氛更为高涨。清晨五点钟，大家的情绪简直达到了顶点。伊莎多拉如痴如狂，热情奔放，和马克斯·迪尔雷跳了狂放的探戈舞。

太阳出来，狂欢舞会才告结束。那个浑身钻石的女人独自一人回到她的旅馆，帕里斯·辛格则留下来跟伊莎多拉在一起。

他对孩子们的慷慨大方，对小埃里卡病情的担忧和劳累，这一切赢得了伊莎多拉对他的爱。

第二天早晨，帕里斯·辛格向伊莎多拉建议，乘坐他重新命名的游艇去旅行。他们带着伊莎多拉的小女儿，把学校留给保育员们照看，乘船直驶意大利。

一切金钱都会带来灾祸。有钱人的快乐维持不了二十四小时。

如果伊莎多拉早知道和她共处的这个男人的心理状态跟宠坏了的孩子似的，自己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顺他的心意，那就一切都会顺利。但是伊莎多拉当时太年轻幼稚，不懂得这些。她喋喋不休地给他解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谈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卡尔·马克思，谈世界的总改造。至于讲这些话造成多大的恶果，她却丝毫没有想到。

帕里斯·辛格这位宣称因为伊莎多拉勇敢和大气而爱的男人，发现带到自己游艇上来的竟是一个狂热革命者，就愈来愈惊慌了。他逐渐了解到，他不能使她的激进思想和他的宁静心情有协调一致。

一天晚上，当他问伊莎多拉最喜欢哪首诗的时候，这种矛盾发展到了顶点。

伊莎多拉·邓肯高高兴兴地给他朗读沃尔特·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浸沉于狂热之中，却没有注意到对他起了什么作用。可是，当她抬头一看，却惊讶地发现他那漂亮的面孔都气得变了形。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大声说。“这伙穷骨头永远得饿肚子！”

“你难道看不出，”伊莎多拉喊道，“他憧憬着自由美国？”

“滚它的憧憬吧！”他说。

伊莎多拉突然明白，他对美国向往的只是使他大发其财的那十几片工厂。

但是女人就是如此反复无常，她和他多次这样争吵，吵完了，还是投入他的怀抱。

在一阵狂暴的爱抚下，使她忘掉了一切，还自我安慰地想，他会睁开眼睛明白过来的。

那时，会帮助她为民众的孩子办伟大的舞蹈学校的。

与此同时，他们乘坐的豪华游艇在地中海碧波上荡漾，破浪前进。

伊莎多拉的确仍旧沉醉在爱情之中，心荡神怡。然而，她还时时想到那些锅炉房的火夫、船上的五十个水手、船长和大副——所有这些巨大的耗费，都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快乐。她想，这种日子多过一天都是工作的损失，然后就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有时候，伊莎多拉把这种豪华奢侈的舒适生活，终日宴乐、满不在乎地纵情享乐的情景，同她早年的困苦挣扎对比，真是天

上地下。她顿时整个身心都感到豁然开朗，犹如黎明的曙光化为炎炎白日。

他们在庞培过了一天。帕里斯·辛格出了个浪漫的主意，想看伊莎多拉于月光下在帕斯顿神庙前跳舞。他雇了一个那不勒斯小乐队，让他们到神庙那儿去等他们。那天正好赶上—阵夏天的暴风雨，大雨倾盆，一连两天游艇出不了港。当他们最后到达帕斯顿神庙时，全体乐师淋得像落汤鸡，十分可怜地坐在神庙的台阶上，足足等了他们24个小时。

帕里斯·辛格叫来了几十瓶酒，一只烧羊羔。他们按照阿拉伯人的方式用手抓羊肉吃。饿煞了的乐师们吃喝过量，加上在神庙等得疲劳不堪，所以一个个都没法演奏了。

赶巧又下起了朦朦细雨，他们都上了游艇，直开那不勒斯。乐师们还想鼓起勇气，在甲板上演奏一番，但是船开始颠簸，他们一个个脸色发青，只好回到船舱里去了。

在帕斯顿神庙月光下跳舞的浪漫主意，就这样完结了。

帕里斯·辛格还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但伊莎多拉想起了和俄国经理人订下的演出合同。虽然自己对这次演出很勉强，但她什么恳求也不听，还是决定遵守合同。

帕里斯·辛格把她送回巴黎，他本想和伊莎多拉一起去俄国，但是怕不容易搞到护照。于是他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两人亲亲热热地告了别。

与心爱的人分手，虽然离愁别绪使人柔肠寸断，但是他们同时也体验到一种终获自由的感觉。

伊莎多拉这次到俄国巡回演出，和往常一样，极为成功。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成为悲剧的事情，尽管后来的结果倒像是喜剧。

一天下午，克莱格来看伊莎多拉。在那一瞬间，她几乎相信，无论是学校也好，帕里斯·辛格也好，都不在话下，重要的只是与克莱格重逢的喜悦。

克莱格情绪很高，他正在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哈姆雷特》。那个剧院的全体女演员都爱上了他，男演员也喜欢他的英俊洒脱、亲切和蔼和非凡精力。他总是向他们大谈戏剧艺术，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而他们也总是竭力跟上他的一切奇异想象。

当伊莎多拉看见他的时候，感到他依旧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如果她当时不是带着一位可爱的女秘书，事情恐怕是另一种结局了。

在他们就要动身去基辅的最后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设便宴招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莱格和她的女秘书。

吃着，克莱格问伊莎多拉是否打算留下来跟他在一起。由于她无法立刻回答，他又像过去那样大发脾气，一把把她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带到另一个房间，把门锁上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吓得要死，竭力劝说克莱格把门打开。当他看到劝说无效时，他们只好赶到火车站去，但是火车已经在十分钟以前开走了。

伊莎多拉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到他的寓所，都感到沮丧，无精打采地谈了谈现代艺术，想把克莱格这桩事岔开。可是伊莎多拉看得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克莱格这种行径感到很苦恼、很震惊。

第二天，伊莎多拉·邓肯乘火车到基辅。

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回到巴黎。帕里斯·辛格迎接了伊莎多拉一行。

帕里斯·辛格在伏日广场有一套房间。他把她带到那里，放倒在一张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吻抱爱抚，热烈得简直使她透不过气来。两人在一起疯狂地做爱。

伊莎多拉觉得他好像是众神之神宙斯，可以随意变成种种不同的化身，时而又觉得他是一头公牛，或是一只天鹅，时而又是一阵金光灿烂的阵雨。而她自己呢？被这种爱情拥托而起，漂浮在浪花之上，乘着白色双翼，心荡神漾，飘飘荡荡，以奇异的方式被诱惑，化为一朵金色云彩而成为尊神。

在巴黎城所有好的饭店里，帕里斯·辛格像一个国王似地受人侍候，人人对他弯腰屈膝，竭力奉承。所有的饭店领班、所有餐馆的厨师争先恐后向他逢迎讨好。这也难怪，因为他挥金如土，有真正的帝王气派。

伊莎多拉在这里第一次懂得了“罐焖子鸡”和“淡味子鸡”有区别，她舌头上潜在的神经和味觉觉醒了。她学会了品尝佳酿，了解它的年代，知道了哪一年的陈酿和哪一种原封最精美。此外，她还懂得了许多以前忽视了的东西。

伊莎多拉平生第一次来到最时髦的时装店，看得她目眩神迷。在此以前，她总是穿一件小小白色舞衣，冬天是毛的，夏天是亚麻的，现在却要订做华丽的衣衫，还要穿戴起来。这样的诱惑不可抗拒，伊莎多拉真是浑身酥软了。不过伊莎多拉倒有一个借口：这个裁缝与众不同，简直是个天才，他能够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把一个妇女打扮得漂亮无比。

伊莎多拉·邓肯开始从神圣的艺术转人世俗的艺术。

这一切满足，也有相反的反应——伊莎多拉患上了神经衰弱。

一天早晨，她和帕里斯·辛格一起愉快地在布洛尼树林散步，他脸上掠过一丝恍惚、悲哀的表情。伊莎多拉觉察到了，不禁感到担心。当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说：“总是看到我母亲躺在棺材里的面容。不论我到哪儿，都看见她那张脸。既然人最后总是要死的，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伊莎多拉意识到：富裕和豪华都不会使人满足！对于有钱的人来说，在生活中要做出有意义的事情，的确更为困难。伊莎多拉总看见那艘游艇在港湾里等着，引诱她到蔚蓝色海洋去遨游。

那个夏天，他们是坐着游艇到布列塔尼附近的海上度过的。海上时常波涛汹涌，伊莎多拉受不了，只好离船乘汽车，跟着游艇沿着海岸前行。帕里斯·辛格坚持留在船上，但是他也很不适应于航海，经常晕船，吐得脸都发绿了。在伊莎多拉看来，有钱人的享受不过如此。

9月份，伊莎多拉带着孩子和保姆去威尼斯，单独和她们一起待了几个星期。

有一天，她到圣马可大教堂去，独自坐在那儿凝视着金色和蓝色的圆屋顶。忽然，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脸孔——一个天使的脸蛋儿：大大的蓝眼珠，一头金发像光环似地围在头上。

然后，她到里多海滩，跟小迪尔德丽坐在那儿玩。

伊莎多拉一连数日陷入沉思。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那种幻想，使她的心情充满着快乐与不安。她恋爱过，但是现在伊莎多拉知道，男人的所谓爱情，不过是朝三暮四和自私的任性而已，而遭殃的是她的艺术。她是用牺牲她的艺术和工作换来的。

于是，她开始缅怀她的艺术、她的工作、她的学校来了。眼前的人世生活与自己的艺术梦想相比，实在是个累赘，她想。

伊莎多拉·邓肯相信，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条上升的精神曲线，依附并加强这条线。对于她自己，这条精神线就是她的艺术。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只有两个契机——爱情和艺术——而爱情常常毁灭艺术；艺术的迫切要求又常常给爱情带来悲剧的结局。

两者不能协调，总是在不断地斗争着。

在这样六神无主和精神苦恼中，她到米兰去找一位当大夫的朋友，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问题。

“咳，真是荒唐！”他大声说。“你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家，竟然又要冒险使世界丧失你的艺术吗？这根本不行。请你接受我的忠告，不要干这种违反人性的罪恶行为！”

听了他的话，伊莎多拉仍然苦恼，犹豫不决，甚至一度反感透了：一方面她觉得不应该再让自己的身体变形，因为她的身体是艺术的工具；另一方面她却再次为回忆和希望所苦，为幻觉中那个小天使的脸蛋——她儿子的形象所苦。

伊莎多拉请帕里斯·辛格给她一小时做决定。

在旅馆的卧室里，她看见墙上有一幅画，上面是穿着十八世纪长袍的一个女人，那可可爱然而无情的眼睛直视着她。伊莎多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的眼睛看起来是在嘲笑伊莎多拉，似乎在说：“不管你怎样决定，反正都是一样。我曾经有光采照人的美貌，但死亡吞没了一切——一切——你干吗要受这个罪：重新把生命带到世界上来，只是为了让它被死亡吞没？”

照片上的眼睛变得更加无情，更加胆沉，伊莎多拉更为苦恼，更为痛苦了。她双手捂住眼睛不看她，努力地思考，做出决定。她泪眼模糊地向照片上的眼光乞求，但是对方毫无怜悯的表示，仍然无情地嘲笑着她。

伊莎多拉终于站起来，对那双眼睛说：“不，你难不住我。我相信生活，相信爱情，相信神圣的自然法则。”

那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突然闪现出一道可怕的嘲笑的光芒。这是幻想，还是真的？

帕里斯·辛格重新进来，伊莎多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从此以后，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的决定了。

伊莎多拉回到威尼斯，手里抱着迪尔德丽，轻声地对她说：“你快有一个小弟弟了。”

迪尔德丽高兴地拍手笑道：“啊，真好，真好！”

“是的，是的，那太好了！”伊莎多拉说。

伊莎多拉给帕里斯·辛格发了一封电报。他立刻赶到威尼斯。他很高兴，充满着欢乐、爱情和温柔。

伊莎多拉·邓肯和沃尔特·丹罗希订了第二个演出合同，10月份乘船去美国演出。

帕里斯·辛格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因此非常高兴。他也有美国血统。他订了船上最大的一套房舱，沿途他们的享受不啻王侯。跟百万富翁一起旅行确实省事，这是伊莎多拉的新感受。他们在这艘船上有一套最豪华的大餐间，人人见了他们都得闪避左右，鞠躬行礼。

当时的美国还有一条法律和惯例，不允许一对情人一起旅行。但是当一个人非常非常有钱的时候，这些小小麻烦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次美国旅行对于伊莎多拉来讲是最愉快、成功和顺利的。因为有了

钱，就能赚更多的钱。直到1月份的一天，一位太太到化妆室来，很不安地大声对伊莎多拉说：“亲爱的邓肯小姐，坐在头排的观众把你的身子瞧得一清二楚。你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伊莎多拉回答说：“啊，亲爱的夫人，那恰恰是我的舞蹈所要表现的——爱情——妇女——孕育——春天！您知道波提切利的名画《丰收大地》、《怀孕的优美三女神的舞蹈》、《圣母玛丽亚》，还有《怀孕的和风女神》吗？万物都在闪闪而动，都在创造新生命，这就是我的舞蹈要表现的一切……”

这位太太听了这些话，显得莫名其妙。但是伊莎多拉一行还是认为旅行演出最好到此为止，回欧洲去，因为伊莎多拉当时的体态的确太明显了。

伊莎多拉·邓肯非常高兴，因为奥古斯丁和他的小女儿也和他们一起回欧洲。奥古斯丁已经同他的妻子分居。

经过途中在埃及的逗留观光之后，伊莎多拉一行回到了法国。他们在维尔弗朗什登岸。

为了度过这个季节，帕里斯·辛格租了一座宽敞壮丽的别墅。这座别墅有层层平台顺坡而下直达大海。他还是那样性急，兴冲冲地在弗拉角买下了一块地皮，打算建造一栋巨大的意大利式城堡。

帕里斯·辛格一反寻常地烦躁不安，忙忙碌碌，不是忙着去弗拉角买土地，就是星期一乘快车去巴黎，星期三回来。

伊莎多拉安静地留在蓝色的海洋之滨的花园里，沉思着把生活与艺术分开来的奇怪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她也时常思忖一个女人是否确实能当一个艺术家？因为艺术是个严厉的主人，它事事苛求，而一个热恋中的女人却是放弃一切而只要生活的。总之，伊莎多拉·邓肯已是再次和她的艺术完全隔绝了。

1910年5月1日早晨，阳光灿烂，海水碧蓝，万物欣欣向荣。在充满欢乐的气氛中，伊莎多拉生下了她的儿子。

迪尔德丽来到母亲的房里，她那可爱的小脸蛋洋溢着光辉。

“啊，多可爱的小男孩。妈妈，您别为他操心，我要天天抱他，照看他。”

伊莎多拉·邓肯又一次怀抱婴儿躺在海滨，不过这一次不是在那狂风怒号的玛丽亚别墅，而是在一所宏伟的大厦里；不是在那个阴沉不平静的北海，而是在蔚蓝色的地中海之滨。

回到巴黎后，帕里斯·辛格问伊莎多拉要不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请她所有的朋友，并且要她开一个节目单，由她全权处理节目安排。

在伊莎多拉看来，有钱人似乎从来不知道怎样娱乐，如果他们举行宴会，那也和贫穷的看门人请客吃饭一样，没有多大区别。而她早就想过，一个人要是有钱，宴会该怎么办才可以办得十分出色。于是，伊莎多拉就照这种想象去准备了。

按照伊莎多拉的想法，客人们在下午四点到达凡尔赛。在那里的一所花园里，准备了大帐篷，帐篷下面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从鱼子酱、香槟酒到茶和点心，应有尽有。然后，在一大片空地上，科隆乐队由皮埃内指挥演奏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音乐会以后，是一场丰美的正筵。一道道山珍海味、珍馐佳肴，客人们一直吃到半夜。园地里处处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人们合着维也纳乐队的曲子跳舞，直到将近天明。

伊莎多拉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一定要花钱让他的朋友们高兴，就应该这么办。

所有的巴黎社会名流和艺术家都出席了这次宴会，而且的确非常欣赏。

但是这次宴会有一点奇特之处，虽然伊莎多拉安排的一切都是为了帕里斯·辛格高兴，并且花了五万法郎，但是帕里斯·辛格自己却没有出席。

在宴会开始前大约一小时，伊莎多拉接到一封电报，说是他突然有病不能来了，叫她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招待客人。

有钱人要找到快乐，就像西西弗斯企图从地狱里把石头推上山一样办不到。

这年夏天，帕里斯·辛格心血来潮地对伊莎多拉说，他们应当结婚，尽管伊莎多拉反对，说她一向是不赞成结婚的。

伊莎多拉说：“一个艺术家要结婚是多么愚蠢！而且，我是要环游世界过此一生的，你怎么能够一辈子坐在特别包厢里观赏我跳舞吗？”

他回答说：“要是咱们结了婚，你就不用到处旅行了。”

“那咱们干什么呢？”伊莎多拉反问道。

“咱们在伦敦我的家里，或者在乡下我的别墅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那以后咱们又该干什么呢？”

“以后就坐游艇去玩。”

“那以后咱们又该干什么呢？”

他建议他们试试过三个月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那我实在太奇怪了，”他说。

于是，那个夏天他们就搬到英国德文郡去了。那儿有一座极为出色的大别墅，是帕里斯·辛格仿照凡尔赛宫和小特里安龙宫建造的。里面有很多卧室和浴室，许多套间，全归伊莎多拉支配。车库里有十四辆汽车，港口有一艘游艇。但是伊莎多拉没有考虑到天是会下雨的，而英国的夏季整天下雨。

英国人对此似乎毫不在乎。他们起床之后就用早餐，吃鸡蛋、咸肉，或者火腿、腰子、麦片粥，然后披上雨衣，在潮湿的乡下走走。到午饭时回来，吃许多道菜，最后一道是德文郡奶油。从午饭到下午五点，他们去睡觉。五点钟，他们下楼来吃茶点，有各种点心，还有面包、黄油，有茶，还有果酱。吃完茶点，他们玩桥牌，然后才进入一天中真正的重要事情——整装吃晚餐。他们都以晚礼服盛装出现在这个时刻：女士们袒胸露肩，绅士们衬衫领子硬梆梆，入席把二十道菜都吃光。酒足饭饱之后，才轻松愉快地谈点政治，或者随便聊聊哲学，一直到告退去睡觉。

这种生活使伊莎多拉非常厌倦。过了三两个星期，她实在是绝望了。

帕里斯·辛格发现伊莎多拉一天比一天情绪低落，便对她说：“你干吗不再跳舞——就在这个跳舞厅里跳呢？”

伊莎多拉看着那些壁毯和油画，说道：

“在这些东西的面前，在油光光的打蜡地板上，我可一点舞姿也做不出。”

他说：“要是仅仅是这些东西妨碍你，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来吧！”

于是伊莎多拉派人去把她的幕布拿来挂在壁毯上，把地毯铺在打蜡地板上。

“可我得有一位钢琴伴奏呀！”她又想起了此事。

“那就叫人去请一位琴师来，”帕里斯·辛格说。

于是伊莎多拉便又发一个电报给科隆：“在英度夏，需工作，速派琴师来。”

科隆的乐队里有位第一小提琴手，相貌奇特，头很大，而且还在长得

难看的身躯上面来回摆动。这位第一小提琴手还擅长弹钢琴。

但是这个人十分不讨伊莎多拉喜欢，不论什么时候看到他或者碰到他的手，都使她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绝对厌恶之感。以前每次伊莎多拉都请科隆不要带他来见她，科隆却说此人很崇拜她。但伊莎多拉告诉他，她对此人的厌恶感觉是无法抑制、无法忍受的。

一天晚上，科隆病了，不能指挥乐队为我的《抒情狂欢节》舞蹈伴奏，就让这个人替他指挥。伊莎多拉气极了，说：“要是他为我指挥乐队，我就不能跳舞。”——

他到化妆室来见伊莎多拉，泪汪汪地瞧着她说：“伊莎多拉，我很崇拜你，让我就指挥这一次吧！”

“不，我必须跟你讲清楚，你的模样太使我厌恶了，”伊莎多拉不客气地说。

听了这些话，他失声痛哭起来。

观众正在等待开演，于是只好由皮埃内来暂代指挥。

在一个雨天，伊莎多拉收到科隆回电：“已派琴师，X日X时到。”

伊莎多拉到车站，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竟是那位她特别厌恶的先生，感到异常惊奇。

“科隆怎么能叫你来呢？他知道我厌恶你的，”伊莎多拉说。

琴师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小姐，请您原谅，是亲爱的大师派我来的……”

当帕里斯·辛格知道钢琴师是何许人以后，对伊莎多拉说：“至少我是没有理由嫉妒了。”

帕里斯·辛格仍然觉得自己还在遭受疾病的困扰，所以他在大别墅里安排了一位大夫和一位有经验的护士照料他。他们特别强调伊莎多拉的行动影响了他。于是她被安置在别墅里远远一头的的一个房间里，并且告诉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去打扰帕里斯·辛格，让他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吃米饭、通心粉和喝水。医生每小时来给他量一次血压。

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加了伊莎多拉的焦躁不安，再加上没完没了下雨，致使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

为了解除烦闷，驱散苦恼，伊莎多拉开始和那位琴师一起工作，尽管她非常地厌恶他。当他伴奏的时候，伊莎多拉就用一道屏幕把他围起来，对他说：

“我觉得你说不出来的讨厌，我一看到你就受不了。”

帕里斯·辛格的一位老朋友——一位伯爵夫人——这时也住在这所别墅里。

“你怎么这样对待这位可怜的琴师呢？”她对伊莎多拉说。

每天午饭后她们都要坐着小汽车出去玩一会儿，有一天，伯爵夫人极力劝她邀请这位琴师一起出去玩玩。

于是，伊莎多拉非常勉强地邀请了他。

这辆汽车没有加座设备，所以他们只得都坐在同一条车座上。伊莎多拉在中间，伯爵夫人坐在右边，钢琴师生在左边。

和平时一样，那天也下着倾盆大雨。当他们到了离乡下不远的地方，伊莎多拉对琴师厌恶之感再也克制不住，敲了敲玻璃隔板，告诉司机掉头回家去。司机点点头，为了让她高兴，来了个急转弯。

乡村的道路到处坑坑洼洼，汽车急转弯时，伊莎多拉一下就被甩到钢琴师的怀里。

他连忙伸手把她搂住。

伊莎多拉坐回去看看他，突然感到自己整个身体好像一堆着了火的稻草，猛烈地燃烧起来。她从来没有感到过有任何力量是这么猛烈的。她瞧着他，突然间惊呆了。在她的眼中，钢琴师仿佛变了一副模样，他的脸是那么完美，眼睛里隐隐燃烧着天才的火焰。

回家的路上，伊莎多拉神情恍惚地凝视着他。进入别墅大厅的时候，他拉着她的手，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眼睛，温柔地把她拉到舞蹈室那道屏幕后面，亲热起来。

从此开始，两人都神魂颠倒，老想单独在一起——在温室，在花园，甚至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但是这种激烈的热情却免不了激烈的结局，终于有一天，钢琴师不得不离开别墅，且一去不复返。

这一段插曲证明了伊莎多拉确实不适合过家庭生活。于是，到了秋天，她就动身去美国履行第三个合同了。这一次伊莎多拉变得聪明了些，心情也有点儿悲哀。她又一次做出决断，从今以后，要把全部生命献给艺术。她认为艺术虽然是个严厉的老师，但是知情感思不知超过凡人多少倍！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伊莎多拉·邓肯坚决呼吁美国帮助她建立学校。

过了三年富人生活之后，使伊莎多拉确信这种生活是毫无前途的，是空虚无聊而自私的；同时也证明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只有创造出一种普遍适用的艺术形式才行。那年冬天，伊莎多拉·邓肯向大都会剧院上上下下包厢里的观众大发宏论，申述她的观点。

报纸做为丑闻，用大字标题登着：“伊莎多拉臭骂有钱人”。

邓肯说：

有人引述我的话，说是我说了美国的坏话。也许我是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美国。恐怕是因为我大爱美国了。从前，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发狂地爱着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对他没话可说，对待他很不好。那个男人每天都要写一封信辱骂她。女的问男的：“为什么你要给我写那些粗野无礼的话？”男的回答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当然爱美国，为什么？我的学校，这些孩子们，难道不都是沃尔特·惠特曼精神的后代吗？还有这个一直被叫做希腊式的舞蹈不也是这样吗？它出身于美国，它是未来美国的舞蹈。所有这些动作——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它们都来自美国伟大的自然；来自内华达的山峰；来自冲洗着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太平洋；来自连绵广裹的洛基山、约瑟米山谷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

贝多芬和舒伯特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是穷人，但他们伟大作品的灵感来自全人类，并且属于全人类。人民需要伟大的戏剧、音乐、舞蹈。

我们去过纽约东区，免费举行了一次演出。一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在东区表演舒伯特的交响乐，那些人是不会理睬的。”

不错，我们进行了免费的演出，剧场没有售票处！人们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泪珠儿顺着脸颊滚滚往下流，这就表现了他们不是不理不睬，而是十分关心演出。东区人民的生活，他们的诗歌、艺术中蕴藏的潜力都是很丰富的，时刻等待着一跃而出。为他们建造一座圆形大剧场吧，那是唯一民主的剧场形式。在那里，人人都一样地看得清楚，没有包厢和楼厢；可是——

你们瞧这剧场的顶层楼座吧——你们认为把人类像苍蝇一样贴在天花板上，然后请他们欣赏艺术和音乐，这样做是合理的吗？

建造一座朴素的、美丽的剧场，不需要给它镀金，不需要那些华而不实的装饰，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是来自人类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外表装饰。只有从灵感充溢的人类灵魂里流露出来的美，还有做为这种美的象征的身体；而且，如果我的艺术在这里对你们有所启发的话，我希望它教给你们的就是这一点。美是需要寻找的，在孩子们身上就可以找到；在他们的眼睛的光辉里；在他们伸展出来做各种可爱动作的美丽小手之中。你们已经看见，她们手拉着手走过舞台，比通常坐在这儿包厢里的任何一位老太太、小姐身上的珠宝钻翠要漂亮得多。她们就是我的珍珠和钻石。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让孩子们美丽、自由、强壮有力吧！把艺术给人民，人民需要它。伟大的音乐再也不能只供少数有文化的人娱乐，它应该无代价的给予大众：他们需要它，就像需要水和面包，因为那是人类精神上的美酒。

结束了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之后，伊莎多拉重新回到巴黎。她把学生们留在凡尔赛，让一个保姆照管。当她打开家门的时候，她的孩子跑到跟前来。伊莎多拉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婴儿，在摇篮里呢。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是意大利的诗人、作家和政界领袖，出生于 1863 年。

多年以来，伊莎多拉·邓肯对邓南遮一直抱有成见，因为她赞赏杜丝，而觉得邓南遮对杜丝很不好，所以不愿见他。

有一位朋友曾对伊莎多拉说，“我可以带邓南遮来见你吗？”

她回答说：“不行，别带来，要是我见到他，一定对他不客气。”

但不顾伊莎多拉的反反对，有一天他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尽管伊莎多拉·邓肯以前从未见过邓南遮，但是当她看到这位神采奕奕魅力的非凡人物，只能大叫起来：“欢迎您，您真可爱！”

邓南遮是个猎艳高手。他总是想把世界上一切知名的女人都搞到手，挂在自己腰间。

就像印第安人把敌人带发的头皮拴在自己腰里一样。初次见到伊莎多拉，他便对她动了心，想要征服这个不那么驯服的女人。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对杜丝的赞赏而抵御他。伊莎多拉·邓肯大概是世界上唯一抵御他的女人。这是一种英雄似的冲动。

当邓南遮想把一个女人搞到手的时候，他每天早晨都给她寄去一首小诗，附带着一朵表达这首诗的涵义的小花朵。

每天早晨八时，伊莎多拉总是收到这样一朵小花，但她仍然坚持本意不为所动！

一天晚上，邓南遮以一种特别的声调对伊莎多拉说：“我半夜到你这里来。”

伊莎多拉和朋友把工作室布置了一整天，摆满了白花——白色的百合花，那都是参加葬礼用的鲜花。她们还点燃了数不清的白蜡烛。

邓南遮一见这像哥特教堂似的工作室里点燃了那么多的蜡烛，放了那么多的白花，不禁目瞪口呆。

进来以后，她们把他带到一条堆着靠垫的长沙发上坐下。

伊莎多拉首先跳舞给他看，再在他身上洒满鲜花，在他周围放了许多蜡烛，然后合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节拍，轻盈地起舞。

接着，她把蜡烛一个接一个地吹灭了，只剩他头上和脚下的还点着。

他躺着，好像进入了催眠状态。

然后，她仍然合着音乐翩翩起舞，把他脚下的蜡烛也吹灭了。

但是，当伊莎多拉庄严肃穆地舞向他头上那支点着的蜡烛时，他像是奋起全身的意志力量，一跃而起，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从工作室里冲了出去。

伊莎多拉和钢琴师忍不住哈哈大笑，倒成一团。

伊莎多拉·邓肯第二次抵御邓南遮是在凡尔赛。这已经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伊莎多拉请他到特里安龙宫廷饭店吃饭。他们是一起坐着伊莎多拉的汽车出去的。

“你不想在吃饭之前到森林里去散散步吗？”伊莎多拉问。

“啊！当然愿意，那简直太好了！”邓南遮回答。

汽车到了玛利森林，两人下了车，走进森林。邓南遮欣喜若狂。

溜达了一会儿，伊莎多拉提议说：“咱们回去吃饭吧！”

伊莎多拉第三次抵御邓南遮，是在多年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她到了罗马，下榻女王饭店。正巧邓南遮就住在她的隔壁。每天晚上，他总是到卡萨蒂侯爵夫人那里去，和她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侯爵夫人邀请伊莎多拉吃饭。她到宫里，走进接待室。这里的建筑、装饰、陈设完全是希腊风格。

当伊莎多拉坐在那里等候侯爵夫人来临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冲着她来的破口大骂，言词极为卑鄙。伊莎多拉往四周一看，只见一头绿色鹦鹉，没用链条锁着。她赶忙站起来，匆匆走进隔壁一个客厅，坐在那儿等候侯爵夫人。

突然，伊莎多拉又听到一阵声音，她看见了一只大狗，也没有锁上链子。于是她又赶快走进隔壁一间客厅。

这里地上铺着白熊皮地毯，四周墙上也挂着熊皮。伊莎多拉刚坐下，突然听到一阵咝咝的声音，往下看，只见一条眼镜蛇竖立在笼子里对着她咝咝地叫着。伊莎多拉赶忙进入旁边一间客厅，里面铺的全是虎皮。

这里有一只大猩猩，朝她嘴牙咧嘴。伊莎多拉急忙走进旁边另一个房间。

这里是餐厅，伊莎多拉见到了夫人的秘书。

侯爵夫人终于下楼来进餐。她穿着透明的金色睡衣。

“我看您很喜欢动物，”伊莎多拉说。

“啊，是的，我非常喜欢动物——特别是猴子，”她回答说。

饭后，回到那个有猩猩的客厅里，侯爵夫人叫来平素给她算命的女人。这女人头戴一顶尖尖的高帽子，披着巫婆的斗篷，手里拿着纸牌给她们算起命来。

一会儿，邓南遮进来了。邓南遮非常迷信，他相信算命占卜。

“您要飞上天空，做出一些惊人业绩。您会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死亡的大门口。但是，您会死里逃生，只是从死亡旁边经过，然后享受富贵荣华。”算命女人对他说。

女算命的对伊莎多拉是这样说的：

“您就要使世界各国惊醒而皈依一种新的宗教，在世界各地建立伟大庙宇。暗中有超凡力量护佑你，一有灾难，天使自来卫护。您将长命百岁，长

生不老。”？

后来，他们一同回到旅馆。邓南遮对伊莎多拉说：“我每天晚上十二点要到你房间里来。我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但是还没有征服过你伊莎多拉。”

于是，每天晚上十二点他都来了。

但是伊莎多拉对自己说：“我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唯一抵御邓南遮的女人。”

他向她讲述他生活中的奇闻异事，讲他的青年时代、他的艺术。

“伊莎多拉，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接受我吧！接受我吧！”他向伊莎多拉·邓肯哀求。

伊莎多拉对他的天才极为倾倒，所以闻听之下，简直不知所措。她彬彬有礼地把他拽出房间，送他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大约有三个星期她都是这样做的。后来伊莎多拉非常恼火，干脆奔到车站，坐头班火车离开了事。

邓南遮常常问她：“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是因为埃莉诺拉的缘故，”伊莎多拉回答。

伊莎多拉·邓肯生活中的放荡不羁终于把帕里斯·辛格激怒了。他简直无法忍受这个做为自己姘妇的女人如此随便地与别的男人亲热，不加选择地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和帕里斯·辛格经常大宴宾客时一样，香槟酒流成河。

凌晨两点，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亨利·巴塔伊坐在工作室的一个房间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尽管他一向对她像兄弟一样，可那天晚上，由于被这个迷人的地方迷住了，他说话和行动与平时就不一样了。

伊莎多拉也顺应着他，两人在一起动起手脚来了。

正当此时，恰好帕里斯·辛格出现了。他一眼看见一面面镜子里反映出亨利·巴塔伊和伊莎多拉在金色长沙发上的情景，立刻飞也似地跑到工作室，对着客人把伊莎多拉大骂一通，然后宣布他要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

转眼间，伊莎多拉的情绪由喜剧而变为悲剧。

这个夜晚注定要以悲剧结束，帕里斯·辛格发誓永远不再见伊莎多拉。她恳求、辩解，都没有用。

亨利·巴塔伊为此非常不安，甚至向帕里斯·辛格写信解释道歉，但也无济于事。

帕里斯·辛格只肯在汽车上见伊莎多拉，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突然，他停止咒骂，打开汽车门，把伊莎多拉推下了车。

伊莎多拉孤独地一个人昏昏沉沉地在黑夜的街上走了好几个钟头。一些陌生人对她做鬼脸，嘀嘀咕咕提出一些暧昧的邀请。

世界好像突然变成了猥亵的地狱。

两天以后，帕里斯·辛格动身去了埃及。

在那些日子里，伊莎多拉最好的朋友和最大的安慰者就是音乐家亨纳·斯基恩。他崇拜伊莎多拉的艺术，为她伴奏是他唯一的快乐。他是伊莎多拉遇到的人中对她最为钦佩的一个。他是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家，有钢铁般的神经，经常整夜为她弹奏。

## 第八章 灭顶之灾

“千万别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他恳求她说。“我体验到了死的滋味……”

她对伊莎多拉说：“你一定是神经上有毛病。”

小女儿大声喊道：“嘿！帕特里克，你猜咱们今天要去哪儿？”

1913年1月，伊莎多拉·邓肯和亨纳·斯基恩一起在俄国巡回演出。这次旅行中发生了一次奇怪的事情。一天黎明，他们到达基辅，乘雪橇去旅行。伊莎多拉睡意未醒，突然非常清楚地看见马路两旁摆着两排棺材，但不是一般的棺材，而是儿童的棺材。她抓住斯基恩的手臂。

“你瞧，都是小孩——孩子都死了！”她说。

“可那儿什么也没有啊！”斯基恩说。

“什么？没有？你看不见吗？”她说。

“没有，那儿除了雪，什么也没有。大雪堆在马路两旁。真是奇怪的幻觉！一定是你累了！”

那一天，为了消除疲劳，使自己的神经镇静下来，伊莎多拉到澡堂去洗澡。

在俄国，澡堂都在蒸气熏得很热的房间里安上一排排长长的木头架子。伊莎多拉躺在架子上，突然，一阵热气把她熏倒，从架子上掉到大理石地面上。

侍者发现伊莎多拉失去知觉躺在地上，把她抬回了旅馆，并找来了医生。诊断结果是轻微脑振荡。

“您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跳舞——您在发高烧。”斯基恩劝她。

“可是这会使观众失望的。”伊莎多拉坚持要到剧场去。

演出的节目是肖邦的音乐。要结束的时候，完全出人意料，伊莎多拉对斯基恩说：“弹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那为什么？”他问。“您可从来没跳过这支曲子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弹吧！”

伊莎多拉热切地坚持要他弹，斯基恩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伊莎多拉按着进行曲跳了起来。她表演的是一位可怜的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孩，拖着缓慢而踌躇的脚步，走向最后的长眠之地。她舞着，像死人一样一步一步走进了墓穴；最后，她又化为灵魂，逃出被禁锢的肉体，飞升而起，向着复活飞去。

舞蹈完毕，幕落以后，全场沉寂异常，伊莎多拉看着斯基恩。

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浑身直哆嗦，握住她的双手也是冰冷的。

“千万别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他恳求她说。“我体验到了死的滋味。甚至闻到了丧礼之花的香味，并且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棺材……”

他们俩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伊莎多拉相信，那天晚上神灵给了他们异常的预兆，预示了将来注定要发生的事。

他们于1913年4月回到了巴黎。在特罗卡德剧场一次长长的演出结束的时候，斯基恩又一次演奏了《葬礼进行曲》。观众在一阵宗教似的沉默之后，仍然恐惧了好一阵，然后疯狂地鼓起掌来。一些妇女痛哭流涕，有的甚

至不能自己，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自从在基辅表演《葬礼进行曲》发生幻象以后，伊莎多拉就有一种灾祸临头的感觉，因而情绪非常低落。回到柏林之后，她又演了几次。接着，伊莎多拉再次着迷地想创作一个舞蹈，表现一个人正在世界上昂然举步的时候，突然被一次可怕的打击压倒，而遭受创伤者在受到这次命运的残酷打击之后，又爬起来追求一种新的希望。

在伊莎多拉去俄国旅行时，她的两个孩子跟伊丽莎白住在一起。现在，她把她们接到柏林自己的身边来了。她们身体很健康，精神饱满，到处跳舞，显得非常快乐。伊莎多拉和她们一起回到巴黎后，住在纳伊的那所大住宅里。

在家里，伊莎多拉·邓肯时常站在阳台上，不让迪尔德丽知道，偷偷地看小姑娘自己编的舞蹈。

迪尔德丽还自己创作诗歌来自编舞蹈，用那甜蜜的、孩子的声音说：“现在我是一只小鸟，我飞得这么这么高，飞到云彩里。”还有：“现在我是一朵花，一边瞧着小鸟，一边摇来摇去，这样，这样。”

伊莎多拉看着她那样优雅美丽的仪态，就想她将来也许会继承自己的事业，照她的想法去办学校，她是她最好的学生。

儿子帕特里克也合着自己创作的古怪的音乐开始跳舞。只是他从来不让母亲教他，总是一本正经地说：“帕特里克要跳帕特里克自己的舞蹈。”

在纳伊，伊莎多拉每天在工作室练舞，在图书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看书学习，和孩子们一起在花园里玩或者教他们跳舞。她非常愉快，唯恐有任何巡回演出把她和孩子们分开。他们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伊莎多拉一天比一天舍不得离开他们。

她过去总是预言，将来一定出现一个大艺术家，他将把创作音乐和舞蹈这两种天赋同时结合起来；而当她的小男孩跳舞的时候，她觉得他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艺术家，将创造出从新的音乐中产生的新的舞蹈来。

伊莎多拉和这两个极可爱的孩子不仅仅是亲生骨肉的关系，同时还跟她们有一种几乎是超乎人性的更崇高的密切关系——那就是艺术上的关系。

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热爱音乐。当斯基恩弹钢琴，或者伊莎多拉练舞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求留在工作室里，乖乖地坐在那里，专心一意地听着、看着。使伊莎多拉有时不免骇异：这么小小的年纪，竟能如此严肃认真地集中注意力。

一天下午，大艺术家拉乌尔·帕格诺在弹莫扎特的曲子，孩子们蹑手蹑脚走进来，站在钢琴两旁，听他演奏。他一弹完，两个小家伙不约而同地把他们披着金发的小脑袋钻在他的腋下，极其钦佩地注视着他。

他吃了一惊，大声说道：“从哪儿出来的两个小天使——莫扎特的小天使啊？”

这时，他们都笑了，爬上帕格诺的膝盖，把小脸蛋儿藏进他的大胡子

里。伊莎多拉·邓肯怀着十分怜爱的激动心情注视着这老少三位。但是，她哪里知道，他们三个此时都已临近阴暗的“永不复返”之乡。

这时正是3月，伊莎多拉轮流在夏特莱剧院和特罗卡德罗剧院表演舞蹈。尽管她现在的生活堪称幸福之至，但是她仍然不断有一种奇怪的压抑感。

一天晚上，在特罗卡德罗剧院跳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由斯基恩用管风琴伴奏，伊莎多拉再次感觉到额头上有一股冰凉的冷气吹拂，还闻到一股

和上次同样的白晚香玉和丧礼之花的气味。

迪尔德丽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那小巧玲珑的身躯坐在中央包厢里，看着母亲跳这个舞蹈，突然哭起来，好像她的小小的心儿都碎了似的，哭喊道：“啊，我妈妈怎么那样伤心难过呢？”

这就是悲剧的前奏中最初一个微弱的音符。不久，这悲剧就结束了伊莎多拉·邓肯对一切自然的欢乐生活的全部希望——以后也不复再有。

伊莎多拉相信，虽然一个人看起来继续在生活，其实总有悲哀的事情发生来扼杀一切希望。一个人的肉体可以在世界上苟延残喘，但是人的精神是被压碎了——永远被粉碎了。

她曾听说，忧伤具有使人精神崇高的力量。而她只能说；我现实生活的最后那几天，在最终的灾祸降临之前，实际上是我精神生活的最后几天。

从此以后，伊莎多拉只有一个愿望：飞——飞——逃离那场灾祸带来的恐怖。以后的生活正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逃离那一切的飞逸，就好像那悲哀的犹太人到处流浪。而且，整个生活在她看来只是在幽灵的海洋上漂泊的幽灵之船。

心理上发生了什么事，常常在物质客体上反映出来。波瓦瑞为她设计的那套奇异而神秘的房间，在每扇金色的门都安上了一对黑十字。起初她认为这个图案别致而古怪，但是它逐渐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影响伊莎多拉了。

尽管看起来她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其实她的心里一直感到一种奇怪的压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现在，她夜里时常突然惊醒坐起，感到十分恐怖，因此常常通宵留着一盏灯不熄。

有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伊莎多拉仿佛看见床对面的双十字架上出现一个活动的人影，身被黑衣，走到床前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伊莎多拉吓呆了，半晌动弹不得，然后把所有的灯开亮。人影便突然不见了。但是这个奇怪的幻觉——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后来一次又一次地不时出现。

伊莎多拉深感苦恼，于是在一天晚上，当好友雷切尔·博耶夫人请她吃饭的时候，便告诉了她。

博耶夫人大为惊恐，以平素那样的好心坚持立刻打电话请她的医生来。她对伊莎多拉说：“你一定是神经上有点毛病。”

年轻漂亮的雷纳·巴德医生来了。伊莎多拉把这些幻象的情况告诉了他。

“您的神经显然是紧张过度了。您必须到乡下休息一些日子。”

“可是我得按照合同在巴黎演出呀！”她回答说。

“那好办，您去凡尔赛好了——那儿近得很。您可以乘汽车去，那里的空气对您大有好处。”

第二天，伊莎多拉把这些话告诉了孩子们的保姆。

保姆很高兴，说：“凡尔赛对孩子们来说是太好了！”

于是，他们准备了简单的行李。正准备动身的时候，伊莎多拉看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细长人影出现在大门口，慢慢地走过来。伊莎多拉心想：是我的神经过分紧张呢，还是那个晚上从双黑十字架上出现的人影呢？

她走到了伊莎多拉面前。

“我特意跑来看你。近来我一直梦见你，觉得非见你不可，”她说。

伊莎多拉这才认出了她，原来是被废黜的那不勒斯王后。刚刚几天以

前，她还带着迪尔德丽去看过她。

那天伊莎多拉说：“迪尔德丽，咱们要去看一位王后啦。”

“啊，那我得穿上节日的衣服，”迪尔德丽说。她总是这样叫波瓦瑞为她设计的一件小衣服，做工精致，镶满了绣花褶边。

以前，伊莎多拉曾费了一些工夫教迪尔德丽行真正的宫廷屈膝礼。她很高兴，最后又突然哭起来，说：“啊，妈妈，我害怕见真正的王后。”

小迪尔德丽想必以为她要被带到真正的宫廷去，就像到神话哑剧里见到的那种王宫里去。可是当她进了布洛涅树林边缘一所考究的小房子里，被引见给一位身材苗条、白发编成长辫盘在头上、雍容华贵的女人时，勇敢地行了个宫廷屈膝礼，然后笑着奔到伸出手臂的王后的怀抱里。她一点儿也不怕王后，因为王后是十分善良仁慈的。

这一天，王后穿着丧服来，伊莎多拉向她解释他们要到凡尔赛去和去的原因。

王后说她很乐意和他们一起去——这是个奇遇。路上，她忽然非常亲切地把两个小宝贝搂在胸前。

然而，当伊莎多拉看到两个金发的小脑袋给卷裹在黑衣里面时，她又一次感到近来常常体验到的那种奇怪的抑郁。

在凡尔赛，和孩子们一起愉快地吃了茶点后，伊莎多拉陪送王后回她的住处，见到了王后的妹妹。那是一个可爱、富有同情心和充满智慧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在特里安龙饭店的花园里醒来，所有的恐惧和不祥预感统统消失了。医生说得对，伊莎多拉需要的是乡村环境。可惜，要是希腊悲剧合唱队在这里的话，也许会唱个例子，诉说常有这种情况：采取相反的道路去躲避不幸，结果适得其反招致厄运，例如不幸的俄狄浦斯就是一个。如果伊莎多拉不到凡尔赛来逃避那使她惴惴不安的死亡预兆，孩子们也就不会在三天以后在同一条公路上遭到横祸身亡。

那天晚上，伊莎多拉的舞跳得与往常大为不同。她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欢乐的火焰——是一团火，是燃烧起来的星星之火，是从观众心中冒出来的滚滚浓烟——而且谢幕十几次之后，做为告别的节目，最后跳了《音乐瞬间》。

突然，她觉得好像迪尔德丽坐在她的肩膀上，帕特里克坐在另一边，非常平稳、非常快乐。当她在跳舞中左顾右盼的时候，看见他们带笑的、明亮的小脸——婴儿似的微笑——而她的腿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这一场跳完后，有一件意外喜事，几个月以前在埃及分手伊莎多拉就没再见过的帕里斯·辛格来到了化妆室。

那晚的舞蹈和重逢似乎使他深深感动，提议让伊莎多拉到香榭丽舍饭店的奥古斯丁套间去等他一起吃晚饭。

伊莎多拉去了，坐在摆好的餐桌前面等着。几分钟过去了——一小时过去了——他却没有露面。他这种态度使伊莎多拉紧张不安。尽管伊莎多拉知道他不是单身去埃及旅行的，但还是非常乐于见到他，因为她爱着他，并且盼望能让他看看自己已经长得很健壮的儿子。

但是到了三点钟他还没来，伤心失望之下，伊莎多拉返身回凡尔赛去和孩子们团聚。

跳舞时的心情激动，等待帕里斯·辛格时的心烦意乱，伊莎多拉精疲力尽，倒在床上就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早晨，当孩子们进来的时候，伊莎多拉才醒来。按照习惯，他们跳上母亲的床大叫大笑，然后才一起进早餐。

帕特里克比往常更加吵嚷，把椅子翻倒取乐，每翻倒一把椅子，就高兴得欢叫起来。

后来发生了一件异常的事情。头天晚上，有个人（伊莎多拉始终不知道是谁）给她送来两本装订精美的巴比·多瑞维利的著作。她随手从旁边的桌上拿了一本，正要责备帕特里克太吵闹了，偶然之间打开了书，目光立即落到这段话上：

美丽的人儿，养育出像你一样美丽的孩子！只要谁说到奥林匹亚山，你就发笑。为了惩罚你，神灵的利箭穿透了你那可爱的孩子们的头，而你赤裸的胸膛无法庇护他们。

保姆也说：“帕特里克，别那样闹，你打扰妈妈了。”

保姆是一位可爱的、善良的妇女，非常有耐心，并且她很喜欢这两个孩子。

伊莎多拉大声说：“啊，由他去吧，保姆。你想假使没有孩子们的吵闹，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伊莎多拉立刻产生了一种想法：要是没有他们，生活该有多么空虚、黑暗，因为他们已经使她的生活充满快乐。他们给予她的快乐，远远超过艺术所给予的，也千百倍于任何男人的爱情。接着她读下去：

当只剩下你的胸膛可以射穿的时候，你就贪婪地把胸膛转向发出打击的地方……你等待！然而，徒劳，高尚而不幸的女人！神灵的弓弦已经松开，他是在捉弄你。

你一生都这样等待在镇静的绝望中，在阴郁克制的绝望中等待。你从未发出人类胸膛惯于发出的悲号。你已木然痴呆。于是，人们就说，你已变成石头，这样来表达你的心灵不屈不挠，坚若磐石……

伊莎多拉合上了书，因为一阵突然的恐惧揪住了她的心。她张开手臂，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把他们紧紧搂住，眼泪夺眶而出。

那天早晨的每句话、每个动作，伊莎多拉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后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又一幕幕不断地重视，而且毫无希望地想：为什么没有出现幻象向我发出警告，得以防止要发生的事情？

那是一个温暖的灰朦朦的早晨。对着花园的窗户敞开着，可以看见花木刚刚吐露芬芳。在这一年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感到一种特殊的欢乐激情从和暖的初春降临心间。

她一面体验着春天带来的快乐；一面看着孩子们——他们多么娇嫩可爱、多么幸福。

她不由得心花怒放，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和他们一起翩翩起舞。三个人笑声不绝，保姆也面露笑容地在一旁看着。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帕里斯·辛格。他要伊莎多拉带着孩子进城去见他。

“我想看看他们，”他说。他四个月没有见过孩子了。

伊莎多拉很高兴，觉得这下子一定会使她渴望已久的和帕里斯·辛格重修旧好的愿望得以实现。于是，她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儿迪尔德丽。

小女儿大声喊道：“嘿！帕特里克，你猜咱们今天要去哪儿？”

（后来，伊莎多拉仿佛还一再听到她那稚气的声音：“你猜咱们今天要

去哪儿？”

可怜的、脆弱美丽的孩子们啊，伊莎多拉想，那天要是我知道有多么残酷的命运要降临到你们头上，该有多么好啊！那天你们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啊？）

接着，保姆说：“夫人，我想今天会下雨，恐怕最好是让孩子们待在这儿。”

（后来，伊莎多拉把保姆的此话视为一种警告，她咒骂自己对此毫不在意。然而当时她的想法是，和帕里斯·辛格见面时，如果孩子们在场将会方便多了。）

在乘汽车从凡尔赛到巴黎的路上，伊莎多拉把两个小小的身体搂在怀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新的希望与信心。她知道，当帕里斯·辛格看到帕特里克时，会忘记对自己的一切反感。而且，她梦想他们的爱情会死灰复燃。

帕里斯·辛格去埃及之前，在巴黎市中心买了一大片土地，打算在那儿给伊莎多拉的学校盖一座剧场——把剧场做为全世界所有大艺术家们聚会的场所和安乐窝。

后来，由于俩人发生了矛盾，这个计划便未付诸实施。此番去见帕里斯·辛格，路上伊莎多拉仿佛又看到了一丝希望。

不出伊莎多拉所料，帕里斯·辛格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他的小男孩，对迪尔德丽也很疼爱。他们在一家意大利餐厅非常愉快地吃了一顿午餐，吃了许多细条实心面，喝了许多香提美酒，并谈了那个未来的美妙的剧场。

帕里斯·辛格说：“它将命名为伊莎多拉剧院。”

伊莎多拉说：“不，它该叫做帕特里克剧院。因为帕特里克将是伟大的作曲家，他将为未来的音乐创作舞蹈。”

吃完饭以后，帕里斯·辛格说：“我今天感到很高兴，咱们何不到幽默家沙龙去？”

但是伊莎多拉约好了要排练节目，于是帕里斯·辛格带了那位跟伊莎多拉一起来的年轻朋友走了，而伊莎多拉带着孩子和保姆回到了纳伊。在剧场门口，伊莎多拉对保姆说：“你带孩子进来等着我，好吗？”

但是保姆说：“不，夫人，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孩子们需要休息。”

于是伊莎多拉吻了两个孩子，说：“我也很快就回来。”

小迪尔德丽把她的小嘴贴在汽车玻璃窗上，伊莎多拉俯身隔着玻璃口吻了她，冰冷的玻璃给伊莎多拉一种神秘可怕的印象。

伊莎多拉走进了她的大排练厅。时间还没有到，她想休息一会儿，便上楼到她的套间里，躺倒在长沙发上。旁边有许多花和别人送来的一盒糖，她拿了一块，懒洋洋地吃着，一面想：“不管怎样，我的确是很幸福的——也许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的艺术、成功、幸运、爱情，尤其是我可爱美丽的孩子们。”

她吃着糖，对自己微笑着，一面继续想着：“帕里斯·辛格回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这时候，一阵奇怪的、非人世所有的哭喊声传进她的耳朵。

回头一看，帕里斯·辛格在那里，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双膝一软，跌倒在她的面前。从他的嘴唇里吐出下面的话：

“孩子们……孩子们……都死啦！”

伊莎多拉·邓肯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浑身血液都凝固了，嗓子里在燃

烧，就像咽下了几块红炭似的。但是，她无法理解，她还是十分温柔地同他说话，极力要他平静下来，跟他说决不会有这回事的。

接着又进来了一些人，但是伊莎多拉仍不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人们害怕她受不了这一打击，一位医生说：“我一定把他们都救活。”伊莎多拉相信了他，想跟他一起去医院，但人们拦住了她，怕她发疯。但她精神亢奋，尽管四周的人都在哭，她却不哭，同时还想安慰别人。

后来，伊莎多拉·邓肯描述了她当时的心情和感觉：

在我们体外听见母亲的哭声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们降生的时候，一次是我们死去的时候。因为当我握住他们冰冷的小手，它们却再也不能回握我的手，这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哭声。就是这哭声，在孩子们出生的时候我也听到过。一个是极度喜悦的哭声，另一个是极度悲痛的哭声，为什么说是同一个呢？我不懂为什么，但我懂得二者就是同一个。

在茫茫宇宙之中，是不是只有一种伟大的哭声——创造者母亲的啼哭，是既包含着忧伤、痛楚，又包含着欢乐、狂喜的呢？

伊莎多拉没有穿丧服，她向来认为穿丧服戴孝是荒唐的，也没有必要。奥古斯丁、伊丽莎白和雷蒙德领会了她的愿望，在她的工作室里堆满了鲜花。

当她向孩子们和他们的保姆的遗体告别时，她极想看到一些舞姿，看到他们最后的笑脸。

回到纳伊的工作室，伊莎多拉·邓肯真想了此残生，而且做出了具体安排。

失去了孩子，她怎么活得下去呢？

可是，学校的小姑娘们围着她说：“伊莎多拉，为我们活下去吧。我们不也是您的孩子吗？”

这些话唤醒了伊莎多拉，使她想到有责任去减轻这些孩子们的悲伤——她们站在这儿为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死，心都碎了。

如果这种悲伤在伊莎多拉·邓肯早年生活里发生，她也许能够忍受，要是晚一些出现，也许不会这么可怕；但是它出现在她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那就完全瓦解了她的精神力。如果那时有什麼伟大的爱情使她沉浸其中，让它把她带走，那也有可能使伊莎多拉摆脱痛苦，可帕里斯·辛格对她的呼唤并没有响应。

雷蒙德和他的妻子佩内洛普要动身到阿尔巴尼亚去，在那些难民中间工作。他们劝伊莎多拉跟他们一起去。可伊莎多拉和伊丽莎白与奥古斯丁一起动身去了意大利。当他们到达米兰过夜的时候，被带进伊莎多拉四年前住过的那个房间，那时她内心极为矛盾，斟酌着生不生小帕特里克的问題。

当伊莎多拉又望着那幅画像上的女人那双不祥的眼睛时，她好像在说：“我的预言不是应验了么？——一切都走向死亡。”

伊莎多拉不禁毛骨悚然，赶快跑下楼到走廊上，央求奥古斯丁带她另找一家旅馆。

他们乘船从布林迪西启程，不久到达科孚。

大自然明媚秀丽，可是伊莎多拉却感不到一点安慰。和她在一起的人说她一连好些日子老是坐着发呆。她失去了时间观念——陷进一片灰朦朦阴郁沉闷的境地，根本不存在什麼生活和活动的愿望。

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到打击时，真正的悲哀是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的。伊莎多拉就像尼俄伯王后变为石头一样，坐在那儿渴望着在死亡中消

灭掉。

帕里斯·辛格当时在伦敦。伊莎多拉想：“只要他来看看我，也许就可以从死人般的麻木状态中解脱出来。也许只要感到温暖爱抚的手拥着我，我就可以苏醒过来。”

一天，伊莎多拉要求谁也不要打扰，拉上窗帘，独自在黑暗的房间里平躺在床上，双手紧紧交握在胸前。她已经到达绝望的最后边缘，反复念叨着打算给帕里斯·辛格的电报：

“来看我吧，我需要你。我快死了。如果你不来，我就随孩子们去了。”

她反复念着这些话，就像念连祷文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念下去。

半夜了，她仍旧辗转反侧，不能安眠。

第二天早晨，奥古斯丁叫醒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务请将伊莎多拉近况告知。我即动身前来料孚。

帕里斯·辛格。

这天以后，伊莎多拉怀着黑暗中出现一线光明的希望等待着。

一天早晨，帕里斯·辛格来了，面色苍白，神情激动不安。

他对伊莎多拉说：“我以为你死了。”

然后他告诉她，在她给他去电报的那天下午，他看见她出现在他眼前，像缥缈的幻影一样站在他床前，跟他说的话正是电报上写的话——“来看我吧……来看我吧……我需要你……要是你不来，我就死。”

当伊莎多拉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心灵感应，便产生了希望，希望通过一种自动的爱的表示，使不愉快的过去获得补偿，使她重新感到心灵的颤动。

然而，事与愿违，她的渴望太强了，帕里斯·辛格忍受不了。一天早晨，他突然不辞而别。

伊莎多拉·邓肯看着轮船渐渐远去，知道他一定在船上。眼望着轮船在碧波上远远逝去，又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她对自己说：“要么就是立即结束我的生命，要么就是必须想办法活下去，尽管日夜吞噬我的痛苦使我痛不欲生。”

因为每天晚上——不管是醒来还是睡着——她还是生活在那个可怕早晨的恐怖情景之中，听见迪尔德丽的声音：“你猜我们今儿去哪儿？”听见保姆说：“夫人，恐怕孩子们今天还是不出去的好。”

## 第九章 悲伤的余韵

像两个愁苦的幽灵，俩人各自默想着，彼此从对方身上找到一些安慰……

“给我一个孩子吧！”当他的热情倾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从悲痛与死亡之中被拯救出来了……

“苦命的伊莎多拉……你的孩子……死了……”

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和平时一样，十分热心。

“那儿整个国家都需要救济。农村一片荒芜，孩子们在挨饿。你怎么能安心在这儿只顾自己伤心呢？来帮助我们救济孩子们，安慰妇女们吧！”

他的恳求收到了效果。

伊莎多拉又一次穿上舞衣和凉鞋，跟雷蒙德到阿尔巴尼亚去了。

在那里，他采用独创性的方法组织了一个营地，来救济阿尔巴尼亚难民。他到市场上去买了一些生羊毛。

伊莎多拉说：“雷蒙德，你如何用这些生羊毛去解决他们的饥饿呢？”

雷蒙德说：“等一等你就知道了。要是我给他们带面包来，那就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可是我给他们带羊毛来，就可以解决以后的吃饭问题。”

雷蒙德组织了一个中心。门口写着：“愿来此纺羊毛者，每天可得一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名）。”

贫穷、瘦弱、饥饿的妇女们很快就排了一条长龙。她们用挣来的德拉克马可以买到黄玉米。

然后，雷蒙德又叫木匠做了些织机。他宣布：“谁愿意把纺好的羊毛织成布，一天挣一德拉克马。”

许多饥饿的人来要求于这种活。雷蒙德让她们织上古希腊的花瓶图案，很快在海滨就有了一支纺织女工队伍。他教他们合着纺织的节奏齐声合唱。当这些图案织成以后，就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床毯。

雷蒙德送到伦敦去卖，可以赚百分之五十利润。

然后，他用赚来的钱开办了一个面包厂，卖白面包，价钱要比希腊政府卖的黄玉米便宜一半。他就用这个办法建立起他的村子。

邓肯们住在海滨一顶帐篷里。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他们就到海里去游泳。雷蒙德不时有剩余的面包和马铃薯，因此他们就翻山越岭到另外一些村子里去，把面包等食物分给饥饿的人们。

阿尔巴尼亚有最早出现的供奉雷神宙斯的祭坛。他们称宙斯为雷神，因为这个国家无论冬夏都常有雷电和暴雨。伊莎多拉和雷蒙德等人常常穿着舞衣和凉鞋，冒着雷雨长途跋涉。伊莎多拉觉得，被雨淋洗一遍要比穿着雨衣散步痛快得多。

在那里，伊莎多拉看到许多悲惨的情景。一位母亲坐在树下，怀抱婴儿，身旁围着三四个小孩子——一个个饿着肚子，无家可归。他们的家被烧掉了，她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被土耳其人杀害了，牲畜被抢走了，庄稼被毁灭了。于是这位母亲就带着她剩下的孩子坐在那里。像这样的一些人，雷蒙德分给他们许多袋马铃薯。

回到营地的时候，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但是精神上却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

当地没有理发师，所以伊莎多拉第一次自己把头发剪掉扔在海里。

当她的精力和健康恢复以后，就不能再生活在难民中间了。艺术家的生活和圣徒的生活有着很大不同。她心中的艺术生活死灰复燃。

伊莎多拉·邓肯感到必须离开这么多山、多岩石、多雷雨的国家。一天，她对佩内洛普说：

“我不能再目睹这一切悲惨的景象了。我渴望伴着寂静的孤灯，踏着波斯地毯，坐在伊斯兰教寺院里。我对走过的道路实在是厌倦了。你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君士坦丁堡吗？”

佩内洛普非常乐意。

于是，她们换上朴素的衣装，乘船去了君士坦丁堡。白天，伊莎多拉照例待在甲板上她的客舱里。晚上，当别的乘客都入睡之后，她围上一块头

巾，走出房间，来到月光下。

这时，有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靠在船舷，凝视月色。他穿着一身白，连手套也是白羊皮的。他手里拿着一本小小的黑皮书，不时地看上两眼，口里念念有词，像背诵祈祷文似的。他面容苍白而憔悴，但镶着两颗黑黑的大眼睛，头发乌黑发亮。

伊莎多拉走近时，那个陌生人对她说：

“我冒昧地跟您讲话，因为我和你一样悲伤。我正要回到君士坦丁堡去安慰我的母亲，她遭到极大的折磨。一个月以前，她听说我大哥自杀了，两星期后，又是一出悲剧——二哥也自杀了。我是她仅剩的一个儿子了。可是我怎样才能安慰她呢？我自己也绝望到极点，不如跟我哥哥一死了之。”

俩人一起谈着。他对伊莎多拉说他是话剧演员，手里的小册子是《哈姆莱特》，他正在研究要扮演的这个角色。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甲板上见面了。像两个愁苦的幽灵，俩人各自默想着，彼此从对方身上找到一些安慰，一直逗留到天亮。

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后，伊莎多拉和他分手了。一位身穿重丧服的高个子漂亮妇女来迎接他。

伊莎多拉和佩内洛普下榻在佩拉王宫饭店。头两天，她们周游了君士坦丁堡全市，主要是观光街道狭窄的旧城。第三天，一位不速不客——船上那位伤心朋友的母亲，就是在车站接他的那位妇女——来见伊莎多拉。她显得万分痛苦，把死去的两个儿子的照片给伊莎多拉看，并说：“他们去了，没法把他们追回来了，但是我到这儿来求你帮助我挽救最后这一个——拉乌尔。我觉得他正去走他哥哥们的老路。”

“我能做些什么呢？”伊莎多拉说，“他危险到什么程度呢？”

“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独自住在圣斯提凡诺小村的一所别墅里。从他离开时绝望的表情来看，我感到凶多吉少。你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因此我认为你可以使他明白自己行动的错误，让他可怜他的母亲，回到生活里来吧！”

“可是他到底为什么要往死路上走呢？”伊莎多拉问道。

“我不清楚，也不知道他两个哥哥为什么要自杀。他们都年轻，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寻死呢？”

这位母亲的哀告深深打动了伊莎多拉，她答应到圣斯提凡诺村去，尽她的努力使拉乌尔清醒过来。

饭店的侍应告诉她，去那里的路很不好走，坐汽车几乎不可能。于是，她到港口去租了一条小拖船。

那天有风，波斯普鲁斯海峡波浪滔滔，然而他们还是安全地到达了那个小村，并照他母亲所指示的，找到拉乌尔的别墅。

那是一所白色房子，坐落在古老公墓附近的一个很偏僻的花园里。

没有门铃，伊莎多拉敲了敲门，可是没人答应。她推门试试，门是开的，于是她走进去。底层的房间空无一人，她走上一小段楼梯，打开另一扇门，发现拉乌尔在一小间粉刷过的房间里。

白色的墙、白色的地面、白色的门。他躺在铺着白床单的沙发床上，和伊莎多拉在船上见到时一样，穿着一身白，戴着雪白的手套。床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只水晶花瓶，里面插着白色的百合花，旁边放着一支手枪。

伊莎多拉相信，他至少有两三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仿佛身在遥远的地方，连她叫他的声音都没法听见。伊莎多拉尽力把他摇醒，说他母亲为了他两个哥哥的死，心都碎了。

最后，她设法用手拉住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拉上了等在那里的小船——小心地把手枪留在他屋里了。

一路上，他不停地哭，不肯回到他母亲那里去。于是，伊莎多拉就劝他到佩拉王宫饭店她那里去。后来，伊莎多拉设法探问他这样异常悲伤的原因。因为在她看来，即使他哥哥的死也不是他这么难受的原因。

终于，他低声说了：

“对，你说对了，不是因为我两个哥哥的死，而是因为西尔维奥。”

“西尔维奥是谁？她在哪儿？”伊莎多拉问。

“西尔维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他回答说。“现在在君士坦丁堡跟他母亲在一起。”

当弄清了西尔维奥是个男子，伊莎多拉惊愕不迭。

伊莎多拉决心尽力挽救拉乌尔的性命，所以就不再谈这个话题，直截了当问他：

“西尔维奥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她问。

很快，伊莎多拉就在电话上听到了西尔维奥的声音——声音很甜。她说：“你必须立刻到这儿来。”

不一会儿，西尔维奥就来了。他是个大约十八岁的少年。

他们在一起吃饭，后来站在阳台上极目眺望，观赏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美景。

伊莎多拉看到拉乌尔和西尔维奥在一起温柔亲切地密谈，心里非常高兴：拉乌尔的生命暂时得救了。她给他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那可怜的女人喜出望外，不知怎样感激伊莎多拉才好。

当晚和这两位朋友告别以后，伊莎多拉觉得救了这个美丽的孩子的性命，是做了一件好事。

可是没过几天，那位母亲又六神无主地找她来了。

“拉乌尔又回到圣斯提凡诺的别墅去了。你必须再救他一次。”

伊莎多拉实在不堪其负担，然而她不忍拒绝那位可怜母亲的哀求。不过这次她觉得坐船太不平稳，决定冒险坐汽车去。她打电话给西尔维奥，告诉他必须和她一起去。

“你们这次又闹什么别扭啦？”伊莎多拉问他。

“啊，是这么回事，”西尔维奥说。“我真心真意爱拉乌尔，可是我不能说我爱他就像他爱我那么深，所以他说他宁愿不活了。”

他们在太阳下山时出发，经过一路的颠簸摇晃，到了那个别墅。伊莎多拉直闯进去，又一次把忧郁消沉的拉乌尔带回旅馆。她和佩内洛普一起研究怎样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治好拉乌尔的怪病，一直讨论到深夜。

第二天，伊莎多拉和佩内洛普在君士坦丁堡古老的街上闲逛。在一条又暗又窄的小巷里，佩内洛普指着一块招牌给伊莎多拉看。这是用亚美尼亚文字写的，佩内洛普能翻译，说这儿住着一位相师。

佩内洛普说：“咱们去算算命吧！”

她们走进一所很旧的房子，登上弯弯曲曲的楼梯，走过堆着陈年垃圾的走廊以后，见一个老妇人蹲在一口发出一股怪味的大锅旁边。她是亚美尼

亚人，但是能说一点希腊话，所以佩内洛普能听懂她的话。她告诉她们，当年土耳其人进行最后一次大屠杀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她亲眼看着她的儿子、女儿、孙子，甚至最小的婴儿都惨遭杀戮，从那时起，她就有了的一种超人的明见，能预知未来。

伊莎多拉通过佩内洛普问她：“您算算我的未来如何？”

老妇人在这口锅冒出的烟里找了一会儿，说出几句话。

佩内洛普翻译给伊莎多拉听：

“她向你致敬，说你是太阳神的女儿。你是派到人间来给人们以巨大的快乐的。在这种快乐之中将创立起一种宗教。经过到处游历之后，在你的晚年，你将在全世界修建很多神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将回到这个城市，在这儿修建一座庙宇。所有这些庙宇都是供奉美神与快乐之神的，因为你是太阳神的女儿。”

当时伊莎多拉正在悲哀和绝望之中，这种诗一般的预言，叫她好生奇怪。

然后，佩内洛普问道：“我的未来怎样呢？”

她对佩内洛普说着的时候，伊莎多拉发现后者的脸色变得苍白，像是极端恐惧的样子。

伊莎多拉问她：“她跟你讲些什么？”

“她说的话使人十分不安。”佩内洛普回答说。“她说我有一头小羊羔——意思指我儿子梅纳尔卡斯。她说：‘你还想要一只羊羔，’——那一定是指我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女儿。但是她说，这个愿望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还说我会很快就会收到一封电报，说我爱的一个人病得很厉害，我爱的另一个人快死了。后来，”佩内洛普接着说，“她说我的命不长了，不过我要在一处高高的地方俯视世界，做最后的沉思，然后离开这个世界。”

佩内洛普完全心烦意乱了，给了老妇人一些钱，拉着伊莎多拉的手简直是跑着通过走廊。下了楼梯来到狭窄的街上，她们赶忙叫了一辆马车回到旅馆。

刚进旅馆，门房就递上一份电报。佩内洛普倚在伊莎多拉手臂上，几乎晕倒。

伊莎多拉把她送进她房间里后，立即打开电报。上面写着：

梅纳尔卡斯病重，雷蒙德病重。速归。

佩内洛普简直发狂了。她们赶忙把东西扔进旅行箱里，然后打听什么时候有船。

门房说有一艘船黄昏时起锚。

尽管她们匆匆忙忙，伊莎多拉没有忘记拉乌尔的母亲，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您想救您孩子的命，他必须立即离开君士坦丁堡。别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的话，请把他带到我乘的船上，船将于今天下午五点启航。”

伊莎多拉·邓肯没有收到回音。开船的时候，那个拉乌尔拿着个手提箱，半死不活地匆忙走舷梯来到船上。伊莎多拉问他有没有船票或者舱位，他都没有想到过。幸好，船长挺好说话，与人方便，因此伊莎多拉和船长商妥，让拉乌尔住到她那套间的起居室，因为船上没有空舱位了。

她们回到家后。雷蒙德和梅纳尔卡斯正在发高烧。伊莎多拉尽力说服雷蒙德和佩内洛普离开阿尔巴尼亚，和她一起走。可是雷蒙德死活不愿意离

开他村子里的难民，佩内洛普自然也不想离开他。因此，伊莎多拉被迫把他们留在那里。

船继续开。伊莎多拉和拉乌尔都非常不愉快，他的眼泪没有干过。由于伊莎多拉怕坐火车同其他的乘客接触，就发电报让她的小汽车来接他们。然后，他们乘汽车向北，翻山越岭，直奔瑞士。

他们在日内瓦湖畔停留了几天。伊莎多拉和拉乌尔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互相认为是好旅伴。在湖上泛舟玩了几天，最后，伊莎多拉好不容易才迫使拉乌尔保证，为了母亲的缘故，不再企图自杀。

就这样，一天早晨，伊莎多拉送他上火车回到他的剧院去。从此以后，她再没见到他。不过后来她听说他一帆风顺，因表演哈姆雷特而大获成功。对此，伊莎多拉能理解，因为她觉得再也没有人比可怜的拉乌尔对“生存还是毁灭？”这句台词理解得更深刻，说得更好的了。

一个人留在瑞士，伊莎多拉·邓肯陷入烦闷忧郁之中。由于焦躁和不安，她坐上小汽车走遍了瑞士，最后，凭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开车直奔巴黎。

她完全孤身一人，因为她已经不可能和任何人交往。甚至特地到瑞士来陪她的奥古斯丁也没有能力消除她的愁苦。

伊莎多拉到了这种地步，甚至听到人的声音都产生反感，而当人们到她房间里来的时候，也好像离她很远，不像是真实的。

就这样，一天晚上，她回到巴黎，回到纳伊她以前住的那所房子。这个地方现在很荒凉，只有一个老头住在门房里照管花园。

走进宽敞的工作室，一看见蓝色幕布，她立时想起自己的艺术和工作。于是，伊莎多拉决心奋力回到艺术上去。为此，她请来亨纳·斯基恩为她弹琴。但是，熟悉的琴声只能挑起她对往事的回忆，她哭泣起来。

这是伊莎多拉第一次哭泣。这里的一切只能把她带回到往昔欢乐的日子，因而使她伤心不已。很快伊莎多拉就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歌唱。

一天，偶然走进他们住过的那间小房子，看到他们穿过的衣服和玩过的玩具到处乱放，伊莎多拉的心都碎了，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在纳伊住下去了。

她坐上小汽车，直奔南方。只有开着汽车，以每小时七十至八十里的速度飞驰的时候，才能使她日夜经受的难以言状的痛苦有所减轻。

伊莎多拉·邓肯越过阿尔卑斯山，驶入意大利，继续她的漫游。她时而在威尼斯运河上泛舟，让船夫整夜地划，时而在里米尼古城里徘徊。

她曾在佛罗伦萨过了一夜，知道以前的一个情人住在这里，很想找他来。但是她知道他现在已经结婚，而且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来了，只能引起他家庭不和。伊莎多拉便克制住了。

一天，在海滨的一个小城里，伊莎多拉收到一封电报：

伊莎多拉，据悉你在漫游意大利。我恳求你到我这里来。我一定尽力安慰你。

这是埃莉诺拉·杜丝发来的。

伊莎多拉不知道埃莉诺拉怎么会发现自己住在这儿，但是当她看到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便觉得她是自己唯一想见的人。

她回电致谢，说自己不久就到，然后立即驱车启程。

埃莉诺拉所在的地方离伊莎多拉住的小城不远。她到的时候，正赶上了一场雷雨。埃莉诺拉住在远郊一所小别墅里，不过她在格兰特大酒店给伊莎多拉留了一张条子，请她到她那儿去。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乘车去见杜丝。

她住在一所玫瑰色别墅里，位于一个葡萄园后面。小径上葡萄成荫。她姗姗走来迎接，就像光采奕奕的天使。一把搂住伊莎多拉，美丽的眼睛无限深情和厚爱地望着她，使伊莎多拉的感觉犹如但丁在天国乐园里遇见登入仙籍的贝雅特丽斯一样。

以后伊莎多拉就住在那儿了，因为她从埃莉诺拉眼睛的光辉里得到了鼓舞。

埃莉诺拉常常把伊莎多拉抱在怀里轻轻摇着，抚慰她的痛苦。她不仅安慰伊莎多拉，而且把伊莎多拉的悲伤注入了她的心怀。

伊莎多拉·邓肯意识到，以前所以不能和别人共处，是因为那些人都 在演戏，演得滑稽：说是要竭力使她忘掉过去，借遗忘而振作起精神来。而埃莉诺拉却对她说：“给我谈谈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吧。”并且让她把他们天真的语言和习惯都讲给自己听，还让她把孩子们的照片都拿给自己看。埃莉诺拉吻着照片，流下了眼泪。她从来不对伊莎多拉说“不要悲伤”，而是和她一起悲伤。

孩子们惨遭不幸以后，伊莎多拉还是第一次感到有人为自己分担悲哀。埃莉诺拉的确超乎常人，心胸无比广阔，装得下整个世界的悲剧。她们经常一起在海边散步，伊莎多拉觉得埃莉诺拉的头就像在众星之中闪闪发光，她的手可以直达高山之巅。

一次，埃莉诺拉望着那高山对伊莎多拉说：

“你看那克罗采山两侧峻峭嵯峨的削壁悬崖，它们在郁郁葱葱的吉拉登山坡之旁，对比阳光下的万紫千红，显得何等阴森可怖！但是只要你再往黑暗突兀的克罗采山峰之顶望望，你就可以发现有白色大理石在发射光辉，等待着雕塑家去把它变成永垂不朽的作品。吉拉登山产生的仅仅是人世间需要的履足之物，而克罗采山峰却鼓舞着人的梦幻。

艺术家的生活就是如此，黑暗、忧愁和悲剧虽在其中，但是它给人以雪白的大理石，从而萌发人的灵感。”

埃莉诺拉热爱雪莱。9月末，暴风雨常至。有时，在闪电划破天空，掠过深暗的波浪之际，她就指着大海对伊莎多拉说：

“看吧！这是雪莱闪亮一生的余辉——他就在这儿，漫步在波尖涛顶之上。”

旅馆里总有一些旅客盯着伊莎多拉看。她不胜其烦，就去租了一栋别墅。

那是一座红砖砌的宽大房子，深深隐藏在一片忧郁的松林里，周围院墙高耸。屋外荒僻黯淡，屋内更显得凄凉。屋顶上有一个大的露天凉廊，一边可以眺望大海，另一边可以眺望远山。

这个至少有六十个房间的阴暗住所，是伊莎多拉一时高兴租下来的，大概是周围浓密的松林和从凉廊上看到的奇妙景色吸引了她的缘故。

伊莎多拉问埃莉诺拉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住在这儿。她婉言谢绝了，但从她那夏季别墅搬到与伊莎多拉邻近的一栋小白屋住下。

杜丝与朋友通讯来往有一个异常出奇的特点。如果朋友住在外国，她只是间或给其发一封长长的电报；可是，如果朋友住得近，她就差不多每天都写一封短筒，全部内容只有一两句极为动人的话，有时候一天给她或他去两三封这样的信。伊莎多拉收到信以后，就去和她见面，一同在海边散步，杜丝常说：“舞蹈悲剧神和诗的悲剧神在一起散步。”

一天，伊莎多拉和杜丝在海边散步。“伊莎多拉，”杜丝语带硬咽地说，“你别，别再去追求什么幸福了。你眉宇之间已有迹象表明你将是世界上最不幸者之一。你遭遇的不幸只不过是序幕而已。可别再拿命运去冒险了。”

杜丝当时正当盛年，风姿绝世，聪明能干。她在海滨散步的时候，高视阔步，气宇轩昂。她不穿紧身胸衣，身材那样高大而丰满，也许会使赶时髦的情人望而却步。然而她表现出一种高尚的威严气概。她的一切都表现出她伟大而受苦的心灵。她经常给伊莎多拉朗读希腊的悲剧或者莎士比亚的戏剧。每当听到她朗诵《安提戈涅》的台词的时候，伊莎多拉便想：她这样美妙的表演居然不为世人所知，简直是罪过。

杜丝是在她的艺术炉火纯青之时长期退出舞台的，有人以为她是由于情场失意或者其他感情上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她身体有病，其实都不对。她长期辍演，是由于她得不到帮助，或者说没有财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艺术理想——这才是真实的原委。

这个所谓热爱艺术的世界，竟然让这位世界最伟大的女演员在孤独和贫困之中凄惨地过了十五年之久。等到莫里斯·盖斯特终于认识到她的天才，和她订了合同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为时已晚了，因为她在前一次巡回演出中就去世了。那次她举行巡回演出，是为了拼命攒钱，凑齐她长年辍演一直希望获得的款项，好继续她的事业。

伊莎多拉·邓肯租了一架大钢琴，放在别墅里，然后打电报给她忠实的朋友斯基恩。

他立刻就来了。

埃莉诺拉酷爱音乐，斯基恩每天晚上为她弹奏贝多芬、肖邦、舒曼、舒伯特的乐曲。

有时她以一种低沉的、音调极其优美的声音唱她最喜爱的歌曲——《寻找坟墓》，当唱到最后一句——“负心人……负心人”的时候，她音调和表情都充满了深刻的悲哀和谴责，使人涕泪纵横。

一天傍晚，伊莎多拉突然起来叫斯基恩弹琴，自己跳贝多芬《悲枪奏鸣曲》中的“柔板”来给杜丝看。

这是从4月19日以来伊莎多拉第一次跳舞。杜丝非常感激，把她拥在怀里，不住地吻她。

“伊莎多拉，”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应当回到你的艺术中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埃莉诺拉知道，几天以前伊莎多拉收到一封信，信中请求她订合同去南美旅行演出。

“你就同意订合同吧！”她怂恿伊莎多拉说。“生命是多么短促，没多少年可以这样无聊地等待下去——无聊——除了无聊，还是无聊！你摆脱忧伤和无聊吧——摆脱吧！”

可是，伊莎多拉的心情实在太沉重了。在埃莉诺拉面前，她可以随便动手脚，可是要重新走到观众面前去献技，是做不到的，她的心每一搏动都

是对那两个孩子的呼唤。

有埃莉诺拉陪着的时候，伊莎多拉得到了安慰。但是夜里剩下她一个人，待在寂寞的别墅里，听着每间阴暗的房间发出空洞洞的回音，她只能独自熬过，盼着天明。天一亮，她赶紧起床到海里去游泳，尽量游得远一点，远得回不到岸边来才好。

一个阴暗秋日的下午，伊莎多拉独自在沙滩上散步。走着走着，她突然看见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身影正在前面手拉手走着。她喊他们，但是他们一边笑一边跑，让她刚好赶不上。她跟在后面追——一面跑着，一面喊叫他们。突然，他们消失在浪花之中，一阵恐惧袭上伊莎多拉的心头。

“这是我孩子们的幻影——我疯了吗？”伊莎多拉想。那阵子，伊莎多拉时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一只脚踩在疯狂和神智健全的分界线那里了。

伊莎多拉感到痛苦绝望，扑倒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不知在那儿躺了多久，伊莎多拉感到有只怜悯的手在她头上抚慰着。她向上一看，见了一个人像意大利西斯廷教堂的默祷塑像一样站在那儿。

这个男人刚从海里游泳上来。他对伊莎多拉说：

“为什么您总是哭泣？我是不是可以稍尽心意，帮助您呢？”

伊莎多拉望着他。

“好吧，”她回答说。“您救救我——不是救我一命，而是救救我的理智，比我的生命还宝贵。给我一个孩子吧！”

那天傍晚，他们一起在伊莎多拉别墅的屋顶凉廊上站了很久。

太阳西落在水天之际，月亮正在升起，月光如水，倾泻在大理石般的山坡上。当伊莎多拉感觉到他年轻力壮的手臂紧紧搂着自己，嘴唇贴着自己的嘴唇的时候，当他的热情倾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从悲痛与死亡之中被拯救出来了，被带回到光明的乐土——她重新回到了爱情的怀抱。

第二天早晨，伊莎多拉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埃莉诺拉。

埃莉诺拉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她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尽管她非常不乐意会见陌生人，却宽宏大量地答应伊莎多拉把她的新情人介绍给她。她们访问了他的工作室——他是个雕塑家。

“你的确认为他是个天才吗？”看了他的作品以后，埃莉诺拉问伊莎多拉。

“毫无疑问，”伊莎多拉回答道，“也许他就是第二个米开朗基罗。”

伊莎多拉·邓肯几乎相信新的爱情会战胜悲伤。那时，连续不断的可怕痛苦已经把她折磨到无可奈何的地步。但这桩情事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伊莎多拉的情人属于一个家规很严的意大利家庭。他已经和一个姑娘订了婚，而对方的家庭也是同样古板的。他最初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伊莎多拉，可是有一天他给她写信，把话挑明，然后就告辞走了。

伊莎多拉一点也不生他的气。她觉得他已经解救了她的理性，从那以后她知道自己不再孤独了，并且从此进入了一种强烈的幻想状态。她觉得两个孩子的灵魂在自己身边徘徊——他们要回到人世间来安慰她。

秋天快要来到，埃莉诺拉搬到她佛罗伦萨的公寓去了。伊莎多拉也放弃了那死气沉沉的别墅，先到佛罗伦萨，然后到罗马，打算在那儿过冬。

她在罗马过了圣诞节，光景十分凄凉，但是她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我并没进坟墓或者疯人院——我还在这儿。”

斯基恩仍然和伊莎多拉在一起。他从来不问什么，从来不怀疑什么，只是把他的友谊、崇敬，还有他的音乐奉献给伊莎多拉。

对于一个忧伤的心灵来说，罗马是一个奇妙的城市。雅典五光十色，又尽善尽美，可只能加深她的痛苦。而罗马却到处都有伟大古迹、陵墓和激动人心的纪念碑，尽是古怪先贤的见证——这就是很好的止痛剂。

伊莎多拉特别喜欢清晨在亚皮安古道上漫步。古道两边坟墓垒垒，从弗拉斯卡蒂来的运酒的大车，载着醉眼朦胧的酒客，好像疲倦的农牧之神斜靠在酒桶上。她觉得时间好像停止了，自己恰似一个幽灵，已经在亚皮安古道上游荡了上千年。有时候她面向天空。高举双臂，就像坟墓丛中游荡的一个悲惨的幽灵翩然起舞。

晚上，伊莎多拉和斯基恩常常信步前往喷泉边逗留。这儿有很多喷泉，发源于山间，长流不息。她喜欢坐在喷泉边听流水潺潺鸣溅，时常在那儿默默地流泪，她的伙伴则同情地紧握住她的双手。

一天，帕里斯·辛格发来一封长电报，使伊莎多拉从这种悲伤徘徊中醒过来。

他以她艺术的名义，恳求她回巴黎。

在这封电报的感召之下，伊莎多拉坐火车回巴黎。

帕里斯·辛格为伊莎多拉在克里戎饭店准备了一套豪华客间，可以俯瞰协和广场，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伊莎多拉把她神秘地梦见孩子们复活、回到人世的情形告诉了他。

他两手捂住脸，似乎经过一番斗争之后，说：

“我 1908 年与你初次相识，是想来帮助你的，然而我们的爱情造成了悲剧。现在，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愿建立你的学校吧，让我们在这个悲哀的世界为别人创造美吧。”

然后，他告诉伊莎多拉，他在贝尔维买了一座大旅馆，从它的高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巴黎，饭店的花园顺坡而下直至河岸，房间可以容纳一千名儿童。现在，只要伊莎多拉一句话，这所学校就可以永远办下去。

“只要你愿意把一切个人感情撇在一边，目前只为一个理想而生活……”他说。

伊莎多拉同意了他的意见。

第二天早晨，他们参观了贝尔维。

从此，伊莎多拉指挥一些装饰家和工匠，把这所饭店改造成为一所未来的舞蹈圣殿。

伊莎多拉·邓肯在巴黎市中心举行了一次选拔考试，选出了五十名新的预备生。此外，还有原来舞蹈学校的学生，再加上女保育员。

舞蹈教室就是原来饭店的餐厅，挂上了蓝色幕布。在长长的房间的中心，伊莎多拉搭了一个平台，有梯子可供上下。这个平台供参观者使用，有时创作舞蹈的人来试演他们的作品也坐在这里。

伊莎多拉认为，普通学校的生活之所以枯燥乏味，部分原因是地板都在一个平面上。

因此她在好多房间之间建造了小通道，一边通上，一边通下，把餐厅修整成伦敦英国下议院的样子，一排排的座位分层排列，分成两边，渐次向上延伸。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和教师坐在较高的座位上，小朋友们坐较低的座位。

在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中，伊莎多拉又一次找到了从事教学的勇气，而学生们学起来简直神速得惊人。开学不过三个月，他们的进步使来看他们的所有艺术家都为之惊叹，赞赏不已。

每星期六是“艺术家之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为艺术家们举行公开课，然后按照帕里斯·辛格通常的习惯，举行一次盛大的午宴，款待艺术家和孩子们，请他们共同赴宴。如果天气好，宴会就在花园里举行，餐后有音乐演奏、诗朗诵和跳舞。

罗丹就住在对面默东的小山上。他常来作客，一来就坐在舞蹈练功室，给正在跳舞的姑娘们、孩子们速写。

有一次，他对伊莎多拉说：

“要是我年轻时有这么好的模特儿就好了！这是能活动的模特儿，按照自然和谐的规律活动的模特儿！美丽的模特儿我倒是有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您的学生这样懂得运动的科学。”

伊莎多拉给孩子们买了五光十色的披肩。当他们离开学校到森林里去散步的时候，当他们跳舞和跑步的时候，简直就像一群美丽的小鸟。伊莎多拉相信，贝尔维这所学校将永远存在下去，自己应该在这儿干一辈子，把自己工作的一切成果留在这儿。

6月，他们在特罗卡德罗举行了一次狂欢节。伊莎多拉坐在包厢里看学生表演舞蹈。

有些节目一演完，观众就站起来热烈欢呼。闭幕的时候，他们不住地鼓掌，不肯离去。

这些孩子虽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舞蹈家或者演员，却受到非同寻常的热烈欢迎。

贝尔维的生活从早晨起就是一片欢腾。孩子们脚步在走廊上匆匆走过，同时可以听到他们一齐歌唱的声音。待伊莎多拉下去，她们已在舞蹈室里，见到她就大声喊叫。

“早上好，伊莎多拉！”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谁还会愁眉不展呢？虽然伊莎多拉时常在他们中间寻找她失去的两副小脸蛋儿，找不到就回到自己房间里独自哭泣。但她还是有勇气每天教孩子们跳舞，而他们跳得那么优美可爱，又鼓舞了她生活下去。

每周都有一批艺术家带着速写本到贝尔维来，因为那所学校已经证明是艺术家汲取灵感的一个源泉。伊莎多拉想通过学校在美术家和他的模特儿之间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并且通过学生合着贝多芬、凯撒·弗兰克的音乐跳舞，用舞蹈来表演希腊悲剧的大合唱，或者朗诵莎士比亚的剧作。模特儿再也不是那种干巴巴地坐在画家工作室里的可怜的小傻瓜，而是一种表现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最高形式。

为了更充实这些理想，帕里斯·辛格设想建立一所剧院，恢复那悲剧性的夭折的设想，就建造在贝尔维小山上。他想把它建成了所狂欢节日剧场，使巴黎人能在盛大的节日到此狂欢。他还要给剧场配备一个交响乐队。

他又一次把建筑师路易斯·休请来，早已束之高阁的剧院模型又重新拿出来，放在图书馆里，地基也标定了。

伊莎多拉又希望在这所剧院里实现她的梦想，把音乐、悲剧和舞蹈各种艺术以其最纯洁的形式溶合在一起。在这个剧场里，穆奈-萨利、埃莉诺

拉·杜丝或者苏珊·德勃雷将表演俄狄浦斯、安提戈涅或者埃列克特拉，她的学生们将为这些剧的合唱部分表演舞蹈。她还希望用一千名学生来表演第九交响乐，以庆祝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她在心里描绘着：有一天，孩子们像雅典娜女神那样从山上下来，登舟河上。在残废院上岸，继续她们神圣的朝圣，向先贤祠前进，去悼念伟大的政治家或者英雄人物。

伊莎多拉·邓肯每天教几个钟头，累得站立不住的时候，就靠在长沙发上，用手和臂做动作教他们跳。她的教学本领确实有点神奇，只要一伸手，指指她们就跳起舞来，甚至不像是在教她们跳舞，倒像是开拓了一条道路。让舞蹈之神降临，鼓舞她们。

她的哥哥奥古斯丁有时给学生们朗诵莎士比亚剧作中的片段，或者拜伦的长诗。邓南遮对学校也很热心，经常和她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学校最早毕业的那一小批学生，现在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们帮伊莎多拉教小同学。

看到姑娘们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她们在自己的教导下增长了知识，伊莎多拉信心百倍。

可是，到了1914年7月，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压抑气氛，伊莎多拉和孩子们都感觉到了。

当他们站在学校高台上眺望巴黎城的时候，孩子们经常沉默不语，感到郁闷。

天空中乌云密布，一种可怕的沉闷笼罩着大地。这时已经再次怀孕的伊莎多拉觉得怀着的孩子的活动也微弱了，不像过去两个孩子那样有劲。

7月中旬，帕里斯·辛格提出把学生送到英国德文郡他家里去过假期。

于是，在一天早晨，全体学生分别来向她告别。她们要在海滨度过8月，9月回来。

学生们走后，整个房间空旷异常，尽管伊莎多拉强打精神，还是摆脱不掉寂寞沮丧。

她总是觉得累，总爱坐在台阶上眺望巴黎，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而且越来越感到有什么危险从东方步步逼近。

一天早上，奥国皇太子斐迪南被刺的凶讯传来，整个巴黎陷入惊慌恐惧之中。

这是个悲剧性的事件，是以后更大悲剧的先兆。

皇太子一向是伊莎多拉的艺术和学校的好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她大为震惊和悲恸。

伊莎多拉哪里会知道，当她正在筹划使戏剧艺术重新振兴，计划举办人间盛大欢乐陶醉的狂欢节的时候，另一些力量却在策划战争，带来死亡和灾难。

8月1日，伊莎多拉感到了分娩前的初次阵痛。在她房间的窗户下面，人们在大声叫嚷战争动员的消息。天气很热，窗户开着。伊莎多拉的喊声、痛苦呻吟和挣扎呼唤，同外面隆隆鼓声与叫喊声混杂在一起。

朋友玛丽搬来一个摇篮，四面挂着白纱帐幔。伊莎多拉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摇篮。她确信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又回到她身边来了。

外面的鼓声咚咚响个不停，动员——战争——战争。

“打起来了吗？”她想知道，但眼前最要紧的是生下孩子。

一位陌生的医生代替了她的朋友博松大夫，因为他接到动员令已被征

召入伍。这位大夫不停地说：“夫人，坚持、坚持住！”

终于，伊莎多拉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在怀孕的一年里，她一直担心受怕，十分惶恐；现在，巨大的欢乐震撼着她，一切不幸转瞬就无影无踪了。哀恸、悲伤与眼泪，长期的等待和痛苦，都由于这一巨大的欢乐而得到了补偿。

鼓声仍然不断传来，“动员——战争——战争”。

“战争爆发了吗？”伊莎多拉心中纳闷。“但是，跟我有何相干？我的孩子在这儿，安然无恙躺在我怀抱里。现在，让他们去打吧，关我什么事？”

门窗外面，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女人的哭声，喊叫声，议论大动员声，到处可闻。可是伊莎多拉·邓肯把孩子抱在怀里，快乐得超乎一切，如登天堂一般。

晚上，她的房间里挤满了来祝贺的人。她把孩子抱在手里，他们对她说：“现在你又快乐了。”

祝贺的人们——离去，伊莎多拉独自和小宝宝在一起，轻轻地对他说：“你是谁呀？是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又回到我身边来了。”

突然，婴儿眼睛盯着伊莎多拉，憋住了呼吸，从冰冷的嘴唇里长长嘘出来一口气。

伊莎多拉赶忙叫护士来。护士一看，惊慌地从她手里把孩子抱过去——从另一个房间里传来要氧气、要热水的喊声。

一个小时后，奥古斯丁进来了，对伊莎多拉说：

“苦命的伊莎多拉……你的孩子……死了……”

此时，伊莎多拉达到了人间痛苦的顶峰。

玛丽哭着进来，拿走了摇篮。

伊莎多拉听见隔壁房间里锤子的敲打声，那是在钉小棺材，这是她可怜的孩子唯一的摇篮。这些钉锤敲出了极端绝望的最后音符，就像打在伊莎多拉的心上。她痛不欲生，无依无靠，躺在那儿，眼泪、奶水和血——三重痛苦的源泉不断涌流。

## 第十章 马赛曲

突然，他把她一把抱在怀里，不住地吻她，抚摩她。

伊莎多拉的工作很快就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

伊莎多拉把玫瑰花拨开，让留声机奏出《马赛曲》，同时她举杯祝酒：“法兰西万岁！”

当那个黑眼睛的青年紧紧搂着她，时时用他那大胆的眼睛注视着她的眼睛的时候，伊莎多拉体会到了它的神秘。

伊莎多拉·邓肯能够走动之后，便和玛丽离开已经成为伤兵医院的贝尔维舞蹈学校到海边去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通过战区的时候，伊莎多拉说出自己的名字，受到了极大的礼遇。值勤的哨兵说：“这是伊莎多拉，让她过去吧。”

伊莎多拉觉得这是生平从未享受过的无上光荣。

她们到了杜维尔，在诺曼底饭店住下了。伊莎多拉很累，又有病，来到这个休息的天堂，非常高兴。但过了几星期，她还是没精打采，身体虚弱，情况令人沮丧，连到海边散步、呼吸海洋新鲜空气都几乎不能够。她感到自己真的病了，便去请医院的大夫。

但是大夫没来，只给了一个闪烁其词的答复。由于没有人来看她，伊莎多拉只好仍旧留在诺曼底饭店，病得连将来怎么办都不去考虑了。

当时这家饭店是许多巴黎上层人物的避难所。伊莎多拉隔壁的一套房间住着贝莱狄埃伯爵夫人，她有一位客人——诗人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晚饭以后，伊莎多拉常常听他以轻柔的假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不断传来的战争杀戮声中，能听到他对美的力量心醉神迷地赞颂，伊莎多拉颇感惊奇。

每一批信件都从前线带来那世界性悲剧的消息，只有这时人们才清醒过来，看到这世界的悲惨现实。

这种生活伊莎多拉·邓肯不久就厌烦了。可是疾病缠身，不能去旅行，伊莎多拉就租下了一所带家具的别墅——“黑白别墅”。里面所有的东西，如地毯、窗帘、家具全是黑色和白色的。租下来的时候，她还觉得时髦别致，但是一住进去便感到忧伤沉闷了。

就这样，从贝尔维怀着对学校、艺术，对未来新生活的全部希望，伊莎多拉迁居到这个小小的海滨黑白别墅，独自缠绵病榻，寂寞凄凉。她几乎连到海边稍稍散步的力气都没有。

秋天挟着 9 月的暴风雨来了，帕里斯·辛格来信说，他已经把学校移到纽约去了，想在那里找到战争时期的避难所。

一天，她感到空前的孤寂，就到医院去找那位不肯来给自己看病的医生。

那是一位留着黑胡子的矮个子男人。他一看见伊莎多拉，便转身逃命似的跑开了。

她赶紧过去，对他说：

“大夫，为什么您不愿来给我看病呢？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难道不知道我真的有病，真的需要您吗？”

大夫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还是那么惊慌失措的样子，不过答应第二天来给她看病。

第二天早晨，下起了秋天的暴风雨。海浪滔天，大雨倾盆。大夫到黑白别墅来了。

伊莎多拉坐在房间里，想把木柴点着，但是烟囱不通，炉火没有生起来。

大夫按了按她的脉搏，问了一些通常的问题。伊莎多拉便把贝尔维的伤心事——她那无法回生的孩子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还是以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情瞪着眼瞅着伊莎多拉。

突然，他把她一把抱在怀里，不住地吻她，抚摩她。

“你没有病，”他大声呼喊，“你只是心灵病了——因为爱情而病了。唯一能治好你的良药就是爱，爱，更多的爱。”

长时间孤单一人、疲惫而忧伤的伊莎多拉，以她那创伤累累的身心的全部悲伤的力量回报了他。

两个人就像是偷情的少年，在一起疯狂地做爱。

从此，每天他在医院工作完毕以后，就到伊莎多拉的别墅来陪伴她，告诉她这一天他经历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战争带来的一切恐怖。

有时，伊莎多拉和他一起去上夜班。设在夜总会的大医院已经沉睡，只有中央的照明灯亮着。到处都有不能入眠的伤兵，虚弱不堪，一面翻身，一面呻吟。医生一一探视，安慰一两句，给点水喝。

就在这样艰辛的白昼和可悲的黑夜之后，两个人需要狂热的爱情，既悲伤又猛烈。

从炽热的拥抱之中，从使人颠狂的纵情欢乐之中，伊莎多拉的身体复元了，又可以在海边散步了。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问她的大夫，为什么自己第一次请他的时候他不来给她看病。

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眼睛里却充满着痛苦和悲伤，使她不敢追问下去。

然而伊莎多拉不禁更为好奇。这里面一定有个谜。伊莎多拉感到自己的过去一定与他不愿回答有着某种关联。

11月1日是亡灵节。伊莎多拉站在别墅的窗前，发现花园里有一块地方是黑白石头布置的，像两座坟墓。伊莎多拉觉得自己好像是陷进了苦难和死亡的罗网，整天孤独地待在别墅里，或徘徊在荒凉的沙滩上。

一列列火车到达杜维尔，运来了受伤的和快死的士兵。时髦一时的夜总会，现在成了苦难者的栖身之所。

伊莎多拉越来越忧郁，而大夫在晚上一天比一天更愁闷，充满幻想的激情没有了。

他那绝望的目光宛如不断为可怕回忆缠绕的人的凝视。每当伊莎多拉碰到他这样的目光，他就对她说：“要是你知道了一切，那我们俩就该分离了。请你千万不要再问了。”

伊莎多拉恳求他说：“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这样的不祥之谜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向后退了几步，注视着她：“你不认识我了？”

伊莎多拉看了又看。迷雾消散了，她放声大哭起来，想起了那可怕的一天。在那两个孩子死去时，就是这个大夫要她保持希望。就是他尽了一切努力想救活她的孩子。

他对她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难过了吧？你睡觉的时候，跟你小女儿躺在那儿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抢救她，尽力从我的嘴里一口气一口气地——把我的生命——一连几小时，通过她可怜的小嘴送给她，把我的生命给她……”

这些话引起伊莎多拉的心头的剧痛，整整哭了一夜，无可慰藉。而他的痛苦也不亚于她。

从那天晚上起，伊莎多拉意识到对他的爱强烈得出乎自己的意料。

但是，他们的爱情与日俱增，他的幻觉也随之增长。

一天晚上，伊莎多拉醒过来，看见他那可怕的悲哀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她立即明白了：始终纠缠着他的那痛苦回忆会使他们俩都发疯的。

第二天早晨，她到海滩上散步，越走越远，心里藏着一个可怕的念头；再不回到那使人伤感的黑白别墅去。

她走得很远，一直走到黄昏时分，天全黑了，才想到该回去了。潮水来得很快，她不时穿过上涨的浪潮行走。虽然很冷，她却渴望迎着浪潮走过去，一直走进海里，永远结束那无法忍受的忧伤。

半路上，大夫接她来了。

他非常着急，因为他找到了伊莎多拉在心烦意乱的时刻丢在海滩上的帽子，以为她企图在波浪里结束自己的痛苦。他看见她活着走了过来，不由得像孩子似地欢呼起来。

他们一起走回别墅，努力互相安慰。但是俩人都意识到，如果他们想保持不发疯，就必须分手。他们的爱情，由于它所带来的那可怕的回忆，只能导致死亡或者进疯人院。

还有一件使伊莎多拉倍感凄凉的事：

她派人到贝尔维去取一箱御寒的衣服。箱子送来了，可是搞错了。她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衣服。重又看见这些衣服，随着一声长长的、凄厉的哀号，伊莎多拉人事不省地趴在了打开的箱子上面。

战争进行过程中，帕里斯·辛格把他在德文郡的别墅改为了医院。为了伊莎多拉的学校来自各国的学生们的安全，他让他们乘船都去美国。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这时在纽约，跟学校在一起，不断来电报要伊莎多拉到他们那里去。因此，她最后决定去美国。

她的情人大夫送她到利物浦，然后把她安置在一艘开往纽约的大型班期客轮上。

伊莎多拉·邓肯不胜悲哀劳累。一路上，白天一步她也不出客舱，只有夜里当其他乘客都熟睡了，才上甲板去。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接她，看到她容颜大变，都感到很震惊。

学校设在一所别墅里——这是一群快活的难民。伊莎多拉租了一所大工作室，重新工作起来。

刚从流血的、英雄的法国回来，看到美国对战争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心中深感义愤。一天晚上，刚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完毕，伊莎多拉裹上红色大围巾，即兴表演了《马赛曲》，号召美国青年起来保卫时代的最高文明——从法国传到世界的文化。

第二天早晨，各家报纸都热心加以报道。其中一家报纸是这样写的：

伊莎多拉·邓肯小姐在演出结束时，热情地表演了《马赛曲》这个节目，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观众起立欢呼，长达数分钟之久……

她英姿勃勃、模仿凯旋门上的不朽形象。当她把这个著名拱门上的形象经过艺术加工再现出来的时候，观众激动万分。这时，她的肩膀是裸露的，半边身子，直到腰部，也是裸露的，都统一在一个舞姿之中。观众为这种崇高艺术作品的生动再现，爆发出欢呼，不断叫好。

伊莎多拉的工作室很快就成为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从此，她重新抖擞精神。

当她发现新建的世纪剧场还空着，就把它租来供演出旺季之用，着手在那里创作《酒神之舞》。

可是这个剧场赶时髦的庸俗装饰使她很生气。为了使它变成一个古希腊式剧场，她把乐队席位挪走，铺上一张蓝色的地毯，让合唱队员能在地毯上来回走动。她在包厢里张挂蓝色幕布，然后安排了三十五名演员、八十名乐师、一百名合唱队员演出《俄狄浦斯王》。哥哥奥古斯丁领衔主演，学校

全班人马和伊莎多拉本人都参加了合唱队。

伊莎多拉的观众大部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感动了她，于是带着学校和乐队全班人马为他们做免费的演出。她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实际证明是代价很高的实验，它使伊莎多拉陷于完全破产的境地。她向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恳求资助，只得到一个回答：“你干吗要表演希腊悲剧呢？”

那时候，爵士舞蹈风靡整个纽约。上层社会的男女老少都在巴尔的摩饭店那样的大饭店的舞厅里消磨时光，随着黑人乐队跳狐步舞。伊莎多拉被邀请去参加过一两次这样的盛大舞会。她抑制不住愤慨。她想，当法国正在流血，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这里居然还如此狂欢作乐，真不应该。于是，她决定带着学校全班人马回欧洲去。

可是这时伊莎多拉缺钱，无法给大家买船票。她自己订了“但丁·阿利吉耶里”号轮船返航卧铺票，可是没钱给学生们买票。轮船起航之前三小时，她还是没有凑齐款项。

这时，一位衣着素雅的美国青年女士走进伊莎多拉工作室，问他们是否今天就要动身去欧洲。

“瞧，”伊莎多拉指着整装待发的孩子们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可是没有搞到钱把票买齐。”

“你们需要多少钱？”她问。

“大约两千美元，”伊莎多拉回答说。

这时，这位女士掏出钱包，抽出两张一千块的钞票放在桌子上，说：

“能在这点小事上帮助你们，我是太高兴了！”

伊莎多拉大为惊奇地看着这位从未见过的陌生女子。

连感谢都不要，就把这么大一笔款子供自己支配，伊莎多拉猜想她一定是位隐名埋姓的百万富翁。后来伊莎多拉才知道不是这样。为了把这笔钱赠送给自己，她头一天把她全部股票和公债都卖掉了。

那位女士和许多人一样，到船上来给伊莎多拉一行送行。这位女士的名字叫露丝。

她对伊莎多拉说：“你的人就是我的人，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从此以后，她始终如一地对待伊莎多拉。

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都有一面法国旗子藏在袖子里。伊莎多拉事先嘱咐过她们，汽笛一鸣，轮船离了岸，就挥动旗子，高唱《马赛曲》。她们十分高兴地唱了起来，码头上的官员和职员们则大为愕然。

好友玛丽也来给伊莎多拉送行。即将开船的最后时刻，她舍不得和伊莎多拉分手，既没带行李也没有护照，就跳上甲板，和孩子们一起唱着，对伊莎多拉说：“我跟你们一起走。”

他们就这样唱着《马赛曲》离开了富裕的、耽于享乐的1915年的美国。伊莎多拉带着她这所流浪学校，向意大利航行。

他们兴高采烈地到了那不勒斯。

意大利已经决定参战。伊莎多拉为回到这里来十分高兴，在乡间还参加了一次盛大宴会。她对一群围着瞧的农民和工人表演说：“感谢上帝给了你们美丽的国家，不用羡慕美国。在这里，在你们美妙的国土上，上面是蓝蓝的天空，下面到处是葡萄园和橄榄树，你们比任何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都要富裕。”

在那不勒斯，他们讨论了下一步到哪里去。伊莎多拉很想去希腊，在

科帕诺斯山上搞一个营地，维持到战争结束。但是年纪大一些的学生听说之后非常害怕，因为她们此行使用的是德国护照。因此，伊莎多拉决定在瑞士找栖身之处，且到了那里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他们抱着这个目的到了苏黎世。有个著名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住在湖边酒吧旅馆，伊莎多拉认为这是使她对自己的学校发生兴趣的极好机会。

一天下午，她让孩子们去草坪上为那女人表演舞蹈。孩子们跳得好极了，伊莎多拉想一定打动了她。

但是，当伊莎多拉向她谈到帮助学校这个问题时，她说：“是的，孩子们也许很可爱，但是他们引不起我的兴趣。”

那年夏天，为了跟学生们在一起，伊莎多拉住到乌希的美丽湖岸饭店。她又租了一所曾经充作餐厅的大凉棚，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那里教孩子们跳舞。

每天早晨，从阳台上伊莎多拉总是看到聚集在另一大阳台上的一群穿着发光的缎子晨衣的男孩子在观赏湖上风光。他们总是从他们的阳台上向她微笑。有一天晚上，他们请她吃晚饭，伊莎多拉才知道他们都是难民。

有几天晚上，他们带她乘小汽艇去游莱芒湖。满船尽是香槟酒味，通常玩到早晨四点才上岸。

和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在一起玩，多少减轻了伊莎多拉的愁闷和孤独，但是他们对女性的魅力显然漠不关心，刺伤了她的自尊心。伊莎多拉决定试一试自己的力量，结果很成功。一天晚上，只由这群青年的头——一个年青的美国朋友陪着伊莎多拉坐着一辆豪华的梅塞迪斯小汽车出去游玩。

这是个奇妙之夜。他们开着汽车沿莱芒湖畔疾驰，经过蒙特勒，黎明时分到了维基。

接着，他们穿过终年积雪的山峰，越过哥萨德隘口。

想着那群可爱的少年早晨起来发现他们的领头人和一个可恶的女人跑了该多么吃惊，伊莎多拉不禁笑了起来。

一路上，她竭尽诱惑的能力。

他们很快进入了意大利，一直跑到罗马，从罗马又继续前往那不勒斯。当瞥见大海时，再看看雅典的渴望又在她胸中燃烧了。

他们租了一艘小游艇。一天早晨，伊莎多拉又踏着普罗比拉山的白色大理石台阶，向着神圣智慧的雅典娜神庙前进。在那里，想到这些年为了她着迷的恋情，自己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伊莎多拉不由得感到惭愧。

雅典一片混乱。他们到达的那天，维尼哲洛斯下台的消息宣布了，人们认为希腊王室会站在德皇一边。

晚上，伊莎多拉·邓肯举行了一次晚宴，客人中包括了国王的国务大臣。在桌子中央，伊莎多拉堆放了许多玫瑰花，花底下藏了一台小留声机。在同一间房里有从柏林来的高级官员，伊莎多拉听到从他们桌上传来祝酒之声：“皇帝万岁！”

伊莎多拉把玫瑰花拨开，让留声机奏出《马赛曲》，同时她举杯祝酒：“法兰西万岁！”

国务大臣好像相当惊愕，其实他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热烈拥护协约国。

这时候，窗外广场上聚集了一大批群众。伊莎多拉把维尼哲洛斯的画像高举在头上，让她那位美国朋友拿着唱机跟在后面，不断播送《马赛曲》。他们走到广场中央。随着乐曲和热情高涨的群众的歌声，伊莎多拉跳起了舞，

然后向人群发表演说：

“你们现在有第二个帕里克勒斯，他就是伟大的维尼哲洛斯。你们为什么允许他受到扰乱呢？你们干吗不跟他走？他只会使希腊伟大昌盛。”

然后，他们组织了一次游行，到维尼哲洛斯的官邸去，站在他的窗户下面，唱希腊国歌，唱《马赛曲》。

然而，军队士兵执着上着刺刀的枪，毫不客气地把集会驱散了。

这段插曲使伊莎多拉十分高兴。之后，他们乘船回到那不勒斯，然后继续旅程，回到乌希。

从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伊莎多拉拚命努力保住她的学校不散，想战争快结束了，就会回到贝尔维去的。可是战争继续打着，她不得不以五分利息向放高利贷的借钱来支付学校在瑞士的费用。

1916年，为了挣钱维持学校，伊莎多拉接受了到南美演出的合同，动身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轮船途经纽约，奥古斯丁来陪伊莎多拉，因为他不同意她在战争时期孤身一人在外旅行。他来作伴对她是极大的安慰。钢琴家莫里斯·杜麦斯尼尔也和伊莎多拉作伴同行。

巴西的巴伊亚是伊莎多拉观光的第一个亚热带城市。此地气候温和，四季常青，而且多雨。这里经常持续下大雨，穿着印花布衣服的妇女们浑身湿透，衣服贴在身上，她们却毫不在乎，似乎身上是干是湿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伊莎多拉第一次看到黑人与白人混杂，而他们都觉得无所谓。在伊莎多拉吃饭的一家饭馆里，她看见一个黑人男子和一个白人姑娘同坐一张饭桌，另一桌则坐着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姑娘。在小教室里，有许多妇女抱着光屁股的黑白混血婴儿来受洗礼。

这里每个花园里都盛开红色木槿花。整个巴伊亚城到处都有黑人和白人在谈情说爱。

在有些街区，黑种、白种和黄种女人懒洋洋地靠在妓院的窗口，探出头来。这儿看不到那些大城市的妓女通常特有的消瘦憔悴或者鬼鬼祟祟的模样。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过了几个晚上，他们到一家小酒店去玩。那是一间长长的房间，天花板很低，烟气腾腾，拥挤着皮肤黝黑的青年和浅黑皮肤的姑娘。人们混杂在一起，大跳探戈舞。

伊莎多拉从来没有跳过探戈，可是他们的年轻向导一定要伊莎多拉试试。她刚怯生生地试跳了几步，立刻感觉到她的脉搏与这种欢快舞蹈迷人而柔情的节奏一起悸动。

它就像长久抚爱那样甜蜜，像南国天空下的爱情那样令人陶醉，像热带丛林那样诱人、那样危险、那样薄幸。当那个黑眼睛的青年紧紧搂着她，时时用他那大胆的眼睛注视着她的眼睛的时候，伊莎多拉体会到了它的神秘。

突然，学生们认出伊莎多拉来。他们把她包围起来，告诉她说，这天晚上是庆祝阿根廷自由的节日，并邀请她用舞蹈表演他们的国歌。

伊莎多拉向来喜欢让学生高兴，就答应了。听罢阿根廷国歌歌词的翻译以后，伊莎多拉把阿根廷国旗往身上一裹，跳了起来。尽力向他们再现一度沦为殖民地奴隶的痛苦，和推翻暴君获得自由的欢乐。

她大获成功。如同电击一般，学生们高兴得欢呼起来。他们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的舞蹈，要求她一次又一次地跳国歌。伊莎多拉一边跳，他们一边唱。

伊莎多拉得意地回到旅馆，喜欢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

可惜她高兴得太早了！

第二天早晨，她的经理人在报上看到关于她昨晚表演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大为震怒，通知她说，根据法律，他认为合同已归无效。

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的上等人家纷纷取消订票，一致抑制伊莎多拉的演出。这样，使伊莎多拉十分高兴的那次晚会导致了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演出的破灭。

本来这次旅行演出的目的是搞到足够经费，来维持舞蹈学校在战争时期的开支。可是伊莎多拉接到瑞士来的电报，说她电汇去的款项由于战争禁令被扣留了。可想她当时是多么惊愕恐慌。如果不付钱的话，安置学生的寄宿学校就无法继续收留，她们就有被撵出去的危险。

伊莎多拉向来易于感情冲动，坚持要奥古斯丁立即动身去日内瓦，带着必需的款项去接济她的学生。可是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自己就没钱付旅馆的房租了。同时，她的经理人怒气冲冲，已经带着一个喜剧团去智利演出。伊莎多拉和她的钢琴伴奏杜麦斯尼尔只好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陷于了绝境。

观众既冷淡、迟钝，又没有欣赏力。实际上，伊莎多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的成功也就是那天晚上在小酒馆的那一次。最后，她不得不把箱子留下来给旅馆作抵押，继续前往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去旅行演出。

在蒙得维的亚，观众和阿根廷观众完全相反，简直热情到了疯狂的程度。因此，他们得以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演出。

到达那里后，他们身无半文，又无行李，然而市立剧院的经理慨然立即为演出售票。

这儿的观众很有水平，反应很快，能与台上共鸣，这样就使每个为他们演出的人能演出最好的水平。

伊莎多拉在里约热内卢和杜麦斯尼尔分了手。因为他在里约热内卢大受欢迎，不愿离开。

伊莎多拉径自回到纽约，一路上感到愁闷和孤独，她还在为学校发愁。

旅客中有一个美国人老是喝酒，每天晚饭时，他总要对侍者说：“把这瓶1911年酿造的波梅列名酒送到伊莎多拉·邓肯的餐桌上去。”人们听了都大为惊讶。

到达纽约时，没有人来接她，因为她的电报由于战争引起的困难没有送到。伊莎多拉偶然打电话给好友阿诺德·根舍。可是实在使她惊讶，在电话里答话的是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不是阿诺德，而是帕里斯·辛格。巧得很，那天早晨他刚好去看根舍。

当听到伊莎多拉无钱无友、孤零零地待在码头上时，帕里斯·辛格答应立即来。

不一会儿，他就来了。当伊莎多拉又看到他时，马上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信心和安全感。伊莎多拉很高兴见到他，当然他也很高兴见到伊莎多拉。

他以一贯的威严气派，马上就把她的行李从海关取出来。然后，他们前往根舍的工作室，接着一起出去到沿河大道的餐馆吃午饭。

又在一起使他们都非常高兴。两个人喝了许多香槟酒。伊莎多拉觉得

回到纽约是好兆头：帕里斯·辛格还是那样宽厚慷慨。饭后，他连忙去大都会歌剧院为伊莎多拉订了场子，花了一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发请帖，请所有的艺术家来参加盛大的特别招待演出。

这次演出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纽约所有的美术家、演员、音乐家都莅临了。因为完全没有票房卖座多少的压力，伊莎多拉舞跳得特别兴高采烈。

在演出终场时，伊莎多拉表演了《马赛曲》，做为最后一个节目。观众掌声雷动，为法国和协约国热烈欢呼。

伊莎多拉告诉帕里斯·辛格，说她已经派奥古斯丁到日内瓦去了，还说她对学校非常担心。

慷慨大方的帕里斯·辛格立即电汇了一笔款子，去把学生们接回纽约。可惜，钱去晚了，所有的小学生都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家去了。

伊莎多拉多年辛苦建成的学校就这样解散了。

痛心之余，伊莎多拉还是多少得到点安慰，因为奥古斯丁回来了。不久，六名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也跟着来了。

帕里斯·辛格一如既往，还是那样豪爽义气。这无论是对于孩子们还是对伊莎多拉来说，都是极其需要的。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顶层租了一间大工作室，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每天下午在那里练功。早晨他带她们乘车沿哈得孙河岸做长时间的巡游。他还给她们每一个人都送了礼物。事实上，通过金钱的魔力，伊莎多拉眼下的生活美满极了。

可是，由于纽约的寒冬到来，伊莎多拉的健康状况就不行了。于是，帕里斯·辛格建议她去古巴旅行，并派他的秘书陪同前往。

伊莎多拉对古巴保留着极好的印象。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做任何演出，但是他们在哈瓦那沿着海滨开汽车兜风，玩了三个星期，尽情观赏四周美丽的风景。

不久，伊莎多拉等人乘船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在棕榈湾登岸，给帕里斯·辛格发了一封电报。他到布莱克旅馆来和他们见面。

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不在开始，那时不幸突然袭来，使人顿时达到昂扬状态，结果反倒使人失去感觉了。最可怕是到了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人们说“啊，她已经经受过来了”，或者“她现在很好，她已经度过了难关”的时候。

这就是伊莎多拉那段时期的情况。所有的朋友都说：“她忘记了，她活过来了。”可是，只要一看到谁家的小孩突然走进房间叫“妈妈”，她就心如刀刺，整个身心都在绞痛。从这种可怕的痛苦中，她渴望着创造出新的生活、新的艺术。

一天，伊莎多拉和帕里斯·辛格一起坐在凉台上，帕里斯·辛格说他计划按照伊莎多拉的意愿办一所舞蹈学校，并说已经买下麦迪逊广场做为建校的基地。

尽管对整个计划反应热烈，但伊莎多拉并不赞成在战时就开始实现这么宏大的方案。

这把帕里斯·辛格气坏了。在他们回到纽约之后，他就像买花园时那样，冲动地把买花园的合同给废除了。

1917年春，伊莎多拉·邓肯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那时她相信，许多人也相信：整个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是由协约国是否战胜

来决定的。因此，每次演出的最后她都表演《马赛曲》，全体观众每次都起立。

虽然如此，伊莎多拉照样表演用瓦格纳的音乐伴奏的舞蹈。因为她想，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在战争时期抑制德国艺术家是不公正的，是愚蠢的。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晚上伊莎多拉跳了《马赛曲》，接着她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她就在这段音乐用来表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隶的形象。

这种与音乐相对比并不协和的舞姿，引起了观众颇大的轰动。

在伊莎多拉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些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她。她穿着红色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起来。

那天晚上，她是以一种极度狂热的欢情来跳舞的。一想到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人类事业献身的人们终获解放，伊莎多拉心在燃烧，热血在沸腾。

帕里斯·辛格一连几天晚上在他的包厢里看她演出，心里相当不安。他问自己，资助的这所学校是否会成为危险的团体，使他和他的百万财产一起归于毁灭。

但是伊莎多拉的艺术冲动太强烈，哪怕是为了让她所爱的人高兴，她也不能把它压抑着不表现出来。

帕里斯·辛格让伊莎多拉在雪利饭店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开始是午餐，然后跳舞，再是精心安排的夜餐。其间，他当众送给伊莎多拉一串极其精美的钻石项链。

伊莎多拉从来不想要什么珠宝钻石，也从来不戴这些玩意儿，但是看他很有兴致，就允许他将钻石项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将近天亮，客人们已经灌了不知多少加仑的香槟酒。而伊莎多拉也由于这种场合十分快乐，酒也喝多了，头脑多少有些飘飘然。她忽然产生了一个后果很不幸的念头：去教在场的一位漂亮小伙子跳快步探戈舞，就是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人跳过的那种。正跳着，突然间伊莎多拉感到胳膊被一个铁掌扭住。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帕里斯·辛格怒不可遏站在他们身后。

戴这串不幸的项链，伊莎多拉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帕里斯·辛格又一次大发雷霆，就和她分手了。伊莎多拉孤身一人，欠了旅馆一大笔钱，还负担着学校的巨大开支。在求帕里斯·辛格帮助无效后，伊莎多拉把那串钻石项链送进了当铺。

就这样，伊莎多拉一文莫名，流落在纽约。这时正是演出季节结束，什么样的活动实际上都不可能。幸而她的行装里还有一件貂皮大衣，箱子里还有一块极贵重的祖母绿，那是帕里斯·辛格在蒙特卡洛从一位赌输光了钱的印度王子手里买下来的。她把那件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祖母绿卖给另一位女中音歌唱家，然后在长岛租了一所别墅度夏，把她的学生也安置在那儿。她等待着秋天的来临——那时又可以演出挣钱了。

一如既往，伊莎多拉·邓肯顾了今天不顾明天。现在靠卖家当有了钱，她租别墅，租汽车，对将来很少考虑。大家一起在长岛消暑，玩个不亦乐乎，她照常还要款待许多艺术界知名人士。

结果，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个夏天，等回到纽约时，伊莎多拉又身无分文了。心烦意乱地过了两个月，她到底接受了一个到加利福尼亚去演出的合同。

在这次旅行演出过程中，伊莎多拉离故乡越来越近。刚一到达，她就

从报上知道了罗丹的死讯。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好朋友了，伊莎多拉哭得很伤心。所以，到了奥克兰，看见记者在站台上等着访问，为了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眼睛哭肿了，伊莎多拉赶快用一块黑色网眼面纱把脸遮起来。记者们第二天报道说伊莎多拉故意装出神秘的模样。

自从离开旧金山，开始她伟大的冒险生涯以来，已经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这次回到故乡，看到经过地震和 1906 年大火以后，一切全然改观，对伊莎多拉来说都是新鲜的，她几乎认不出来了。

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都不是寻常之辈，他们花了大价钱买票，非常和气而有欣赏水平。评论界也是如此。尽管这样，伊莎多拉还是未得满足，因为她要为广大的观众表演。

但是，当伊莎多拉要求为此租赁希腊剧场时，却遭到了拒绝。

在旧金山，伊莎多拉又和母亲团聚了。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母亲了，由于无法解释的思乡病，邓肯夫人不肯在欧洲长住。她看起来是老多了，也憔悴了。

当母女二人一起去克里弗饭店的时候，伊莎多拉从镜子里看见了俩人的面容：自己面带愁容，母亲形容枯槁。她不禁对比二十年前抱着极大希望去寻求成名、寻求好运的那两个冒险劲头十足的女子，真是不堪回首！她想，名和利都找到了，但是为什么结果却这样悲惨？

在旧金山，伊莎多拉还遇到了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使她大为惊异和高兴的是，他告诉她，与其说她是舞蹈家，还不如说是音乐家。他还说，是她的艺术使他懂得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里那些不易理解的地方。

在奇迹般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共同体验到了在艺术上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快乐。

因为不仅像他那样所说，她向他揭示了音乐艺术的秘密，而且他也向她揭示了舞蹈艺术的某些寓意，那恰是伊莎多拉做梦都未曾想到过的。

哈罗德观察力极为敏锐，善于思考，超乎常人。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他的眼界并不局限于音乐。他对一切艺术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对诗歌以及极为深刻的哲学也有渊博的知识。两个同样热爱崇高艺术理想的人遇在一起，就都有了一种真正的陶醉之感。

很多天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无酒而醉的怡然自得的状态中，每一根神经的颤动都给予他们新的希望，战栗不已，汹涌澎湃。当他们的眼睛在这种希望实现的时候相遇，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喜悦，甚至促使他们像在疼痛时那样大声喊叫：

“你觉不觉得肖邦的这段音乐就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这样，甚至还不止于此，我一定要给你用动作把它表现出来！”

“啊，多么好的体现！现在我来给你弹。”

“啊，真令人高兴——简直快乐到极点了！”

## 第十一章 爱情的玄妙

这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神圣、最飘忽微妙的爱情的开始。

伊莎多拉没想到，她的大天使和她的一个学生联手把她的这次爱情送进了坟墓。

在美国的生活奋斗，已经使伊莎多拉精疲力尽，失去了勇气。于是，她想回巴黎去，在巴黎也许或能把财产变卖一些钱。

玛丽已从欧洲回来，从巴尔的摩打来电话。伊莎多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她。

玛丽说：“我的好友戈登·塞尔弗里奇明天动身去欧洲，要是我求他一下，他一定会给你一张船票的。”

伊莎多拉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二天早晨，她就从纽约乘船出发了。

第一天晚上，在甲板上散步的时候，由于战时灯光管制，到处漆黑，伊莎多拉掉进了甲板上一个洞里，跌得相当厉害。戈登·塞尔弗里奇慷慨地把他的房舱全让给她使用，一路陪伴着她，非常和蔼可亲。伊莎多拉向他叙述了二十年前，当她还是一个饿着肚子的小姑娘的时候，去向他赊购一件女衫作跳舞的服装的事情。

这是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接触到的一个实干家。他的人生观和她过去认识的一些艺术家、幻想家根本不同，这使她大为惊奇——他比起那些人来，可以说几乎是另一种性别的人，因为她过去的那些情人明显地都是女性化的男人。

过去跟她好的那些男人中间，有些人多少有些神经衰弱，要不就是阴郁不堪，要不就是醉酒狂欢。

而塞尔弗里奇则与众不同，任何时候见到他，他都是一样地快乐，从不喝酒。这一点也令伊莎多拉大为惊异，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有谁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乐趣。

伊莎多拉总是认为，未来只有通过艺术或者爱情使人偶然瞥见转瞬即逝的欢娱，而塞尔弗里奇却在现实生活之中找到了快乐。

到了伦敦，她已经没有钱去巴黎了。因此，她在公爵街找了个公寓住下，然后打电报给巴黎各方面的朋友求援。

由于打仗，没有回音。

伊莎多拉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穷愁潦倒，心情极为苦闷忧郁。她孤身一人，贫病交加。她的学校完蛋了，战争好像没完没了地打下去。夜里，她常常坐在黑暗的窗前看着空袭，希望炸弹掉在头上，结束自己的困境。

绝望之中，伊莎多拉打了电报给帕里斯·辛格，但还是没有口音。

一位演出经理人为伊莎多拉的学生组织了演出，她们想在美国打开个路子。后来，她们以“伊莎多拉·邓肯舞蹈演员”的名义做巡回演出，然而演出的收入并不给她分文。

她仍陷于绝境中。后来算是侥幸，她遇上法国大使馆的一位人物。他向伊莎多拉伸出援助之手，带她到了巴黎。伊莎多拉在巴黎奥赛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向放债人借钱应付开支。

每天早晨五点钟，他们被德军大炮的霹雳巨响惊醒，开始不祥的又一天。前线时有可怕消息传来。死亡、流血、屠杀，无时无刻不带来悲惨不幸。夜里，空袭警报凄厉刺耳，令人心惊肉跳。

日子过得单调可怕。当护士伊莎多拉倒很乐意，但是她知道，申请当护士的人排成长龙在等候，她夹进去添一份不见得成功的力量也是没用。因此，她想还是回到艺术中去。

伊莎多拉很喜欢瓦格纳的一首歌曲——《天使》，内容是说有个精灵无限愁苦凄凉地坐着，光明天使来到他身旁。

在那黑暗的日子里，终于有这样的一个天使来到了她身旁：她的一个朋友带着钢琴家沃尔特·拉梅尔看她来了。

当他进来时，伊莎多拉以为是青年李斯特从画像的框子里走出来了一——他身材修长，高高的前额上垂着一绺光亮的头发，那双眼睛像闪闪发光的清澈源泉。

他为伊莎多拉弹奏，她把他叫做大天使。

他们在剧院的休息室里工作，这是借给她使用的。

在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中，在战争消息引起的种种反响中，拉梅尔为伊莎多拉弹奏了李斯特的《荒野的祈祷》。他的演奏启发了伊莎多拉的灵感，她创作了一些新的表现了祝愿甜蜜与光明的舞蹈。同时，她又重新振作精神，返回了现实生活。

这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神圣、最飘忽微妙的爱情的开始。

在伊莎多拉的眼中，弹奏李斯特的作品，谁也没有像她的大天使弹得这样美妙。因为他有丰富的幻想，能透过写在纸上的乐谱，把握住狂想真正引起的幻觉，每天在和天使交谈中诉说他自己的狂想。

拉梅尔非常文雅、亲切，内心却热情洋溢，演奏时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狂放之气。他从不以青春的一时冲动向激情让步，相反，他显然厌恶这种激情，就像支配着他的不可抑制的激情一样明显。他就像在炭火通红的火盆上跳舞的圣者一样。要爱这样一个人又危险又困难，对爱情的厌恶很容易变成对进攻者的憎恨。

通过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去接近他的灵魂——通过他的躯体得到享受、快感、幻觉，然后触及灵魂，这种方式真是太奇怪了。只有伊莎多拉能这样做。

在她的一生中，伊莎多拉的情人不计其数，而每当新的情人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不管表现为什么姿态——恶魔、天使或平凡人——她都相信那就是自己等待已久的唯一伴侣。她也相信这次恋爱就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次复活。爱情总是给人以这样的自信。伊莎多拉的每一次爱情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但是结局都很不好。

对此，伊莎多拉·邓肯说：

爱情的玄妙就在于它能够奏出种种不同的主题、种种不同的音调。而一个男人的爱情和另一个男人的爱情相比较，就像听到贝多芬的音乐与普契尼的音乐之不同，而响应这些美妙旋律的乐器就是女人。我想，只体验过一个男人的女人，就像只听过一个作曲家的作品的人。

夏天即将过去，他们在南部找到一所安静的隐居之地，在一所几乎荒废了的旅馆，把它的空车库改做工作室。从早到晚，拉梅尔弹奏音乐，伊莎多拉跳舞。

这段时光伊莎多拉倍感幸福！身边有情人陪伴，周围是大海，完全生活在音乐的海洋里，宛若处于天主教徒死后进入天堂的梦中。

他们不时从隐居地出去救济那些不幸的人，或者为伤员们举行演出，但多半是单独在一起。通过音乐和爱情，通过爱情和音乐，伊莎多拉的心灵在极乐世界的高峰找到了寄托。

后来，他们在尼斯找到一间工作室。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停战的时候，

他们回到了巴黎。

战争终于结束了。伊莎多拉和拉梅尔观看了胜利阅兵式，队伍经过凯旋门。他们高呼：“世界得救了！”

伊莎多拉的大天使拉着她的手，一起走到贝尔维。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但是他们想：干吗不把它重建起来呢？

他们费了几个月的劲，谋求资金，结果白费了一顿气力。

最后，确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伊莎多拉就接受了法国政府给的公道价格，把这所房子卖了。

卖房成交，钱存入银行。伊莎多拉买了一所房子，过去是贝多芬展览馆，她把工作室设在这儿。

伊莎多拉的大天使有一种很可爱的同情感。凡是使她心情沉重、时常失眠、终夜流泪的一切痛苦，他好像都感觉得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以同情的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她，使她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工作室里，两种艺术绝妙地合而为一。

在他的影响之下，伊莎多拉的舞蹈也飘然欲仙了。他是第一个启发伊莎多拉去全面理解李斯特作品的超凡精神的人，他们把李斯特的音乐编成了一整套演出节目。在贝多芬展览馆安静的音乐室中，伊莎多拉开始研究一些伟大壁画的动作和光线，想用《帕西法尔》这部作品把它们体现出来。

他们又在那里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两个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他们，载负着他俩的心灵。

人从来不会满足，总是要打开大门让魔鬼进来制造一切灾难。

伊莎多拉并不满足于追求她已经找到的幸福，重建学校的老想法又回来了。为了这个目标，她给在美国的学生们发了电报。

学生们来了以后，伊莎多拉聚合了几个忠实朋友，对他们说：“咱们到雅典去看看卫城吧，咱们有可能还是把学校设在希腊。”

学生们年轻漂亮，而且颇有成就。伊莎多拉没想到，她的大天使和她的一位学生联手把她的这次爱情送进了坟墓。

他们在黎多山上的至高旅馆住了几个星期，伊莎多拉第一次看出了他们两个在搞恋爱；后来是在去希腊的船上；最后，伊莎多拉再也没有心思去观赏什么雅典卫城的月色夜景了。

到雅典后，学校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由于维尼哲洛斯的好心安排，查培昂大厦归伊莎多拉支配，他们在这儿有了工作室。每天早晨伊莎多拉和学生们一起练功，竭力用无愧于卫城这个圣地的舞蹈来激发她们的热情。伊莎多拉计划训练出一千名儿童，在大竞技场上庆祝盛大的酒神节。

他们每天都到卫城去。从美国来的学生带来了不少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习气，伊莎多拉非常不喜欢。现在，在雅典灿烂辉煌的天空下，受到群山、大海的壮丽景色和伟大艺术的鼓舞，她们把那些习气改掉了。

科帕诺斯山上原有的房子已成废墟，牧羊人和一群群山羊出没其间。但是伊莎多拉没有气馁，决定立即清除地基，重建房屋。

工作立刻就开始了。堆积多年的垃圾清除掉了，请来的建筑师着手安装门窗和屋顶。

他们在高高的起居室里铺上舞蹈用的地毯，并运来了一架大钢琴放在里面。

每天下午，卫城山外落日美景灿烂辉煌，紫红色的晚霞辉映在海上。

拉梅尔为大家弹起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宏伟壮丽、激动人心的音乐。在凉快的夜晚，大家把从街上的雅典小孩那里买来的白色茉莉花扎成花环，戴在头上，溜达着下山，到海边的法利龙去晚餐。

处身于一群戴花冠的少女之中，伊莎多拉开始注意到拉梅尔眼睛里有了一种新的表情。原来伊莎多拉以为和他的爱情由于理智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而极为牢固，到现在伊莎多拉才猛然醒悟——他那双闪亮的翅膀已经变成了两只热情的手臂，能够抓住和搂抱林中仙女了。

过去的一切经验对伊莎多拉毫无助益，这次失算对她仍然是可怕的打击。

从此，伊莎多拉惴惴不安，痛苦不堪，不由自主地开始观察他们两人爱情日益增长的明显迹象。看着看着，心生恶念，自己也不寒而栗，有时候她恨不得把他们都杀了。

一天傍晚的日落时分，拉梅尔刚刚弹完《曙光》进行曲，伊莎多拉突然看见他俩在眉目传情，双方的眼睛都燃烧着同样炽热的火焰，犹如鲜红的夕阳映照。

看到这副模样，伊莎多拉气得浑身发抖。她抽搐起来，怒不可遏，连自己都害怕了。

她转身走开，整整一夜都在山上徘徊，绝望得快发疯了。

的确，她从前在生活里也曾知道嫉妒恶魔的毒牙会引起最难忍受的痛苦，可是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可怕的程度。伊莎多拉爱他们，同时又恨他们。这种体验使伊莎多拉对那些由于嫉妒而痛苦得难以想象，只好杀掉他所爱的人的那些不幸者深表同情、深为理解。

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件，伊莎多拉带了一小部分学生和她朋友爱德华·施泰肯，登上了查尔西斯山。

但是一切并不能驱除那纠缠着伊莎多拉的可怕恶魔，它不断使她脑子里总是出现那一对男女留在雅典的形象，咬噬着她的血脉，像酸一样消蚀她的头脑。她们回去以后，伊莎多拉见他俩偎依在卧室窗前的阳台上，情味浓浓，她的痛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尽管如此，伊莎多拉还是每天教学生，继续实现在雅典建校的计划。

维尼哲洛斯的内阁对她的计划很支持，雅典的公众对此也很热心。

一天，他们都被邀请到古竞技场去参加祝贺维尼哲洛斯和年轻的国王的盛大集会。

五千人参加了这次集会，全部希腊教会人士也参加了。国王和维尼哲洛斯进入竞技场的时候，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呼。元老们列队通过，身着锦缎长袍，金线绣花，整齐笔挺，在阳光下金光闪闪，令人目眩。

伊莎多拉·邓肯穿着轻纱飘拂的长袍，后面跟着一群活泼的学生。和霭可亲的康斯坦丁·梅拉斯走上前来送给她一顶桂冠，说：

“伊莎多拉，你又给我们带来了菲迪亚斯不朽的美，复活了古希腊的伟大时代。”

伊莎多拉回答说：“啊，请您帮助我培养出一千个出类拔萃的舞蹈演员，在竞技场上表演舞蹈，他们将跳得那么精采动人，让全世界的人都到这儿来，又惊奇又高兴地注视他们。”

这些话刚说完，伊莎多拉发现拉梅尔痴迷地握着他心爱的人的手。这一次，伊莎多拉心存和解的愿望。她想，和这样伟大的前景相比，个人的感

情何其渺小。于是满怀着仁爱和宽宥，她向他们微笑。

然而那天晚上，当她在月光下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在阳台上紧贴着脸的时候，又受到世俗感情的摆弄。脑子里乱哄哄的，独自一人向前狂奔，到处乱走，心里盘算着从山岩上纵身跳下去。

为激情吞噬痛不欲生，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周围景色何等美妙，但只能加深伊莎多拉的不幸。

她陷入了绝境，再也没有出路了。既不能把从自己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那个女学生打发走，她又不能每天眼见他俩相亲相爱，而忍住自己心里极度的委屈懊恼。

然而，尽管很不幸，但她不断跳舞练功，又到山上去长途跋涉，每天还在海里游泳。

这些都使她胃口大开，但同时那也使得伊莎多拉的尘世激情剧增而无法控制。

就这样，伊莎多拉一面努力教给学生美和宁静、哲学与和谐；另一方面，自己内心深处却上下翻腾，如利爪抓心，受尽致命的痛苦煎熬。

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由于一次偶然的命运转折而告结束。其起因微不足道，一只淘气的小猴子咬了希腊国王一口，后来竟送了国王性命。

年轻的国王一死，引起了希腊全国动乱的局面，又一次使维尼哲洛斯和他的内阁倒台。伊莎多拉也垮台了，因为他们是被请到希腊来的，是维尼哲洛斯的客人，所以也成了混乱局势的政治牺牲品。

就这样，花在重建科帕诺斯山和准备工作室的全部钱财都白扔了。伊莎多拉被迫放弃在雅典建校的梦想，搭船经罗马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以后，她又重新受苦，最后拉梅尔走了，那个学生也永远离开了她。虽然伊莎多拉为这受尽苦难，但她的学生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严厉责备伊莎多拉不该嫉妒，根本没有顺从这一切事态。

终于，只剩下伊莎多拉独自坐守空房，待在一切为了拉梅尔的音乐而准备的贝多芬大厅里。她的绝望无言可表。睹物思情，看见曾经幸福地待过一阵的房屋，伊莎多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渴望从这所房子里飞出去、从这个世界飞出去，因为她相信，世界和爱情对自己来说都泯灭了。

1921年春，伊莎多拉收到苏联政府发来的一封电报：

只有苏俄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将为您建立学校。

这是从哪儿来的电报？从地狱里来的吗？她自问。环视空空如也的房子，没有了大天使、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爱情。伊莎多拉回电说：

欣悉来电，同意来俄，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对方的回电是“同意”。于是，伊莎多拉·邓肯乘上船顺泰晤士河而下，离开伦敦到雷维尔，最后抵达莫斯科。

## 第十二章 红色苏维埃

她是一个革命者。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斜倚着的长沙发椅旁，恳求她别去俄国。

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

1921年7月12日，伊莎多拉·邓肯登上“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的甲板，偕同她的学生启航去苏维埃俄国。

当时，她的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认为她疯了。但对那些真正了解她的人来说，她的这一举动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这并非她一时的心血来潮；他们知道她热爱俄国和俄国人民。他们，可能还有很少一些人，了解她的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像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是一个不信奉清规戒律的人。

她是一个革命者。

伊莎多拉·邓肯热爱俄国。为此，她已在1905、1908和1913年在俄国做过三次富于成果的巡回演出。她在观众、知识界和帝国芭蕾舞团体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任何一个观看过她以舞蹈表演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的人，都会确凿无疑地感到伊莎多拉·邓肯多么同情俄国人民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

当她1917年在美国巡回演出期间，听到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她就在这个国家里第一次演出了《斯拉夫进行曲》。无疑，也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在她的心里萌发了重归已从专制统治下获得了解放的俄国演出的念头。几年后，在1921年至1924年间，在她回到俄国并且在那里生活、工作、经受磨炼以后，她向一位朋友表示，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三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三年。

1921年的4月，伊莎多拉·邓肯奔赴伦敦，与她的情人、钢琴演奏家沃尔特·拉梅尔合作进行一系列的演出。伦敦市民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所有她的老朋友，诸如小迪尔德丽的祖母艾琳·泰瑞、艺术家奥古斯塔斯·约翰·司各特小姐，还有许多诗人、音乐家、画家挤满了她在克里奇的沙龙。各种报纸上出现了对她的长篇颂扬文章。

正当这个时候，一个来自苏维埃俄国的商务代表团在伦敦进行访问。代表团由一位具有相当文化修养和讨人喜欢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之一的列昂尼德·克拉辛率领。他听说这位国际上著名的舞蹈家对新生的俄国很感兴趣，就到邓肯登台演出的威尔士王子剧院去拜访了她。

那天，她演出的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由伦敦交响乐团伴奏。克拉辛像所有观看过这出表现斯拉夫民族的压抑与自由的舞剧的人一样，被舞蹈家的艺术语言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结束后，他立即奔到后台，向这位舞蹈家表示敬意。就在那间剧院的化妆室里，他们简短地、同时也是半开玩笑地讨论了邓肯去俄国开办舞蹈学校的问题。克拉辛一口答应竭尽全力促使这项计划实现。

在此期间，克拉辛向莫斯科的同事发了电报。几天后，他又去邓肯下榻的旅馆和她详细讨论办学的前景。他提交她一份待签的合同，不料立刻遭到邓肯的拒绝，原因是她不愿在“同志”之间沿袭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方式！克拉辛只好建议她发表一项声明，以表达她去俄国办学的愿望。这回她同意了。她拿起笔，给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阿纳托尔·瓦西里耶夫·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封信：

我从未想过用我的工作来交换金钱。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场所、一座

能容纳我和我的学生的住宅、简单的伙食、朴素的衣着，以及能发挥我们才能的机会。我讨厌资产阶级分子和商业性的艺术。我一直没有能够为自己心目中的人工作，这是我的不幸。恰恰事与愿违，我不得不为五美元一张票的代价出卖自己的艺术。我讨厌现代剧院，与其说它是艺术的殿堂，不如称它为妓院更贴切。在那里，艺术家们理应占有一个高级祭师的席位，可是事实上，他们却被降格为老板们的雇工。每晚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出卖他们的眼泪和高尚的灵魂。我愿为人民群众舞蹈，愿为需要我的艺术的劳动人民舞蹈，他们由于贫穷，却享受不了我的艺术。我愿无偿地为他们演出，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没有被比他们聪明的社会贤达带到这里，而他们却真正需要我的奉献。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这些条件，那么我将前来为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未来和她的孩子们效劳。

伊莎多拉·邓肯

接到这封信以后，卢纳察尔斯基给当时正在巴黎的邓肯回了一份电报：请来莫斯科。我们将为您提供一所学校和 1000 名儿童。您能大规模地执行您的计划。

伊莎多拉立即复电：

接受您的邀请。拟于 7 月 1 日自伦敦启航。

在和卢纳察尔斯基互相通电不久，伊莎多拉在她巴黎的排练室里举行了一次宴会。

所有她的朋友都来了，其中有几位是俄国侨民：柴可夫斯基小姐，她是前沙皇政府农业部长的女儿；马克拉科夫，原俄国驻法大使，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他们得知邓肯真的下定决心要去苏维埃俄国，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奇思怪想，却不料是她的真诚愿望。

柴可夫斯基小姐俯下身去，跪倒在伊莎多拉像往常一样斜倚着的长沙发椅旁，恳求她别去俄国。她告诉邓肯她父亲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身在俄国的人写给她父亲的。信中谈到发生在那里的无可名状的恐怖。她戏剧性地在邓肯的面前挥动着这封信，带着悲哀的声调念道：

“看看他们干的好事吧。由于缺乏粮食，他们正在宰杀 4 岁的儿童，把他们的四肢挂在肉铺里出售。”

伊莎多拉·邓肯天生的怀疑精神使她拒绝相信这种夸大其词的歇斯底里的调语。当其他几位在场的俄国友人振振有词地证实这些消息，央求她取消这次旅行时，她只说了一句：“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必须去那里！”她的脸色看上去显得苍白而严肃。

宴罢客散以后，只有伊莎多拉和学生艾尔玛在一起，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恐怖的谈话，仍萦绕在她们耳边。伊莎多拉开玩笑地说：“别担心，艾尔玛。要吃的話，他们当然先吃我，我长得比你胖。那时，你赶紧逃跑就是！”

6 月初，伊莎多拉在她的排练室里举行了告别宴会。来宾中有：两位法国小说家拉希尔德夫人和莫里斯·韦尔纳先生，著名的剧团经理雅克·科波，法国女记者的老前辈塞弗兰，伊莎多拉的亲密朋友、艺术家查尔斯·达利斯，还有她的三个学生艾尔玛、莉萨和马戈特。

几天以后，在一份巴黎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由塞弗兰执笔的文章，报道了那次在富丽路的殿堂里举行的晚会。

伊莎多拉离开巴黎去布鲁塞尔，她在那里做了一些演出，然后在她的

三个学生艾尔玛、特里莎、莉萨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特里莎和莉萨在最后一刻拒绝和她一起登船去俄国冒险）。她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由德西雷·德福指挥，在皇后大厅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出。

6月的一天，克拉辛邀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一起到俄国大使馆赴宴。她们发现，这位商务专员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好客，这使得她们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残暴成性的恐惧感顿时烟消云散。克拉辛告诉她，莫斯科当局不但决定按照她的愿望为她招收1000名儿童，而且还向她提供位于克里米亚的美丽的利瓦季亚皇帝行宫！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她们将在富饶的里维埃拉乡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和煦的阳光；那里将有成千名有才能的儿童在蓝天下接受训练。他们将像柏树那样优美地摇曳，将像波浪那样欢快地跳跃。他们将在拥有众多的房间的高楼大厦里居住，在古老城堡内的花园里舞蹈。但比这一切更好、更重要的，是那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的大力支持。

她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奢望呢？

7月15日自伦敦启航的“巴尔坦尼克”号航轮，经过风平浪静的航行，于19日安抵雷瓦尔。

外交事务助理秘书的妻子利特维诺夫夫人和她的陪伴早已伫立在码头上代表苏维埃政府迎接来宾。见到她们以后，利特维诺夫夫人发现沉甸甸的行李封得严严实实，于是命人径直送往领事馆。这三位旅客被安排在领事馆住宿。第二天早晨，她们看着那艘轮船缓缓驶离雷瓦尔港，挥手向同船的朋友们道别。等船只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远方以后，伊莎多拉向艾尔玛转过身来，嘴边挂着勇敢的微笑，紧紧地拥抱着她说：“好，现在我们承担自己做出的选择吧！”

午夜，在利特维诺夫夫人的护送下，伊莎多拉、艾尔玛和法国姑娘让娜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这几位胆子不小的旅客发现，她们不得和一个年轻的陌生小伙子同坐二等车厢。

以烛光照明的列车沿着无人照管的轨道徐徐前进。她们发现，这位同车厢的陌生人原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名送急件的机要员。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一点也不像图画里画的那种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

这个年轻人在这群生气勃勃、谈笑风生的艺术家面前，很快就感到非常温暖和友好。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伴，而且还给了她们很多的帮助。

火车到达了俄国边界，她们看到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的共和国的殷红的旗帜底下。她们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伊莎多拉急不可待地希望当场履行入党手续。她要求这位年轻的机要员毫不迟延地介绍她入党。接着，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谈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离开爱沙尼亚，苏联境内的第一站就是纳尔瓦。在那里，检查行李的苏联边防人员告诉旅客：火车可能要在这一站停上一天。伊莎多拉不愿把自己关在不动的车厢里，于是就去村庄转转。她独自一人，因为那位机要员不能撤下他的旅行袋，艾尔玛则还未醒来。

在农村集市上，伊莎多拉买了鲜花和带回车里用做早餐的覆盆子。过了一會兒，她又和艾尔玛一起下车去那里散步，顺便访问了当地的学校。

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她们像两个彩衣笛手，后面跟随着一大群穿着杂色衣服的青少年。在她们走上火车以后，伊莎多拉叫让娜拿出手提唱机和唱片，在车站的月台上给这些睁着好奇的大眼、兴奋异常的孩子们举行了一次音乐会，还给他们上了一次舞蹈课。

然后，她们为他们跳了一小段舞蹈做为示范。

这次聚会以伊莎多拉从午餐篮子里取出白面包和糕饼分赠孩子们而告终。她把能在行李里找得到的糖果和美味的点心，都一股脑儿地给了他们，一点也不考虑到以后的几天里，她们必须勒紧腰带。

傍晚，火车开不动了，他们决定带上一听雷瓦尔的青鱼和一些鱼子酱到村里去野餐，这是篮子里的全部佳肴了。

火车直到深夜才决定驶向彼得格勒，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放气、鸣笛、停留，终于磨磨蹭蹭地在第二天上午十时到达目的地。

伊莎多拉一行被人用车从车站直接送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所在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那里当局已为她们安排好一个房间。

休息片刻，她们就去游览市区。伊莎多拉对彼得格勒有特殊的好感，但现在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看着空荡荡的久未擦洗的商店橱窗，看着紧抱着一小包一小包食物匆匆而过的行人，她不禁回想起这座城市昔日的奢侈与繁华。没有一点感伤的成分，她记得 1905 年和 1908 年为她举行的盛大的贺宴。

她沿着泥瓦河的码头缓缓走去，一眼望见斑斑驳驳、破烂不堪的一些宅第。

“这座房子是米哈伊尔大公爵送给巴莱琳娜·克斯钦斯卡娅的礼物，1905 年我在这里时她对我是那么和蔼可亲。那边那座带着贝壳般大小裂口的房子一度属于公爵未亡人，我演出时，她场场必到……”说到这里，她黯然神伤。

最后，她来到冬宫，知道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用做儿童医院时，她对新政权的信仰油然而生。

回到德安格尔特勒旅馆，她们发现四个身着希腊式长袍的年轻陌生人正等在那里，以便向这位舞蹈家表示她们的敬意。她们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得知她已到达彼得格勒。后来从谈话里，才发现原来新希腊乐队的一位负责人有两个女儿，她们曾经做为译员帮助过伊莎多拉的学生和养女艾尔玛·邓肯在 1914 年 4 月那次给俄国孩子们的授课。那时，艾尔玛为了替伊莎多拉创设在贝尔维的舞蹈学校选拔学生，曾经到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在她们走出房间以后，伊莎多拉非常高兴，她冲着艾尔玛大声说：“这不是很好吗？如果我接见一些人，并且客客气气地对待她们，要不她们和你或者我的其他一个学生接触，回去就创办传授邓肯舞蹈艺术的学校。再不然，她们脱下鞋子，自己就练起舞来。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成了笑料。如果所有自称为我的学生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那么足可以从这里穿越西伯利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转一个来回！”

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车于午夜发车。火车噗哧噗哧费力地行驶着，几乎每一个小站和交叉点都要停一停，而且停的时间很长。一群群的农民，携家带口，背上背着铺盖，手里提着茶炊，簇拥在每一个车站上。她们听说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为的是搭车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

旅行，即便是短途旅行，也是难之又难。在正常情况下，从彼得格勒

到莫斯科只需 14 个小时的时间，可她们却足足走了 28 小时！火车于 7 月 24 日早晨 4 时徐徐驶入莫斯科车站，那天正是星期天。

尼古拉斯基车站空空荡荡，漆黑一片。

一进入莫斯科市郊，伊莎多拉一行就感到十分兴奋。但当她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她们时，心就凉了一半。车站上没有欢颜笑语，没有鲜花和拥抱，就连问一声“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另外几名旅客走下火车，匆匆走出这个冷冷清清的车站，他们知道目的地已到。

伊莎多拉向同车到达的那位年轻的机要员表示了她的这种惊讶，后者十分同情。她毕竟是做为苏维埃政府的“贵宾”来到俄国的。她的来踪去迹，即便在欧洲或美国那些最偏僻的地方，也会在当地居民中引起很大的轰动。可是此时此地，这位受一个伟大的政府邀请的举世闻名的贵宾，居然被人扔在车站，连派一个门卫迎接一下，告诉她一声到哪里去的人也没有。

“在车里等一等吧，”那位机要员说，他和伊莎多拉同样着急。“我到外面看看，有没有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等您。也许外面候车室里有人，要不接您的人在车站广场上的汽车里睡着了。”

过了一会，他回来了，报告说外面只有一辆接人的车，是外交部的一名职员前来接他，把他的公文递送箱带到最后的目的地。如果她愿意的话，他说，他可以将邓肯夫人以及其他两位女士同车送到外交部。到了外交部，他一定能弄清给她们的膳宿安排的哪里。

这种连最起码的工作上的安排也如此缺乏考虑的作法，使她们无法理解。

这几位疲惫不堪的旅客沉默寡言地跨进了那辆小红车，飞快地行驶在灯光暗淡、行人稀少、用鹅卵石铺砌的街道上。车子驶过高墙围起的广场，驶过幽暗的高楼大厦，驶过大大小小的教堂——它们的圆顶和屋顶小阁，在溶溶的月色中神话般地浮现出黑色的剪印。

最后，那位机要员向司机说了一声，车子就在勒克斯旅馆的门前戛然停下。

这位机要员以为那里可能有订好的房间，他进去问了一下，才知那里没有她们的房间。当然，人家不会接受生客在这里住宿，勒克斯旅馆只对前来这个国家访问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开放。

这一行人于是驶向剧院广场。在一度曾是十分豪华的首都旅馆，苏维埃的第二号机构就设有那里。外交人民委员奇切林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办公。在这些女士们留在车里的时候，那位机要员将各类公文传递箱一一传送出去。

车子的马达声早已停息，广场上万籁俱寂。远处，克里姆林宫高大的围墙耸立在广场的那一边，整个场景就像俄罗斯民间故事里的一幅插图，完全不是现实世界。

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紧挨着坐在一起。在慢车里经历了三天异常兴奋但又累人的旅行，此时她们已筋疲力尽。她们顿时感到饥肠辘辘。从“巴尔坦尼克”号上登陆以来，她们还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她们很快就发现食品匮乏，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吃的东西，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购买，因为每人都由政府定量配给。早在第一天的火车旅行以前，午餐篮里的食品已经吃完。

车上供应的大粗黑面包，实在无法下咽。她们那由于不正常的进食造

成紊乱的消化系统，对此无能为力。

坐在敞篷汽车里，又饿又冷，她们感到无论是上帝还是人类，都抛弃了她们。她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滚烫的咖啡和松软的甜面包。在巴黎，她们想，在街道转角处，往往就有“车夫的集会处”；在伦敦，有露天咖啡座；在纽约，从浴室里的儿童售货机到镍币自动售货机，各式各样的购货方式任你选择。芬芳馥郁的咖啡和纯净的奶油，新出炉的面包。啊……

她们正想得入神，突然二楼的一扇窗子亮起了灯光，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口探了出来。他往下望了望坐在车里的人，想弄清这些坐在黑暗中的人究竟是谁。

她们一边拍手一边想，这才是她们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人影从窗口缩了回去。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黑色服装的高大男子从楼梯往下朝她们走来。他倾身向前，吻着伊莎多拉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

伊莎多拉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位说话的人，然后想起他的名字来了。他叫弗洛林斯基。

1918年她曾在美国见到过他，当时他和翁格恩-施特恩贝格男爵在一起，人们称他为弗洛林斯基伯爵。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止不住地大笑。这真逗！她们在莫斯科的心脏里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竟是弗洛林斯基伯爵！

他穿着无可挑剔的餐服和考究的皮鞋，呆呆地站在那里，弄不清是什么东西使她们感到如此好笑。

几分钟以后，她们被安置在弗洛林斯基的私人办公室里。

“你们累吗？”他问。

“因为饿，倒不太觉得累了，”伊莎多拉说。“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好好吃饭，我们不希望再吃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人还能在俄国吃东西！”

“怎么？”这位布尔什维克伯爵问道，“我刚从土耳其大使那里饱餐了一顿回来。”

餐桌上有鸡汤、油炸鸡、奶油白面包、各式各样的酒、还有美味绝伦的咖啡！”

但他的这番话无法使这两位饿得发慌的女士相信。她们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些东西，除非她们也亲自品尝到这些美酒佳肴。

为了证明他的诚实，弗洛林斯基邀请她们到附近的萨沃乌旅馆去就餐，那里他有一个房间。当她们在礼仪许可的范围内四肢舒坦地坐下，主人就点起火油炉。于是，他使出一个能人的手腕，他知道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把事情办得最好，他用奶油面包卷和不加糖的茶款待这两位饿极了的女士。

然后，他着手解决她们在这个旅馆里的住宿问题。但是旅馆里只剩一个可以出租的房间。当她们进入那个空房间，她们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床上既无床单，也无枕头。伊莎多拉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艾尔玛凑合着蜷缩在一张小沙发上。让娜她后悔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只能直挺挺地坐在一把独一无二的椅子上。尽管这样，她们也都进入了梦乡。但不久，她们为恼人的苍蝇大军所吵醒。当曙光照进房间时，它们便开始营营地四处出动。空气似乎也变得和它们一样污浊。它们比蚊子更爱在人的面颊上爬来爬去，飞去又飞来，弄得人烦躁不安。它们决不甘心让室内的外国住客舒舒服服地睡觉。

除了苍蝇本身以外，昆虫世界里其他更为微小的虫子，也同心协力地帮助它们完成这一任务。

当她们认识到再也无法入睡时，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索性就不睡了。盥洗完毕，她们便出去找她们的朋友弗洛林斯基，看看怎样和那些人取得联系，他们理应为她们的来到做好安排。

那天正是星期天，各级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弗洛林斯基试图摇通各个部门领导人家里的电话，首先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阿纳多尔·卢纳察尔斯基家的电话，他应该从雷瓦尔的苏维埃领事那里接到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俄国的通知。但是所有重要的官员，没有一个在家。他们全到乡间去消度这个7月的星期天了。

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弗洛林斯基提议干脆出去到克里姆林宫周围沿着广阔的环境莫斯科的林荫大道散散步。

几个小时以后，当她们回到萨沃乌旅馆的时候，她们仿佛觉得已经走到地球的尽头。

她们饥肠辘辘地走进餐厅，希望能吃上一顿美味可口的午餐。

在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圆桌，旁边还有几张小一点的桌子。在那张大圆桌旁，坐了大约12个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男人。他们头戴有边的帽子，身披外套。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洋铁碗里混浊不清、漂满油脂的汤，一边啃着大黑面包。

这就是同志们哪！尽管旁边有几张小桌子，足可以让她们三个人悠闲自在地下进餐，但是伊莎多拉还是想坐到大圆桌那边去。她兴致勃勃地和他们打招呼：“同志们，你们好。”她的脸上堆满了亲切坦率的笑容。

但“同志们”自顾自地继续喝汤。向旁边略略斜视一眼以后，他们又去从事他们喝光肉汤的大业了。

这样，她们这些新来的客人只好默默地坐着。同样用三口洋铁碗盛着的神秘莫测的肉汤，还有三个大黑面包推到了她们的面前。

伊莎多拉做了个手势，表示她想在市长的宴会上，一点一点地啜饮这碗肉汤，品味品味这种“女巫的饮料”。艾尔玛总算把汤匙伸到了碗里，但无法再把它送到嘴边。让娜这个女孩子，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看上去如同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的早期基督教徒。

和进来时一样，她们又饿着肚子走出了餐厅，回到临时住宿的房间。

立刻有人敲门。随着一声轻柔的“请进”，那位同车的机要员走了进来。他从自己的口粮里，给她们送来了一暖瓶的可可茶，还有一些白面包。这三位妇女对他真是感恩戴德，视为救星。她们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突然，让娜令人毛骨悚然地尖叫了起来。艾尔玛转过身去，只见一只彪形硕鼠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爬着。让娜紧接着又尖叫一声，从坐着的椅子上跳了起来。伊莎多拉从床上坐起，和她一起奔出房间。年轻的机要员试图诱捕那只硕鼠，但没有成功，它拣食了撒在地上的一些面包屑以后，又悠悠地回到浴缸下的隐身之处，有几只小耗子在那里吱吱直叫。

在伊莎多拉·邓肯遗留在莫斯科的几页草稿里，她粗略地勾画出了她打算撰写的那本有关俄国之行的回忆录的开头部分。她是这样写的：

我去俄国，伴随我的只有我的学生艾尔玛和我的忠诚的小保姆让娜。她虽然生活得提心吊胆，但始终不肯离开她的“太太”。在火车驶过飘扬在国境的红旗时，我们早已听到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说，所以对画中那些布尔什

维克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他们身穿法兰绒的红色衬衫，大黑胡子，口里噙着刀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三人为非作歹。

然后在一个夜晚，切断我们的喉咙，寻欢作乐。当我们看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年轻人，灰色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告诉我们说他只是共产党人的一名学生，能说六种语言，非常愿意为我们服务。我们承认，我们都感到非常激动，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失望。他很害羞，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那种布尔什维克。我发现，只有在谈到列宁的时候，他那双在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才发射出无限崇敬的光芒，他整个颀长的身体也因激动而抖个不停。他以颤抖的声音，讲述共产党员们如何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打退白匪军的进攻，把这场神圣的战争描绘得壮烈雄伟、有声有色。

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把让娜留在旅馆一个租来的房间里，她独自睡在床上，由于见到了“许多大老鼠”而歇斯底里地哭个不停。我们则和一个小布尔什维克一起在有着许多教堂和金碧辉煌的圆屋顶的神秘美丽的城市里闲逛。他大谈共产主义的未来，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东方发白，个个愿为列宁和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不久天上乌云密布，在我们的头上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们的这位向导似乎对挨浇毫不在意，我则念念不忘我们已有 14 个小时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后来见得多了，我才发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根本不在乎冷热、饥饿或者其他物质上的困苦。如同早期基督教的殉教者，他们完全生活在信仰之中，绝不考虑生活上的事情。而艾尔玛和我实在是困顿不堪，因此只好迈着沉重的步子，返回火车……

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仍然载着全部笨重的行李，停在车站的旁轨上。给了列车服务员一点小费之后，伊莎多拉、那位年轻人、艾尔玛设法打开了两间列车车箱的分隔间，在那里安安静静，甚至可以说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

当伊莎多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经 11 点了。怀着渺茫的希望，他们又在车站上等着，以为总会有人来带她们回旅馆——那个年轻人早上早已离开了车站。结果还是空等了一场。

她们决定朝市区的另一头寻找归路。这时天已大亮，笼罩着这座城市的神秘色彩也随之一扫而光，看上去显得那么荒凉和破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扑进她们鼻孔的气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典型东方式的。在大街小巷散了一个多小时的步以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借着辨别方向的卓越才能，最后总算找到了那个老鼠旅社。它的名称对一个熟知“伦敦卷心菜”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嘲弄。

据在旅馆等着她们的弗洛林斯基说，他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任何回音。她们只好坐下来，不知在这个旅馆里到底还要等多长时候。直到下午卢纳察尔斯基从乡间度假回来，发现桌上放着这位舞蹈家已经到达的通知，才派他的秘书接她到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房间里。

最后一切总算有了个着落。让娜歇斯底里发作，艾尔玛精疲力尽，她自己既疲倦又失望。所有这三个人，在经历了四天食无定规、休息不好，以及由于来到这片新的国土，开始了新的生活所引起的过度兴奋疲劳之后，对于能够被人送进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至少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不用害怕老鼠，不用咀嚼令人作呕的食物，就已心满意足。

教育人民委员为伊莎多拉·邓肯匆忙安排的住处，据带她去那儿的秘书说，是格尔采尔公寓。

格尔采尔是谁？她问。

卢纳察尔斯基的秘书圆瞪双眼瞧着她，仿佛她问他谁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谁是夏里亚宾。像她这样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居然不知道同时代人！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地向她解释道，格尔采尔是俄国最有名的舞蹈家，是莫斯科歌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她和安娜·芭甫洛娃属于同一学派，又是同时代人。

这位秘书接着说，当卢纳察尔斯基见到他桌上的条子，得知邓肯已到俄国时，他有点不知所措。

对于伊莎多拉是否真的会放弃欧洲那些大都市的舒适生活，前来动荡不安的俄国生活和工作，他确实没有多大把握，因此他没有为她安排住处。那时，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共产党的官员和政府办公人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招待邓肯这样的一位贵宾。（当时，世界各国都称她为“伊莎多拉”，只有俄国，自从她1905年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以来，一直称她为“邓肯”。）

在什么地方为邓肯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呢？卢纳察尔斯基想起了莫斯科空着的格尔采尔公寓。当时邓肯正在俄国南部旅游观光。这位人民委员按照共产主义早期的一般作法，征用了这座无人居住的公寓，并派他的秘书按这位贵宾。他可能政务繁忙，但不妨设想一下，即使仅仅为了弥补前一天的接待不周，他也应该拜访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宾。她初到莫斯科，人地生疏，他理应亲自陪她去住宿的地方。但一直过了好几天，伊莎多拉才初次见到这位先生。在这以前，她已数度和他函电往来，告诉他她即将前来莫斯科。

在她终于弄清事情正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之前，伊莎多拉想到，让她住进格尔采尔空下的地方确实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她认识到，芭蕾舞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无产阶级国家的联系，其情况就像宝石倒退成装在大金盘里的甲鱼。芭蕾舞一向受到皇家贵族的支持和赞助，它是一种非常贵族化的娱乐。背弃自然界的引力定律和个性化的意愿，从姿势到动作，与大自然极不协调，由此所产生的无生气的动作，创造不出未来，只能随生随灭。”

她怀着创建一个自由舞蹈学派的雄心壮志来到俄国，按照她的设想，它将以美丽和自由的动作产生的巨大力量最终推翻掘壕固守的呆板保守的芭蕾舞，就像工人阶级推翻保守的帝国统治者。但她对莫斯科芭蕾舞所占有的牢固的地位估计不足，因为它得到学校和政府的资助。莫斯科的芭蕾舞还是老的一套，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对它没有大的影响。

以偶像破坏者泰罗夫、格兰诺夫斯基和迈耶霍尔德特的作品做为典型，艺术和戏剧的改革在莫斯科其他一些剧院进行，只有芭蕾舞艺术仍旧我行我素，像波旁家族一样，“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物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人活到50岁，就会像一个女芭蕾舞演员那样，情不自禁地爱好收藏。所有这些贵重的礼物既无法排斥在视线以外，又非常容易打碎。伊莎多拉自己从不收藏这么多的小玩意儿，她总是设法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帷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住在女芭蕾舞演员这样的公寓里，宛如置身在室内装饰师的梦魇中，深怕一不小心把一个法国塞佛尔产的花瓶或德累斯顿造的牧羊女碰落地上，摔个粉碎，这使得伊莎多拉终日提心吊胆。最后，她终于失手打破了一盏制作非常精致的陶瓷台灯。

伊莎多拉安顿好住宿后，第一位到公寓来访的客人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她第一次来俄国时，他曾经是她最初的赞赏者之一。自从那时以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浓厚的友谊，互相尊重彼此的

天才。

这两位者朋友在一起时彼此有很多话可谈，两人都衷心地喜欢互相来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但对这位舞蹈家非常敬慕，他对外界其他一些富于才智学识的人也很乐意结交。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不是个政治家，因此在革命的年代里，没有少吃苦头。他比以前老了很多，但他那张富于表情的脸，仍然保持着先前的全部魅力。

他向伊莎多拉谈及所有他的老朋友以及他正在从事的新工作。他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能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

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几天以后，他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

她们坐在他的包厢里，观看演出。

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台钢琴。这似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歌剧的初次实验。此后，他的第二研究室相继排演了许多歌剧，其中《卡门》、《佩里肖勒》、《安哥特夫人》等还在纽约上演。

他急想知道这两位客人对这项新工作的看法。做为一个老朋友，伊莎多拉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她对歌剧一向不感兴趣。确实，她也曾经非常鲁莽地把类似的话告诉过最伟大的歌剧作家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

“音乐剧简直是胡闹……人必须先说，然后才唱和跳。说话是主宰，一个有思想的人才会说话。歌唱是抒发感情，而舞蹈则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心醉神迷，它使人忘记一切，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这三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混合在一起。音乐剧根本不存在！”

她反复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陈述这些意见，并且说，无论如何不值得为《叶甫根尼·奥涅金》多费力气。她以这种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用心良苦的“实验”，实在有点儿太感情用事了。最后，她用这些话结束了对他的评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您应当更加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是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埃莉诺拉·杜丝扮演阿加娃埃，我和我的学生们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在她住进格尔采尔公寓以后没过几天，弗洛林斯基前来探望她们。当时，伊莎多拉正要坐下来与几位新结识的人——大部分是房东的朋友——共进午餐。他们似乎热切希望能为这位新来的客人倾销掉存放着的听装果酱和食品，这些都是她在伦敦的时候戈登·塞尔弗里奇送给她的。弗洛林斯基前来征求伊莎多拉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都将出席这个晚会。他的车等在门外，可以把这位舞蹈家送往那里。

想到将面对面地会见这些为革命而斗争并建立了新政权的大人物，她不禁一阵激动。

在她的想象中，正像后来她所解释的那样，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像托尔斯泰的信徒们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上围着一轮光圈。

于是，她赶紧换装，换了适于这种场合穿戴的服饰。她身穿她最喜欢

穿的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上一条猩红色的开士米围巾——她过去经常披着这条围巾跳革命舞和《马赛曲》。1927年9月14日晚上，她披的也是这条围巾。她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类似某些东方国家妇女所戴的头巾。然后她匆匆披上斗篷，和弗洛林斯基一起去初次会见共产党的领袖们。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这座建筑物坐落在莫斯科河以南，面向克里姆林宫，原为一位俄国皇帝所有。从它内部的装饰，可以看出这位阔佬的审美趣味之低。

容光焕发、激动异常的伊莎多拉，由她的护送者伴同进入一间大会客室。

这个客厅以路易十五式的风格装饰得有点儿过份。在客厅中央的一张桌子旁，坐着所有的同志。他们衣冠楚楚、心满意足、庄严非凡。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对那位站在大钢琴旁、柔声歌唱一支法国“牧歌”的女士感兴趣。

年轻的姑娘  
莫虚度年华，  
紫罗兰  
在春天采摘……

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穿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法国画家瓦多所作的跳着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和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

那位演员唱完《牧羊姑娘》之后，正想接着唱《爱情小调》，这时怒不可遏的伊莎多拉走到了大厅中央。

“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她大声说，“沉迷在这种可笑的滑稽动作里，和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样。在这里，你们也像他们一样地坐着，在这个到处都是拙劣的艺术和根据低下的审美观制作的家具的大厅里。你们也像他们那样欣赏着这种平淡庸俗的音乐，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你们只不过是夺取了他们的位置。越变，越和他们类似。

“你们进行了一场革命，你们首先应该抛弃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可惜的遗产，可是你们却比希律还要希律。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资产阶级。你们是篡位者！”

大厅内鸦雀无声。伊莎多拉像一个复仇的天使，身披炽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辞，仪态大方地步出了大厅，后面跟着她的惊惶不知所措的护送者。

这时，大厅里一片喧嚣。只有当坐在桌旁的几位级别较高的领导人用新的目光环顾四周，认为这位外国同志说的并非毫无道理时，大厅内才安静下来。但这件意外的事终于引起不少议论，甚至卢纳察尔斯基后来写的有关这位舞蹈家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这件事。

伊莎多拉回到格尔采尔公寓，距离她出去赴会的时间仅仅半个小时。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兴致勃勃地告诉她的朋友们，她是怎样走进共产主义者的晚会，又是怎样离开那个晚会的。她以哑剧演员的卓越的演技和无所不在的幽默感，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位上流社会的女歌星和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听众，逗得朋友们个个开怀大笑。

几天以后，声纳察尔斯基前来拜访她。这位很有文化修养的作家兼剧作家花了不少时间和她谈论她在苏维埃俄国的生活、艺术和未来。

8月上旬，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可是有关学校的事情还是一无进展，新的住处也没有落实的迹象。伊莎多拉心急如焚，深怕这次俄国之行一无所获。她最怕无可奈何的闲散，渴望能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消磨时光，白天她在城里散步，晚上常去剧院闲逛。在那些日子里，剧院都可以随便出人。

8月就这样过去了，学校的筹建还是音讯杳然。卢纳察尔斯基派了他的私人秘书和远东共和国的主席克拉斯诺斯特乔科夫同志带伊莎多拉去察看了马拉科夫卡的一个儿童聚居地。在他们参观了房屋和场地之后，伊莎多拉将孩子们聚集在她的周围，给他们上了一堂舞蹈课。他们除了有节奏地向她齐声致敬外，还给她跳了一些农民的舞蹈。她通过翻译对他们说：“你们跳的是奴隶的舞蹈，所有的动作都向着土地。你们应该学习自由人的舞蹈：头向上抬，双臂伸向前方，仿佛以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拥抱整个宇宙！”

她一回到城里，又只好照旧等待。白天一些熟人来访，再就是散步，到剧院和音乐厅游荡。在前来看望伊莎多拉的人当中，有许多是格尔采尔公寓的熟人，他们似乎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爱慕从一个舞蹈家身上转移到另一个舞蹈家身上。其中之一便是本涅克托夫先生，他是作曲家兼艺术商。尽管每个人都定量配给食品，但他总能设法搞到各种各样的美酒佳肴。

在这个月的下旬，一天，他邀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到他家共进午餐。

伏特加配鱼子酱，禽肉下勃艮第葡萄酒。餐末咖啡后饮的小杯烧酒是上好的老牌科涅克产的法国白兰地酒。这席盛宴和伊莎多拉凭定量配给做出的饭菜有天壤之别。除了美酒佳肴以外，还有听装浓肉汤、果酱和戈登·塞尔弗里奇先生制作的薄脆饼干。这种鲜明的对比使伊莎多拉大为惊讶。用餐完毕，她不禁高声喊道：“噢，这和里茨一模一样！”

然后，一些乐师走了进来，为客人们演唱助兴。这些亲切友好的主人为了表示对她的爱慕，送给她一幅意大利早期的绘画，画面上是三个天使模样的音乐家。（伊莎多拉后来把这幅油画挂在她的卧榻旁边的墙上，并且常常谈到其中之一很像诗人叶赛宁。）

午宴过后，主人决定下午唯一消遣的办法是乘汽船出游，沿河道流而上，航行到麻雀山。1812年，拿破仑就是从这个居高临下的地点最先俯视莫斯科，然后再进入该城的。

这个城方是莫斯科人的游览胜地。站在高处，特别在日落时分，人们可以观赏该城的壮丽景色：圆屋顶和塔尖，还有莫斯科河的峡谷，沐浴在落日的余辉中。

当伊莎多拉和她的友人们登上树木荫翳的高处，漫步在丛林之间，偶然碰到了一名男子，这个人日后成了这位舞蹈家终生敬慕的人物，他就是波德沃斯基。在10月革命初期，是他鼓舞了红军的斗志。由于1917至1920年的紧张的战役和艰苦的生活，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麻雀山疗养。当时他是体育教育人民委员，带领一批运动员从事体育场的建造。

这位陌生的男子给伊莎多拉的印象非常深刻。她通过翻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到家以后，和这位生气勃勃的人士的接触仍使她感到非常激动。她坐下来写下了对他的印象。

她认为，她应该向全世界宣传这样的人物。

当她用文字描绘出他的肖像以后，便把稿件寄给了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说也奇怪，这位编辑不但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送给作者一张支票以支付稿酬。收到这张支票后，伊莎多拉心情非常激动，比以往每次得到舞蹈演出的大笔收入或者她的崇拜者们的热烈掌声还要使她高兴。她长期保存着这一张支票，因为它代表着第一次靠她的写作赚来的钱。最后，当食物变得越来越紧张时，她只好将它换成了钱币，用这些钱给她的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在她写出那篇描写波德沃斯基的文章以后，伊莎多拉决定第二天乘船去麻雀山，希望能在那里再见他一次。她们从一艘小汽船上岸，然后在树林中寻找这位人民委员，可是遍访不着。于是她们就躺在河边斜坡上的一棵白桦树底下休息。后来，波德沃斯基就在那里见到了她们。

在伊莎多拉访问麻雀山以后，波德沃斯基夫人邀请她和艾尔玛住到她为她们安排好的一所拥有两个房间的简陋的木屋里。时时萦绕伊莎多拉心头的像波德沃斯基家那样过一种简朴生活的想法，由于没完没了地等待筹建学校的通知而迟迟未能实现。她住在格尔采尔公寓里，感到非常沉闷，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更多的自由。

刚到小木屋的那天，只穿了白色束腰外衣和赤脚凉鞋的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出去沿着河边散步。当她们走累了的时候，就坐在遍植树木的河滩上休息。在河流的弯曲处，迎面驶来一条小船，船里坐着四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显然他们对穿着白衣服的这两个人感到好奇，于是摇桨的人把船径直划向岸边，并停泊在那里，然后爬上岸来。他们还没有走到她们两人坐着的地方，就已认出了伊莎多拉，其中之一还要求给她们拍个快照。

伊莎多拉同意了他的要求，然后这位男子把她介绍给他的同伴们。这一伙人的头头是米哈依尔·鲍罗廷（后来曾来中国当顾问），他从美国来到俄国，原是芝加哥一所中学的教师。那天和他在一起的是几个德国的革命者，他们由于红色暴动失败而逃离了巴伐利亚。

伊莎多拉颇为鲍罗廷所吸引，这一方面是由于只有他一个人会讲英语，另一方面可能也由于在这一伙人中间他长得最英俊——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

总而言之，他很有教养，很讨人喜欢。他们促膝长谈，直至日落时分。伊莎多拉很关注鲍罗廷，他对她也十分友好。

转天，他和他的朋友们驾车出城，来到伊莎多拉的小木屋与她共进午餐。午餐桌上有山羊奶，有让娜用几个来之不易的禽蛋做成的煎蛋卷，两个生西红柿，还有面包。几天来连续不断地啃黑面包，嚼鱼干，使得这几位共产主义者认为这顿午餐简直丰盛无比，烹饪技术也无懈可击。

午餐后，他们一起出去在田间的公路上散步。伊莎多拉和她的黑眼睛的侍从走在大伙儿的后面，她为鲍罗廷跳起舞来，并以她最富于魅力的方式将玫瑰花瓣撒向他的身上。

但是鲍罗廷，一如波德沃斯基，始终不为所动。他俩终于没有卷入风流韵事。伊莎多拉毕竟只是一个舞蹈家，这位共产主义者能以他的政治生涯做为代价来报答她的友情吗？尽管看来她对他是那么富于魅力，那么亲切友好。

麻雀山的其他一些居民得知伟大的伊莎多拉·邓肯生活在他们中间，

为了向她表示敬意，就在附近的一所大疗养院里为她举行了一个欢迎会和音乐会。来宾中有一位老人，人们为她指明，“布朗斯坦先生，托洛茨基的父亲！”

他走到这位尊贵的客人面前，等待介绍。伊莎多拉向他微笑了一下，用德语说了一句：“我为您有那样一个杰出的儿子而表示祝贺。”

在伊莎多拉离开之前，他请她在第二天下午去和他一起喝茶，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伊莎多拉在麻雀山度过一周的简朴生活后，决定搬回市里。她在麻雀出所饱尝的种种困苦使她终生难忘。此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促使她决心离开极为原始的小木屋回到莫斯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官员终于设法在一所大楼为她找到了一个住处，并表示这座楼也可以供学校办公和学生们居住。

这座被征用的房子坐落在一度十分繁华的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上，是一所私人住宅。

房主是一位名叫乌什科夫的富裕的茶叶种植园主，他的妻子芭拉乔娃是莫斯科芭蕾舞剧院名闻遐迩的台柱。

从一位芭蕾名媛的寓所来到另一位名角的公馆，这使伊莎多拉觉得非常有趣。她在取得进展！她思忖着还需要多少时间整个芭蕾界就会在她的自由奔放的艺术特色面前甘拜下风。

房主和芭拉乔娃女士在数月前双双逃离俄国，奔往巴黎这一众多俄国移民的避难所。

那时，伊莎多拉正在为赴俄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她急于出租位于帕西豪华大街的那所住宅，一些人闻讯赶来察看这所带有宽敞的演出室的房屋，其中一位俄国妇女对此最感兴趣，表示她极想找到一个住处。她刚到巴黎不久，希望在此安居。她看过伊莎多拉的房子和演出室之后，决定不租用这所房子——里面没有餐厅！后来，人们得知“这位需要一间餐厅的俄国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斯科芭蕾皇后芭拉乔娃。

而现在，伊莎多拉在莫斯科却恰恰搬进了芭拉乔娃的寓所，这种奇妙的巧合曾多次发生在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假使那位芭蕾明星租下了豪华大街的住宅，随后又听说伊莎多拉在莫斯科住进了她的房子，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呢？她会不会大喊“一报还一报”而拒付房租？实际上，后来租用这所房子的那个俄国人很少寄来房租，只有在律师表示抗议的信件、便条纷至沓来，伊莎多拉的朋友们登门质问之后，他才寄出少许租金。尽管一向对钱毫不在意的伊莎多拉只索要低得可怜的租金，并要求按季度用法郎付款。

芭蕾舞星逃离莫斯科之后，官方在她的闺房以及他俩卧室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10月革命后，政府将这座房屋充公时仅为富有的主人保留了这两个房间，其他房间则最大限度地挤满了众多无处栖身的家庭。被查封的两个房间里的艺术品自然已被人搬走了，巨大的桃花心木卧床以及其他最好的家具也无一例外。

除了钢琴、餐厅里沉重的橡木家具、几张长靠椅和沙发，以及其他一些无法轻易拿走或搬走的笨重物件以外，整座住宅里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都已搬运一空。不过，人们仍可以在这里看到腰缠万贯的俄国资产阶级对室内装饰的庸俗奢侈的爱好。天花板一律经过油漆装饰，每个房间的格调各不相同。

在伊莎多拉选作她的房间的那个宽敞的卧室里，除了一顶巨大的罗伞

外，昔日雍荣华贵的物件都已杳无踪影。

伊莎多拉将几条色彩各异的丝围巾盖在烛台上，又把几小块毯子铺在长沙发上，使房间很快失去了原有的令人不悦的格调。随即，她撤掉了那把带有雄鹰的孤零零的罗伞。

后来，当天气转冷时，她砌起了一座俄国式的砖炉。伊莎多拉将这些安排就绪后，便开始考虑筹建学校的问题。

其他房客们被逐渐赶走了，一间间房子腾了出来。伊莎多拉将这些房间收拾停当后，便向当局要求招收学生，开始办学。

伊莎多拉希望招收儿童，但当局却将一批成年人送到芭拉乔娃的住宅。

他们都成双结对地赶来：两个守门人、两个侍女、两个秘书、两个打字员、两个厨师，等等。两位厨师身穿一尘不染的亚麻布罩衣，头戴熨烫得十分妥贴的白帽来到了厨房。然而他们发现这里连一只砂锅或水壶都没有。当他们终于弄到包括必不可少的茶炊在内的厨房日常用具时，却又发现没有东西可供烹调。

莫斯科对全体居民实行配给制。身为艺术家的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邓肯享受脑力劳动者的供应，领到一定数量的白面、浓鱼子酱、茶叶和白糖。

每隔两星期，让娜就要拎着大菜篮到克里姆林宫分配办公室为她的女主人同志领供物品。每当让娜将食物领回家后，一贯慷慨大方的伊莎多拉总要举办“烙饼宴会”，款待她的所有的朋友们——他们大多是半饥半饱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似乎都在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短短几小时内，领来的白面就全变成了烙饼，鱼子酱也全都抹在了饼上。

烙饼宴会过后，两位头戴白帽的厨师就只能在土豆上施展他们的烹调技术了。每餐他们都端上用若干方式烧煮的土豆，而土豆经过水煮、油炸、捣碎等加工后，确实变得美味可口。

伊莎多拉在新家定居后不久，列昂尼德·克拉辛前来拜访。他们在工作室里用餐——在这间阴郁的哥特式餐厅里，伊莎多拉已用她著名的蓝色帷幕遮住了令人抑郁的橡木镶板，并在光秃秃的地板上铺好了她的蓝绿色地毯。伊莎多拉款待了这位尊贵的来宾。

当在场的一位青年小提琴家奏起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时，伊莎多拉款步走向房间的尽头，在微弱的灯光下，开始婆娑起舞。这首歌颂母爱的动人心弦的诗篇——她的最富艺术魅力的创作之一——是她在新的工作室里演出的第一个舞蹈。

年轻的钢琴师皮埃尔·吕博斯希特兹来到这里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便能将一些空闲的时光用来练习舞蹈和编排新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内，伊莎多拉根据斯克里亚宾的乐曲创作了两个舞蹈。当她们为朋友们表演这两个曲目时，他们深为倾倒。借助于俄国作曲家的这两支练习曲，舞蹈家凝炼地表现了饥荒给伏尔加地区带来的恐惧和冷酷。这两个舞蹈具有一种强烈的恐怖之感，一种可怕的力量，能够打动苏维埃俄国最顽固、最冷酷的对手的心。

10月中旬——伊莎多拉·邓肯从伦敦启程三个月后——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孩子们。

他们成百名地蜂拥而至。

然而许多人应征而来，但只有少数中选。在参加考试的孩子们中，伊莎多拉只选拔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做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直到12月3日学校正式成立接收寄宿生，这些孩子们才每日前来学习伊莎多拉和艾

尔玛教授的基础课程。

10月的秋日寒意渐浓，白昼缩短，大家开始为过冬担忧。她们原以为这里气候温暖，身边未带任何皮衣或厚衣服。

她们向克拉辛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大家到仓库里去挑选衣服，并为她们开了一张单据。

当大家兴致勃勃地驱车前往仓库时，艾尔玛对伊莎多拉说，既然可以免费挑选衣服，那就应该选择一些质地优良的黑貂皮外衣。

伊莎多拉对此不以为然。

“我们应该同劳动人民一样。我们要挑一些农民们爱穿的质地不错的羊皮外衣，就像那两位妇女穿的，”伊莎多拉指着在街上慢吞吞地行走的两个农妇说道，“难道这两件衣服不漂亮吗？”

到达仓库后，映入她们眼帘的物品足以使任何一位毛皮商人羡慕得发疯。一排排衣架和挂钩上挂着外衣、轻便女大衣、皮围巾、女用长披肩、斗篷、头巾，以及用世界上最昂贵的毛皮制成的皮毡。

审视所有这些珍品花去了她们不少时间。她们在这些毛皮制品中间来往穿行，用手抚摩抚摩毛皮，看看是否柔软。伊莎多拉挑了一件缀有貂皮的女式上装，这是她所见到的样子最难看的一件。从这件上装那对长及膝盖的袖子判断，至少是19世纪末的产品。

她为艾尔玛挑了一件式样陈旧的、很长的水貂皮女式上装，领子是用黑貂皮做的。

挑选完后，她们一起走出仓库，各人的胳膊里都挎了一件长袍。到了办公室，她们被留住了。那里的官员告诉她们，这些上装必须经过估价，然后才能出门。

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些毛皮衣服还是音讯杳然。伊莎多拉叫一个秘书给仓库打电话，对方告知：如果邓肯同志愿付几千金卢布或几十亿纸币，当然可以把那两件上装送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她府上。

毛皮上装之事的余波几个星期以后才告平息，当时伊莎多拉正在剧院排演。她自己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已排演完毕，正要让孩子们排演。这时第一小提琴手看了看表，准备起身告退，因为他的时间已到。

在译员的帮助下，伊莎多拉对他说：“您知道，孩子们已在四面透风的舞台上站了好半天，耐心等待排演。”

这位第一小提琴手不作回答，他向其他乐师示意，他要再次起身告退。

伊莎多拉也再次向他提出：“我已经来到这里用我的艺术培养这些俄国的孩子们。

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已经做出了不少牺牲。当然，同志，您也一定能让这些孩子们牺牲几分钟继续伴奏。”

这位第一小提琴手冲着译员咆哮着说：“是的，我们知道她到俄国是来干什么的。

她来这里，为的是免费索要貂皮上装。”

随着一阵哈哈，他们一个一个走下乐池，离开了排演场。

受到这样的屈辱，伊莎多拉难受得几乎要哭出来。但她克制住自己，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继续为演出进行排练。即将来到的这场演出，是专门免费为莫斯科的工人们举办的。

### 第十三章 与诗人叶赛宁结婚

在谢尔盖渴望见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的狂热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但是我觉得，您最好教教我，当我想吻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时应当说什么……以及类似的话。”

伊莎多拉·邓肯在7月离开伦敦之前，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算过命。那个衣着入时的算命女人对她说：

“你将要长途旅行去一处天空淡蓝色的地方。你会富有，非常富有。我看到遍地黄金，有百万，甚至亿万黄金。你将结婚……”

听到这里，伊莎多拉对算命人淡然一笑，不愿再听那些无稽之谈了。因为，虽然她知道自己将要远行，而且她也想象自己能富起来，即使成不了亿万富翁，也能成个百万富翁，然而，她无法认真地听到有人对她说，她会在伊甸乐园的这一边结婚。

她到了俄国之后，发现卢布的价值跌到那么低，即便买一盒火柴，也必须花费一笔数量惊人的卢布。按照这种情况，伊莎多拉确是比百万富翁还要富上许多倍。而且，此时那个算命人的最后一句话应验了，她于11月初在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

谢尔盖·叶赛宁生于1895年。像伊莎多拉·邓肯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幸家庭的孩子。

在他童年时，父亲就和母亲分居了，起因是母亲又生了孩子，而父亲不承认是自己的。

这样，小谢尔盖基本上是由爷爷和奶奶带大的，所以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孤儿。

在青少年时期，叶赛宁并不热衷于玩闹和诗歌，他是个多情的种子，喜爱女性。大约在15岁左右，他爱上了一位朋友的妹妹安娜，甚至梦想长大后与她结婚。后来，他和另外一个乡村姑娘玛丽娅·巴尔扎莫娃有过一段恋情。

1913年，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厂，叶赛宁结识了年轻姑娘安娜·伊兹里亚德洛娃，不久他们便同居了。1915年初，他们的儿子尤里出世了，叶赛宁刚刚19岁便当上了父亲。

但几个月后，他便离开与他同居的女人和他的儿子，离开莫斯科，动身到彼得堡求名去了。

1915到1917年间，叶赛宁名气大增。1917年秋天，他第一次结婚，他的妻子吉娜依达·拉依赫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但当时她去彼得堡一家报社当秘书和打字员。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4年，其间吉娜依达生了两个孩子——女儿塔吉娅娜1918年出生，儿子康斯坦丁生于1920年初。1921年10月，他们离了婚。

谢尔盖·叶赛宁生性风流。即使是在与拉依赫、邓肯和托尔斯塔娅（他

的第三个妻子)的婚姻中,他也到处留情。不过他对女人的态度并不热情和友好。在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情诗极少。这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有人甚至猜测叶赛宁有同性恋倾向。

叶赛宁被认为是 10 月革命后的作家群中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他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对蓝眼睛和两道拧在一起的金黄色眉毛。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阿尔蒂尔·兰波身上的某些素质。小时候,他曾在叔父的农场里看马。他既漂亮又早慧,因此引起了他出生的那个村庄——梁赞州的康斯坦丁诺沃村中的主教的注意。这个神父培养教育他,并把他送到圣彼得堡的学校去读书。叶赛宁在那里依然那么英俊聪慧,引起了诗人克洛耶夫的注意,便收他为徒。有人甚至把叶赛宁引荐给皇后。皇后对这个初露头角的金发碧眼的年轻诗人的兴趣,似乎不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积极投身革命。革命后,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并加入了由诗人和小说家马里恩戈夫创立的追求词藻华丽的意象主义派。

在马里恩戈夫写的一部名为《一部没有谎言的小说》的小说中,记述了两位诗人在艾尔米塔什公园的一个夜晚。著名的未来派艺术家、卡梅尼剧院的舞台制景人乔治·亚库洛夫向他们走来,并且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引荐伊莎多拉·邓肯吗?”

叶赛宁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她在哪儿?在哪儿?”

“在这儿。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叶赛宁一把抓住亚库洛夫的手说:

“立刻带我们去见她!”

我们起身去找伊莎多拉。从镜厅找到冬季剧院;从冬季剧院找到夏季剧院;从夏季剧院找到轻歌剧剧院;从歌剧院又回到了公园,找遍了所有的长椅。但是哪里也没有伊莎多拉·邓肯的影子。

“真糟糕!她准是已经走了。”

“这儿,乔治,到这儿来!”

于是,我们再一次跑到镜厅,又去了冬季剧院,然后从冬季剧院再到轻歌剧剧院,然后是夏季剧院,最后回到公园。

“乔治,这儿,到这儿来!”

我说:“怎么了,谢尔盖?什么事让你这么焦急?”

叶赛宁闷闷不乐,心烦意乱。此时此刻,在谢尔盖渴望见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的狂热焦躁、莫名其妙的愿望中,似乎有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这个女人将在他的生活中起到那样巨大、那样可悲的作用。

过了一些日子,伊莎多拉到亚库洛夫的工作室去喝茶。

房间里聚集了许多艺术家和诗人,但叶赛宁未在其中。主人很失望,因为叶赛宁在伊莎多拉离开之前没有到来。

亚库洛夫安排在下周举行一次晚会,并询问伊莎多拉是否愿意再次光临。

伊莎多拉与这些狂放不羁的艺术家朋友们在一起感到如鱼得水,所以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这样欢快的晚会在那个时代是极少的,而且机会难得。因此,在晚会的那天晚上,伊莎多拉穿上了她最喜欢的鲜红礼服,做了头发,洒了香水。她像是在巴黎去赴朋友、女演员塞西尔·索雷尔家的晚宴一样。

伊莎多拉在午夜后来到亚库洛夫的工作室。当时正在那里的马里恩戈夫描述了她进门时的情形和后来发生的事情：

……她慢慢地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摩着他的鬃发说：“金色的头。”

当我们听到伊莎多拉说出这几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天使。”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魔鬼！”

凌晨4点，伊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伊莎多拉在她的工作室中招待一些朋友。在灯光幽暗、蓝色的帷幔直达屋顶的房间中，一片宁静，一片近乎虔诚的寂静，因为伊莎多拉刚刚跳了一段肖邦的玛祖卡舞。观众们看到，在他们眼前，一个优美的动作融化为另一个优美的动作，真是美的化身。钢琴的最后一个音符逐渐消失，伊莎多拉走向沉默无语、激动不已的朋友们。他们朦胧的眼睛表达了他们的谢意。这时，十二只脚重重地踏在楼梯上，六个醉醺醺的声音传上楼来。他们沙哑地笑着，说着醉意的笑话，破坏了那一刻神圣的气氛。

叶赛宁和三角琴从不离身的科乌西科夫领着一群意象主义诗人闯进了房间——伊莎多拉宁静的殿堂。

要是在别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会用比鞭梢还尖利的话语把闯入者驱逐出去，而此时，她却欢迎这些酒神和诗神的喧闹的信徒。

伊莎多拉见到他们高兴极了，她通过一个友好的翻译对叶赛宁说：“我要专为你跳个舞！”

她从长沙发上站起，要钢琴师弹一曲肖邦的华尔兹。她觉得这首曲子会投合这个金发诗人那颗抒情的心。她踩着舞曲的节拍翩然起舞。

欢乐的情绪多么热烈！优雅的舞步多么诱人！

音乐停了，她走向前去，脸上挂着天真的微笑，两眼闪光，双手伸向正与同伴高声谈话的叶赛宁，问他是否喜爱自己的舞蹈。

翻译转达了她的意思。叶赛宁说了些粗鲁野蛮的话语，他的话引起了她那些醉醺醺的朋友们一阵阵粗鲁野蛮的高声狂笑。做为翻译的那个朋友显然有些犹豫地对伊莎多拉说：

“他说你的舞跳得——很糟……他自己能跳得比你好！”

在翻译还没有把整段话向神情沮丧、含羞受辱的伊莎多拉翻译完时，诗人已经站起来，像个疯子似地绕着工作室跳起舞来。

三角琴响了起来，他那些狂放不羁的艺术家同伴大声地叫好。

由于这群喧闹的醉鬼的闯入，音乐、安宁、优雅、美丽——一切都从这个殿堂中消逝了。不一会儿，那些在那天晚上的早些时候还接受了祝福的朋友们，也跟着醉鬼们闹了起来。

1921年11月7日，苏联将庆祝二月革命四周年。卢纳察尔斯基问伊莎多拉，她是否愿意在将于那天晚上在大剧院举行的节日演出中表演舞蹈。

由于他们希望她是节目中唯一的舞蹈表演者，所以这次机会对她不顾那么多的诽谤和反对而来俄国的举动真是一次极大的荣誉和赞颂。于是伊莎多拉告诉友好的卢纳察尔斯基，能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第一次公开演出，她

将引以为荣。全部入场券将免费在工人组织和红军中分发。

伊莎多拉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乐曲《第六（悲怆）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

而且，她还依照《国际歌》编了个舞蹈，做为对观众的特别敬意。节日庆祝的组织者们得悉伊莎多拉的节目内容之后感到有些不安，是《斯拉夫进行曲》使他们担忧。他们知道，古老的沙皇赞歌《上帝保佑沙皇》中的几个小节编进了柴可夫斯基这一进行曲的乐曲中。尽管是在精心挑选的观众前，虽然不能十分肯定，但也足以激起可能引起反革命示威的熊熊大火的情感的火花。于是派卢纳察尔斯基同志去看一看，舞蹈家对这一乐曲的表演上是否有对国家不利之处。他来参加最后的排练，看着伊莎多拉在柴可夫斯基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中，摹拟表演俄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最终的解放。他离开剧场时，依然沉浸在舞蹈家所创造的感人的力量和罕见的悲剧美之中。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 3000 人，但是十倍于那个数字的热情洋溢的苏共党员想要一睹广为谈论的邓肯的舞蹈。

《真理报》、《消息报》以及所有的工人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报道了她是那样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这些读者们当然都渴望能抓住这个机会免费看她演出。

就这样，1921 年 11 月 7 日，伊莎多拉·邓肯为免费的“工人”观众表演了以柴可夫斯基乐曲伴奏的舞蹈。然而，入场券是谨慎地分发的，观众包括优秀党员、各部的人民委员、政府官员、各工会的领导和官员、红军代表，和所有的外国记者，等等。而在剧场外面的雪地里，站着伊莎多拉真正想为之表演舞蹈的人：那些不走运的工人；一群失望地跺着脚、簇拥推挤着的男男女女。一队警惕的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只能抵挡住他们不冲入剧场的大门。

节目的第一部分是在此种场合例行的政治讲话。当然，在这方面，俄国与其他国家庆祝政治独立日时的情形完全一样。但是，尽管俄国观众喜欢精采的讲话——越长越好——这次节日庆祝活动的观众却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卢纳察尔斯基的讲话上。他们尽量耐心地等待着邓肯在《斯拉夫进行曲》中出场。当卢纳察尔斯基以热情洋溢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讲话、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时，观众们全体起立，精神抖擞地唱起《国际歌》来。

关于伊莎多拉在庆祝节目中的演出，莫斯科《消息报》是这样评论的：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节日的艺术表演了。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的庆曲。伊莎多拉·邓肯是一位舞蹈家。但是，这不是在一般技巧意义上的舞蹈。这是动作和摹拟音乐杰作的最优美的表演；而且也是一次对革命的表演。

管弦乐队没有一刻按照艺术家的节拍演奏；没有盲从的伴奏。相反，管弦乐队自由地演奏；而邓肯以富于艺术表现力的动作完成、解释和形象地说明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悲剧性节奏。人们可能会对某些部分的表现手法有不同的意见，但即使如此，用舞蹈表现《悲怆交响曲》这部巨作，这部交织着欢乐与悲伤、生与死、热情与新生的交响曲，这部时而堕入感情的深谷，时而登上胜利高峰的交响曲，使剧场自始至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是个巨大的成功。

我们必须着重提一下柴可夫斯基的《斯拉夫进行曲》。这不仅仅是一部

斯拉夫风格的进行曲，也不仅仅是一部极端爱国主义的进行曲。它是一部泛斯拉夫主义的帝国主义进行曲。由于这部进行曲中反复出现沙皇赞歌的旋律，它的基调是反革命的，但伊莎多拉对这一乐曲的表演维妙维肖，极富艺术表现力。她那无与伦比的表演使人再一次看到，一个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对这样一部风格陈旧的作品所能够给予的理解和表现。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衬托下，邓肯刻画了一个拖着脚镣的奴隶。他佝偻着身躯，忍受着压迫，身负重荷，精疲力竭地跪倒在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被诅咒的沙皇赞歌的头几节的旋律中这个奴隶的表演。他抬起重重垂下的头，他的脸因仇恨而可怕地扭曲。他用尽全力挺直身躯，掐断镣铐，然后从背后抽回扭曲而僵硬的手臂，伸向欢乐的新生活。所有的人都理解了这段表演的寓意。舞台上的奴隶行列是打碎枷锁的被压迫的俄国人民的悲惨道路。说来很反常，在邓肯的表演中，沙皇的赞歌使人觉得是具有革命性的。在这一赞歌的背景烘托之下，革命取得了胜利。

《斯拉夫进行曲》激起的情感平息后，管弦乐队奏起《国际歌》。

伊莎多拉款步走到舞台中心。此时，最激动的时刻到了，观众们在整个晚上都对伊莎多拉的舞蹈入了迷。伊莎多拉身披红色的衣裳，脚跟坚定地挺立在那里，宛若一尊庄严而优美的雕像。接着她开始形象生动地表演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开始了，人类充满了兄弟般的情谊。

人们全体起立，热情地唱起了他们的颂歌的歌词。此时此刻，他们看起来像是这首古老合唱的再现，为舞台上中心形象的英雄姿态唱着赞歌。

伊莎多拉形象地表演完第一段乐曲后，唱着歌的观众们看到艾尔玛从舞台一角走了出来，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后面跟着一个又一个——100个穿红色束腰上衣的小孩子。每个人都把右手高高举起，亲密地紧握住前一个孩子的左手。他们在蓝色帷幕的衬托下慢慢移动，组成一条艳丽的活动饰带。随后，他们在宽阔的舞台上围成一个圆圈，稚嫩的手臂伸向灯光，伸向他们环绕着的崇高、勇敢和光彩照人的伟大的教师的形象。

在莫斯科大剧院成功地登台露面之后，伊莎多拉开始与她的新学生一起工作了。然而，工作室中极冷，所以孩子们的课程只好停下来。孩子们被告知，要等到能弄到充足的燃料来给那个大房间正常和连续不断地供暖时，他们才能回到学校上课。

由于这个学校是一所公立学校，而且是新成立的，所以，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直到最后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要耽搁许多天。要是学校的钱柜里有钱，他们就可以出去买足够的木柴来度过这些难关了。然而，就是那样的解决办法，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私人贸易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颁布。

然而，不久以后，这个新政策实施了。它从大体上改变了俄国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这个学校的面貌。伊莎多拉那个建立一所杰出的免费学校的宏伟梦想，尽管有一个明智而仁慈的政府的支持，却逐渐破灭了。因为，虽然位于芭拉乔娃私邸的这所学校于1921年12月3日在名义上正式开学了，并挂上了“伊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这个光荣的名称。然而，那个名称和那所房子虽然宽大，却没有火炉取暖的房间，这大概是政府为帮助伊莎多拉实现俄国之行的计划所真正免费慷慨提供的仅有之物了。

是富于同情心的卢纳察尔斯基，亲自来告诉满脑子只是理想的伊莎多拉，政府已改变了主意，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这所学校。他们正在经历一次

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目前允许商店开门营业，而且将要准许剧院在上演节目时收费，因此，大概也会许可邓肯为花钱买票的观众演出。如果那样的话，邓肯应当能够在目前把学校办下去。也许过一段时间，在较为安定时候，政府会尽可能地在各方面帮助这所学校。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卢纳察尔斯基将会以亲切友好的关注来照顾这所学校的。

于是，伊莎多拉在苏维埃俄国住了六个月之后，面临着下面的两种抉择：她可以告诉有关当局，他们不惜牺牲她在西方世界的声誉，邀请她来开办他们明知不可能或不愿支持的学校，是有意愚弄她，因此她只好回到英国、法国和美国，继续她的营业性演出生涯。要么，她仍然留在莫斯科，为使这个刚刚成立的学校继续生存下去而奋斗，因为学校中的 40 个聪明伶俐、惹人喜爱的孩子，逐渐开始喜欢他们的课程了。

伊莎多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为了使这所学校能够生存下去，她将到俄国各地，甚至西伯利亚的荒原去演出。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寒冷、饥饿和成长中的新国家中，怀着坚定的信念所创办的学校。

于是，在 1921 年底，伊莎多拉·邓肯开始举行营业性演出。这些演出是在济明剧院举行的。尽管这个剧院比莫斯科大剧院大得多，三个晚上的每一场演出，全都被真正喜爱舞蹈艺术的热情观众挤得水泄不通。

舞蹈演出的头一场，邓肯重复了 11 月 7 日节日庆祝时演出的柴可夫斯基的曲目。

她的第二天演出，跳的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乐曲。

勃拉姆斯的《华尔兹组曲》引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使邓肯不得不重演了一次。

第三天晚上，她又一次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舞曲，并像往常一样，以《国际歌》做为压场节目。这时她表演的《国际歌》是独舞，舞中表现出更深沉的力量。

邓肯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她的小学员们买了木柴和食物。她还为圣诞节买了一株冷杉树摆在大厅里。

她没有钱去买通常的礼物，去买闪闪发光的装饰丝带或五彩缤纷的明亮易碎的灯泡之类的装饰品，但是，兴高采烈的孩子们，用灵巧的手指，把彩纸剪开、折叠和盘绕起来，做成各种各样精巧别致的形状，然后用这些折纸把深绿色的树枝打扮起来。

看到这些发自内心的快乐的孩子们，围着他们的第一株圣诞树欢快地跳舞，给了伊莎多拉的痛苦一些补偿，使她在失望的苦涩中，多少尝到了一点甜蜜。

圣诞节的第二天，主管外交的人民委员的助手利特维诺夫的夫人，前来看望伊莎多拉，并请求她在当天晚上为一批劳动人民演出一场舞蹈。这是个特殊的场合，是只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会议。卢纳察尔斯基要发表讲话，哈拉汉和其他领导人也将出席。

尽管伊莎多拉很清楚，这样的演出不会为她的孩子们赚到任何食物，甚至连一片黑面包也得不到，她最后还是同意为这些工人和农民举行一场免费演出。

转天，伊莎多拉收到了利特维诺夫夫人的一封信，信中天真地表示要以某种方式报答这位艺术家。这深深地感动了伊莎多拉。通过这一单纯的举

动，伊莎多拉再次感到，自己的一切疲劳和痛苦都得到了补偿。

利特维诺夫夫人的信是 1921 年 12 月 26 日寄出的：

最亲爱的，最光荣的人！

您的《斯拉夫进行曲》是使人铭刻在心的舞蹈。看到您，我仿佛生活在百年的巨大痛苦和奴隶制的枷锁下，但是最终出现在阳光之中。然而，我仍在颤抖——

我多么渴望在今天晚上见见您，只见一小会儿。但是，我丈夫又回去工作了，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独自外出，我可能会在街道上被人剥光衣服的。

哈拉汉也去观看了演出，他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我从未想象过，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会有如此富有人情味的生动的关系。现在，您已经真正给予莫斯科的无产阶级某种他们自己专有的东西。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们——所有的士兵和妇女都把围巾盖在头上。

我在冥思苦想，我自己不能给予您任何东西。我知道您不会拒绝。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我对装饰相当在行。您要我给您绣点什么，或为您做几幅窗帘，或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恳求您！我做不出精细的针线活或通常的绣品，然而，我可以给您绣一些有醒目而质利花纹的东西——请您告诉我您想要什么吧！我已经用镶有动物和小鸟图案贴花的乳白色平纹细布为我的婴儿室做了所有窗帘。也许，您想给您的宝贝儿们要一些？图案漂亮极了。

再见，我无比美丽的朋友。

西格达·瓦莎

伊维·利特给诺夫

12 月的一个晚上，叶赛宁把他的朋友马里恩戈夫带来见伊莎多拉。她把她们引入自己的房间。看到两位客人审视房间时的惊讶表情，伊莎多拉说：“这是芭拉乔娃的……糟糕的房间，很糟糕……伊莎多拉买了三角围巾和披肩……许许多多的俄国披肩。”

伊莎多拉床边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戈登·克雷格的。这张照片似乎吸引了叶赛宁的视线。他从桌子上拿起照片，仔细地看。

“他是你的丈夫吗？”叶赛宁问。

伊莎多拉半用法语半用俄语说：“是的，丈夫，克莱格……他是个坏丈夫。整天写作和工作。克莱格是个天才。”

叶赛宁把食指放在胸前：“我也是个天才。叶赛宁是天才。克莱格分文不值。”说着，他把那张照片悄悄塞进了一堆旧报纸和几张乐谱的下面。然后他对着照片说：“别了！”

伊莎多拉像着了魔，也把“别了”那个词说了一遍，并且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

“现在，伊莎多拉，跳舞吧！”叶赛宁说。“为我们跳舞！”

他感到自己像是希律王在命令莎乐美跳舞。

“好吧，我就为你们跳舞。”

伊莎多拉穿上叶赛宁的外衣，又戴上他的帽子……一段他们从未听过的肉感的音乐，使人骚动不安的音乐……伊莎多拉扮演巴黎的流氓，她的围巾充当那个女人。一段可怕而绝妙的舞蹈。围巾那细长的粉红色躯体在她的两手间扭动着。她用神经质的手指扼住了它，它那柔软光滑的圆脑袋悲惨地垂了下来，伊莎多拉把她假想舞伴的尸体抛到地毯上，结束了她的舞蹈。

后来，叶赛宁成了她的主宰。她像一条狗一样去吻他抬起来要打她的

手，去吻他那燃烧着仇恨而不是爱情的眼睛。然而，他只是那个舞伴，就像那块粉红色的东西，是一个没有意志的悲剧性的舞伴。她跳着……是她在领舞。

叶赛宁递给他的朋友一个八音盒，那是一个小孩玩具。

“上上弦，米哈依尔，我要跳舞了。”

米哈依尔上了弦，八音盒奏起了《巴琳娜》。

叶赛宁脱下他的漆皮鞋。光着脚在地板上又蹦又跳。伊莎多拉用充满柔情的眼神看着他说：“多有俄国味儿！多有俄国味儿！”

斟满香槟酒的杯子来回传递着，叶赛宁的舞步加快了。

“妙极了！”伊莎多拉叫道。

叶赛宁停了下来。他那白皙的前额上淌着大滴的冷汗。他的眼睛也是冷峻的，睁得大大的，几乎黯淡无光。

“伊莎多拉！烟！”

她递给他一支烟。

“香滨酒！”

她给他一杯香滨酒。

叶赛宁一饮而尽，然后又干了第二杯。

伊莎多拉搂着他的脖子，她的手臂很温柔，有些太柔软了。她喃喃地说：“叶赛宁很壮，非常强壮！”

诗人来访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时，伊莎多拉开始感到自己的词汇量在这样的场合已不够用。为此，她请了为学校的孩子们教英语的女士来每天给她上难学的俄语课。

这个善良的女人，得知伟大的伊莎多拉将要做她的学生，欣喜若狂。她为了给伊莎多拉上课，特意打扮了一番。在第一堂课的约定时间里，她出现在工作室时，就好像是从19世纪后期的彩色画片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学生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用这些陌生的单词相互问答。在第一节课结束时，伊莎多拉知道如何用俄语说：

“这是什么？”

“这是铅笔。”

“什么样的铅笔？”

“这是红铅笔。”

而这些对诗人的求爱竟毫无用处！

第二天，那位女士来了，手插在小手笼里，保存很好的绿天鹅绒中散发出一股熏衣草和广藿香的淡淡的幽香。她进来后，开始复习前一天的课程。

这时，伊莎多拉打断她，说：“是的，那很有意思。我肯定孩子们会喜欢那种课程。

但是我觉得，您最好教教我，当我想吻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时应当说什么……以及类似的话。”

戴着手笼的女士震惊了，她目瞪口呆。教那种语言？她感到胜任不了这项任务，于是便从不知害羞的舞蹈家那里辞职，专心致志地去教决不会想到接吻等类似事情的小孩子了。

从那时起，伊莎多拉采用了先把词组用英语写下来，然后由家庭各成员为她翻译过来的形式学习俄语。

伊莎多拉开始用自己说不利落，别人也听不太懂的俄语信口说起来。

后来，叶赛宁自己也帮助她讲俄语。但是，恐怕他教伊莎多拉的不总是来自“纯洁的俄语的源泉”。

当自成一派的意象主义小集团看到，他们的成员谢尔盖被一个女人迷住了，而且在他们眼中她简直是一个由夏娃和夜妖合为一体的女人，他们开始寻求办法和采取措施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觉得伊莎多拉·邓肯会对诗人产生不良的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嫉妒那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和自由。这个团体还从事印刷业务，并开办了一家商店，这些人认为，如果一个人退出了团体，肯定迟早会有别人跟他学，这对写诗和他们的业务自然会有损害。这个小集团必须保持完整。

大约 12 月底，出现了一个能把叶赛宁从他那个女人的关系中拯救出来的机会。这个集团的一位好友将要被派往波斯，他同意带谢尔盖一起去做此长途旅行。其他诗人拟定了计划，并决定谢尔盖到火车站前不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像与他开一个大胆的玩笑那样，他们将让他去波斯旅行。

火车将要开出的那一天，叶赛宁到火车站来向他的朋友告别。他在火车正要开动的一刹那才到。他被大家举到车上，行将离开的那个朋友伸出手臂接住他，这时火车噤嘎噤嘎地开走了。其他诗人在月台上站了好久，看到他没跳车，就顺着铁路线走回了莫斯科。

马里恩戈夫和集团中的其他人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计划成功了。然而，没出几天，从距首都两天路程的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真见鬼，你们把我弄到这样的境地……我要在这里换乘的私人汽车已经出发去波斯了。罗斯托夫糟透了。向伊莎多拉和艾尔玛问好！我想，我离开以后，她们周围的空气一定清新多了，她们肯定已经把我忘了。托里，你这个白痴。我听了你的话，也聪明不了多少。

谢尔盖

第二天，叶赛宁又回到了莫斯科，而且，1922 年初，他住进了普列特奇斯坚卡 20 号漂亮的公寓，与伊莎多拉·邓肯同居。

伊莎多拉的家总是挤满了五花八门的狂放不羁的俄国艺术家，有意象主义诗人、雕刻家、音乐家、室内装饰师等等。几个美国人使这些艺术家活跃起来了。那些美国人大多数是记者，还有少数美国救济协会驻莫斯科人员。

叶赛宁似乎总是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到某个地方去赴他害怕会迟到的约会。由于他这个习惯，伊莎多拉送给他一块漂亮的小金表作礼物。她想，他的背心口袋里有了准确的时间，他就不会总是跳起来，赶紧跑到没人知道的什么地方去。

然而，这块表并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像以前一样，叶赛宁还是继续从安乐椅上跳起身来，跑出去赴并不存在的约会。

叶赛宁是个执拗任性的小孩子，而伊莎多拉则是个爱着他的母亲。她的深情的爱，足以使她宽容和原谅一切粗俗的咒骂和傲气。在伊莎多拉多情地向叶赛宁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经常遭遇到后者无礼而粗暴的拒绝。这样的爱情与幸福的场面之后，伊莎多拉常常喝得醉醺醺地，许多天不到普列特奇斯坚卡去。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些时候。到了 2 月，伊莎多拉接到列宁格勒一个剧团演出主办人的邀请，去那里演出几场节目。她问谢尔盖·叶赛宁是否愿意与她一起去列宁格勒。他那时正处于田园诗般的情绪中，所以愉快地接受了

邀请。两人一起动身到北方去了。

然而，在他们出发去列宁格勒前，一天晚上，叶赛宁的朋友们无情地取笑他的“订婚礼物”——那只“贵族化”的金表。然后他便来到伊莎多拉的房间，把表还给了她。

伊莎多拉拒绝接受那只表。她对他说，只要他真心爱她，他就必须保留这只表，不管那些愚蠢的朋友和他们那些离奇古怪的狂放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得把她的照片放在表壳里。她给了他一张自己护照上的快像。

叶赛宁天真地表示喜欢这个主意，并把装着照片的表又放回口袋。几天以后，为了某件使他不高兴的事突然发起脾气来，他像训练有素的掷铁饼运动员那样，竭尽全力把金表猛地扔到房间的另一头。

在叶赛宁怒气冲冲地离开房间后，伊莎多拉慢慢走到角落里，悲伤地看着破碎的玻璃片，摔坏的表壳和表壳中七零八落、无声无息的机件。从那些小碎片中，她捡起了自己含着微笑的像片。

到列宁格勒后，他俩来到达恩勒特勒旅馆。在那里，伊莎多拉按照她的惯例预订了最好的一套客房（几年后，就是在这套客房的卧室中，诗人叶赛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一安顿下来，就像往常一样有许多朋友来拜访她，向她表示敬意。来访者中有一些富有的美国人，他们曾在伊莎多拉的某次美国之行时见过她。

一进门，他们就脱去厚厚的毛皮大衣。其中一个人没太留意，把大衣随手扔到一张椅子上，大衣又从椅子上滑落到地板上。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弥漫起一股什么东西烧着了的特殊气味。大家在房间四下看了看，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于是继续交谈下去。

那股气味依然没有消失，甚至越来越刺鼻了。但是，屋里没人再注意这股气味，直到客人们起身离开。这时，他们发现，从椅子上滑下来的那件大衣，掉在了一个小电炉上，这个电炉是伊莎多拉买来给房间加温的。崭新漂亮的美国毛皮大衣上逐渐烧了一个大洞。

伊莎多拉说：“你瞧，梅特林克是对的。物体确实是有灵魂的。这可能是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电炉，以它的方式向资本主义美国的代表提出了抗议！”

达恩勒特勒旅馆的地下酒窖很有名，其中储存着所有战前最好的一品脱、一夸脱和两夸脱装的美酒佳酿。

叶赛宁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也很快发现，和伊莎多拉一起旅行，赐予他某种特权，他想什么东西，就可以随意吩咐。

结果，伊莎多拉演出结束回来后，经常发现叶赛宁面前堆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空酒瓶。

他们在达恩勒特勒旅馆逗留期间，叶赛宁还不止一次地被男服务员们强行弄回房间，因为他们发现他在餐厅里脱得一丝不挂地四处游荡，酗酒闹事。

就是这一时期，在列宁格勒的一系列演出中，发生了一件使伊莎多拉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场演出是专为在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的。挤满剧院的3000名水兵中，大多数是1917至1918年的革命中的老兵，他们是来自“曙光”号巡洋舰和其他领导起义的军舰上的水兵。

伊莎多拉演完节目单上的第一个舞蹈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剧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水兵们燃起的闪烁不定的火柴光，根本无法把剧场照亮。观众席上发出了脚步声、笑声、喊声和口哨声。过了一会儿，由于观众越来越喧闹了，后台的一个人设法找到一盏点蜡烛的灯笼。他们把灯笼拿到台上伊莎多拉站着的地方，她正为日场演出出现这样的结果感到点儿紧张。伊莎多拉将灯笼高高举过头顶，向前走到舞台边，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舞台上有人把她的要求译成了俄语。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的开头两句：

敌人的哨声在我们四周呼啸，  
黑暗的势力企图把我们压倒……

观众们得助于黑暗的帮助，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习惯于大合唱，于是，跟着领唱者一起唱了起来。深沉热情的洪亮歌声从黑暗中涌上来，倾泻在舞台上。

台上，伊莎多拉独自一人沉默无语地站着，心底里一阵激动，甚至比第一次听到巴赫的咏叹调，或尼基施指挥的柏林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还要激动。

因为，从这些看不见的纯朴的人们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乐，比任何用乐器演奏的音乐更具有人情味，更辉煌雄壮。

一首接着一首，他们唱遍了他们所有的革命歌曲。舞台上，伊莎多拉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永不退缩的手臂仍然高擎着烛火摇曳的灯笼，她的面颊上热泪滚滚。

这场即兴音乐会进行一个小时之后，电灯终于亮了。这时，伊莎多拉对水兵们说：“当众多的人合唱时，歌声永远是美妙动听的。然而，我从未听到过这样世间少有的、这样充满质朴美的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所听到的歌声。”

3月，伊莎多拉从列宁格勒回到了莫斯科。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每天的情形都大体相同。她的学校走上了常规。她不在莫斯科时，由艾尔玛照管这所学校。她的情事也按着自己的方向发展着。叶赛宁像从前一样常来常往。伊莎多拉经常接待朋友、记者、美国救济协会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来访。

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打来的电报送到了她的房间。她用红肿的眼睛看着电文：

多拉·格雷·邓肯于1922年4月12日在巴黎其儿子的寓所中逝世。

头一天晚上，伊莎多拉便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当时，她的母亲正在巴黎，与雷蒙德住在一起。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正在生病。但伊莎多拉没想到母亲这么快便永远离开了她。

从那时起，伊莎多拉在莫斯科越来越坐卧不安了，她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由于两个原因，这样做是必要的：一是她的健康状况、一是学校的资金问题。她认为，能弄到足够的大笔资金的唯一途径，是到外面的世界去巡回演出。而且，可能的话，带上一些最好的学生，以显示一下她正在完成的工作。

抱着这样的目的，她打电报给纽约的一个演出主办人，问他是否能为

自己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这个人回电说，他很愿意安排这样的巡回演出，但是提出在秋季之前无法安排。

1922年5月2日，伊莎多拉·邓肯与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在莫斯科办了结婚登记。

对于所有认识伊莎多拉·邓肯并了解她的婚姻观的人来说，听到这条通过海底电缆发往外部世界的新闻，都感到大为震惊。

但是，那完全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丝毫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观。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首先，因为叶赛宁病得很厉害，需要得到专家的检查和治疗；其次，她认为他是个诗人，需要开阔新的眼界。可惜她不知道，让这个俄国农民离开他的土地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那是一块他从西方世界的闲荡中归来之后为之哭泣和亲吻的土地！

伊莎多拉想带着叶赛宁离开俄国。她想让他看看欧洲的一切美丽的东西和美国的所有奇迹。然而，虽然她知道她可以与她那金发碧眼的诗人丈夫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旅行，住在饭店的最讲究的套房中，接待知识界的名流，且他们中间没有人会无礼地询问他们俩是否有结婚证书。但是，她也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生活在美国各州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饭店的老板更爱多管闲事。以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并非她杞人忧天。

因此，为了做一次平安而富有成果的旅游，伊莎多拉·邓肯履行了合乎苏维埃婚姻法的手续，在官方证书上把自己的名字签成了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下一步是得到护照和签证。

直到此时，伊莎多拉才发现，自己进入俄国时带来的护照找不到了。她曾经把护照交给莫斯科的一个人民委员会官员。美国国务院发给伊莎多拉·邓肯小姐的护照，不知是埋在外交部某个无人问津的办公桌中满是灰尘的文件堆里，还是在离开俄国外出旅行的另一个人的手中。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谈话、讨论和抗议之后，伊莎多拉所得到的是一张能使她通过俄国国境而不会遭到任何好管闲事的“契卡”官员干涉的纸片。

至于交通工具，邓肯已决定，值得纪念的蜜月旅行应该乘飞机去。她被告知，自从莫斯科到德国的航线开辟以来，还从未接待过任何私人乘客，而且票价也高得惊人——至少1000金卢布！但这也阻挡不了她。她要去，她说，如果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行动的话。

“顺便提一下，”她的朋友说，“在你登上飞机开始这次冒险旅行之前，你最好写个遗嘱。”

“废话！”她说。“我这辈子从未写过遗嘱。”

但是，望着她的新丈夫，她改变了主意。她拿起桌子上的一本已撕去大半的廉价笔记本，匆匆在本子的四页纸上，写下了下面的这段文字：

这是我最后的遗言。如果我去世，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和所有物遗留给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如果我们同时去世，那么，此项财产遗赠我的兄弟奥古斯丁·邓肯。

书此遗书时神志完全清醒。

伊莎多拉·叶赛宁-邓肯

见证人：施奈德

艾尔玛·邓肯

1922年5月9日于莫斯科

翌日清晨，这对富于冒险精神的夫妇从普列特奇斯坚卡 Z0 号乘车前往托洛茨基小型机场。

飞机正在停机坪上等待他们。学校的秘书施奈德为一家杂志写了下面这段记事：

天气寒冷刺骨，天上阴云密布，并下起雨来。然而，就在飞机起飞的时刻，太阳透过云层，射出了光芒。机场上有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和各国记者。两个大衣箱已经装进机舱，从莫斯科飞往柏林的头两位私人乘客，登上了他们的头等客舱。伊莎多拉穿着特意为这次旅行做的套裙，但叶赛宁却不得不穿上航空公司借给他的飞行服。

整 9 点，螺旋桨转了起来。舱门也关上了。伊莎多拉从舷窗里望着她的学校的孩子们，并向她们挥手告别。飞机沿着跑道滑行。突然，机舱门又打开了。一张吓人的苍白的面孔出现了，喊着要午餐的篮子。叶赛宁拼命挥动着手臂。有人跑着追上了飞机，就在飞机离地前的一瞬间，设法把篮子递了进去。一会儿，飞机成了天边的一个小黑点。他们走了。

## 第十四章 夫妇之旅

“迄今为止，我才得到了大约 10 万马克，但我还有希望搞到 40 万马克。”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诗人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有挑逗性、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

一天夜晚，他像个疯子一样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

1922 年 5 月 11 日，伊莎多拉同诗人叶赛宁一起离开柏林坦普尔霍夫机场直奔阿德隆旅馆。在那里他们举行了庆祝活动，庆祝伊莎多拉重归旧地，庆祝叶赛宁过上豪华、高雅、舒适的文明生活。英美各家报纸的记者纷纷云集旅馆，采访这对新婚夫妇，新房随着镁光灯的不停的闪亮很快便变得空气污浊了。

早在俄国革命初期，柏林便已成为从混乱不堪的俄国逃出的斯拉夫人的一大欧洲聚集地。这座城市拥有一批名副其实的俄国贵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被剥夺了财产的商人，满腔怨恨、无所事事的白军官兵，冒险家，知识分子，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演员等。在这些四处游荡、神情恍惚的人们中，只有一些人从事低贱然而诚实的劳动，其他人则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地打发着日子，并不是都反对在他们的祖国所建立的新政权。

在该城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居住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宁的挚友马克西姆·高尔基。

叶赛宁的老朋友、诗人科乌西科夫仍旧背着那把他只能弹出几个基本音的吉他与这些流亡在外的同胞们来来往往。小说家伊利亚·爱伦堡和诗人比耶利也是这个俄罗斯人聚集地的名声显赫的文人。

这里还居住着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的，他们后来都蜚声巴黎艺坛。这批身处逆境的演员和音乐家组织了一个蓝鸟剧团，模仿巴利耶夫的蝙蝠剧团，举办了一系列晚场演出。这里还设有专门出版俄罗斯文学和俄语报纸的出版社和报社。

叶赛宁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与同胞们来往密切。他到达这座城市不久，不仅与伟大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以及地位稍低的科乌西科夫建立了联系，并且举办了诗歌朗诵晚会。他极为成功地朗读了自己的作品，使碰巧到会的白军官兵都为之激动不已。他的诗作引起了轰动，柏林准备出版一本他的诗集。后来，叶赛宁借助伊莎多拉的力量，与一位比利时诗人进行了谈判，内容涉及将叶赛宁的一本抒情诗选集译成法语，由一位在巴黎开业的俄国出版商出版，费用则由伊莎多拉担负。诗集的题名十分恰当，叫《一个粗鲁的人的自由》。

一天，当叶赛宁回到柏林的那家旅馆时，发现妻子正手捧藏有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的像册失声痛哭。他粗暴地一把抢过像册，扔进火里，带着醉意怒吼：“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了！”并拦住正要从火中抢救出自己的珍贵回忆的妻子。

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一本专门描写几位俄国作家的文集里记载了柏林的这些日日夜夜。在关于叶赛宁的那篇文章里，高尔基描写了他与叶赛宁的会晤，并评论了叶赛宁的作品。他认为叶赛宁是新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与蜚声世界艺坛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结合并不明智。据高尔基所见，伊莎多拉纵使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她的丈夫——一位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满浓郁俄罗斯气息的诗作！高尔基并不十分欣赏伊莎多拉的艺术，并未领略到她的艺术美的真谛。他评论说，在和朋友一起观看了伊莎多拉特地为他们举行的舞蹈晚会后，她留给他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拚命取暖的妇女……

叶赛宁夫妇对在德国生活感到无比厌倦，使南下来到著名的水滨胜地威斯巴登。在这里，叶赛宁给莫斯科邓肯学校的秘书施奈德写了一封信：

问候你并吻你。请原谅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柏林的气氛已经弄得我六神无主。

我的精神垮了，现在几乎无法移动双腿。目前我正在威斯巴登治疗。我已戒酒并着手工作。如果伊莎多拉不这么反复无常，能让我安静地坐下来工作，我就可以赚许多钱。迄今为止，我才得到了大约 10 万马克！但我还有希望搞到 40 万马克。

伊莎多拉处境窘迫。在柏林，律师卖掉了她的房产后仅付给她 9 万马克。这种情况也可能在巴黎重演。她的财产——藏书和家具——已被挪用，流失在四面八方。她的银行存款已经告罄。现在她已派出一位密友急奔那里。赫赫有名的保罗·邦库尔不仅没有给她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拒绝为她赴巴黎的签证签字。她的处境就是如此。但她却若无其事，一会儿跳上汽车前往卢贝斯克，一会儿又驶向莱比锡、法兰克福或者魏玛。我只好服从她的决定，默默地跟着她四处奔波。只要我一反对，她就歇斯底里大发作。

这对夫妇从威斯巴登启程，前往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前往布鲁塞尔，随后将飞往巴黎。

接着，伊莎多拉偕同丈夫离开巴黎，南下来到威尼斯。他们在极为时髦的游乐地丽都的一家最高级的旅馆居住了一段时间。

旅游旺季结束后，他们回到巴黎，准备赴美巡回演出。尽管伊莎多拉

曾计划将莫斯科学校的一批学生带到美国登台演出，但学校已在夏天来信说，这一计划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许可，因而他们只好独自进行这次巡回演出。

返回巴黎后，伊莎多拉马上来到她的位于豪华大街的住宅。她发现她的俄国房客已逃之夭夭。他未付房租，将钥匙放在了前门擦鞋的棕垫底下。

然而，他们总算在启程前有了安身之处。况且，伊莎多拉很喜欢住在这里，因为她可以在位于这座房子后部的宽敞的大厅里排练节目。她正急需这种排练。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演出之后还从未登台跳过舞，并且一直找不到场地为即将举行的举足轻重的美国巡回演出排练。

诗人弗朗斯此时正与他的俄国夫人一起致力于叶赛宁诗集的翻译，他记叙了他在豪华大街度过的一晚。

我几乎天天见到他们，有时在豪华大街上伊莎多拉的那座小房子里，有时则在克里永旅馆，以躲避琐碎的家务。如果说叶赛宁在克里永旅馆的举止宛如一个饱经沧桑的人，没有任何与那里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感觉，那么在那座小房子里的融洽、亲密的气氛中，他则更是如鱼得水，举止出众，富于同情心……

当伊莎多拉为了向叶赛宁求婚，将他从俄国带到欧洲时，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充满母爱地扮演引人向上的角色。这是一个崇高的举动，因为这意味着她将做出牺牲，并注定要陷入悲伤。她从未对此抱有幻想，深知这段带有痛苦的幸福时光是短暂的，她会陷入于一种富于戏剧性的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中；这个她极望培养长大的粗犷的男孩子迟早会振奋起来，甩掉她情不自禁地赋予他的多情的保护，他的方法也许会是残酷的。伊莎多拉热烈地爱着诗人叶赛宁。我发现这种爱即便在开始时也已埋下了绝望的种子。

记得一天晚上，我见到了这两种情感——爱恋和绝望——的同时存在。叶赛宁也显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我到那里时他们都还未离开饭桌，两人的情绪既古怪又严肃。他们几乎都没有和我说话，宛如年轻的情侣一般紧紧地拥抱着，没有任何争吵过的迹象。片刻，伊莎多拉告诉我，她的那些仆人破坏了他们的生活。那晚发生了令人厌恶的事情，使她心烦意乱。她似乎一反常态，有些神经过敏。她的举止失去了那种令人佩服的稳重沉着、适度的分寸感和韵律感，而这些特色正是她的艺术的基础，是她的天性，平日对叶赛宁产生了极好的影响。诗人见到伊莎多拉有些失态，便决定将她灌醉。他并无恶意，而是出于一片好心。他本人就是这样镇定自己虚弱的神经的。他将酒杯端到夫人唇边，温柔地哄骗她喝下去。当酒力渐渐发作时，我发现在舞蹈家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绝望的神色，而平日她很善于用一种沉静、乐观的风度掩饰这种情绪。

突然，伊莎多拉振作起来，邀请我们到工作室走走——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舞台设在房间的一端，一排排软沙发倚墙而放。在这里，伊莎多拉恳请我朗诵刚刚完稿的《波乌加物斯切夫》这首诗。我在这首诗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风儿，土地和树木。

我担心自己有缺陷的发音和怯懦会破坏这个抑扬顿挫的的美感，但仍违心地朗诵了这首诗。我的朗诵不十分使她满意，因为等我朗诵完毕，她立即请叶赛宁用俄文朗诵一首。此时此刻，让人感到多么羞愧！我的拙作怎能和叶赛宁相提并论？叶赛宁倏地诗情勃发，低吟慢咏了起来。它像是晨

风吹过嫩绿的叶丛沙沙作响，是一种发乎天性的诗人气质的曲折变化的表现，我从未见到过诗歌能被这位诗人提到这样的高度。朗诵诗歌是他对自己感受的出色的总结。他歌唱它们、赞扬它们，他使它们像雨点般落下，他尖声抒发它们，他以动物般的温顺和力量表示这些感受，使听众和他同样感受，同样如醉似狂。

我在那天晚上感悟到，这两个存在物，尽管各不相同，不可能不带悲剧性地分离……

日子就这样在朗读诗歌、排练节目和社交应酬中一天天地过去。

9月底，伊莎多拉通过她的老朋友、法兰西喜剧院的塞西尔·索雷尔的强有力的社会影响，获得一个法文证件。带着这个证件以及必要的由领事馆签发的护照，她和她的丈夫放心大胆地登上了“巴黎号”航轮，驶往纽约。

1922年10月1日，当“巴黎号”航轮驶过自由女神铜像，缓慢地向纽约湾行进的时候，伊莎多拉·邓肯接到移民局一位官员的通知，说她没有获准登陆。她的丈夫叶赛宁和秘书弗拉基米尔·韦特卢金也同样未得到准许踏上伊莎多拉曾向他们详细介绍过的国土。

那位官员讲话十分客气，但无实质内容。

船停靠在码头，伊莎多拉可以会见她的亲属和经纪人，并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巴黎号”的莫拉斯船长向移民局官员为他们做了担保，并邀请他们做他的贵宾留在船上，这样才使他们免于蒙受在埃利斯岛移民区过夜的羞辱。

在来访者离船之后，在码头的大门口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侦探。他轻轻拍了一下经纪人的肩膀说道：“嗨，你得跟我走一趟。如果你不老实跟我走，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位不服气的经纪人的衣服全被剥光。他们将他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和缝合处彻底检查了一遍。

对于伊莎多拉，当时没有任何扣留她的理由。前来采访她的一大群记者中，有一位暗示说，当局认为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是专门到美国宣传可怕的“赤色”瘟疫的。

伊莎多拉驳斥道：

“荒唐透顶！我们是想告诉美国人民，可怜的俄国儿童正在挨饿，决不是来宣传俄国的政治。谢尔盖不是政治家，他是位天才，一位伟大的诗人。我们来到美国的唯一愿望，就是告诉人们俄国人的诚意，并为恢复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工作。既非政治，亦非宣传，我们仅仅是为艺术界工作的。我们相信，俄国和美国的首脑正准备相互理解。”

然后，她面带甜蜜的微笑对记者们说：“有一件事实在我吃惊，那就是听说美国政府不同情革命。我曾经常受到这样的教育：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建立起来的，我的曾祖父威廉·邓肯上将在那次革命中曾尽了他崇高的职责。”

美国所有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位舞蹈家与其新婚的诗人丈夫到达美国并被移民局扣留的消息。一些新闻记者甚至指责伊莎多拉挑起此事以使她的美国之行起到广泛宣传的效果。然而伊莎多拉并不缺少辩护者。这座大都市的报刊上多次发表抗议社论，并在专栏上刊登了许多来信。

10月2日早晨，被扣留在“巴黎号”上的伊莎多拉一行，由两名卫兵押送，来到海关办公室。

那里的主要负责人将他们的行李全部打开进行彻底检查。所有穿戴的服饰都被翻过来检查，所有的衣兜都摸过一遍，就连用脏的亚麻布制品也未能幸免；全部书写材料都用显微镜仔细看过，所有只要看来是俄文的印刷品全部没收，以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所有的交响曲与钢琴乐谱逐页翻看，伊莎多拉还时不时地做些解释，诸如她写在音谱上的旁注是什么意思等。

这种不慌不忙的。没有找出任何罪证的检查结果是，当事人依然由卫兵押送，重返法航码头。

秘书在那里迎候他们。然后，一辆出租汽车将他们带到驳船办公室，又从那儿赴埃利斯岛。等了一会儿之后，他们终于被带到审查局门前。在审讯室里，由移民局长和助手出面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伊莎多拉和她的同伴们面带微笑，走出审查局。

伊莎多拉冲着在外面等候的经纪人和律师大声喊道：“宣布无罪！我们是无辜的！”

坐在返回纽约的小汽艇上，伊莎多拉对随同她前往的记者们说：

我有仿佛被宣告未犯杀人罪一样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的罪犯。然后他们向我提出一些无聊的问题，例如，“你是古典舞蹈家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舞蹈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还想知道我跳舞时的形象如何，我怎么知道？我从不看自己跳舞。

审查局还问我，当我从俄国飞抵柏林时，是否与在那里的奥地利官员谈过话。我不得不讲出令他们失望的真话。我在离开俄国归来的途中，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从未与任何一位奥地利官员交谈过。其他的问题更是荒唐可笑。如，他们竟然想了解我和谢尔盖是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

在我踏上埃利斯岛之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人的大脑怎么会挖空心思出如此之多的、向我快速袭来的问题。我从不关心政治。在俄国居住的那段时间，我全都用来照顾年幼的孤儿，并将我的艺术传授给他们。说我是，甚至暗示我是布尔什维克，纯粹是胡说八道！废话！蠢话！

船在巴特里靠岸时，许多朋友来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前往下榻的旅馆。伊莎多拉离别近五年后在美国公众中初次露面前，虽然在那种令人厌烦的气氛中仅生活了四天，但她早就需要这家著名的旅馆所能给予她的照顾以及安静、舒适的环境了。

10月7日，星期六，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3000名慕名而来的崇拜者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外面还站着数百名观众，他们企盼着能等到哪怕是一张站席票。

演出的剧目是大家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

交响乐队在内森·弗兰科的得力指挥下，演奏了几首柴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做为两个剧目的序曲。这位俄罗斯作曲家曾于1891年在那里指挥过这些作品，奉献给卡内基音乐厅。当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为伊莎多拉鼓掌和喝彩，并久久不肯离去。

伊莎多拉走到台前讲了话。她向友好的观众说道：

当你们的孩子在美国同样也需要舞蹈的时候，当经历了并不存在的幻想之后，我为什么必须去莫斯科呢？我了解有勇气的美国儿童们，因为我本

人曾是其中的一员。

我希望不久就让你们看到由 50 名俄国儿童表演的舞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我可以让那样一支舞蹈队在纽约出现，能使它比百老汇的舞蹈队更加名副其实。

为什么美国不给我一所舞蹈学校呢？由于此事一直没有答复，我才不得不接受了莫斯科的邀请。

美国拥有俄国所没有的一切！但俄国也拥有美国所不具备的东西。美国为什么不能和我一样向俄国伸出援助之手呢？

几天以后，10 月 11 日，伊莎多拉在一个与首场演出一样观众爆满、气氛热烈的剧院里又一次演出。这次，伊莎多拉演的是几部瓦格纳的作品。为了回报终场时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喝彩声，她跳了一曲自己最为欣赏的勃拉姆斯的华尔兹。结果，观众仍然不断地欢呼、鼓掌。

伊莎多拉到波士顿交响乐厅演出了两场舞蹈。正是这两次演出，说得更恰当一点，是歪曲了有关演出情况的新闻报道，破坏了伊莎多拉·邓肯在美国的巡回演出。

她向自己的观众讲话已经成为惯例。她认为，如果演出结束时不对在场的的朋友和崇拜者讲上哪怕几句话，就不是一场完整的演出。伊莎多拉确实具有惊人的演讲天赋。她非常善于讲故事，表达方式巧妙得当，语言优美简练。

然而在波士顿，伊莎多拉却没有以往说得多。她被自己的讲话内容所感染，被观众的麻木不仁和音乐厅冷峻的灰暗所激怒，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挥动着红丝绸围巾，大声说道：

这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与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的约束的，现在也仍然带着发乎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刻，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青年男女，留在那里欢呼喝彩。

感谢上帝，波士顿的评论家们不喜欢我。假如他们喜欢我，我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他们喜欢我的材料。我要给你们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我给你们带来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应该读一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他说，世上有三种人：黑色的，灰色的和红色的。黑色的人如同从前的独裁者和沙皇一样，是一些制造恐怖，喜欢发号施令的人。红色的人则在没有任何束缚的精神进步过程中享受着自由。

灰色的人就好像这里的墙壁，好像这个音乐厅。你们看看头顶上的雕像，那不是真正的雕塑，将它们推倒吧！它们不是真正的希腊众神的雕像。在这里，我几乎不能跳舞；在这里，没有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弗兰科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几乎无法演奏。

弗兰科先生和我，我们都是红色的人。

随着帷幕的降落，伊莎多拉再次挥舞红围巾，与此同时，大多数观众在喝彩欢呼。

翌日，美国全国所有的报纸上出现的大标题耸人听闻：

红色舞蹈家震惊波士顿

伊莎多拉的演讲使许多人退出波士顿交响乐厅

头戴火红围巾的邓肯说她是红色的人

在某些不择手段的好撰写奇闻轶事的作者的笔下，伊莎多拉的红围巾变成了全红束腰外衣。她被详尽生动地描绘成扯掉薄纱的红色衣裙在头上挥舞，浑身裸露着发表讲话。

波士顿市市长向新闻界发布声明说，他已给执照颁发部门写去通知，如再发给邓肯小姐执照在波士顿演出，是不恰当的，“鉴于责任，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伊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不愉快的演出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市长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为此，伊莎多拉决定作最后一次讲话。在准备离开波士顿去芝加哥之前，伊莎多拉对那些兴高采烈来看望她的记者们说：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话，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成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象征。

暴露一个人的身体是艺术，隐蔽它才是庸俗。每当我跳舞的时候，我的宗旨是唤起人们的尊重，而不是提倡任何庸俗的东西。我不会像你们的歌唱团中半裸体的女演员那样，我并不以人类的低级本能来吸引观众。

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有挑逗性、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

裸体是真实，是美，是艺术。因此它绝非庸俗的，也绝不可能是不道德的。假如衣服没有保暖性能，我决不会穿它。我的身体就是我的艺术神殿，我之所以将它暴露，是因为我把它当作崇拜美的神龛。

我曾想把波士顿观众从束缚他们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他们被套上近千条习俗与环境的锁链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他们受着清教的束缚，受着波士顿的名门贵族的限制，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是呆板的、受奴役的。他们早就想获得自由，他们曾高喊着要他人来为他们解下锁链。

有人说我的衣着不妥。仅一件服装有些不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为什么要关心我露出了身体的哪个部位？为什么人体的一个部位比另一个部位更邪恶呢？难说整个肉体与灵魂不是艺术家表现其美的内在信息的工具吗？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这是现实的、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这正是庸俗与艺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因为艺术家会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灵魂及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神圣的艺术宝座上。

我跳舞时运用自己的身躯，就如同音乐家使用自己的乐器；如同画家使用调色板和画笔；如同诗人发挥大脑的想象力。我从不穿着累赘的服装来束缚自己，也从不让衣服遮住我的四肢及颈部。难道我不是正在力争把精神和肉体融为一个统一的美的形象吗？

今天舞台上的许多演员是庸俗的，因为他们隐藏而不显示自己。如果他们赤身裸体的话，反而会更少具挑逗性。然而当局却允许他们演出，因为他们满足了清教徒隐藏肉欲的本能。

这是波士顿清教徒感染上的一种疾病。他们想要满足自己的卑鄙粗俗而又无须公开承认。他们惧怕真理。一个裸露的躯体使他们反感，而一个挑逗性地穿着衣服的躯体却令他们愉快。他们惧怕用正确的名称来说出他们道德上的缺点。

我不明白，清教徒的这种庸俗作风为什么一定要制约着整个波士顿，但看来事实的确如此。其他城市则不同，那里既不存在怕美恐惧症，也无人

假笑着欣赏滑稽的半裸体。

以上的讲话内容，被或多或少地断章取义，从波士顿电发或邮发到其他各州的所有报社。“红色的伊莎多拉与清教徒的波士顿”成为许多社论的标题，无数以“大众精神”、“美国人”、“抵抗红色”、“热爱真理的人”等名义书写的信件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刊载。

伊莎多拉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时，波士顿小题大作的这一爆炸性的新闻报道达到了顶峰。她的房间里挤满了采访记者，他们高兴地期待着采访到更加生动的内容。与他们一同到来的新闻摄影师们则希望伊莎多拉为他们和他们的报纸摆好姿势，并手举据说她在受惊的波士顿人面前挥舞的舞蹈束腰外衣。

然而，伊莎多拉早已被此事搞得厌烦了，她对记者们说：

“我没有扯掉衣服并且在喊：‘我是红色的！我是红色的！我是红色的！’我也根本不可能把衣服撕掉，因为它是用松紧带固定在我的双肩、臀部及腰部周围的。我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像评论家们讲的那样。”

然而，事态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人们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这些人的喊叫被传教士比利·森迪接了过去，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向那些政客宣讲福音。

“那个轻佻的布尔什维克女人，她的衣服短得不足以盖住胯部。我愿意担任 15 分钟的劳工部长，但愿我能把她打发回俄国，以便……”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者说是口中吐出的唾沫阻止了一连串的脏话从这位基督徒口中脱出。

这次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对伊莎多拉一系列演出计划的被取消感到十分不安。他给伊莎多拉打电报说，再也不要做落幕前的讲话了。但伊莎多拉是不会轻易听从他人劝告，放弃自己喜欢享受的社交生活的。加演两个节目之后，在芝加哥观众的热情鼓励下，她再次走到台上，面带非常天真的微笑，向他们讲话：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的演出是要结束了。我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后接着说，“哦，对啦，还有自由！”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莎多拉深受鼓舞，继续说道：

“我为什么不能发表讲话？我听说你们的歌星阿尔·乔尔森比我的讲话要长得多，比我的反政府情绪要强烈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生有一张黑色面孔。只要让我讲话，我也可以带上黑色面具嘛！”

台下又一次传来笑声与喝彩声。

结束了芝加哥的演出，伊莎多拉又回到纽约的旅馆。那群经常出现的记者又来采访。

伊莎多拉对他们说：“我是来这里休息的，我需要从我整个旅行期间所遭受的、来自美国新闻界的迫害中恢复过来。我每次来到美国，他们都如同一群狼一样围着我嚎叫。

他们就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他们说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者，这不符合事实。我现在跳的舞蹈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尚未形成以前跳的毫无两样。波士顿的报纸编造说，我将衣服扯掉，并且挥舞着高喊‘我是红色的！’这完全是谎言。我的舞蹈被全美国的舞蹈学校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演出时却遭到诽谤，这是为什么？他们乐意仿效我的舞蹈构思，却又不去帮助它的

创作者。我的舞蹈，一直在激励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对美的追求与热爱，然而在波士顿，只因一位爱尔兰政治家说我的舞蹈不规矩，就被禁止上演。这里包含着你们美国清教徒气质的习俗和教义。”

在纽约做了短暂休息之后，伊莎多拉再次西下践约。她一系列需要完成的预约演出首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始。

她抵达那里后发现，她的经纪人已完全摆脱了上个月在波士顿发生的事件所带来的干扰。而那里的市长却极度兴奋地警惕着，他大叫说，决不允许伊莎多拉在他的市民面前扯掉红色衣裙，并带有煽动性的挥舞。他告诉人们，他已经吩咐在演出之夜的舞台上及剧场内安置四名警察。他们打算设法使这位舞蹈家不能做出任何伤风败俗的举动，既不要摘下红围巾，也不要剥掉太多的衣服。但他们却允许她不穿鞋袜赤脚跳舞，真是令人不解。

这位市长在一次对新闻界的讲话中说：“伊莎多拉根本骗不了我。她也配谈论艺术？哼！这种不正派的人，我见过何止她一个。我就像了解美国所有的男人一样了解艺术，但我却从不为了欣赏艺术去看这样的舞蹈。不，先生，我敢断定，去看这种所谓的古典舞的男人大都认为那是只能愚弄他们的妻子的艺术。

“关于一个女性的艺术问题，关系到她的自尊问题。脱掉那么多衣服，她的自尊也就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粗俗下流，这就是男人们在那里所能看到的。

“不，先生，这种裸体舞蹈演员在我这儿是通不过的。如果她要脱掉衣服在空中挥舞，像传说的她在波士顿的所作所为一样，将会有巡逻警车出动。如果她在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当，我们将随时干预。”

“讨厌透顶！”当伊莎多拉听到这位市长的声明时，气愤地说道。“粗俗下流得令人作呕！简直不是人话！感谢上帝，这个人仅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长。在我看来，甚至连非洲人大概都会比美国中西部的一些本地人珍惜我的劳动！”

但是，剧院里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观众确实非常欣赏她的舞蹈艺术，因此，那四名警察也就失去了任何作用。这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演出结束时，观众为杰出的艺术家伊莎多拉鼓掌喝彩，而她却十分严肃，不露声色。

11月22日，伊莎多拉来到路易斯维尔，举行了一场演出。继而她又由那里出发，开始奔赴预约过的若干大城市，做短暂的巡回演出。这些始终没有取消演出计划的城市有：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孟菲斯、底特律、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和费城等。她的演出预计在布鲁克林结束，因为那里的音乐学校为她在圣诞节之夜安排了一场演出。

圣诞节前夜，伊莎多拉打算应思想开明的教区长威廉·诺曼·格思斯博士的邀请，在圣马可教堂演出，同时准备就“舞蹈对人的精神及道德的影响”问题讲几句话。然而伊莎多拉想就这一题目讲些什么已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因为纽约的主教以写给新闻界的如下声明插手进行了干涉：

许多家报纸刊登了一则为位其演出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引起强烈反对的舞蹈演员将在纽约圣马可教堂演出并发表讲话的消息后，纽约的主教已经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极为严肃的抗议书。

曼宁主教希望声明，上述的这位舞蹈演员将不会在圣马可教堂讲话，也不会在与教会组织及其宗教仪式有关的场合举行专业性演出，主教愿以此做为对那些抗议书的答复。

1923年1月23日星期六晚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星期一晚上,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进行了她的最后两场演出。由于报纸上攻击性的宣传把她搞得精疲力竭,于是,她在叶赛宁和忠实的女仆让娜的陪伴下,于月底乘船启程了。在即将离开码头之际,伊莎多拉再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的确不该对你们这些记者再说一句话。你们破坏我这次巡回演出的愿望得逞了,而我对此行却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希望赚得足够的钱送给我那些在莫斯科处于饥饿中的孩子们。我非但没有带钱回去,反而被迫向朋友们举债。

在我演出期间,你们的报纸不惜整版刊登有关我私生活的详情细节。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同谁交往等诸如此类的事,但只字未提我的艺术活动。实用主义是美国的一大祸害。这将是你们在美国见到我的最后一次,我宁愿在俄国生活,啃黑面包,喝伏特加,也不愿住在这里最豪华的旅馆里。你们对爱情、食品,甚至艺术一无所知。

在俄国有自由,这儿的人们根本不懂得自由为何物。这里有自由吗?哼!因为我来这里教导人们懂得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你们的报刊就毁了我的巡回演出。你们这些人不需要艺术。当我抵达这里、将真正的艺术奉献给人们时,他们将我拘留在埃利斯岛上。

在这个国家,如果有谁说出他的真心话,政府就会对他依法处理!

假如我是做为一个筹借款项的外国金融家前来,我将会受到隆重的欢迎。由于我仅仅做为一位世界公认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前来这里,反而将我看作一名危险分子被送到埃利斯岛上。

我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者。所有的天才人物都配得上这一称号,每一位艺术家如今必须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所创举的人。

那么,再见了,美国!我将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伊莎多拉带着剩余的贷款抵达巴黎后,她和叶赛宁径直到了克里永旅馆。豪华大街上的那所房子已租给一位美国妇女,租期六个月。至少得等一个月以后才有可能再住进去。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叶赛宁简直有些受不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淹没在酒中,或确切地说,淹没在伏特加中。一天夜晚,他像个疯子一样冲进他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把他制服,送到附近的警察局。

美国驻巴黎的报界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消息。但是,伊莎多拉忠诚地站出来保护她的丈夫。

但是,克里永旅馆的管理者态度冷淡而又不失礼貌地对她说,他们不愿接待她这位名声远扬的住客。

于是,伊莎多拉和她的朋友佩克夫人又搬到了莱茵旅馆。在那里,靠几位有影响的朋友们的帮助,他们设法从警察的手里接回了这位狂暴雨不幸的诗人。

叶赛宁一出警察局,伊莎多拉便设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和丈夫一起到了凡尔赛,住在特里亚农旅馆。

然而,嗅觉灵敏的美国新闻记者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被甩掉的,他们的报纸仍在继续不失时机地报道伊莎多拉和她丈夫的活动。

最终决定，叶赛宁最好返回俄国，而不要再去冒险遭到法国警方纠缠的危险。不管他做为一位诗人，还是做为一位公民，警察似乎都不愿为这个狂暴的俄国人多加考虑。

讲一口勉强称得上是俄语的女仆让娜被派去陪送这位诗人的前一段旅程。伊莎多拉的那些友好而有影响的朋友替他们把证件办妥后，他们便从法国进入德国。将诗人留给柏林他的同胞们以后，让娜便回到她的女主人身边。

伊莎多拉回到豪华大街后，又开始展望未来。她想要演出，可是难以找到一位经纪人。她的秘书乔·米尔沃德和她的兄弟雷蒙德决定带上乐队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为她安排两场演出。由于没有精心组织好，甚至伊莎多拉·邓肯这一富有魅力的芳名也不足以使那个遐迩闻名的剧场满座。而经伊莎多拉的请求，为在俄国挨饿的孩子们，他们提前支付了演出所应得的收入。所以，这两场演出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余款，能使她再继续演出。

这期间的伊莎多拉，还有另一个故事。它撩开了帷幕的一角，展示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和她的性格的一个侧面。

一天傍晚，她的一位老朋友杜吉到豪华大街拜访了她。他在那儿见到伊莎多拉同从柏林回来的叶赛宁在一起。这位诗人看上去情绪极佳，每天坐在那里让他的朋友、著名的俄国画家鲍里斯·格里戈里耶夫给他画像。当画家在聚会后准备离去时，伊莎多拉邀请他留下来共进晚餐。

“你也不要走，杜吉。我不知道拿什么来招待你们，可能什么也没有。知道吗，我欠了厨师 600 法郎。一周来，一直在由她提供我们的膳食，”伊莎多拉对他说。

过了一会儿，女仆拿着一块桌布走进来摆餐桌。若是在过去，哪怕是在她的仆人们的餐桌上看到那么皱、那么脏的桌布，伊莎多拉也会觉得丢人的。

此时，门铃响了。在连着餐室的小客厅里，伊莎多拉与来人匆忙商量了一下之后，站在门口朝里看了看，接着便请客人们原谅她出去一刻钟。

半小时以后，她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了。秘书跟在她身后，也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还有酒和鲜花。那块肮脏的桌布、发皱的餐巾和半瓶已走了味儿的啤酒通通从餐桌上拿走。重新铺上了一块刚从商店里买来的漂亮的格子花布，与之配套的餐巾放在各自的席位前。麝香石竹花插进花瓶里，摆在餐桌中央。这时，从厨房里端出了晚餐开始的头一道菜——牛肉清汤。

接着，其他的包被打开，放在盘子上。是一只特大龙虾、两只大烤蟹、色拉和刚上市的草莓。还有配了一些蔬菜的淡而无味的白煮牛肉。这些东西与牛肉清汤加在一块儿，就是这顿晚餐的全部菜肴了。为了吃掉这么多美味，还买了四瓶散装香槟酒。伊莎多拉说，这种散装香槟酒往往喝起来味道也很好，尽管它的价格只是名牌香槟酒价格的十分之一。

在晚餐进行过程中，伊莎多拉做了解释。那天整个一下午，秘书都在外面弄钱，并设法从她的一个债务人那里提取了约 300 法郎，这仅为所欠金额的一个微薄数目。当伊莎多拉恰好在晚餐前接到这笔钱时，又想起她已邀请了格里戈里耶夫和杜吉两位客人留下来用晚餐，可是，那时根本没有条件达到她以往请客的标准。于是她马上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用秘书刚交给她的这点钱去购买了一块新桌布、半打餐巾、麝香石竹花、龙虾与蟹，草莓和酒等。若不是她身上只剩下几个法郎要付回家的出租车费，她还要去买一只烤全鸭或斯特拉斯堡的油煎鹅肝馅饼。

正当用餐期间，她的兄弟雷蒙德进来了。他以一种近乎清教徒似的不满情绪注视着面带笑容的就餐者。伊莎多拉拿起龙虾爪递给他。

“我不吃肉，”他简慢地说。

“可这不是肉啊，雷蒙德。这是水果。泥塘里的水果！泥塘里的水果！”她一边重复这句话。一边笑着观察她兄弟脸上呈现出的那不可思议的神情。

5月27日，在特罗卡德罗剧场举行了首场演出之后，伊莎多拉接待了几位挚友——一小批艺术家和诗人。

叶赛宁发现这些客人不合他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分局打了电话。四名警察很快骑车来到，把叶赛宁带走。他还轻声地说：“好警察，我跟你们一起走！”

第二天早上，伊莎多拉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设法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据说，通过叶赛宁的几位朋友的努力劝说，伊莎多拉·邓肯才允许她那可怜的丈夫被送进一家普通的精神病院。因为疗养院的收费之高，令人咂舌。伊莎多拉在她因同叶赛宁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她的行为所表现出的是忠诚、克制和博大的爱。

好奇的记者们仍然在刺探着她的私生活，并利用以较大篇幅登载社会丑闻和杂谈的报刊进行宣扬。换了别人，也许会不事声张，但伊莎多拉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

在6月3日举行的第二场演出——不像第一场那么成功——结束后不久，伊莎多拉决定，除了卖掉她在豪华大街的家具，将房子长期租出去，与此时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俄国，别无其他办法。

家具一件一件地被卖掉了，用这笔钱支付一位每天拿出那张3000法郎的帐单来催着要帐的裁缝。房子腾空了以后，租给了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而伊莎多拉和她的丈夫则途经柏林回莫斯科去了。

## 第十五章 孤独的舞蹈家

她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坏蛋，就是下流坯！”伊莎多拉喊道

“在伊莎多拉的房间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

“这项合同是一场骗局。”

1923年8月5日，在外辗转奔波了近15个月后，伊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抵达莫斯科。

当邓肯走下火车时，她看上去满面愁容，困顿不堪，尽管实际上她正为自己终于完成了一项十分累人的任务而欣喜万分：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将诗

人丈夫送回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叶赛宁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车梯。终于回到俄国所激起的巨大的感情波澜，连同进入故乡边境后就源源不断倾入喉咙的伏特加酒，使他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他欣喜若狂，奔放的感情驱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艾尔玛偕同学校秘书来迎接他们回家，陪同他们一起乘车离开了车站。在他们身后随行的一辆马车，载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衣橱式皮箱、饰有锃亮的闪光的铜锁和铜扣的手提皮箱，以及沉甸甸的皮革袋子。

当他们来到学校时，校园里冷冷清清。孩子们都到农村避暑去了。叶赛宁一头倒在躺椅上醒酒。在他沉睡时，伊莎多拉以她优雅绝伦的风度、无穷的睿智讲述着旅途见闻，让朋友们一饱耳福。

当她的旅行见闻讲座告一段落时，叶赛宁也从小睡中醒来，精神饱满，醉意全无。

他们开始考虑吃午饭，但房间里没有任何食物，厨师还在乡下陪着孩子们，所以只能去餐馆了。

午饭后，伊莎多拉建议到乡下看看为避暑临时搬去的学校。同孩子们分离一段时间以后，她很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在艾尔玛指导下进步如何。

他们租了一辆汽车。莫斯科郊外的道路崎岖不平，他们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来到通向学校的庭园时，夜幕已经降临。

孩子们听说伊莎多拉回到了莫斯科，便派出侦察员，等老师一到便由他们用灯笼发出信号。伊莎多拉一跨出汽车，孩子们便翩翩起舞，簇拥着她进入屋里。

她并未在乡间久留，尽管这里有快乐的孩子们的陪伴。转天，夏雨瓢泼而下，令人郁闷，叶赛宁决定回城，她只好陪着他进城。

当他们再次来到普列特奇斯坚卡时，他将她一人留在那里，自己不告而别，三天杳无音信。

每天清晨，伊莎多拉总是喃喃自语：“他一定遇到什么事了。他受伤了，出事了，得病了。”白天，她在焦躁不安的等待和急切的盼望中度过。到了傍晚，她又喃喃自语：“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决定远远离开莫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季余下的日子。

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的火车票。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伊莎多拉不禁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开始重新收拾行装。

让娜留在巴黎了，身边没有侍女帮忙，她使唤来了艾尔玛。艾尔玛将与她同行，以便随时照顾她。

当艾尔玛着手准备旅途用品时，立即发现自己的老师衣服少得可怜，这使她大吃一惊：她甚至连一件睡衣都没有。她的衣箱几乎是空的。仅有的几件衣服还是在俄国买的。

当艾尔玛问到这些时，伊莎多拉无可奈何地笑笑，回答道：

“我什么都没有。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不见了。开始我还以为是让娜干的，后来才偶尔发现几天前在豪华大街买的一件黑睡衣跑到了叶赛宁的一只新箱子里。这样，我的内衣就一件接一件地从五斗橱的抽屉里不翼而飞了，钱就更甭提了……”她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势说完了没有说出的一切。

“那么，”艾尔玛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打开叶赛宁

所有的箱子，拿回你自己的东西！”

“噢！”伊莎多拉带着悲戚而又惊恐的神情喊了起来，“我们不能这么办。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好几次他威胁说，如果我胆敢瞧瞧他箱子里的东西，他就开枪打死我。我知道他在一只箱子里藏着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不，不，我们可不能轻易动他的箱子。”

但伊莎多拉的朋友们很快找到了一把能开最大的一只手提箱的钥匙，且马上将它打开了。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千奇百怪的东西。人们以各种各样的钥匙和尖头工具试开其余的箱子和提包，但都无法打开，有人便出去找技术高超的锁匠。

艾尔玛在工作室里忙碌着。她从摊在地上的一匹丝绸上剪下一件件睡衣用料。除了这匹放在上面的丝绸外，这只敞开的箱子里还有成盒的和散装的昂贵的香皂，一瓶瓶头发香水、洗涤剂、润发油，一筒筒牙膏和刮脸皂，大瓶小瓶的各种香水，一盒盒剃刀片。

这些都是叶赛宁准备送给亲朋的礼物。

叶赛宁后来将箱子一股脑儿带到一位朋友的家里，用一个手指按在唇上，神秘地逢人便说：

“我的箱子！不能让别人碰它们。”

其他箱内的东西也许永远是个秘密，因为正当锁匠要在这种他从未见过的、别出心裁的锁上施展技艺时，叶赛宁一头闯了进来。

这时，伊莎多拉把同他断绝关系的决心抛到了脑后，张开双臂向房门冲去，喊道：“谢尔盖！谢尔盖！你到哪儿去了？伊莎多拉难受，太难受了！”

此时，艾尔玛将迷惑不解的锁匠从旁门推了出去，在他身后大声嚷道：“不，我们不把这些箱子放到地下室里去了。”

叶赛宁环顾四周，随即将伊莎多拉推开，扑向他的宝贵财产，发疯般地大喊：

“我的箱子！谁摆弄我的箱子了？你们竟敢动我的箱子，我要杀了那个碰我箱子的家伙。我的箱子！噢，我的箱子！”

大家急忙解释说由于以为他不回来了，才准备将箱子搬出屋去。叶赛宁这才平静了一些。随即，他走向一只箱子。从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挑出其中一把，打开了一只皮箱。当他正忙于拿出他所需要的东西时，伊莎多拉走过去，飞速捡出了一件衣服。

“看！这是伊莎多拉的裙子！”她喊道。

他跳了起来，想抢回这件衣服，于是一场稚气可掬的拔河赛开始了。最后，他松手了，伊莎多拉将衣服扔给艾尔玛。随即她以比叶赛宁更敏捷的动作奔向箱子，拿出了另一件。他们又孩子般地抢来抢去。他大喊大叫：

“这是我的！这是给我妹妹的。在巴黎时你把它送给我了。这是我的！”

伊莎多拉：“不对！不对！这是给艾尔玛的。我在巴黎时没有送过你，这件礼物是给她的。”

叶赛宁松开了他抓住的衣服的一角，奔过去把箱子合上，以防伊莎多拉再拿去什么。

随即，他像以往一样用纸将衬衣和盥洗用具裹成一个小包，准备离开房间。

伊莎多拉站在他面前，以过去从未有过的严峻的目光注视着他，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如果他又对所去的地点、时间只字不提就离开，那么一切

就都结束了，她不愿再为他过另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天。无论如何当晚她要离开莫斯科了。

他带着怀疑的目光大笑着走了。当晚，当列车即将驶离卡赞斯基车站时，叶赛宁出现在月台上。这回他没有喝醉酒，满面笑容，尽管莫斯科火车站很多，他仍然巧妙地找到了妻子上车的车站，赶来与她道别。

他的到来使伊莎多拉深受感动，劝他登车同去。

但叶赛宁没有被她说服。他答应过一段时间也要前去，可能是在克里米亚与她相聚。

在最后一遍车铃响起前，他们温情脉脉地互相道别，仿佛这是他们第一次分手。伊莎多拉不停地挥动着围巾，直到叶赛宁的身影在她的视野中消失。

伊莎多拉启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这是俄国的疗养胜地，那里有闪闪耀眼的纳赞泉，含矿物质的泉水装瓶运出，行销全苏各地。

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经过两天半的奔波，于8月的一个清晨6点钟到达这个小镇。

伊莎多拉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早晨，她用令人精神焕发的矿泉水洗浴，中午在库尔斯豪斯进餐，随后在附近风光旖旎的乡间乘车兜风，傍晚又回到库尔斯豪斯用餐，饭后去剧院看戏或听交响乐队演出的音乐会。

这样生活了一周左右。她感到有些厌烦了，决心振奋起来做些事情。

于是，她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首场演出在基斯洛沃茨克举行。为此她给在莫斯科的秘书打了一个电报，要他与别人同来安排演出。

他们赶来后，伊莎多拉制订出了演出计划。她在基斯洛沃茨克的首场演出是柴可夫斯基的带有交响乐伴奏的乐曲。这个交响乐队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列宁格勒交响乐团，他们熟记《悲怆交响曲》。但他们告诉伊莎多拉，他们已多年没有演出过《斯拉夫进行曲》，需要排练才能登台。

在首场演出的当日清晨，设于库尔扎尔广场的半圆形音乐台上，大幕紧闭，遮住了正在紧张排练《斯拉夫进行曲》的乐手们的身影。

小号吹出的刺耳的歌颂沙皇的音符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几位还没有洗澡便早早出来散步的游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面面相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遮住了乐队的帷幕前。

乐队指挥对此一无所知，当他正要指挥乐师们第三次重复这支进行曲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契卡官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查问他们反复演奏这支刺耳的沙皇赞歌是什么意思。

乐队指挥刚才还在一味欣赏这支由喇叭吹出的充分体现了柴可夫斯基的创作风格和斯拉夫特色的赞歌，现在却浑身上下颤抖着，向那位可畏的官员解释说这场虚构的反革命示威没有任何含义。他是奉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女士之命来排练这支乐曲的，当晚她将要在剧院中用舞蹈来表演这支出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

他给半信半疑的官员出示了节目单和柴可夫斯基的乐谱。这位契卡官员命令指挥不论早晨还是其他时间都不准再为好奇的围观者演奏富于煽动性的曲子。

当晚，剧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因为邓肯即将演出“上帝保佑沙皇”这一节目的消息早已传遍了全城。

然而，当邓肯一登上舞台，两个全副武装的契卡官员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进行曲》，演出就不能进行。

伊莎多拉用结结巴巴的俄语竭力解释说，她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纪念会上，曾在所有的共产主义领袖们面前用舞蹈表演过这支乐曲，卢纳察尔斯基同志曾为此写了热情洋溢的赞誉文章。她已在世界各地富于革命色彩地表演过这个节目，现在不准备在一个俄国小镇放弃这一节目。

然而，这两位漠不经心、疑惑不解的契卡官员冷冷地答道：伊莎多拉必须保证不再跳沙皇赞美歌的曲调，否则他们将寸步不让。

伊莎多拉不屑继续与他们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到台前，面对着急切等待着的观众。

第一阵热烈的掌声平息后，伊莎多拉问剧场里是否有人能将她的话译成俄语。坐的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愿意提供帮助。

伊莎多拉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他们来逮捕我！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

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此时，那位一直缄默不语的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

“您不必担心，邓肯同志。您可以开始演出了。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分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伊莎多拉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两位契卡官员不再罗嗦就离开了舞台，伊莎多拉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然而，契卡对插手这起事件的人甚为不满。

转天傍晚，当伊莎多拉和艾尔玛进餐时，有人惊恐万状地跑来送信说，警察已在秘书的房间里。

两个女子匆匆赶回旅馆，跑到屋里，发现那两个在演出那天晚上打过交道的官员正与一位地位更高的人物交谈着。他们身着清一色的警服，腰带上别着手枪，房间的前后门均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着。

秘书面色苍白，全身战栗地躺在床上。他十分清楚，自己一旦离开此屋，也许就永远不能回来或回到人世间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当伊莎多拉弄清他们不敢招惹冒犯了他们尊严的艾尔玛和她本人、却要逮捕纯属无辜的秘书时，不禁怒气冲冲地将矛头对准了那个官衔最高的官员。狂怒中，她找出了她所知道的俄语中最下流的骂人的话，满腔怒火地对他骂道：

“下流坯！”

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向手枪的皮套。

“坏蛋，就是下流坯！”伊莎多拉喊道，随即又怒不可遏地向他抛去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话语。

躺在床上的秘书竭力解释，借以安慰这位受辱的官员。

当两名士兵奉命上前看守躺在床上的秘书时，伊莎多拉蓦地记起颇有权势的托洛茨基此时仍在基斯洛沃茨克。她跑出房间，大声告诉艾尔玛她去找托洛茨基。士兵们想拦住伊莎多拉，但她巧妙地躲开了他们，跑到自己

的房间里匆匆写了一个便条，旋即冲下楼梯，找到一个门卫，努力向他说明自己要直接去托洛茨基居住的别墅。

这位仆人充当了伊莎多拉的向导。在灯笼摇曳的微光下，伊莎多拉攀登在峭峻漆黑的山路上，焦急地寻找着军事部长的住宅。他们找寻了大约 15 分钟，终于来到一幢高大的别墅前。

守门的两名契卡人员不准这个陌生的、情绪激动的女士入内，并且找来了警卫队的长官。

他询问了伊莎多拉的情况后，随即告诉她任何人不能见托洛茨基。

最后，她只好将那张用铅笔写的便条交给他带入别墅。

过了一阵，他回来通知她可以回旅馆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伊莎多拉回到旅馆，发现秘书的房间已杂乱无章，所有的抽屉、箱子和提包都被搜查了一遍。根据托洛茨基卫队的高级契卡官员下达的命令，士兵们已撤离了此处。

风波之后，伊莎多拉觉得如果迁往更边远的地区对她和她的朋友们也许会安全一些。

因而她决定前往里海岸边的石油名城巴库。从她们所在的疗养胜地乘火车去巴库，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

到达巴库后，伊莎多拉到欧罗巴旅馆。

她刚一露面，旅馆老板和他的夫人就迎了过来。他们向她问好，欢迎她的到来。他们告诉伊莎多拉，很久很久以前，他俩在德国见过她。这位美国姑娘的美妙的舞姿已成为他们珍贵的回忆，因而在伊莎多拉逗留期间，他们对她关怀备至，并且总是亲自做这做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她住得舒服一些。

旅馆设有一个屋顶花园，一支小乐队在开饭期间在此演奏。伊莎多拉每晚都在这里进餐，同时俯瞰市区和周围乡村的奇妙景色。

午后，伊莎多拉和艾尔玛总是驱车到城外兜风。她们时而驶进景色秀丽的乡间，时而在陡峭的沿海公路上疾驰。

一次，在环海飞驰的途中，她们闯进了一个小村庄。村里一片静寂，一座座农舍似乎都没有窗户，只有通向院子的一扇扇房门。门前的院落阒无人声，散发着醉人的花香，苍老的无花果树在院内投下浓浓的树荫，泉水淙淙，清脆悦耳。水边端坐着缄默不语、头戴面纱的妇女。当她们离开小村时，路过一片荒芜的墓地，歪斜的墓碑旁一些戴面纱的女子倚石而坐。在清真寺的尖塔下，一位祷告的报时人正在招呼虔诚的教徒们祷告。

这里的人们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司机告诉她们，这是一个普通的波斯人居住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是穆斯林。

在离开这个被人遗忘的小村庄的途中，她们驶过一个迷人的小海湾，这里的海岸铺满银沙，一望无际。当漫不经心的司机坐在那里大吃其在村里买到的西瓜时，她们用他的汽车当浴室更衣，随即跳入温暖的里海水中尽情畅游起来。

伊莎多拉在石油城逗留了两个星期，举办了几场由管弦乐伴奏的演出。她发现，如同往常一样，大部分收入都付给了乐师们，但她又不愿只在钢琴伴奏下跳舞。一次，在巴库举行独舞演出之前，伊莎多拉只请了一位在当地享有盛誉的钢琴家参加排练。但在演出那天，那决定无论如何必须有管弦乐伴奏以壮阵容。因此，即使在为油田工人免费演出时，自始至终也是由一支

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伴奏。

一次，在一个小俱乐部里，伊莎多拉为工人子女们举行了一场免费的午后演出。

在节目开始前，她把几个孩子叫上舞台，给他们上了舞蹈训练的第一课。随后她表演了几支舒伯特的圆舞曲、《音乐瞬间》以及肖邦的小夜曲。

小观众们兴高采烈的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喝彩和掌声，使伊莎多拉深受感动，她决定接受几名天赋高的孩子进入她所执教的莫斯科舞蹈学校学习。他们将在那里接受几年训练，然后返回巴库去教其他的孩子们舞蹈。这一计划将由国家石油公司资助。

但在一番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这一打算终于成为泡影。由于缺少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然而，伊莎多拉十分喜爱孩子们，仍为孩子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盛会。通过旅馆德国老板的热情帮助，伊莎多拉请来了屋顶花园的小管弦乐队。在他们的伴奏下，她指点艾尔玛排练了许多她大约在 20 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这些节目表现了爱情与青春的欢乐，销魂的陶醉和狂喜，十分迷人。

演出那天，艾尔玛因病无法登台。伊莎多拉不愿让急切等待的热情的观众失望，决定亲自表演这些她已多年未跳过的充满青春魅力的舞蹈。

伊莎多拉身披薄如蝉翼的粉色彩裙，栗色的秀发上缀着鲜花，轻盈地跳着，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在格鲁克、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等大师的乐曲声中，她将少女的迷恋和狂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优雅和喜悦出自天然，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杰出的天赋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她捕捉到了飞逝的青春的精灵，并在一个下午将其牢牢地留在了举手投足之间。

离开巴库，伊莎多拉来到坐落在激流奔腾的库拉河沿岸的梯弗里斯。昔日她来俄国旅行时，曾到过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格鲁吉亚首府。这里给她留下了许多有趣而又幸福的回忆：美丽的黑眼睛的土著，芳醇馥郁的葡萄酒，矿泉水浴以及在群山起伏的郊外的游览。

在她到达市中心几个小时后，高加索共和国主席埃尔耶阿瓦就前来拜访，并向她表示了敬意。他对这位舞蹈家已久闻大名。埃尔耶阿瓦不仅是位蜚声全国的革命战士，而且是个地道的格鲁吉亚人，他十分希望伊莎多拉这次访问苏维埃领导下的梯弗里斯，会同前次访问时一样顺利、愉快。他告诉伊莎多拉，他非常愿意，而且高兴陪她在乡间乘车出游。

转天，他乘一辆大型公车来到了旅馆，随行的还有其他一些级别稍低的政府官员的汽车。伊莎多拉将一条红围巾披在肩后，当她穿戴停当后，所有的车辆一同朝弗拉基卡夫卡兹的方向驶去。

他们来到一个小酒店进午餐。店主人是一位胖乎乎、温厚的当地人，他在一桶桶堆积如山的新酿造的高加索酒之间忙碌着，犹如一位格鲁吉亚酒神。他摇摇摆摆地穿梭于饭桌之间，端着大杯的殷红的葡萄酒为尊贵的客人们祝酒，又不时摆弄着在火上烘烤的羊肉串，使它们合乎客人们的口味。当午餐将要结束时，客人们已品尝完香气扑鼻的东方咖啡，开始抽起烟来。这时，上了年纪的胖主人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蹈。他在牙间衔一把短剑，头顶一个空酒瓶，表演了一个欢快的当地舞蹈。他的舞姿非常优美，轻快，使伊莎多拉大为惊讶。她看得人了迷，大声要求他再来一次。

伊莎多拉在前次梯弗里斯之行中，见到了名扬天下的硫磺温泉浴，对

此仍记忆犹新。

现在她每早必去那里洗浴一次，洗浴结束，房间里备有热腾腾的肉馅饼和醉人的当地葡萄酒。伊莎多拉说洗这种澡只有一个难题：她虽在服侍人员娴熟的摆弄下减轻了许多磅体重，但在敞开胃口吃热肉馅饼时，体重却又升了上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傍晚，在政府供职的朋友们的陪伴下，伊莎多拉喜欢去一个突出在库拉河上的小饭店。那里，他们边啜肯南特莱酒，边欣赏当地管弦乐队的演奏。由于伊莎多拉的光临，他们总是乐于为她表演一些几乎已被遗忘的歌曲和民族音乐。她津津有味地聆听着乐师们变化多端、富于魅力的演奏，而他们也不知疲倦地为这位欣赏力极高的听众表演着。

尽管梯弗里斯暑气逼人，近于热带气候，但伊莎多拉在这里的数场演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离开迷人的格鲁吉亚首府前，伊莎多拉前去参观了无家可归的亚美尼亚儿童集中营。

这个庞大的营地设在距梯弗里斯几英里的地方。

像平日一样，伊莎多拉为孩子们表演了一个朴素的舞蹈，使得他们兴高采烈。随后，通过翻译，伊莎多拉为他们上了舞蹈第一课。离开营地时，她许诺捐赠一些红色舞蹈服装给他们，教师们可以将衣服送给那些跳得最好的女孩子们。

高加索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巴图姆，一个笼罩在 8 月末灼人的酷暑之中的小镇。伊莎多拉来到小镇后，当地政府安排她住进了一座美丽的别墅。托洛茨基在这个港口逗留期间曾住在这里。革命前它属于一个腰缠万贯的法国人，他在房前屋后的花园里栽种了许多欧洲和热带花卉。这是一个乐园，可惜离镇中心很远。

不走运的是，此时这里正是雨季。滂沱大雨已经持续了 48 个小时，伊莎多拉越来越感到抑郁。她喃喃自语不该离开镇里，不应这样随便接受当地政府的殷勤款待。第三日，骤雨依旧，伊莎多拉悄悄地离开了别墅，来到通往镇上的大路，搭车向剧院赶去。

当瓢泼大雨稍稍收敛一些时，别墅里的其他客人纷纷四处寻找这位失踪的贵宾。在巴图姆，他们发现她已在一位年轻人的公寓住了下来。这位年轻人是格鲁吉亚诗人，契卡首脑的弟弟。伊莎多拉来到剧院时，虽然全身湿漉漉的，但内心却欣喜万分。此时这位年轻人正巧也在剧院。

遇到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女士，年轻人不禁有些为之倾倒。他将她送往一个饭店，并在这里把她介绍给一些年轻的格鲁吉亚诗人。很快，他们把她当作缪斯，并把她护送到年轻人的公寓里住了下来。随后，他们在外面的楼梯上坐了一夜，为他们这位新来的缪斯守夜。

直到离开巴图姆，伊莎多拉一直住在这位年轻人的公寓里。

伊莎多拉在巴图姆逗留期间，黑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正在该港停泊。

一天，政府官员们拜访了伊莎多拉，询问她是否愿意为舰长和水手们免费演出一次。伊莎多拉欣然同意，为他们安排了一场日间演出。她用舞蹈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曲目，并像平时一样，以《国际歌》做为演出的压轴戏。台下的水兵们起劲地随着歌唱。

尽管巴图姆的诗人们仪表堂堂，对他们选出的缪斯殷勤周到，不乏魅

力，但仍无法驱走她脑海中对另一位诗人的思念：叶赛宁的影子总是浮现在她的脑海。

自从在卡赞斯基站分手后，她曾给他写了许多信，打了许多电报，但从未得到过他的片言只字。

伊莎多拉辞别了这群巴图姆诗人，乘船前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她希望那里会比高加索更容易吸引叶赛宁前去。伊莎多拉到达后，给漫游四方的丈夫发去了电报，要他去雅尔塔与自己会面。不久，回电到了：

别再来信、来电报。叶赛宁同我在一起，不会再找你。别指望他再回到你身边。

加琳娜·宾尼斯拉夫斯卡娅

这个答复使伊莎多拉·邓肯怒不可遏。她想马上赶到莫斯科，但她的朋友们劝她在黑海岸边安静地休息一下。

后来伊莎多拉才了解到，那个名叫宾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女子并未给她打电报，是叶赛宁出于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原因，写出了这份电文，签上了她的名字。当时她根本没有同他在一起。

这样，伊莎多拉在雅尔塔度过几天后，又回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她千方百计地想要见到桀骜不驯的叶赛宁。然而，他的行踪却这样难以捉摸，无论是他原先的住处。还是在特沃斯卡娅路他过去经常出入的咖啡馆，都没有他的踪影。他的朋友们也似乎都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他们虽有所知却不愿将此透露给正在打听他的消息的人。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后来叶赛宁在普列特奇斯坚卡 20 号露面。

他的行为非常不检，遭到人们的非议，连他的朋友施奈德也将他从那里赶了出去。

后来，他给叶赛宁写了封长信，信中提到：

在伊莎多拉房间里，你高声谈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情，以及你使其他两个女人怀孕的事，难道你不觉得这很粗俗吗？人们听了你的话会怎样想呢？伊莎多拉唯一的过错就是对你太好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下流坯。你曾多次告诉我你是多么爱伊莎多拉。

但你回到莫斯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一首献给另一个女人的爱情诗，来侮辱伊莎多拉。

你到处嚷嚷伊莎多拉把你送进了一所精神病院。我看到了账单，它证明你所说的精神病院不过是个你住过的一流疗养院。你想，精神病院能允许你随意外出吗？住疗养院花掉了伊莎多拉很多钱，才使你免受了监禁和流放之苦。

在歌剧场，你打伤了一位法国警察。如果没有伊莎多拉的影响和保护，你就会蹲好几个月的监狱。伊莎多拉像守护神一样随时随地保护着你，我曾读过不少她为你辩护的非常精采的文章。正是因为你，她才失去了美国护照。你知道吗，为了带你去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她做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然而在你的祖国，你却以卑劣的行径来回报她。我十分清楚地见到了伊莎多拉为你所做的一切，却没有发现你所谓的“爱情”给她带来了什么。我只看到你丢人现眼，谎话连篇。昨晚你又那样出丑，我只能告诉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此后，一天下午，伊莎多拉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与来访者闲坐，叶赛宁又前来索要他的半身雕像。他一露面就大声追问，最后终于醉醺醺地闯进了

屋里。

这座巧夺天工的半身像是由才气横溢的科尼奥可夫用一大块木料雕刻而成的，摆在屋角的一个高高的古董柜的顶层。

伊莎多拉拒绝将雕像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交给他，要他在神志清楚的时候再来搬走，但他却将一把椅子拖到屋角，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伸出双手摸到雕像并紧紧抱住，然而他又承受不住雕像的重量，摇摇晃晃地跌下椅子，滚到了地上，但双手还是紧紧地把自己的木像搂在胸前。他突然摇晃着从地上一跃而起，随即步履蹒跚地走出房间。他游逛在莫斯科的小路上，那个拖累人的雕像也不知丢到哪条街沟里了。

这是伊莎多拉·邓肯最后一次见到丈夫谢尔盖·叶赛宁。

当叶赛宁从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时，她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她为孩子们授课，大量读书，甚至还想写回忆录。

1924年初，一位名叫季诺维也夫的音乐家来到邓肯的学校。他急于为伊莎多拉组织一次巡回演出。

冬季数月的懒散已使她颇感抑郁，于是便欣然同意了这位年轻人的建议。他们研究了演出时间后，年轻人便匆匆奔赴乌克兰各个城镇，并做了初步安排。但在他已制订出旅行路线并在许多访问过的地方出售了预售票时，列宁逝世了。苏联政府决定全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哀悼。巡回演出只好暂时推迟。

尽管伊莎多拉从未与这位伟大的领袖接触过，但他的去世仍使她深感悲痛。在进入工会大厦的大厅里瞻仰列宁的遗容之前，她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外面工人农民的行列里，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自己在这次漫长的等待中也几乎被冻僵。然而几十万悲痛欲绝的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时的悲壮场面，给伊莎多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创作时她参考了一些流传甚广的歌曲，第一首曲子参考了列宁心爱的革命颂歌，第二首则参考了《革命英雄葬礼进行曲》。在后来所有的演出中，伊莎多拉都跳了这两支葬礼舞曲，并对不同的观众都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哀悼期过后，伊莎多拉同季诺维也夫一起踏上了乌克兰巡回演出的旅途。

首批演出是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伊莎多拉每次都是以献给列宁的两个葬礼舞蹈做为开场戏——这两个节目是首次公演。伊莎多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为她后来在乌克兰各地的一系列演出奠定了基础。的确，她的演出在每一个城镇都深受爱好音乐的乌克兰人的欢迎。

乌克兰首府基辅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伊莎多拉在这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该城约有50万居民，但伊莎多拉连演18场，场场爆满。即使在巴黎，她也从未连续演出过这么多的场次。在大街上，人民向她欢呼喝彩。

1924年4月，伊莎多拉·邓肯返回莫斯科。此时，她看上去比到俄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美丽。由于她的饮食仅包括新鲜的鱼子酱、烤鸡、烧鸡和香槟酒，几乎每晚必有的舞蹈演出又使她得到了持续的锻炼，她减去了约30磅体重。她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她说，即使演出没有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也无关紧要，不论赚不赚钱，在这样好的情绪中她无法闲散下去。如果她每天无所事事，每餐吃些土豆，失去的30磅体重很快又会恢复。

于是，伊莎多拉反复劝说自己的秘书，直到他终于前往列宁格勒去联系演出事宜。

伊莎多拉等不及听取回音，也赶往该城，并在驰名天下的欧罗巴旅馆租下一套宽敞的房间。1922年她同叶赛宁度蜜月时曾在这里住过，十月革命前她也曾几次做为贵宾来过这里。在苏维埃政权下，这座旅馆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葡萄酒窖基本保持原样，许多原来的侍者仍在这里工作。伊莎多拉前几次在这里居住时十分慷慨，一位老总管因此对这位舞蹈家印象颇深。他为伊莎多拉跑前跑后，设法让她高兴。

伊莎多拉仍像平日一样慷慨，对花钱毫不在意。她在自己房间的大客厅里款待了所有的新旧朋友。

五月份，伊莎多拉与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一场音乐会，第二次演出定于下一周举行。在这期间，演出主办人设法将伊莎多拉“卖”给了一个距列宁格勒很远的乡下小镇。

这个名叫威特普斯克的小镇位于铁路干线之外，须乘每站必停的夜车才能到达。

当伊莎多拉得知她要经过怎样的奔波才能抵达这个她将举行两场演出的遥远的乡间小镇时，她拒绝舍弃旅馆套间里舒适的生活去忍受三等夜车里的艰辛。尽管经纪人反复申明她要在那里举行的第一场演出的门票已经售出，但她仍不为所动。

经纪人心急如焚：他已花掉了提前收取的大部分钱。面对他声泪俱下的恳求，伊莎多拉回答道：“我无法设想乘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货车赶路。给我找一辆汽车来，我就考虑这次旅行！”

已慌得说话结结巴巴的经纪人在搜寻了全城后，终于找到了一辆私人汽车，车主同意用此车将伊莎多拉和随行人员送到威特普斯克，当然他们需付相当高的车费。

然而在归途中，悲剧却发生了。伊莎多拉在威特普斯克悠闲自得地打发着日子，直到临走也未考虑过她马上将要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演出。但她一踏上归途，便督促司机加快车速，她急于赶回列宁格勒。

那辆车已十分陈旧，全速颠簸了几俄里后便碎成两段。司机所在的前半部翻了个筋头，后半部则和乘客一起甩进了沟里。两位乘客被死死压在行李下面。

一行人在公路中间孤立无援地站立着，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终于，伊莎多拉一只手从沟里那堆行李中拎起她的提包，另一只手握住仍未镇静下来的钢琴师的手，沿着公路走去以寻求帮助。在他们身后，悲痛欲绝的司机还在那堆残骸中哭泣，他的车毁了。

走了几英里后，他们迎面遇到了一位正赶着马车辘辘而行的农民。他们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随即经过商量，他用马车将他俩、行李和司机送到了最近的普斯科夫火车站。因为到午夜才有一趟火车，伊莎多拉只好在那里拍了一份电报。那位农民是个典型的好客的俄国人，他将他们请到了他的小木屋。他们在那里同他一起围坐在茶炊旁，直到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驶来。

音乐会自然被取消了，聚集在大厅里焦急地等待着帷幕升起的观众们收到了门票退款。

几天以后，伊莎多拉带着伤痕离开了列宁格勒，甚至比以前更加穷困。

在她离开欧罗巴旅馆时，她给亲密的朋友们留下了一张未付讫的票据，做为她在此居留期间过得十分愉快的纪念。

伊莎多拉重返莫斯科时已是 6 月仲夏，学校里的孩子们正准备度暑假。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所受到的挫折迫使她设法重整旗鼓，以改善自己和学校的经济状况。回想年初收益不小的乌克兰之行，她觉得带上一些最具天资的学生赴前次未曾去过的一些乌克兰小镇演出，也许不会令人失望。

这次巡回演出始于基辅，在基辅大剧院里举行了首场演出。

伊莎多拉用德语讲授，翻译将其译成俄语，孩子们则用舞蹈动作进行表演，随即，在艾尔玛领舞的一系列舞蹈后，演出便结束了。

然而，常客们并不十分欣赏这种讲课和舞蹈融为一体的形式。他们已欣赏过伊莎多拉轻盈美妙、富于青春魅力的单人舞，所有学生合在一起也远不及她独自一人的演出动人心弦。

其他演出都是在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的伴奏下露天举行的。伊莎多拉总是独自表演前一部分——通常是瓦格纳风格的舞蹈——艾尔玛和女孩子们合演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舞曲则构成了演出的第二部分。

在基辅逗留两周后，伊莎多拉发现学校的经济条件未见好转，大部分演出所得付给了管弦乐队和旅馆。

伊莎多拉借款将艾尔玛和孩子们送回了莫斯科，随即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商讨如何继续巡回演出，以便多赚一些钱。他们计划带上一名钢琴伴奏，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斯坦、乌拉尔地区巡回演出，也许还要到西伯利亚和中国。

看上去这的确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计划。这次行程减少了管弦乐队的巨额开支以及 15 个孩子的食宿费，经过的地方又都是伊莎多拉的未曾演出过的城镇，而在这些地区她的名声又早已家喻户晓，所以此行必定会大大增强她自己 and 学校的经济实力。

同艾尔玛一起回莫斯科的孩子们因无法到农村度假，便决定为城市儿童们上课，课堂设在由伊莎多拉的老朋友波德沃斯基负责管辖的位于麻雀山的体育场。学生们身着短短的红色衣衫，学习邓肯设计的练习动作以及一些最简单的舞蹈。他们在阳光下边跳边唱革命歌曲。夏季数月，这些面色白里泛黄的城市儿童已被晒得黝黑，成了健康愉快的爱跳舞的人。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同钢琴师马克·梅奇克和经纪人季诺维也夫正在旅程上奔波。

但他们三个却屡遭失败，不仅没赚到钱，而且遭了许多罪。

8 月中旬，整个夏天都在运动场上接受舞蹈训练的孩子们得到了伊莎多拉返回的消息，聚集在位于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的校舍外面。伊莎多拉乘车离开火车站驶往学校，抵达后被迎进了学校大客厅的阳台上。在那里，她俯瞰着由 500 多名身着红衣的儿童构成的海洋。他们向她欢呼，她则报以微笑，并向他们挥舞着红围巾。随即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孩子们依次轻盈地舞过阳台，每人都将前面同伴的手高高举起。

伊莎多拉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她对身旁的人说：“见到这 500 多名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我所受的那些磨难算得了什么呢？”

当孩子们列队前往麻雀山去上每日必修的舞蹈课时，伊莎多拉无法安心留在学校休息了。她跟着他们来到了运动场。他们在此再次为她翩翩起舞，列队而行。从此以后，伊莎多拉冒着八月的酷暑，天天前往运动场为幸福的

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进步而欣喜万分。

1924年9月，伊莎多拉·邓肯掀过了她生活中俄国之旅的一页。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国演出。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充满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而她的朋友们及家人则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在这期间，伊莎多拉四处流浪，投宿于工作室和设施简陋的旅馆，有时甚至吃不上饭。他写给养女和学生艾尔玛的信反映了柏林这段生活的真实增况。

““9月底：“ ”

……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告诉你一些好消息，然而事与愿违，这项合同是一场骗局。

他们都是骗子，他们没有付款，我在这里陷入了困境！……我在柏林没有一个朋友，伊丽莎白也身无分文。

布卢特内尔大厅座无虚席，观众们热情洋溢，而评论家们则大多刻薄无礼……我一文不名，却住在一个收费高得吓人的旅馆里。……今天下午我在等待来自俄国的一位律师。当然，我可以指控他们犯有诈骗罪，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然而这对我并无多大好处……

我已全然不知所措——首批演出组织得极差，以致今后我很难再签订合同。他们有一支糟糕透顶的40人的管弦乐队，演奏总是跑调。在这里我就像囚徒般闲坐着，连要一辆出租汽车的钱都没有！

我已濒于自杀的边缘。伊丽莎白很忙，又没有钱，所以无法帮助我。……这里的报纸将我视作受雇前来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人，对我充满了敌意。实际上，这种误解多么可笑！

““10月初：“ ”

1924年我大概命中注定要陷入悲惨的处境，我仍在这里等待，天知道等待什么。柏林简直可怕。在莫斯科街上卖火柴都比呆在这里要好。……

伊丽莎白十分温柔，但却没有一分钱！我接到了你的电报，并打电报询问马霍尔姆能否为我在维也纳签订一项合同。

我花费不少时间琢磨哪种毒药能够使人比较平静地死去，我不愿选择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死法。

““11月底：“ ”

我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我正困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我签了三项合同，也被欺骗了三次。最后一项合同约定去汉诺威演出。届时，经纪人竟支付不出旅费。

他们全是一伙骗子。

我无法离开此处！旅馆已四个星期没有供给我们饮食了。一位美国朋友每天给我送来一块烤牛排，但他也没有钱。我给戈尔季耶夫打了电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伊丽莎白抛弃了我，到维也纳拜访一位富裕的朋友去了。她那所设在波茨坦的学校居然将我拒之门外。我因支气管炎病倒了两周，现在又饱受着牙痛的折磨。

我已给雷蒙德打过电报，但他远在尼斯，显然无法、也不可能为我提供任何帮助。

德国今人无法忍受，简直地狱般可怕。我无法预料今后还会遇到什么。

““12月中旬：“ ”

你为什么不答复我的电报和信件？尽管我不断地给你发航空信和电

报，六周来却从未见过你的片言只字。我焦急万分。你总没有病倒吧？学校还存在吗？在这里我无法从俄国大使馆领到护照，请想方设法为我搞到护照以及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离婚证书。愿上帝保佑他，但他不是个好丈夫。

一周内我在这这里的居留期限就要到了，因此我可能只好回莫斯科。各国都以我的“政治关系”为借口拒绝给我签证。我有什么政治关系？我的政治关系在哪里？连我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在这个极不友好的城市里，我进退维谷，茫然若失。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如果我回俄国的话，你能为我联系一个赴西伯利亚演出的合同吗？

他们甚至不发给我赴维也纳履行合同的签证。……你们很快就要为我的葬礼送花圈了。你为什么六个星期不给我发一封信或电报？

当不幸的舞蹈家在柏林陷入困境时，也有为数不多朋友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包括两位学音乐的美国学生：年轻的歌手马丁和钢琴师阿伦·科。他们仅靠有限的津贴维持生活，但他们为伊莎多拉献出了最后一分钱。他们陪伴着她，努力让她心情愉快。

当饥肠辘辘的舞蹈家收不到家人和密友的来信、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阿伦·科给巴黎的一位朋友写了信。

在那张信纸的背面，胡乱涂抹着潦草的铅笔字迹，仿佛出自一个绝望的病人之手，那是伊莎多拉的手笔。

然而，求助无效。虽然阿伦·科的朋友四处恳求，人们却无动于衷。最后，还是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凑了几百美元寄给这位处境困难的舞蹈家。伊莎多拉用这笔钱来到布鲁塞尔，塞西尔·索雷尔帮她搞到了签证。在他的帮助下，1925年1月，伊莎多拉离开布鲁塞尔，奔赴巴黎。

这时，柏林传出了伊莎多拉·邓肯准备将一生中收到的情书公之于世的消息。她一到巴黎，英美各家热衷于刊登爆炸新闻的报纸便派记者对她纠缠不休，然而她一一拒绝了他们。因为她从未想过要这样做。她说她只是在考虑撰写一部回忆录，描述自己的艺术生涯。她的艺术远比她的爱情故事更为重要。对于要求出版她现有的私人信件的荒谬提议，她充耳不闻。

巴黎的1月并不十分宜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到旅馆拜访过她。

弟弟雷蒙德多年来经营手织地毯以及衣料和布匹，生意十分兴隆。他除了在巴黎拥有两家零售店之外，在尼斯还有一所住宅和工作室。当他准备在三月份去尼斯时，他提议陪送不幸的姐姐离开潮湿多雾的巴黎，南下气候宜人的里维埃拉。他还许诺为伊莎多拉安排一间住房。

雷蒙德·邓肯是个禁欲主义者，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伊莎多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便渴望告别弟弟那些覆盖着层层手织地毯的木凳，坐上富于弹性的长沙发椅。她将此事托付给朋友乔治·莫尔韦尔，他颇能左右位于英格兰大街的内格雷斯科旅馆的经理，便说服他以极低的租金为伊莎多拉在这所高级旅馆中提供一个带有浴室的小房间。

后来，伊莎多拉在尼斯的加利福尼亚区找到了一家小剧院，这家剧院就在英格兰大街附近，便托一位朋友为她租下了这家剧院。她想，如果能在这里挂起她那蓝色的帷幕，适当修饰一番，她就能在里维埃拉社交活跃季节举行演出，甚至可能创建另一所学校。

在她的思想深处，总是潜伏着建立学校、培养儿童的念头。

尽管缺乏钱款，伊莎多拉在尼斯却过得十分愉快。她见到了许多朋友，

并结识了新交。有时，她与在尼斯北部的奇米埃兹拥有一套房间的弗朗克·哈里斯共同进餐，有时则与老朋友、作家乔治·莫尔韦尔共度傍晚的时光。

4月的一天，伊莎多拉在内格雷斯科旅馆附近的海滨浴场上闲坐时，被苍蝇叮了一下。

她对此毫不在意。但转天，她的右臂剧烈地肿胀起来，她病倒了。

伊莎多拉只得让医生用柳叶刀割开隆起的部位，此后她卧床休养了一段时间。她在患病期间无法提笔，便考虑到请人润色一下她的一些关于舞蹈艺术的文章。

然而这位伟大的舞蹈家对她的舞蹈艺术所发表的见解似乎并未引起任何一位编辑的兴趣。如果她肯撰写披露布尔什维克内情的耸人听闻的文章，她的作品必定会非常畅销。

她告诉朋友她已想到撰写一本题名为《我的布尔什维克时代》的回忆录，但她必须首先描写赴俄之前的那一段生活。然而她总认为自己不是作家，所以迟迟下不了写作的决心。她只好请弗朗克·哈里斯和布拉斯科·伊瓦涅斯来整理这些材料。并且坚持认为，这本书以他们卓越的写作才能，必定会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可是这两位文人百事缠身，给她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口授给速记员。

1925年秋，伊莎多拉从尼斯回到巴黎，投宿在多尔赛宫旅馆。她在这家大旅馆的后侧租下了一间昏暗的小屋，但她很快就无力负担这笔费用。

她的一位多年的崇拜者为她在萨布隆大街提供了一间带有家具的工作室。伊莎多拉将她寥寥无几的几件家当带到了这里：一座用闪长岩雕制的小巧玲珑的如来佛头像，她与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欧内斯特·海克尔的合影，埃莉奥诺·杜丝·戈登·克莱格的照片，一个装满信件和原稿的柳条筐，以及一些书籍。

这间工作室没有浴室，取暖需靠煤气供热器，所以并不舒适。这里也不安静，因为一个大型汽车库就在对面。

伊莎多拉在闲坐中度日，期待着转机的到来。她时常身无分文，吃不上饭。一罐豌豆或蚕豆，在电热器上煮一些咖啡，这成了伊莎多拉最大的奢侈。伊莎多拉日渐忧郁。

为了应付即将来到巴黎的潮湿的冬季，她决定迁往位于米厄特区弗良科维勒街上的一个带有家具的小公寓。

在这里，她至少拥有一间浴室、卧室和起居室，尽管它们都很狭小。这里还有一个阳台，可供她欣赏美妙的市容，时而还可以在阳台上凉上一瓶香槟酒。就是在这个地方，伊莎多拉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朋友安德烈·阿尔恩伊弗尔德，与他商量在法国共产党的赞助下创办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舞的学校。

伊莎多拉对阿尔恩伊弗尔德说：“请他们给我送来500名、1000名学生，我会让他们创造出奇迹！孩子们生来就和谐优美、生气勃勃。他们宛如洁净的陶土。可以被人们打上欢乐、生活、自然等一切印记。如果人们善于引导孩子们，让他们理解舞蹈的含义，那么所有的孩子就都会跳舞。然而形体训练是次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培育孩子们的心灵。

如果我能招收1000名孩子，我就将我的最优秀的学生从莫斯科接到这里。她们将在这所学校里担任班长，同我一起生活，由我为她们提供衣食。她们生活在我的书籍和艺术作品之中，一定会接受我的学说……但你必须向

共产党的领导人强调，要实现这一切，必须有一定的资金。”

尽管阿尔恩伊弗尔德热情相助，仍未能落实任何具体问题，而春天已经悄悄过去。

这个问题还是处于“被考虑”的阶段。

## 第十六章 横祸突至

“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1925年底，从苏联传来了叶赛宁的死讯。

他是在列宁格勒的一所旅馆里自杀身亡的，几年前，正是在这间客房中，他与伊莎多拉度过了他们的第一夜。诗人割开左腕的静脉，用鲜血写了一首《致友人》。为那个未指明的朋友写完此诗后，诗人自缢身亡。转天早晨，旅馆的服务人员发现了他的遗体。

巴黎的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并利用叶赛宁在巴黎克里永旅馆的经历以及有关他与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和美国时的一些传闻大做文章，渲染此事。

伊莎多拉向巴黎的新闻社去电，提出了下列抗议：

叶赛宁不幸的去世使我悲痛欲绝。他拥有青春、美貌和超人的天赋。然而他不满足于这些，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心灵向往着无法达到的目标，他希望压倒那些市侩们。

他毁灭了自己年轻美丽的身体，然而他的灵魂将永远活在俄国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诗人的人们的心中。对于在巴黎出版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一切无聊的不实之词，我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去世。

伊莎多拉·邓肯

艾尔玛从莫斯科来信，将叶赛宁的去世和下葬的情况通知了伊莎多拉。伊莎多拉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

谢尔盖的去世使我大为震惊，我痛哭了好几个小时。他似乎经历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系列的灾难，以致时常想到随他而去，不过我要走进大海而死。

目前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还有一个对未来的计划需要完成。

伊莎多拉租到工作室和一个小房间并布置一新以后，偶然结识了一位贫困潦倒的俄国人。他同意担任她的秘书。伊莎多拉还找到了一位钢琴师——一位身处窘境的高加索人——并开始在工作室中安排一系列演出。这些演出售票有限，仅以每张100法郎的价格卖出100张票。

伊莎多拉在工作室举办演出之后不久，里维埃拉的演出旺季就过去了。伊莎多拉对尼斯的生活也产生了厌倦之感。她将演出所得全部付给了钢琴师、花商以及租给她雪花石膏制灯的人。她打算去巴黎，却又无钱买火车票。一天清晨，她来到车库租了一辆汽车。两天后，她已抵达巴黎吕特蒂阿旅馆，并将汽车停在门外，准备随时奔赴市中心或布瓦地区。

如同在尼斯的内格雷斯科旅馆一样，伊莎多拉在吕特蒂阿旅馆也时常请来一位速记员，写下她的自传的部分章节。她的客人还包括各位朋友以及急于得到此书的经纪人和出版商。然而，大家似乎一致认为这本书“艺术味太浓了”。人们期待从舞蹈家这里得到一些秘闻，读到她的爱情经历的详情细节以及她的全部情书。

然而对于伊莎多拉来说，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的计划比出版自传更具吸引力。

她曾两三次前往俄国使馆拜访拉科夫斯基。

伊莎多拉在尼斯租下的那辆小汽车每天都停在吕特蒂阿旅馆的大门口，随时供他派遣。而汽车的租金和司机的工资也在逐日加大伊莎多拉帐单上的数额。终于，当她发现她的自传的撰写以及将孩子们从莫斯科接到巴黎的工作都一筹莫展时，便决定返回尼斯的工作室。

陪伴她乘坐汽车的有两位朋友：年轻的记者沃尔特·肖和他的朋友马塞尔·埃朗德。

贫穷并未影响伊莎多拉的极度慷慨的举止，而这恰恰构成了她为人的特点之一。她在吕特蒂阿居住时，为了经济起见在旅馆包饭。当她发现每顿饭菜的份量都相当充裕后，便轮流邀请贫困潦倒的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与她共享午餐和晚餐。每到此时，她总是加要一瓶好酒和一盘菜。这两项的开支往往就大大高于客饭的价钱。

瑞昂莱潘的日光浴和英格兰大街公寓内的简朴生活消磨了伊莎多拉愉快的夏日，然而伊莎多拉现在又已囊空如洗——为数不多的钱已被用来支付汽车的租金和司机的工资——她又想到了在工作室再次举行演出。

伊莎多拉再次聘请了那位高加索钢琴师，于9月10日举行了一场十分成功的李斯特作品专场。四天后另一场演出如期举行。

演出的帷幕垂落后，随之而来的是里维埃拉冷冷清清的演出淡季，此时夏季游客已纷纷离去，冬季客人则尚未来到。伊莎多拉苦于无所事事，变得愈来愈烦躁不安。她再次奔赴巴黎的吕特蒂阿旅馆。

伊莎多拉回到吕特蒂阿旅馆以后，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突然出现，给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她的一笔欠款在1922年还是3000法郎，然而由于不计其数的追加费用，到1927年时已超过1万法郎，她只好卖掉位于纳伊的住宅还债。前一段时间，她曾千方百计地出售这座房屋，但当时它已被抵押，并为一家香料和肥皂商租用，租约几年后才能到期。

纳伊住宅总是唤起伊莎多拉痛楚万分的回忆。她深爱的两个孩子就是从这里跑出去被塞纳河混浊的河水夺去生命的。她还在这里经历了一场令人不悦的冗长的诉讼——她的弟弟雷蒙德和学徒们从这里取走了一个澡盆和一些管子，而此时这所房子已由一位著名的法国艺术家租住，他随后提出了诉讼。

这所住宅位于美国医院附近，地皮归房主所有，因而价值连城。伊莎多拉和朋友们试图将房屋以其实际价值的几分之一价格出售，却仍无法脱手。可是法院判决的销售日期日益临近，于是，在1926年11月25日，这所住宅由法院以31万法郎的价格卖掉了。

出售的前一天，伊莎多拉得知莫斯科法院鉴于她是叶赛宁的遗孀，确定由她来继承叶赛宁的财产。

叶赛宁去世后，皇家贵族在全国出售他的诗作，赚到了这笔约40万法

郎的财产。

伊莎多拉虽然身无分文，却仍起草了一份电文。在这份电报中，她放弃了对叶赛宁全部遗产的继承权，并建议将其分赠给他的妹妹和在农村的母亲，因为她们比她更需要这笔钱。

伊莎多拉认为她回到尼斯可以更好地工作，因为她在那里请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速记员尼克森小姐，所以她很希望离开吕特蒂阿旅馆南下度过余下的冬日。然而旅馆帐单上那日渐增长的数字妨碍了她实现这一计划。她既不可能去尼斯，也不可能还帐。

幸好，名媛伊奥尔斯卡女士向伊莎多拉伸出了援助之手。伊奥尔斯卡女士虽然并没有万贯家产，却设法筹集现金付清了吕特蒂阿旅馆的费用。

伊莎多拉在年轻的俄国钢琴师的陪伴下，轻松愉快地启程前往尼斯。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一直致力于自传的撰写工作，并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重新富裕起来。她的住在纽约的一些朋友联系的一家公司终于同意让该公司驻巴黎代理人布拉德利先生起草一份关于此书的合同。公司同意预付 2000 美元，如果原稿在 1927 年 5 月底前完成，还可另加 500 美元奖金。这笔钱由布拉德利先生掌握，根据交稿情况分批付给伊莎多拉。

1927 年初，布拉德利先生带着合同由美国返回巴黎，南下来到尼斯请伊莎多拉签了字。

然而，当尼克森小姐终于赶到内格雷斯科时，伊莎多拉十分疲惫，不愿着手工作。

旅馆里已聚集着不少来客，其中有翩翩年少的富于魅力的英国艺术家加布里埃尔·阿特金和他的朋友英国记者斯托克斯。当这位年轻人围在伊莎多拉左右，正努力劝说倔强的伊莎多拉至少口述几页她的自传时，服务员送进来一个信封。

伊莎多拉从信封中取出一张记载详尽的帐单。9000 法郎！信封内还有一张由办公室印发的便条，写明如果这张帐单不能在当晚付讫，邓肯女士就必须搬出此室。

伊莎多拉不禁勃然大怒。这是她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被勒令离开旅馆。

大家焦急地研究对策。显然，伊莎多拉无力支付欠款，然而旅馆方面宣布这一决定的粗鲁无礼的方式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他们会说到做到，毫不顾及私人情面。

尼克森小姐被派出与经理商量能否改变立即付款的要求。她回来告诉大家，她只设法见到了经理助理，他表示了极大的歉意，但同时也说明这是一项新规定，必须遵守。

伊莎多拉思忖了片刻，随即给楼下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这位经理能否上来见她。

几分钟后，他来到了伊莎多拉的房间，向靠在床上的舞蹈家毕恭毕敬地鞠躬。她优雅地抬起头，注视着他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用这张微不足道的 9000 法郎的帐单来打扰我。你们毕竟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曾在这里最声名显赫的常客。我在这里度夜时曾付过这个数字的两倍或三倍的价钱。我现在手里没有钱。我在等待出售纳伊房产的钱款。”

她漫不经心地将一把有些揉皱了的法国报纸的剪报扔给这位经理，这些剪报刊登了关于纳伊房产的情况以及有关的诉讼。几小时以前，她曾把这些剪报塞进一位商人的手里，他为了催促伊莎多拉支付装饰工作室的雪花石

膏制灯的租金而与她纠缠不休。

经理彬彬有礼地看了看剪报。

伊莎多拉继续说：“我所有的钱都在巴黎，冻结在这场房产诉讼中，如果我要提取这笔钱就必须赶回巴黎。我计划明天就回那里。”

屋里其他的人都吃了一惊。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伊莎多拉这个打算。

“如果你担心这张荒唐的帐单得不到付讫的保证，我可以将我那辆轿车押在你这里，这辆车现在就停在车库里。”

经理边鞠躬边退了出去，希望自己没有给邓肯女士添加任何不便，并盼望她的事情会在巴黎理出头绪。

“这真令人恼火，”当房门轻轻关上时，伊莎多拉泰然自若地说。“太烦人了！现在我不能让他们兑现这张支票了。好吧，我们都去巴黎咖啡馆，那里的店主同我很熟，他会兑给我现金的。”

在巴黎咖啡馆，店主迎出来向这位大名鼎鼎的来宾问好。她就座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美国支票，说：“请将这张支票兑成 50 美元好吗？”

店主小心翼翼地接过支票打量着。

这是伊莎多拉的一位默默无闻的美国崇拜者的私人支票。

“在美国，这个名字如同洛克菲勒和阿斯特一样响亮。签发这张支票的人拥有百万家财，”伊莎多拉对似乎在犹豫不决的大班说。

“并不是这个原因，夫人。这张支票自去年 9 月生效，今年年底就作废了。”

“这种美国支票永远有效！”伊莎多拉既温柔又果断地说。“请兑换这张支票。”

当他返回来告知为了特殊照顾“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尊贵的客人”，这张支票将被兑换时，伊莎多拉早已要侍者端来了鸡尾酒和葡萄酒，正在与朋友商量什么样的饭菜合乎他们的口味。

夜深人静，朋友们陆续离开了这家避难所。伊莎多拉手里尚存 1000 法郎，便决定租用一辆马车将杜吉送回土伦。然而所有的马车夫都至少要价 2000 法郎才肯从尼斯赶到土伦。于是，这班人马谈笑风声地步行在英格兰大街通向内格雷斯科的路上。

转天早晨，伊莎多拉将为数不多的几件东西装在手提箱里，在关于那辆轿车的合同上签了字，乘车离开了旅馆。她将其他行李以及装有写自传的重要书信和文件的柳条筐都留在了旅馆里，尽管这些信件对于她撰写自传十分重要。

第二天，伊莎多拉抵达了巴黎。

伊莎多拉于 1927 年 2 月 6 日到达巴黎后，一些朋友们劝她在位于德朗布勒大街的新落成的工作室旅馆投宿。她看了看那里的房间，选中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这个房间设有壁炉、卧室、阳台和浴室，价格只相当于正规旅馆一个中等房间的租金。伊莎多拉和她的俄国伴奏者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伊莎多拉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纳伊房产之争。一些尊贵的名人已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开始筹集资金，以便在房产第二次被拍卖时将其买回。

与此同时，伊莎多拉一直致力于口授自传的工作，她在三、四、五这几个月份内一直忙于此事。她决心要按合同规定如期完成这项工作。

如同纽约一样，巴黎也有许多万事通传言伊莎多拉也和其他名人一样

让“代笔人”为她写书。然而，伊莎多拉的作法与平时一样，与众不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她坚持采用布拉斯科·伊瓦涅斯建议的口授方法著书，并早已亲自执笔写出了描述早年生活的前几个章节。她还眼含热泪、默默无语地亲笔完成了描述帕特里克和迪尔德丽的惨死的章节。她不忍将这不幸的情景讲给一个陌生人。

1927年的夏天来临了，许多朋友也随之从美国来到伊莎多拉身边，其中包括她自1923年以来从未见过的玛丽。艾尔玛·邓肯也从莫斯科赶来看望伊莎多拉，并向她汇报了学校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举行巡回演出的情况。

艾尔玛原准备于6月底在莫加多尔剧院举行由塞西尔·萨尔托里夫人为伊莎多拉组织的演出。演出被推迟至7月8日举行。尽管巴黎在夏季的这段时间总是处于演出淡季，剧院里却仍旧座无虚席，云集了法国和美国的观众。

莫加多尔晚会结束之后，伊莎多拉等待着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结果。这本书此时正在英美编辑们的手上传阅。8月中旬，伊莎多拉获得了第一批经济成果：英国支付300英镑购买连载权。这笔钱换成法郎仅够支付工作室旅馆的帐目。此时，伊莎多拉的一位朋友艾丽斯正准备南下前往尼斯的住所，她建议伊莎多拉和玛丽与她乘汽车同去。她还邀请了一位急于为伊莎多拉拍照的年轻的俄国电影摄影师与她们同行。

8月8日，他们启程了。途中，摄影师设法拍摄了一组伊莎多拉端坐在汽车后部的镜头。此后，出于一些人际原因，这班朋友分手了。伊莎多拉和玛丽只好在里昂换乘另一辆汽车独自上路，而艾丽斯和摄影师则继续坐在那辆车中颠簸。

伊莎多拉和玛丽抵达尼斯后，钢琴师也前来与她们聚会。他们住在一所廉价旅馆里，在沙滩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温暖愉快的日子。

时光在平静中飞快地流逝，伊莎多拉急切地盼望着在美国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消息，然而却杳无音信。他们仅有的为数不多的法郎也很快在海滩上花掉了。钢琴师借了一些钱后便赶回巴黎想办法。于是，在9月初，两位女子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11日，星期天，伊莎多拉一反常态地坐下来，写出了四封长信。她这种突然爆发的写信热情使朋友们大吃一惊。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被她称为“精神孩子”的俄国钢琴师的。

由于身边无钱，也没有希望搞到钱，玛丽勇敢地前往圣吉恩·卡普·费拉特的一座别墅拜访了正在避暑的帕里斯·辛格。

他尽管已不再是昔日那个百万富翁——佛罗里达的经济危机吞噬了他大笔的现金和债券——却仍怀念旧情，同意资助他依然倾慕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段时期内，她将编排出一组新的节目，其中包括根据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改编的舞蹈。

形势似乎有所好转。12日，星期一，伊莎多拉和玛丽愉快地去赴由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的午宴。

席间不乏揶揄和笑语，午餐即将结束时，有人提出这两位同坐一桌的伟大的美国艺术家——钱德勒和伊莎多拉——应当结婚。

当天这个玩笑不胫而走，甚至到了向纽约各报发电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伊莎多拉对一辆小巧玲珑的赛车以及它的英俊潇洒的意大利司机深感兴趣，这成了人们打趣的另一个中心内容。

几天前，伊莎多拉在一家旅馆门前见过这辆小型赛车。在餐厅的一张饭桌旁，伊莎多拉还见到一位相貌出众的年轻人——他无疑就是汽车的主人。从此，汽车和司机的影子时常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甚至与一位朋友商量了购买这辆赛车的事宜。于是经过联系，这位还拥有车库的年轻的意大利人法尔凯托准备于9月14日星期三晚前来接伊莎多拉乘车兜风，让她看看汽车的运行情况。

13日，星期二，伊莎多拉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拉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饭后，奥托伊斯夫妇将他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孩子带进屋里，介绍给这位大名鼎鼎的客人。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似一把利刃深深刺痛了伊莎多拉·邓肯心中的旧伤。她宛如被致命地刺伤一般惨叫了一声，冲出屋外。她的朋友马上追了出去，见她在静谧的大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身体随着一阵阵令人心碎的抽搐而痉挛着。

转天一清早，伊莎多拉就来到了玛丽的房间里。因为哭了一夜，她的眼睛红肿着。

她说：“玛丽，我不能这样下去了。14年来，我心里一直带着这种痛楚。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必须帮我找到一种解脱的办法。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时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我不能。”

当晚，她们在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她的同伴的思绪则正在为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困扰着。空气中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她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伊莎多拉，我预感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

“今晚我只乘车出去转转，很快就回来。玛丽，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烟吧，心情会好些。”

她们离开餐馆，回到了工作室。伊莎多拉边等法尔凯托和赛车，边打开唱机随着歌声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肩披红色羊毛围巾的伊莎多拉一把抓起色彩斑斓的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当她站在门厅里准备出发时，玛丽注视着她单薄的衣着说：“亲爱的，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会着凉的。”

“不，不用。我戴着红围巾就挺暖和了，玛丽。”

法尔凯托说：“我的汽车不太干净，您披上我的皮外衣好吗？”

伊莎多拉摇了摇头。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伊莎多拉则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她准备在司机身旁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向玛丽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伊莎多拉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似乎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汽车嘎然而止。旁观者以为这是为了让莎多拉提起拖在地面上的围巾的一角。他们走上前去，却发现伊莎多拉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了下去。他们急忙冲了上去。

司机正在边做手势边用意大利语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

母！”

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地缠在车轴上。当疾驶的汽车在距离工作室 20 米处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伊莎多拉的颈部。伊莎多拉自 1913 年 4 月便多次呼唤过的死神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只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便迅速挤碎了她的喉部，折断了她的脖颈，压裂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啜泣着拼命剪断厚厚的丝围巾，从车轮里把它抽了出来，火速把伊莎多拉送往圣罗克医院。

然而她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那里的医生们当时就宣布了她的死亡。权威们希望将遗体运往停尸所做进一步的检查，然而悲痛欲绝的朋友们却将遗体送回了位于英格兰大街的工作室，为她殓殓后任人瞻仰。

帕里斯·辛格来了，罗伯特·钱德勒来了，所有的艺术家、诗人以及穷朋友和富朋友都鱼贯走进这间撒满鲜花的烛光摇曳的静静的工作室。人们商定将遗体用火车运往巴黎，火化后将骨灰埋在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遗骸附近。

悲痛万分的辛格出面解决了一切具体问题。

9 月 16 日，星期五。在雷蒙德·邓肯、玛丽和钢琴师的护送下，安放伊莎多拉遗体的灵柩被抬上火车，运往巴黎。灵柩上覆盖着一件富丽堂皇的紫色天鹅绒斗篷，伊莎多拉生前表演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和李斯特的《葬礼》时，总是穿着它。

丧车于星期六下午到达里昂车站。当覆盖着紫绒斗篷的灵柩徐徐抬出摆满鲜花的车厢时，朋友们不禁放声痛哭。

人们将灵柩从车站运往雷蒙德·邓肯的那间小工作室。伊莎多拉曾在这里挂起陈旧的蓝色帷幕，遮盖油漆斑点和其他杂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便于休息的优美的环境。星期六一夜和星期日全天，朋友们携带着鲜花络绎不绝地赶来。

9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伊莎多拉的朋友们聚集在工作室中，准备护送她的遗体去佩尔·拉雪兹火葬场。贝多芬和肖邦的乐曲透过薄薄的墙壁和蓝色的帷幔，宛如天堂的和声传入了致哀者的耳中。

11 点钟，殡仪馆的人员将灵柩抬上了停在那里的灵车。他们将紫天鹅绒斗篷覆盖在灵柩上，并在斗篷上面放好了鲜花。接着，雷蒙德·邓肯走上前去，拿出一面他事先藏在希腊式外衣皱褶中的美国国旗，铺在棺木的末端。当人们重新摆放鲜花时，有人大概记起伊莎多拉去世时已是一位俄国公民，手提包里还带着苏维埃护照，便献上了一大束鲜红的唐菖蒲，并别上一条宽宽的红缎带，以便让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能读到拓金的悼词：

俄罗斯人民深切悼念伊莎多拉

送葬者穿过巴士底广场，通过罗居厄特大街，途经关押着不幸的处境悲惨的年轻人的残酷野蛮的监狱，抵达佩尔·拉雪兹墓地的主门。这时，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然而门外成千上万的人仍守候在那里，等候随同送葬队伍通过长长的弯弯曲曲的通道前往火葬场。

人们从灵车上抬下棺材，放入一个巨大的盒子里，由工作人员运往火化炉。此时，音乐响了起来。曾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为伊莎多拉伴奏的拉尔夫·劳顿演奏了李斯特的《葬礼》，随即卡尔韦四重奏小组奏起了贝多芬的《行板》。此后，加西亚·马尔瑟拉演唱了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

天才的艺术女神伊莎多拉·邓肯告别了人间。

